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沙俄侵华史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沙 俄 侵 华 史

第 一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沙 俄 侵 华 史

第 一 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186,000字
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1·322 定价 0.76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 是中国领土	7
第一节 唐以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与中原地 区的联系	7
第二节 唐朝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管辖	10
第三节 辽、金、元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 统治	18
第四节 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辖境	33
第五节 清初的东北疆域	49
第二章 沙皇俄国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开端	63
第一节 沙俄向东方的扩张和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63
一、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吞并伏尔加河流域	63
二、沙俄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和继续东侵	70
第二节 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开端	80
一、波雅科夫的武装入侵	80
二、哈巴罗夫的侵略罪行	89
三、斯捷潘诺夫的可耻覆灭	109
第三章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	119
第一节 沙俄侵略军的卷土重来	119

第二节	为侵略扩张服务的沙俄对华外交	129
一、	巴依科夫出使北京的前前后后	129
二、	米洛瓦诺夫和尼果赖使团	135
第三节	正义的雅克萨攻城战	146
第四节	《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160
一、	使团的派遣和谈判的准备	160
二、	尼布楚谈判和条约的缔结	170
第五节	《尼布楚条约》的性质	186
第四章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的签订	206
第一节	彼得一世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	206
一、	侵占我国蒙古地区大片土地	208
二、	义杰斯使华和沙俄对华经济掠夺	219
三、	伊兹玛依洛夫使华和中俄贸易的中断	232
第二节	萨瓦使华和《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 条约》的签订	238
第五章	俄国东正教会的侵华活动	256
第一节	俄国在华东正教会的由来和发展	256
第二节	披着宗教外衣的奸细	264
第三节	俄国商业资本的坐探	269
第四节	挂着“汉学家”招牌的文化特务	274
第五节	盘剥中国人民的吸血鬼	280
附录一	俄文参考书名译汉表	283
附录二	英文参考书名译汉表	294
附录三	俄汉人名对照表	299
附录四	俄汉地名对照表	306

地图目录

《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划定的中俄

边界示意图6—7

早期沙俄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路线示意图80—81

插图目录

风景如画的黑龙江11

明代永宁寺碑37—38

哈巴罗夫匪帮窜扰黑龙江92

沙俄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99

阿尔巴津城堡 125

清军围攻雅克萨 154

北京俄国东正教堂(北馆) 258

前 言

沙皇俄国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殖民国家。从第一代沙皇伊万四世(一五四七——一五八四年)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七年),三百多年中,沙俄一贯疯狂地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掠夺别国土地,压迫别国人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曾遭受它的欺凌、掠夺与宰割,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中俄两国关系史,实质上就是沙俄侵华的罪恶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史。

本卷叙述十七、十八世纪早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这个时期,正是沙俄版图迅速扩张,吞噬整个西伯利亚,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封建殖民帝国的时期,也是它开始争夺世界霸权的时期。作为沙皇专制制度主要社会支柱的贵族农奴主阶级,**“按照……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①力图扩大剥削范围,征服更多的“新土地”。与此同时,沙俄继西欧的一些国家之后,已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沙皇政府卵翼下兴起的俄国商人阶级,渴望扩大殖民地,夺取更多的天然富源和更广大的国外市场,用赤裸裸的暴力为资本积累开辟道路。因此,这一时

^①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全集》第21卷,第85页。

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反映了俄国封建农奴主对外征服的传统，而且带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殖民掠夺的特征。沙俄侵略者的疯狂、凶残和野蛮，同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暴行一样，都“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

征服中国是沙俄对外扩张的重要一环。早在十七世纪中叶，沙俄在西伯利亚立足未稳，就把中国当作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竟然要求清朝皇帝“率领全体臣民”“归顺俄国”，向沙皇“纳入贡赋”，“永久不渝”，如若不从，将“以武力平定之”，妄图一举灭亡中国。但是，当时中国是一个独立的、较强盛的封建国家，具有一定的自卫能力。因此，沙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沙俄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半殖民地中国的情况比较，其结果有显著的不同。

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无孔不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军事侵略占有首要的地位。同时，沙皇政府还不断施展阴谋诡计，进行外交讹诈，广泛采用重金购买、派遣间谍、策动叛乱等卑劣手段。正如恩格斯所说，沙俄在追求既定目的时，“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②

利用一切机会侵夺我国领土，是沙俄对华政策的中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

②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

心目标和突出特点。

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沙俄利用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主力南下的时机，以雅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为基地，多次派遣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①以东地区，窃据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到处抢夺财物、焚烧村庄、剽劫人口、杀戮居民，妄图把我国大片领土一口吞并。在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下，沙俄的武装入侵遭到了严重挫折，不得不接受清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倡议，同中国举行谈判。一六八九年，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清朝方面允许把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并给予沙俄以通商利益；俄方同意从黑龙江地区撤回它的侵略军队。《尼布楚条约》的订立，是出于中俄双方的需要。它是一个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缔结的平等条约。

《尼布楚条约》以后，沙俄改变策略，利用中俄在蒙古地区北部边境未曾划界的状况，乘机蚕食我国蒙古土地。清政府为了制止沙俄的侵略扩张，曾多次提议举行边界谈判，均遭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被迫中断中俄贸易。沙俄因担心边界问题影响对华贸易利益，才同意举行谈判。一七二七——一七二八年两国先后签订《布连斯

^① 贝加尔湖原系突厥语，意为“水产丰富的湖泊”。我国汉代称“北海”，元代称“菊海”，清入关前称“北海”，十八世纪初图理琛撰写的《异域录》称“柏海儿湖”，《大清一统志》称“白哈儿湖”。

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西从沙宾达巴哈东至额尔古纳河的中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已成为蒙苏边界）。通过条约，俄国获得了贝加尔湖东南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土地；中国方面暂时遏制了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继续蚕食。

至此，中俄两国的东段和中段边界都已正式规定。至于西部地区，当时沙俄边界还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很远，同中国并不接壤。沙皇彼得一世虽然图谋占领额尔齐斯河上游直至叶尔羌的中国广大西北地区，但没有得逞。

经济掠夺，是早期沙俄侵华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沙俄垄断对华陆路贸易，每年向中国输出掠自西伯利亚的大量毛皮和本国其他商品，通过不等价交换，牟取暴利，以充实沙皇的国库，并为商人阶级积累货币资本。不论《尼布楚条约》或《恰克图条约》，都使沙俄获得了扩大中国市场、发展对华贸易的极大好处。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沙俄在对华贸易方面，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处于更优越的地位。

打着传教的幌子推行殖民政策，是沙俄惯用的伎俩，也是早期沙俄对华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俄国东正教是沙俄“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①在华的俄国教士，是钻入中国心脏的沙俄奸细。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挂着“汉学家”的招牌，到处刺探政治、军事、经

^①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2页。

济、文化等机密情报，直接为沙皇政府服务，为俄国商业资本夺取中国市场效劳。他们起了沙俄的大炮和商品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

早期沙俄从陆上对中国的侵略，与明末清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从海上对我国东南沿海的侵略，遥相呼应。其中，沙俄侵华的规模最大，掠取的侵略权益最多。沙俄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①从不屈服于任何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身受沙俄迫害的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疆各族人民，为了保护家园，捍卫国土，首先举起反侵略的义旗，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抗俄斗争。这是遏制沙俄侵略的决定因素。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当时清政府实行坚决的民族自卫政策，也发挥了抗击沙俄侵略者的积极作用。沙俄侵略与中国爱国军民反抗侵略的斗争，贯穿着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全过程，构成了它的基本内容。

资产阶级学者对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说教和殖民主义的偏见，给历史真相蒙上了很厚的灰尘。沙俄御用文人为适应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对早期中俄关系史作了严重的歪曲。他们胡诌什么，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是俄国人“发现”的“新土地”，沙俄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7页。

入侵者给被占领地区带来了“文明”，《尼布楚条约》是“俄国被迫签订的割地条约”，如此等等，竭力为沙俄的侵华政策涂脂抹粉。现在，苏修全盘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继续制造谎言，伪造历史，千方百计地为沙俄侵华罪行辩护，为自己觊觎中国领土、建立一个新的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殖民大帝国制造舆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揭露沙俄侵华的罪恶，批判“侵略有理”等谬论，总结我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历史经验，对于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认识它的反动本质，加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就是我们研究沙俄侵华史的目的。

第 一 章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

第一节 唐以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在沙俄侵华史上，领土掠夺占有首要地位。我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首先遭到沙俄哥萨克军队的蹂躏。沙俄殖民主义者矢口否认武装入侵中国领土的事实，硬说上述地区是俄国人“发现”的“无主土地”，妄图一笔勾销自己的侵略罪责。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把中国政府在自己这块土地上捍卫主权抵抗沙俄入侵的正义行为，说成是对俄国的“侵略”。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在叙述沙俄武装入侵中国的过程之前，首先必须说明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从远古起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生息和繁殖的地方。

远在新石器时代，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在黑龙江上源的石勒喀洞穴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如带刻纹饰的有分支的鹿

角、野猪牙制的工具、箭镞、有肩磨制石镞等，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有的甚至完全相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出土的陶器，也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相似。这个地区的农业也是从中原传入的，当地出土的石锄、石镰等主要劳动工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殷周时代，贝加尔湖以东部落中使用的金属器如铜戈等，是直接在中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们使用的陶鬲(ǐ 利)等三足器，不仅在总体形式上和古代中原地区的三足器相符，而且制作技术也是一样的。在这同时，中原一带的金属也开始传入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上这些事实，苏联的一些考古学家，例如奥克拉德尼科夫，过去也是明确承认的。^①

据历史文献记载，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向西周“贡楮(hù 户)矢石砮(nǚ 努)”，^②建立了政治联系。公元前一〇一六年，肃慎贡使来朝时，周成王还命大臣荣伯作《锡肃慎氏命》。^③《左传》记载周朝的四境时说：

① 奥克拉德尼科夫：《石勒喀洞穴—黑龙江上游的古代文化遗存》，载《远东考古队著作集》第1卷（《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86种）；《海参崴附近砂磧半岛的古代居址》（《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12种）；《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195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第77、116、134页；《外贝加尔地区的三足器》，载苏联《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3期。

② 《国语·鲁语下》。

③ 《竹书纪年》，第9卷，周纪一；《史记》，第4卷，《周本记》。“命”是古代帝王以信物、爵位赐给臣下的诏书。

“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bó 博)，吾北土也”。^①由此可以看出肃慎与西周王朝的密切关系。

汉代(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肃慎又名挹娄，^②臣属于以今吉林省农安县为中心的夫余。夫余是汉朝的属国，隶玄菟郡。《后汉书》记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jǔ 举)接，不知其北所极”。^③《晋书》记载：挹娄“在不咸山(即长白山)北”，“东滨大海”，“北极弱水，其土界广袤数千里。”^④由此可知，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东至海岸，都是挹娄的分布地区。^⑤三国时期(二二〇——二六五年)，肃慎(挹娄)同地处北方的魏继续保持朝贡关系，曾进贡弓、楛矢石砮、皮骨铁杂铠和貂皮等物。^⑥二六五年，晋朝代替了魏，肃慎又向晋朝进贡楛矢石砮。^⑦北魏时，肃慎演变为勿吉。勿吉

① 《左传》，鲁昭公九年。

② 《后汉书》，第85卷，《挹娄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晋书》，第94卷，《肃慎传》载：“肃慎氏，一名挹娄。”

③ 《后汉书》，第85卷，《挹娄传》。

④ 《晋书》，第98卷，《肃慎传》。

⑤ 奥克拉德尼科夫也认为：“在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兴凯湖附近，以及现代的东北，几千年居住着河上渔人和农人……最初是古代的肃慎、挹娄、勿吉。”(奥克拉德尼科夫：《石勒喀洞穴—黑龙江上游的古代文化遗存》)日本学者箭内互也说：挹娄的北境“应该到达松花、黑龙两江下游”。(《满洲历史地理》，第1卷，1913年东京出版，第226页)苏联考古学家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认为弱水是“黑龙江古称”。见《古代的黑龙江沿岸》，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册，1953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第4页。

⑥ 《三国志》，第3卷，《魏书·明帝本纪》；第4卷，《陈留王本纪》。

⑦ 《晋书》，第3卷，《武帝纪》。

同北魏、东魏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四七一年到五五〇年朝贡不绝。^①同时,黑龙江上、中游一带的室韦、乌洛侯等部,也纷纷向北魏和东魏朝贡。^②到了隋朝(五八九——六一八年),勿吉被称为靺鞨(mòhé 末合),它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靺鞨贡使曾向隋文帝表示归附隋朝的愿望。^③随后,靺鞨著名首领度地稽率领千余家移居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县),隋炀帝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④室韦也相继向隋朝纳贡。^⑤隋朝是一个短暂的朝代,不久就被农民大起义的汹涌巨浪淹没了。代替隋朝的是强大的唐朝。此后,随着唐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历史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第二节 唐朝对黑龙江、乌苏里江 流域的管辖

唐朝(六一八——九〇七年)建立后,靺鞨和室韦等族纷纷归附。八世纪上半期,在俄罗斯人形成统一的国家

① 《魏书》,第100卷,《勿吉传》。

② 《魏书》,第4卷下,《太武帝纪》下;第100卷,《乌洛侯传》和《勿吉传》。

③ 《隋书》,第81卷,《靺鞨传》。

④ 《隋书》,第81卷,《靺鞨传》;《旧唐书》,第199卷下,《靺鞨传》。

⑤ 《隋书》,第2卷,《高祖纪》下;第3卷,《炀帝纪》上;第84卷,《契丹传》。



风景如画的黑龙江

七百多年以前，唐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靺鞨、室韦的统治，就开始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立行政管辖机构。

靺鞨原分为白山、粟末、汨咄、安车骨、拂涅、号室和黑水七部，其中黑水、粟末二部最为强盛。七世纪中叶以后，其他各部有的归入黑水靺鞨，有的并于粟末靺鞨。

黑水靺鞨又分十六部，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和库页岛。《旧唐书·室韦传》记载：“望建河……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流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① 俱轮泊即今呼伦池，望建河是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的总称，那河包括今嫩江和与嫩江相连的东流松

^① 《旧唐书》，第199卷下，《室韦传》。

花江，在同江县北注入黑龙江。忽汗河，金代称为胡里改江，清代称为瑚尔哈河，后改称牡丹江。那河会合忽汗河后东北流入黑龙江（望建河），所以说望建河“与那河、忽汗河合”。望建河会合那河后，流经黑水靺鞨地区，“东流注于海（即鄂霍次克海）”。居住在库页岛的黑水靺鞨称窟说部。库页是窟说的转音。这就表明，黑水靺鞨分布于今松、黑两江会合处以下的黑龙江两岸和库页岛一带。黑龙江又名“黑水”，黑水靺鞨就因居于黑龙江流域而得名。

当时，黑水靺鞨还处于比较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穴地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牧畜狩猎而外，还从事农耕。各部有“酋帅”，父死子继，世代相承。

六三一年，黑水靺鞨开始向唐朝进贡，^①从此与唐的政治关系日益加强。七二二年，唐玄宗封其酋长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②“勃利”就是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七二五年，唐朝政府根据安东都护薛泰的建议，在黑水靺鞨地区建黑水军。第二年，又在黑水靺鞨最大的部落中设置黑水州都督府，其他各部设刺史，以当地酋长为都督、刺史。都督赐姓李，并授云麾将军和黑水经略使职，由唐朝中央政府派长史监督。^③

① 《册府元龟》，第970卷。

② 《新唐书》，第219卷，《黑水靺鞨传》。

③ 《旧唐书》，第199卷下，《靺鞨传》；《新唐书》，第43卷，《地理志》七下。

黑水州都督府初属幽州都督府管辖,① 七四一年以后,转归平卢节度使管辖。②

黑水靺鞨的南面是粟末靺鞨。粟末靺鞨“依粟末水以居”,③ 粟末水是松花江上游的古称。早在武德(六一八——六二六年)初年,粟末靺鞨人已纷纷归附唐朝。④ 六六八年,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率部众移居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县),受营州都督管辖。六九六年,松漠都督李尽忠杀死营州都督;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率部东走。武则天帝皇帝为了争取乞乞仲象,封他为震国公。乞乞仲象死后,他的儿子大祚荣兼并乞四比羽的部众,以忽汗河流域为中心,降服周围各部,声势大振,“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自号震国王。七〇五年,唐中宗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去招抚,大祚荣立即归附。七一三年,唐朝以大祚荣所辖的地区为忽汗州,任命他为忽汗州都督,加封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⑤ 忽汗州都督府也称

① 《旧唐书》,第199卷下,《靺鞨传》;《新唐书》,第43卷,《地理志》七下;第219卷,《黑水靺鞨传》。

② 《旧唐书》第9卷《玄宗纪》下,载:“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年)……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又《新唐书》第225卷《安禄山传》载:“天宝元年(七四二年),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按:“两蕃”指奚和契丹,“四府”即管辖契丹族的松漠都督府、管辖奚族的饶乐都督府、管辖渤海的渤海都督府(即忽汗州都督府)和管辖黑水靺鞨的黑水都督府。

③ 《新唐书》,第219卷,《黑水靺鞨传》。

④ 《新唐书》,第43卷,《地理志》七下。

⑤ 《旧唐书》,第199卷下,《渤海靺鞨传》;《新唐书》,第219卷,《渤海传》。

渤海都督府。^①从此，粟末靺鞨“去靺鞨号，专称渤海”。^②

渤海的辖境北接黑水靺鞨，东抵日本海。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③其中在乌苏里江以东的有定理、安边、安远、率宾等府。率宾府以境内有率宾水（即绥芬河）得名，治所设在今双城子（苏联称乌苏里斯克）。考古发掘证明，率宾城规模宏伟，城内有许多宅邸、佛寺、衙署等建筑物，“屋脊上饰有精美的龙头雕塑。”^④此外，在这里还发现各种精美的金属器、瓷器和陶器，以及唐代的钱币“开元通宝”，等等。^⑤

《旧唐书》说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根据考古发现，渤海所用的文字，“大抵汉字居十之八九”。^⑥渤海还经常派人到“京师（长安）太学习识古今制度”，^⑦并抄回《唐礼》、《三国志》、《晋书》等汉文书籍。^⑧上层人物大都通晓汉族文艺，不少人能用汉文作诗。到了辽代，渤海人大批迁居今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在金代，居于辽宁

① 《新唐书》，第43卷，《地理志》七下。

② 《新唐书》，第219卷，《渤海传》。

③ 《新唐书》，第219卷，《渤海传》。参看金毓黻撰《渤海国志长编》第14卷，《地理考》。

④ 奥克拉德尼科夫：《西伯利亚古代居民及其文化》，载《西伯利亚民族志》，1956年莫斯科出版；《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第198页。

⑤ 奥克拉德尼科夫：《牡丹江东京城旁的渤海都城遗址》，载《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3期。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第201页。

⑥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第16卷，第21—22页。

⑦ 《新唐书》，第219卷，《渤海传》。

⑧ 《唐会要》，第36卷；《玉海》，第154卷。

的渤海人又迁徙到山东一带。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处，渤海人逐渐与汉族融合。到元朝末年，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一书中已把渤海人列为“汉人八种”之一。^① 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后来逐渐与女真人融合。

室韦，包括乌固素室韦、东室韦、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落俎（zǔ 阻）室韦、婆莫室韦等二十多部。各部有酋长，号称“莫贺咄”，小部千户，大部数千户，散处川谷，逐水草而居，集体狩猎。有些部落兼事农业，“剡（yǎn 眼）木为犁，人挽以耕”。部族内部没有赋税，但已出现富人。酋长死，“以子侄继，无则推豪杰立之”。^② 隋唐时大约处在原始公社的末期。

乌固素部居于“俱轮泊（呼伦池）之西南”。^③ 它的东面有移塞没、塞曷支、东室韦等部。东室韦居獯（náo 挠）越河（洮儿河）北一带。^④ 这是最南面的室韦部落。

关于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和落俎室韦的分布地区，《旧唐书》记载说：望建河自呼伦池“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⑤ 前面说过，望建河是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的合称，那河与望建河的会合处即今松花江与黑龙江的会合处。由此可知，上述室韦各部分布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1卷，《氏族》。

② 《新唐书》，第219卷，《室韦传》。

③ 《旧唐书》，第199卷下，《室韦传》。

④ 《新唐书》，第219卷，《室韦传》。

⑤ 《旧唐书》，第199卷下，《室韦传》。

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和包括石勒喀河在内的黑龙江上、中游一带。在赤塔地区,额尔古纳河、鄂嫩河、石勒喀河、乌尔卡河和尼布楚河流域,“至今还保存一些与‘室韦’相似的地名和河流名称:室韦、室维、石维、石夫卡、石凡得”。^①其中西室韦和大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流域和黑龙江上游,^②再往东,黑龙江南岸是蒙兀室韦住地,北岸是落俎室韦住地。

在室韦各部中,最北面的是婆莫室韦,隋代称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③胡布山即黑龙江以北西林木迪河源的雅玛岭。^④

总起来说,室韦的分布地区南起洮儿河一带,北至外兴安岭,西及石勒喀河一带,东邻黑水靺鞨。

室韦在武德年间开始向唐朝政府纳贡。六三〇年,唐营州都督薛万淑派人招抚东北诸部,“奚、霫(xí 习)、

① 诺维科夫—达翰尔斯基:《古代黑龙江沿岸》,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册,第5页。

② 《旧唐书》记载:“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第199卷下,《室韦传》)那河以北的大山,指大兴安岭的北端,据此可知大室韦分布于黑龙江上游。

③ 《隋书》,第84卷,《契丹传》。

④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雅玛岭,即古胡布山也,有二水出焉,北曰西林木迪河,南曰牛满河”。(该书第3页)牛满河即今苏联的布列亚河。西林木迪河即今苏联的肯林札河。西林木迪河隋代称为“深末怛(dá 达)水”,是深末怛室韦居住的地区。《隋书·契丹传》记载:“从钵室韦西南四日程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这也证明,钵室韦所居的胡布山,位于西林木迪河(深末怛水)的东北。

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①此后，唐朝为了加强对室韦地区的统治，在这里建立了都督府，归平卢节度使管辖。^②唐政府任命许多室韦首领为都督、大都督、将军、郎将等官。仅在八三九年三月，唐朝政府就发给“奚、契丹、室韦等告身（即委任状）八十九通。”^③文献记载，先后由唐政府任命为室韦都督或大都督的有和解热素、阿朱、秩叟（虫）、热论等人。^④

契丹族居于室韦的南面，分布在辽河以西，大凌河以北，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西与奚族毗邻。

契丹族来源于“东部鲜卑”，^⑤分为八部。各部有酋长，“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⑥显然是处在部落联盟的阶段。

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隋书》说它“逐寒暑，随水草畜牧”。^⑦《旧唐书》说它“逐猎往来，居无常处”。^⑧《辽史》也说：“契丹之初，草居野处，靡有定所”，^⑨“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Tián田）渔为生。”^⑩这说明契丹人

① 《资治通鉴》，第193卷；《册府元龟》，第426卷。

② 《旧唐书》记载：“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见第38卷，《地理志》。

③ 《册府元龟》，第976卷。

④ 《册府元龟》，第972卷；《唐会要》，第96卷，《室韦传》。

⑤ 《辽史》，第63卷，《世表》。

⑥ 《旧唐书》，第199卷下，《契丹传》。

⑦ 《隋书》，第84卷，《契丹传》。

⑧ 《旧唐书》，第199卷下，《契丹传》。

⑨ 《辽史》，第32卷，《营卫志》中。

⑩ 《辽史》，第31卷，《营卫志》上。

过的是半游牧半渔猎的生活。约在九世纪下半期，契丹内部在汉族影响下开始出现农业。

从五世纪中叶起，契丹族即向北魏“岁贡名马”。六四八年，契丹各部在首领大贺窟哥率领下归附唐朝。唐朝政府在契丹居住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和峭落、弹汗等十州，并任命窟哥为都督。^①唐朝还在营州设置东夷都护，“以统松漠、饶乐之地。”^②松漠即松漠都督府，饶乐即管理奚族的饶乐都督府。七四一年以后，松漠、饶乐二都督府改归平卢军节度使统辖。

唐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地方政权机构，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唐以后，辽、金、元、明、清各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继续不断地加强。

第三节 辽、金、元在黑龙江和 乌苏里江地区的统治

九世纪后期，唐朝在黄巢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日趋崩溃，地方藩镇纷起割据。九〇七年，朱温灭唐，建立梁朝。接着，在中国内部又出现了几个与梁朝并立的政权，阿保机建立的契丹国是其中之一。后来俄罗斯人称中国为 Китай，这个词就是“契丹”的转音。

阿保机，姓耶律，原是契丹迭刺部的首领。十世纪

① 《新唐书》，第219卷，《契丹传》。

② 《通典》，第200卷，《边防》十六，《契丹》。

ト見ミヒコ

初，他在一些汉族地主的帮助下，统一契丹各部，并兼并周围的一些部族，逐渐强大。九一六年，阿保机即皇帝位，国号契丹（后改称为辽）。九二六年，阿保机攻灭渤海，把渤海辖境全部并入契丹的版图。^①在此前后，分布于黑龙江流域等地的室韦、黑水靺鞨等部也相继归附契丹。辽称黑水靺鞨为“女真”，从此，女真的名称代替了黑水靺鞨。^②

渤海灭亡后，有一部分女真人开始向南迁徙，因此，女真分布很广，黑龙江中游，乌苏里江上、中游，绥芬河流域，东抵日本海，都是他们居住的地域。其中居于臧州（今开原）东北至束沫江（松花江）之间的叫做“回跋”，或称“回霸”。居于宁江（今吉林省扶余县石头城）东北，直至黑龙江中游的，叫做“生女真”。居于乌苏里江以东“极边远而近东海（今日本海）”的，叫做“东海女真”。^③迁居辽阳一带的叫做“熟女真”。在女真各部中，生女真最强盛，“地方千里，户口十余万”，分成许多部落，“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④女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熟女真比较先进，后来逐渐与其他族人融合。生女真和东海女

① 《辽史》，第34卷，《兵卫志》上。

② 《三朝北盟会编》，第3卷，记载：“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申，番语（即契丹语）讹为女真，……《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靺鞨者，……契丹阿保机乘唐衰乱，开国北方，并合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

③ 《三朝北盟会编》，第3卷。

④ 同上。

真比较落后,主要靠渔猎为生,有的也以“耕凿为业”,“富者以珠玉为饰,衣墨裘细布、貂鼠狐貉之衣”,并开始“役使奴隶”,^①大约处在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辽政府任命女真酋长为节度使,许其世袭。^②此外,辽朝还在长春路设置东北统军司,黄龙府设置兵马都部司,咸州设置详稳司等机构,管理女真各部的军政事务。^③

女真东北是五国部。五国部是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五部的总称。剖阿里,也称为“颇里”或“婆离”,分布于乌苏里江口的伯力一带,唐朝曾在这里设置过勃利州。剖阿里、颇里、婆离和伯力都是勃利的转音。奥里米部的奥里米城,在今黑龙江省绥滨县境内。^④《契丹国志》记载五国部分布地域说:“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接大海”。^⑤《三朝北盟会编》也说:“海东青出五国部,五国之东接大海”。^⑥海东青是一种珍贵的名鹰,盛产于黑龙江下游一带,因此,女真东北的五国部,其东面的“大海”,当然是鄂霍次克海。又《大明一统志》记载五国头城以东,“分为五国”。^⑦“五国头城”在今黑龙江

① 《三朝北盟会编》,第3卷。

② 《契丹国志》第10卷记载:“女真服属大辽二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兄弟相传,周而复始。”

③ 《契丹国志》,第26卷。

④ 奥里米城遗址,在今黑龙江省绥滨县。明代在这里设奥里迷驿站。清代称“鄂里米古城”,附近有鄂里米村。鄂里米是奥里米的转音。

⑤ 《契丹国志》,第10卷。

⑥ 《三朝北盟会编》,第3卷。

⑦ 天顺《大明一统志》,第81卷。

省依兰县。由此可见，五国部分布在依兰以东，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一带，东接鄂霍次克海。五国部同女真一样，来源于黑水靺鞨。九八四年，五国部归附辽朝，辽朝命他们留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治所在今吉林省农安县）都部署司统辖。五国部内各设“酋帅”，管理本部事务。一〇三七年，辽朝政府下令“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领之”。^①先后担任五国部节度使的有耶律仙童和萧陶苏斡等人。根据辽政府规定，五国部每年要向辽朝交纳实物税，“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匹”。^②辽朝还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阿姆贡河）口附近的特林（今苏联蒂尔），建筑了奴儿干城。^③

在乌苏里江以东，除了有女真人、五国部人之外，还有乌惹部人。乌惹，金代称为兀的改，元代称为斡拙或吾者，清代称为乌德赫或乌底赫，今苏联称为乌德盖。乌惹人也来源于黑水靺鞨。^④乌惹部每年向辽朝缴纳鹰、马、貂皮，作为贡赋。^⑤

室韦部分布于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流域等地。《契丹国志》记载：“太祖（阿保机）并诸番三十

① 《辽史》，第33卷，《营卫志》下，《部族》下。

② 《辽史》，第69卷，《部族》表。

③ 《元一统志》（辑本）第2卷记载：“东北曰哈州、曰奴儿干，城皆渤海、辽、金所建。”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1卷记载：契丹“谓黑水（部）为恶弱国土”。恶弱即乌惹的别译，可见乌惹来源于黑水靺鞨。

⑤ 《辽史》，第13卷，《圣宗本纪》。

六国，室韦在其中。”^①《北番地里》也说：“今契丹尽有奚、靺鞨、室韦。”^②《五代史记》也说：“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③辽在室韦部设节度使，归西北路招讨司管辖。^④

辽朝是契丹贵族联合汉族地主建立的政权，在它统治下的各族中，以汉族文化为最高，人数也最多。辽朝的典章制度，大多仿自唐朝。在礼仪方面，辽朝杂礼，“汉仪为多”。^⑤辽朝实行科举制度，考试诗文，更是完全模仿唐朝。^⑥当时有很多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移居北方，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茫茫的草原上建立起乡村和城镇。辽朝的都城临潢（今辽宁省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到处可见到来自河北、山西等地的各阶层人物，包括官吏、文人、杂技艺人、歌舞演员、僧尼道士等等。同时，也有大批契丹人移居河北、山西等地，同汉人杂处。在契丹人与汉人融合的过程中，辽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辽朝存在了二百多年，代替它的是以生女真完颜部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金朝。

生女真完颜部的先世分布于黑龙江中游一带，“随水

① 《契丹国志》，第26卷。

② 《契丹交通史料七种》，《北番地里》（录自《四库全书》《武经总要前集》，第16卷下），第2页。

③ 欧阳修：《五代史记》，第74卷，四夷附录《奚传》。

④ 《辽史》，第46卷，《百官志》；第35卷，《兵卫志》中。

⑤ 《辽史》，第49卷，《礼志》一。

⑥ 《契丹国志》，第23卷。

草为居”，“迁徙不常”。约在十世纪下半期，完颜部酋长绥可率众南迁到安出虎水（今黑龙江省阿什河）一带，“耕垦树艺”，建筑房舍，开始定居生活，部族逐渐繁盛。绥可死后，子石鲁统率部众，辽朝授给他惕隐的官职。石鲁“耀武于青岭（庆岭）、白山（长白山）”，“入于苏滨（绥芬河）、耶懒（雅兰河，也叫苏城河，在今苏联滨海边区东南）之地”，^①势力迅速扩大。到其子乌古乃时，声势更盛，从长白山、图们江、耶懒河，到黑龙江下游的五国部，都听从他的号令。^②当时，五国部节度使拔乙门叛辽，乌古乃把他擒送辽朝皇帝。为此，乌古乃被封为生女真节度使，子孙世袭此职。^③一一一三年，阿骨打继任生女真节度使时，东北各部族因不堪辽朝政府的压迫，“诸部皆怨叛，潜附阿骨打”，^④掀起反抗辽朝统治的斗争。

一一一四年九月，阿骨打集中主要兵力于来流水（拉林河），击败辽军。为了争取渤海人归附，阿骨打提出了

① 《金史》，第1卷，《世纪》。“耶懒之地”，即耶懒河流域。耶懒，元、明时称牙兰，清朝前期称为雅兰，嘉庆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开始称为苏城。一八六〇年吉林将军景淳奏称：“苏城，即古之雅兰城，在吉林（今吉林市）东南二千余里，其地崇山峻岭，滨临东海，尚有古城旧迹。苏城以东海岸，即恰喀拉等”居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4卷，第4页）。光绪年间绘制的《珲春边界地方图》标注：“苏城一名雅兰城”，“苏城河一名雅兰河”。

② 《金史》，第1卷，《世纪》。

③ 同上。

④ 《三朝北盟会编》，第3卷。

“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①并派人前往招抚。一一一五年，阿骨打即皇帝位，更汉名旻，国号大金。金兵在阿骨打的统率下，攻城夺地，势如破竹，东北的名城重镇，先后落入金兵手中。一一二〇年，辽朝的都城临潢也被金兵攻占。一一二五年，金兵俘获天祚皇帝，辽朝灭亡。

金朝的都城叫做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的白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属蒲与路、胡里改路和恤品路管辖。“路”是金朝行政区域名称，相当于现在的“省”，路设节度使为最高行政长官。蒲与路的治所设在今黑龙江省克东县西北十五里的古城，北临乌裕尔河，“乌裕尔”是“蒲与”的转音。蒲与路的辖境从治所“北至北边界火鲁火曈谋克三千里”。^②“谋克”是金朝的基层行政单位，大致一谋克管三百户。火鲁火曈谋克的位置，从位于蒲与路治所以北三千里推算，当在外兴安岭一带。蒲与路辖境东至屯河（汤旺河）流域，与胡里改路毗邻。胡里改路的治所设在今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依兰旧城。胡里改路即以治所濒胡里改江而得名。胡里改路的辖境从治所“北至边界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③“千户”即猛安，是比谋克高一级的行政单位，一猛安辖七至十谋克。哈里宾忒，元代称哈里宾或哈尔分，位于黑龙江下游敦敦

① 《金史》，第2卷，《太祖本纪》。

② 《金史》，第24卷，《地理志》上。

③ 同上。

河口(今苏联阿纽依河口)附近, 哈里宾忒猛安的治所就设在这里, 并建有城郭, 称为哈州城。恤品路的治所设在今苏联滨海边区的乌苏里斯克, 即唐代率宾府的所在地。《金史·地理志》记载: “太宗天会二年(一一二四年), 以耶懒路都孛堇所居地瘠, 遂迁于此, ……置节度使, 因名速频路节度。”^① 由此可见, 恤品路(速频路)原是由耶懒路改置, 只是将治所从东南濒海的耶懒西迁到恤品。《金史·地理志》记载金朝的疆域说: “金之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② 兀的改分布于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一带。吉里迷, 元代称吉烈灭或吉烈迷, 明代仍称吉里迷, 也称吉列迷, 清代称为费雅喀, 今苏联称为尼夫赫(十月革命前称为基里亚克), 分布于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

《金史·食货志》记载: “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 猛安、谋克民户, 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③ “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④ 在各种赋税中, 盐税也是重要的一项, 仅一一八四年蒲与、胡里改、恤品三路征收的盐税就达二万七千贯。^⑤

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至今还可以找到金代的遗址和文物。苏联考古学家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写道:

① 《金史》, 第24卷,《地理志》上。

② 同上。

③ 《金史》, 第50卷,《食货志》五。

④ 同上。

⑤ 《金史》, 第49卷,《食货志》四。

在阿穆尔州，“离米哈依洛夫区的波雅科沃村不远，保存有辽金时代的一些巨大的村落遗址和土工事废墟”。^① 在康士坦丁区新彼得罗夫卡村北端，也有金朝“女真人的城镇废墟”——“‘中国城’遗址”。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四角形城址，周围有厚实的土墙，高二至五公尺，宽六至七公尺。墙上有圆锥形滑秸泥垒的塔楼的残迹，高一公尺。墙四周有大门”。^② 奥克拉德尼科夫也写道：“金代时，今苏联的滨海地区曾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在渤海国的率宾城（后为金兵所占并焚毁）附近修建了傅尔丹城。这里保留着许多纪念金代统治者的宏伟的墓地建筑，其中包括保存完好的石雕乌龟，龟背上驮着铭有碑文和龙纹的石碑。在滨海地区到处都可见到当时的古堡、道路、矿场的废墟。”^③ 此外，在这一地区还发现大量“咸平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崇宁重宝”等宋、金中国钱币。^④ 这些考古发现，同文献记载一样，都有力地证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是在中国金朝的版图之内。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建立的王朝。

① 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古代黑龙江沿岸》，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册，第8页。

② 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古代黑龙江沿岸》，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册，第8页；《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载同上书，第3册，1955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第15页。

③ 奥克拉德尼科夫：《西伯利亚古代居民及其文化》，载《西伯利亚民族志》。

④ 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第271、384页。

蒙古族唐代称为蒙兀室韦，是室韦族的一支，原来居住在黑龙江中游一带，后迁移到鄂嫩河流域。辽代称为萌古或蒙骨，“受契丹皇帝管辖”。^① 辽朝末年，蒙古归附金朝。^② 金朝政府还把蒙古人编入军队，称为“萌骨纥(jū久)军”。^③ 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蒙古族对金叛服无常。金朝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曾派遣“小龙虎大王镇守蒙古”；^④ 并用官爵笼络蒙古族的上层人物。著名的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就被任命为札兀忽里(官名)，他的义父脱斡邻勒也同时被封为王。^⑤

十二世纪末年，金朝日趋衰微，铁木真乘机崛起，他以斡难河(鄂嫩河)为中心，先后兼并了塔塔儿、蔑儿乞、克烈、乃蛮等部，统一了大漠南北，并把势力伸展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一二〇六年，铁木真大会诸部首领于斡难河源，即大汗位，称“成吉思汗”，从此，所属诸部不分蒙古与非蒙古，都用“蒙古”这一族名。一二一五年，成吉思汗派兵进入东北地区。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子窝阔台继汗位。这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尚为金朝叛将蒲鲜万奴

① 拉施德：《史集》，俄文本，第1卷，第2册，1952年莫斯科出版，第21页。

② 《三朝北盟会编》第9卷《赵良嗣奉使录》记载，金朝使臣通知宋使赵良嗣说：“沙漠之间，是鞑靼、萌古子地方，两国君长，并已降拜了本国。”

③ 《金史》，第44卷，《兵志》。

④ 《三朝北盟会编》，第343卷，引《炀王江上录》。

⑤ 《元朝秘史》，第4卷；《元圣武亲征录》；《多桑蒙古史》，中译本，上册，1962年上海出版，第40、42页。

所割据，号称“东夏国”。一二三三年，窝阔台派皇子贵由东征，灭“东夏国”，统一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① 第二年，金朝也为蒙古所灭。一二六〇年，忽必烈继汗位，一二七一年改国号为大元。一二七九年，元军攻灭南宋。

元朝在东北地区设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简称辽阳行省），下辖辽阳、沈阳、广宁、大宁、东宁、开元、水达达等七路。黑龙江中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属于开元路和水达达路。

《元史·地理志》记载：水达达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设官牧民，随俗而治。”又载：“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② 当时混同江包括现在的松花江，以及松花江注入黑龙江以后的整段黑龙江下游。^③ 奴儿干指黑龙江口一带，有时也专指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元朝还在奴儿干设立东征元帅府，^④ 以镇守库页岛和黑龙江口一带。库页岛，元时称为“骨嵬”。一二六四年，骨嵬部骚扰吉里迷，忽必烈下令

① 《元史》，第59卷，《地理志》二。

② 同上。

③ 《元一统志》（辑本）第2卷载：“混同江，发源长白山，北流经渤海建州，会诸水东北流，经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的白城），下达五国头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北，又东北流注于海。”

④ 《辽东志》第9卷载：“奴儿干都司，……元为东征元帅府”。可见元代的东征元帅府和明代的奴儿干都司设立在同一个地方。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该书《辽海丛书》本第10页）

“征骨鬼”。①其后屡经招捕，骨鬼首领“玉善奴、瓦英等乞降”，每年向元朝政府缴纳毛皮作为贡赋。②元人黄潜描述东征元帅府的山川形势和居民生活情况说：“东征元帅府，道路险阻，崖石错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则以犬驾耙（即雪橇）行冰上，地无禾黍，以鱼代食，乃为相山川形势，除道以通往来，人以为便。斡拙、吉烈灭，僻居海岛（库页岛）”。③在东征元帅府所在地特林有一座庙宇——“观音堂”，并立有一座纪事的石碑。④在一二九七年以前，元朝已设有“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⑤一三五五年，元朝为了加强对黑龙江下游的统治，又“立吾者（斡拙）野人、乞烈迷等军民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⑥在黑龙江口一带，元朝也设有千户所，由吉烈迷人担任千户、百户等官，如“吉烈迷人百户盖分，……千户皮牙思”，“吉烈迷百户乞失乞”，“吉烈迷百户兀劝吉”等等。⑦此外，元朝还在黑龙江下游驻扎军队，守卫边疆；在水达达路设置屯田总管府，管理屯田事务。征东招讨使阿八赤

① 《元史》，第5卷，《世祖本纪》。

② （元）苏天爵：《国朝文类》，第41卷，《招捕》，《辽阳骨鬼》条。

③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第25卷，《鲁国公札刺尔公神道碑》。

④ 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第15卷载：“海边古城：（位于宁古塔）城东北三千余里，在混同江东南入海处。城外有元碑。”又《敕修永宁寺碑记》记载：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秋，卜奴儿千西，有站满泾，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这说明，在明初建永宁寺之前，这里已有观音堂存在。

⑤ （元）苏天爵：《国朝文类》，第41卷，《招捕》，《辽阳骨鬼》条。

⑥ 《元史》，第44卷，《顺帝纪》。

⑦ （元）苏天爵：《国朝文类》，第41卷，《招捕》，《辽阳骨鬼》条。

之子寄僧，就曾担任过水达达屯田总管府的达鲁花赤。^①汉人百户张成也曾奉命率所部军，携带妻儿，随同阿八赤“往水达达路屯田镇守”，“至黑龙江之东北极边”屯营。^②

黑龙江中游北至外兴安岭一带隶属于开元路。据《开元新志》记载，在开元路的北境，有“乘鹿出入”的“北山野人”。^③所谓“北山”，指的是外兴安岭。“乘鹿出入”的“北山野人”，就是游猎于外兴安岭一带的使鹿部。一二六六年，忽必烈在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南部，设置了恤品(率宾)路宣抚司。^④后来恤品路宣抚司裁撤，并入开元路。元朝还在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东的西林(失邻)河流域，设置失邻千户所；^⑤在雅兰(牙兰)河流域，设置牙兰千户所。^⑥

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等地，元代是成吉思汗弟弟哈萨尔家族的世袭封地。拉施德《史集》记载：“蒙哥汗时，术赤哈萨尔有几个老妻还活着，蒙哥很敬重她们。(术赤哈萨尔儿子)移相哥和术赤哈萨尔宗族的帐幕和游牧驻扎地，分布在蒙古东北境内额尔古纳河、呼伦池和海拉尔河一带，距斡赤斤乃颜的儿子只不干和孙子塔察儿

① 《元史》，第129卷，《来阿八赤传》。“达鲁花赤”，蒙语，意为总辖官。

② 罗福颐：《满洲金石志》，第5卷，《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

③ 转引自陈循：《寰宇通志》，第116卷，第11页。

④ 《元史》，第6卷，《世祖纪》三。

⑤ 《明太祖实录》，第175卷，洪武十八年九月甲申条。

⑥ 《明太祖实录》，第142卷，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条。

的帐幕很近”。^①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尼布楚还保存有元代树立的成吉思汗纪功碑。再往西，直至贝加尔湖一带，是巴尔忽等部的分布地区。以上各地都属于岭北行省管辖。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联系，元朝在辽阳等行省设置了许多驿站和狗站，通称为站赤。这些站赤星罗棋布，纵横交织，构成了好几条交通线。其中有通往黑龙江中游失宝赤万户府的，有通往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永明城的，也有通往黑龙江下游东征元帅府的。^②后一条交通线，以庆云站（今辽宁省开原县西北庆云堡附近）为起点，经上京（阿城南面的白城），然后沿松花江、黑龙江而下，过乌苏里江口、哈儿芬、末鲁孙等地，最后到达东征元帅府附近的末去站（也称末吉，明代称满泾站，位于亨滚河口北岸）。^③从末鲁孙至末去共有十五站，是所谓“狗站”。每站有站民二十户，狗二百只，狗车若干辆。“狗车以木为之，其制轻简，形如船，长一丈，阔二尺许，以数狗拽之。”^④

元朝还把奴儿干作为流放犯人的地方。当时的刑法规定：“诸流远囚徒，惟女直流湖广，余并流奴儿干及取海青之地。”^⑤因此，有很多汉人和其他族人被流放到这里，

① 拉施德：《史集》，俄文本第1卷，第2册，第52页。

② 《析津志》，见《永乐大典》，第19426卷；《经世大典》，《站赤》七，见《永乐大典》，第19422卷。

③ 《经世大典》，《站赤》七。见《永乐大典》，第19422卷。

④ 《元一统志》（辑本），第2卷，第220—221页。

⑤ 《元史》，第103卷，《刑法志》二。

其中有些是犯罪的官吏。例如：“脱思马部宣慰使亦怜真，坐违制不发兵，杖流奴儿干之地”；御史成珪、李谦亨被“窜于奴儿干地”；“宦者孛罗帖木儿坐罪，流奴儿干地”；“流诸王曲吕不花于奴儿干”；浙江行省平章政事“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儿干以死”，等等。^① 由于当地人民以渔猎为业，不产布帛粮食，流放者的衣食全靠从内地运送。随着流放人数的增多，运载囚粮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一三一九年，有些官员就曾指出：“有似这般运送呵，站赤每消乏的一般”。他们建议，今后对流犯应加区别，重罪“发将奴儿干地面里去”，轻罪“教这壁肇州（治所在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四站八里城）屯田里住着”。^② 这说明当时流放到奴儿干的人，为数相当可观。

元代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族，有的靠打渔为生，有的“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有的也从事耕织。元朝政府把他们编入户籍，每年征收赋税。至顺年间（一三三〇——一三三二年），水达达路交纳“钱粮”的户数有二万九百零六户。^③ 据《经世大典》记载：“女直（女真）、哈里宾、水达达等处，每岁进送鹰鹞”。^④ 《元史》也记载：“水达达分地，岁输皮革”；“征东（元帅府）末吉地（亨滚河口北岸）兀者

① 《元史》，第27卷，《英宗纪》；第29卷，《泰定帝纪》；第205卷，《哈麻传》。

② 《元典章》，《刑部》，《刑法》。

③ 《元史》，第59卷，《地理志》二。

④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第19420卷。

户以貂鼠、水獭、海豹皮来献，诏存恤三岁”。又载：岁课“恤品路布一千尺”。^①此外，吉里迷人、水达达人和女真人还有服徭役和兵役的义务。一二六三年，忽必烈就从“女直、水达达、乞烈宾（吉里迷）地，金军三千人”。^②一二六七年，又征调了“女直、水达达军三千人。”^③

第四节 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辖境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着手统一东北地区。一三七〇年，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献辽东州郡地图和兵马钱粮册籍，归降明朝。^④接着，明都指挥使马云率兵抵达辽阳，并建立行政机构——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一三七五年，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下设定辽、广宁、东宁、义州、金、复、海、盖、宁远、沈阳、铁岭、三万、辽海等二十五个卫，辖境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⑤辽东都司建立后，元朝官吏纷纷归降，其中有海

① 《元史》，第9卷，《世祖纪》六；第28卷，《英宗纪》二，第94卷，《食货志》二。

② 《元史》，第98卷，《兵志》。

③ 《元史》，第6卷，《世祖纪》三。

④ 《明太祖实录》，第61卷，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条。

⑤ 《辽东志》，第1卷，《疆域》。

西右丞相、朵颜元帅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鲸海千户和牙兰千户等。^① 一三八七年六月，明大将军冯胜率大兵进击农安等处的元军，元将纳哈出所部二十余万众归降，^② 这对明朝统一东北地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后，明朝又进军松花江、贝尔湖和斡难河流域等地，清除元军的残余势力。^③ 一四〇三年，明朝政府派人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招抚女真、吉烈迷等族人民。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说：“本朝永乐元年（一四〇三年），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招抚之。”“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④ 明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在《辽东志书序》中也说：“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咸属统内”。^⑤ 由于女真、吉烈迷的归附，明朝顺利地完成了统一东北地区的事业。

为了管理女真、吉烈迷、达斡尔、蒙古等族人民，一四

① 《明太祖实录》，第142卷，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条；第153卷，洪武十六年四月癸亥条；第175卷，洪武十八年九月甲申条；《殊域周咨录》，第23卷，《兀良哈》。

② 《明太祖实录》，第182卷，洪武二十年五月丁未条；《全边略记》，第1卷《蓟门略》，第10卷《辽东略》。

③ 《明太祖实录》，第190卷，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条；《明太祖实录》，第220卷，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条；第239卷，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巳条。

④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24卷，《女直》。

⑤ 《辽东志》，《辽东志书序》。

○三年至一四〇九年，明朝陆续在松花江、嫩江、鄂嫩河、黑龙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一百三十个卫。一四〇九年，奴儿干卫官员忽刺冬奴等进京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政府采纳这一建议，下令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等为都指挥僉事。^①一四一一年春，太监亦失哈和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领官兵千余人，乘大船二十五艘，顺黑龙江而下，在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正式设立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②

奴儿干都司直属明朝中央政府，设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僉事等行政长官，^③以及经历、吏目等其他官吏。在都司的所在地，有五百名驻防军戍守，两年轮换一次。^④此外，有时还不定期地派驻大批官兵，例如一四二七年，曾增派官兵达三千人。^⑤明朝政府还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到奴儿干巡视。例如太监亦失哈，在一四一一年至一四三三年间，就曾十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视奴儿干等地。一四一二年，亦失哈还亲自到库页岛视察。《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记载：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年），

① 《明太宗实录》，第62卷，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条。

② 《满洲金石志稿》，第2册，第3—6页。

③ 奴儿干都司建立时，以都指挥同知为最高长官，一四二七年始设都指挥使。

④ 《明太宗实录》，第94卷，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条。

⑤ 《明宣宗实录》，第31卷，宣德二年九月乙巳条。

“中官亦失哈等……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皆踊跃欢忻。”^①“苦夷”清代称为“库叶”或“库页”，库页岛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随着奴儿干都司的建立，中原地区的医生、画匠、木匠、泥水匠和铁匠等也相继来到奴儿干。在奴儿干的官吏、士兵和各种工匠中，有汉、蒙、女真等族的人。来自中原等地的各族人民，和当地居民一起，共同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东北边疆。

由于奴儿干一带地方官吏和士兵的衣食主要靠辽东都司和中原地区供给，因此，明朝政府在今吉林市附近松花江畔建立造船厂，派遣官兵制造船只，往奴儿干运送粮食和其他物品。这个地方因此就称“船厂”。明朝辽东都指挥使刘清曾经几次来此督造船只，例如《明宣宗实录》记载：“中官亦失哈等往使奴儿干等处，令都指挥刘清领军松花江造船运粮”。^②《明英宗实录》也载：“辽东都指挥使刘清与太监阮尧民等，督兵造漕舟于松花江，并捕海东青。”^③当时，刘清还在松花江边石崖上刻字题词，遗迹至今犹在，这就是有名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④

明朝还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重建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树立两座记事的石碑，一座立于永乐

① 《满洲金石志稿》，第2册，第3—6页。

② 《明宣宗实录》，第90卷，宣德七年五月丙寅条。

③ 《明英宗实录》，第4卷，宣德十年四月丁酉条。

④ 《吉林通志》，第120卷，第35页；《满洲金石志稿》，第2册，第9—10页。

十一年（一四一三年），上刻《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座立于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上刻《重建永宁寺记》。这两座石碑记载了建置奴儿干都司和兴建永宁寺的经过，碑文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书写。永宁寺位于奴儿干都司衙署的西边，这里“山高而秀丽”，“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① 因为这里有佛殿，所以后人又称为“殿山”。乾隆、嘉庆两朝的《大清一统志》都记载：“殿山，在宁古塔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北二



明代永宁寺碑

千七百二十一里，上有二碑。”^② 一八〇九年，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乘船经过特林时，曾亲见这二座石碑，不过他只是“从船中遥望，不知道碑上是否刻有文字”。^③ 十

① 《满洲金石志稿》，第2册，第9—10页。

② 乾隆《大清一统志》，第45卷，《吉林山川》；嘉庆《大清一统志》，第97卷，《吉林》。

③ 间宫林藏：《东鞑纪行》，1942年东京出版，卷下，第50页。



明代永寧寺碑

九世纪五十年代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也目睹这两座石碑耸立在特林江岸的悬崖上。^①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弄清楚碑文的内容。一八八五年，清代学者曹廷杰至特林考察，那时俄国人已在永宁寺基址上改建东正教堂，但“二碑尚巍然立于庙西南百步许”。他拓下了这两座石碑的碑文。曹廷杰还在这里发现一座古城的遗址，他写道：“由特林

喇嘛庙（指东正教堂）西北下山，沿江行里许，有石岩高数十丈，上甚平旷，有古城基，周约二三里，街道形迹宛然，瓦砾亦多。今为林木所翳，非披荆履棘，不能周知”。^②这座“街道形迹宛然”的古城遗址，无疑就是奴儿干都司的

① 瓦·巴·瓦西里耶夫：《关于黑龙江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载《帝俄科学院通报》，1896年第4期。

②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22—23页。

所在地。曹廷杰的考察结果公布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纷纷发表研究奴儿干都司和永宁寺碑文的著作。例如，一八九六年俄国人瓦·巴·瓦西里耶夫写道，根据永宁寺的碑文可以肯定，一四一一年明朝政府在奴儿干地区“建立了地方管辖机构，把奴儿干改为省一级的都司。”^① 日本人鸟居龙藏在《东北亚洲搜访记》一书中说，一九一八年他到特林考察时，石碑已被搬到海参崴博物馆。他在永宁寺遗址发掘出盖屋用的圆瓦，“瓦上有刻龙者，亦有刻鬼面者”。奴儿干都司衙署的遗址，已变为耕地，但“尚可自土中掘出当年中国人所用之陶器”。衙署附近还发现砖墓，“据俄人所传，大抵系明人葬地也”。^② 后来，苏联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也谈到：永宁寺碑文“宣扬了明朝皇帝的功绩和歌颂了他对臣民的政策。”他还谈到：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时，“在特林峭岩上还保存着中国式建筑的残体，用精制的青砖砌成的墙，以及用大块斜槽瓦建成的屋顶。”^③

上述各种历史记载、文物和中外学者的考察研究证明，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在明代曾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行政中心。

奴儿干都司建立后，明朝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加强管

① 瓦·巴·瓦西里耶夫：《关于黑龙江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载《帝俄科学院通报》，1896年第4期。

② 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第153、156页。

③ 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第288—289页。

理,又继续增设了许多卫、所。卫是次于都指挥使司的地方军政机构,设有指挥使、指挥同知、卫镇抚等官。所(千户所)是比卫低一级的单位,设有正千户、副千户、所镇抚等官。明朝万历年间编修的《明会典》记载:奴儿干地区“为卫者三百八十四,为千户(所)者二十四,为站为地面者各七”。^① 这些卫、所分布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北抵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

(一)设在鄂嫩河至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以北地区的卫:

斡难河卫,一四〇六年设立,^② 是奴儿干都司最西面的一个卫。一四一〇年,明成祖曾亲临这里,“命都督薛禄祭斡难河山川,赐名玄冥河。”^③

卜鲁丹河卫,一四〇七年设立,^④ 位于雅克萨城东北的卜鲁丹河流域。卜鲁丹河也称博罗穆丹河或博罗木达河。^⑤

古里河卫,一四〇九年设立,^⑥ 位于精奇里江上游的支流古里河流域。古里河即今苏联基柳依河。

① 万历《明会典》,第108卷。

② 《明太宗实录》,第40卷,永乐四年二月甲申条。

③ 《明太宗实录》,第70卷,永乐八年五月乙卯条。

④ 《明太宗实录》,第48卷,永乐五年三月乙卯条。

⑤ “博罗穆丹河……源出西北兴安岭(外兴安岭)南流入黑龙江。”见乾隆《大清一统志》,第48卷,第3页。参看《康熙皇舆全览图》和《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⑥ 陈循:《寰宇通志》,第116卷,第7页。

脱木河卫，一四〇六年设立。^① 脱木河也称托摩河或托漠河，是精奇里江的一条支流。^② 今天在苏联地图上仍沿用脱木河这个名称。

乞勒尼卫，一四〇九年设于乞勒尼河流域。^③ 乞勒尼河清代有奇穆尼河和奇木宁河等名称，自西北向东南流，在同江县勤得利附近注入黑龙江，^④ 即今苏联比腊河。

此外，还有设在黑龙江城（瑗珲城）西北九百里出万山（察哈颜峰）地区的出万山卫，设在精奇里江中游阿拉山区的阿刺山卫，设在瑗珲城东八百里图呀里山区的土鲁亭山卫，等等。

（二）设在黑龙江下游的卫、所：

古鲁卫，一四一二年设于古鲁河流域。^⑤ 古鲁河一名枯鲁河，《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作库噜河，在“宁古塔东北一千五百八十九里，源出库噜窝集，东南流入黑龙江”，^⑥ 即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北边的库

① 《明太宗实录》，第45卷，永乐四年八月戊子条。

② 乾隆四十九年版《盛京通志》载：“托摩河卫，托摩，国语（即满语），旧讹脱木。”（第103卷，第6页）乾隆《大清一统志》载：“托摩河在黑龙江城东北三百七十里，源出东北兴安岭（外兴安岭），南流入精奇里江，即江之上源也。”（第48卷，第3页）

③ 《明太宗实录》，第62卷，永乐七年四月癸巳条。

④ 《满洲源流考》记载：“奇穆尼卫，旧讹乞勒尼，今改正，明永乐七年置。”（第13卷）奇穆尼河在宁古塔“城东北一千三百五十里”。（《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4卷，第23页）《康熙皇舆全览图》中作“乞母尼河”，《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中作“奇木尼河”。

⑤ 《明太宗实录》，第84卷，永乐十年八月丙寅条。

⑥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27卷，第67页。

尔河。

亦儿古里卫，一四〇六年设立，^① 位于库鲁河东。亦儿古里也称伊尔库鲁。清代这里有“噶珊”（满语，意为乡）。《康熙皇舆全览图》作“伊勒枯鲁噶山”，《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作“宜尔库禄”，在伯力东北。

葛林卫，一四〇九年设于葛林河流域。^② 葛林河也称割林河、格楞河或格林河，^③ 今苏联仍称格林河，位于“宁古塔城东北二千一百二十九里，源出哲勒肯山，东流汇为克音湖而入黑龙江”。^④

钦真河卫，一四〇八年设立。^⑤ 卫址在黑龙江下游奇集湖畔。钦真是奇集的别译。^⑥ 今苏联仍叫奇集湖。

满泾卫，一四一二年设立，^⑦ 位于亨滚河口、奴儿干都司衙署的西边，这里还设有驿站。^⑧ “满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中作“莽阿臣”，在《大清一统舆图》中作“莽阿禅”。

依木河卫，一四〇七年设立。^⑨ 依木河清代称为“依

① 《明太宗实录》，第45卷，永乐四年八月戊子条。

② 《明太宗实录》，第62卷，永乐七年三月丁卯条。

③ 《满洲源流考》：“格林河卫，旧讹葛林，永乐七年置。”（第13卷）

④ 乾隆《大清一统志》，第45卷，第6页。

⑤ 《明太宗实录》，第55卷，永乐六年二月丙申条。

⑥ 《满洲源流考》载：“奇集河卫，旧讹钦真，永乐六年二月置，案奇集淀在宁古塔境内。”（第13卷）

⑦ 《明太宗实录》，第84卷，永乐十年八月丙寅条。

⑧ 《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载：“奴儿干之西，有站满泾”。见《满洲金石志稿》，第2册，第3—6页。参看《辽东志》附图。

⑨ 《明太宗实录》，第48卷，永乐五年正月戊辰条。

穆河”，“在宁古塔城东北三千一百四十八里，源出扬古岱山，东北流入兴滚河”。^①兴滚河（亨滚河）今苏联称为阿姆贡河。依木河是兴滚河的支流，今苏联仍称依木河。

朵儿必河卫，一四〇七年设立。^②朵儿必河清代称为“噶勒毕河”，今苏联称噶尔毕河。噶勒毕河与宜密勒河（也称额密勒河）汇合后流入亨滚河。^③

兀的河卫，一四〇七年设立。^④兀的河也称为乌底河或乌第河，即今苏联的乌达河。

囊哈儿卫，一四一二年设立于库页岛。^⑤库页岛明代称为苦夷或苦兀。《寰宇通志》说：“苦兀在奴儿干海东”。^⑥囊哈儿卫设在“奴儿干海东囊阿里”。^⑦囊阿里即囊哈儿，位于库页岛西北部，今苏联称郎格里。一四三〇年，明宣宗颁发谕旨，“敕遣都指挥康旺、王肇舟、佟答刺哈等仍往奴儿干都司，抚恤军民。又敕谕奴儿于海东囊阿里、吉列迷、恨古河（亨滚河）、黑龙江、松花江、阿速江（乌

①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27卷，第54页。

② 《明太宗实录》，第48卷，永乐五年正月丁丑条。

③ 乾隆四十九年版《盛京通志》，第27卷，第68页，记载：噶勒毕河“在宁古塔城东北三千四百六十七里，源出鄂锡克塔山，东北流入额密勒河”；又说，“额密勒河在宁古塔城东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源出宁聂里神山，东南流入兴滚河”。额密勒河，《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作“宜密勒河”，今苏联称为尼密连河。

④ 《明太宗实录》，第48卷，永乐五年正月戊辰条。

⑤ 《明太宗实录》，第84卷，永乐十年八月丙寅条。

⑥ 《寰宇通志》，第116卷，第11页。

⑦ 《明宣宗实录》，第69卷，宣德五年八月庚午条。

苏里江)等处野人头目哥奉阿、囊哈奴等皆受节制”。^①这也证明,库页岛和黑龙江、亨滚河、乌苏里江等地区一样,都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之下。

除上述诸卫外,黑龙江下游还有:设在萨尔布湖畔的撒儿忽卫,设在敦敦河流域的镇真卫,设在敦敦河口附近的哈儿分卫,设在敷答河(即弗朵河,清代称富达哈河)流域的敷答千户所,等等。

(三)设在乌苏里江流域的卫:

亦速里河卫,一四〇七年设立。^②亦速里河清代称乌苏里河或乌苏里江。^③亦速里河卫即因设于乌苏里江流域得名。

亦麻河卫,一四一〇年设立。^④亦麻河清代称伊瞒河或尼满河,西流入乌苏里江,^⑤今苏联仍称伊瞒河(伊曼河)。

使坊河卫,与亦麻河卫同时设置。使坊河清代称舒藩河或舒法河,“在宁古塔城东南,入绥芬河”,^⑥今苏联仍称为舒法河。

速平江卫,一四〇六年设立,^⑦“本渤海率宾府地,金

① 《明宣宗实录》,第69卷,宣德五年八月庚午条。

② 《明太宗实录》,第48卷,永乐五年三月乙巳条。

③ 《满洲源流考》,第13卷。

④ 《明太宗实录》,第68卷,永乐八年二月戊戌条。

⑤ 《满洲源流考》,第13卷。

⑥ 同上。

⑦ 《明太宗实录》,第40卷,永乐四年二月庚寅条。

之苏滨水，明之恤品河，皆此一地，今呼绥分河”。^①

此外，还有设在伯力附近的喜申卫，设在兴凯湖附近的恨克卫，设在兴凯湖南们河流域的莫温河卫，设在瑚叶河（今苏联刀毕河）流域的兀也卫，设在双城子（今苏联乌苏里斯克）的双城卫，等等。

（四）设在锡霍特山以东的卫、所：

克默而河卫，一四〇八年设立。^②克默而河清代称为克默尔河或克默勒河，位于奇集湖东南，流入鞑靼海峡。^③

兀列河卫，一四一〇年设立。^④兀列河清代称为额勒河或额埒（liè劣）河。^⑤位于锡霍特山以东，克默尔河的南面，东流入日本海。^⑥

失里卫，^⑦设子失里河流域。失里河有锡璘河、西林河等不同写法，^⑧河在海参崴东面，南流入日本海。^⑨

此外，还有设在雅兰河（苏城河）流域的牙鲁卫；设在额勒河南、岳色河流域的鱼失千户所等。

奴儿干都司各卫所的官吏，一般都由部族头人担任。

① 《吉林通志》，第12卷，第12页。

② 《明太宗实录》，第55卷，永乐六年二月丙申条。

③ 《满洲源流考》，第13卷；《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103卷，第13页；第27卷，第49页；《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④ 《明太宗实录》，第73卷，永乐八年十二月丙午条。

⑤ 《满洲源流考》，第13卷；《吉林通志》，第12卷。

⑥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大清一统舆图》。

⑦ 《辽东志》，第9卷，第9页。

⑧ 《满洲源流考》，第13卷，第11页。

⑨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大清一统舆图》。

明朝政府“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各仍旧俗，统其属”。^①这些官吏由明朝政府正式发给授职敕书（委任状），负责“抚绥属部”，“保境安民”。^②如果敕书丢失，必须向明朝中央政府申请补发。例如，一四七二年，亨滚河附近的朵儿必河卫指挥同知阿升华等“授职敕书为火所毁”，便向明朝皇帝奏明原因，请求补发。^③又如一五四〇年海西（松花江流域）桑古卫指挥佾事皇家奴奏称：“奴婢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得的职事，至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开原地方，将原领敕书失落了。今可怜见奴婢，肯（恳）再给与新敕书，好管人民。”^④

奴儿子都司各卫所的官吏一般是世袭的，治绩优异的可以提升，有些官吏还主动向皇帝申请提职。例如，黑龙江地面女真指挥使只鲁古速男秃申哥奏称：“奴婢祖父在时，边境地面往来出气力。进贡马匹、貂鼠皮，至今不曾有违。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正月十七日得的职事，今多年了，可怜见奴婢讨升都指挥职事，奏得圣皇帝知道。”^⑤海西塔麻刺卫指挥使失郎哈也奏称：“奴婢比先我祖父在时，边境上往来出气力，至今领本部百姓进贡马

① 天顺《大明一统志》，第89卷，《女直》。

② 《明英宗实录》，第49卷，正统三年十二月辛未条；第147卷，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条。

③ 《明宪宗实录》，第100卷，成化八年正月己亥条。

④ 《女真馆来文》，载《女直译语》二编，第11页。

⑤ 同上书，第34页。

匹、貂鼠皮，不曾违了。奴婢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的职事，可怜见讨升都指挥僉事。”^①等等。

明朝政府在奴儿干都司辖境内征收赋税，各卫所居民向明政府缴纳的主要是土特产，即所谓“土贡”。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的吉烈迷族交纳“海青、大鹰、皂雕、白兔、黑狐、貂鼠、阿胶、黑兔”。外兴安岭东段至海一带的“北山野人”交纳“海豹皮、海骡皮、海獭皮、爰（shū书）角（即海象牙）、鲂（fóng房）须、好刺（即各色鹿）”。鄂嫩河和呼伦贝尔等地的达达（蒙古）族交纳“马、失刺孙（即土豹）、貂鼠皮、金钱豹皮”。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的“建州、兀者等女真野人卫所，贡物与达达同”。^②这种以土特产充贡物的赋税制度由来已久，据《文献通考》记载：“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③

明政府还经常征调各卫、所居民戍守边疆和从事劳役，他们“闻命即从，无敢违期”。^④有些卫、所官员“从征有功”，“每有征调能效勤劳”，“擒捕叛亡累有劳绩”，因而受到嘉奖和晋职。^⑤

① 《女真馆来文》，载《女直译语》二编，第36页。

② 《辽东志》，第9卷，第12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④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24卷，《女真》。

⑤ 《明太宗实录》，第71卷，永乐八年八月乙卯条；第104卷，永乐十五年二月甲申条；第109卷，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条，永乐十六年二月庚戌条；《女直译语》二编，第34页。

为了便利东北和中原地区的物资交流，明朝还在开原、抚顺、广宁等地开设贸易市场，由政府派官管理，“有货者在内过宿，无货者不准入市”。^① 黑龙江等地各少数民族每年把马匹、皮货和其他土特产源源运入市场，以换取汉族聚居区出产的粮食、布匹、铁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些贸易市场的开设，对于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起了积极作用。

明朝还在东北地区设置了许多驿站，其中大部分是在元代站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奴儿干都司辖区内东西两条交通干线。往东的一条叫做“海西东水陆城站”，由底卜失站（双城县西南花园屯）起，沿松花江而下，直到黑龙江下游的满泾站止，共有五十五个城站。其中从乌苏里江口往东至享滚河口一段，驿站沿黑龙江两岸设立，冬天以狗拉雪橇为交通工具，即所谓狗站。往西的一条称为“海西西陆路”，以肇州为起点，越松花江，过洮儿河，北至雅鲁河，西达兀良河（满洲里附近）。^② 这两条干线又连接辽东都司辖境的驿站、城镇，和明朝的京师北京相通。

明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建立奴儿干都司等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就连苏联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也明确承认：明朝政府在

① 《辽东志》，第3卷，第30页；《全辽志》，第1卷，第35页（《辽海丛书》本）。

② 《辽东志》，第9卷，第11—12页。

上述广大地区“设立了地方管理机关，派遣官吏，征收年贡：皮毛和东方异常珍视的猎鹰。明朝行政机关立足最巩固的地方是沃沮故地，即滨海地区的南部和东北部。它们试图向北方继续深入，直到吉烈迷人（即基里亚克人）和苦夷（即虾夷）部落居住的黑龙江下游。一四〇四年黑龙江部落的首长曾进京朝觐，并被封为本地的军事首领。接着于一四〇九年在吉烈迷人的土地上设立了奴儿干都司”。^①

到十六世纪末，明朝国势趋于衰落，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乘机兴起，逐渐取代明朝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统治。

第五节 清初的东北疆域

建州女真于元亡以后归附明朝。一四〇三年，明朝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设置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一四一二年又设置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后升为都督佥事和右都督。^②猛哥帖木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几经迁徙，最后移置于今辽宁省浑河支流苏子河流域一带。一四四二年，明朝政府又增设建州右卫，和建州左卫、建州卫一起，合称建州三卫。

^① 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第228页。

^② 《明宣宗实录》，第99卷，宣德八年二月戊戌条。

从猛哥帖木儿开始，努尔哈赤的祖辈世代担任指挥使、都指挥使、都督僉事、都督同知和都督等官，为明王朝效力。一五七五年明朝讨伐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gǎo搞)，一五八三年讨伐王杲子阿台，这两次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觉昌安)、父塔失(塔克世)都在明总兵李成梁军中任向导，在后一次战役中，被明军误杀。后来，努尔哈赤向明朝请求升赏，说：“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①一五八九年，明政府封努尔哈赤为都督僉事。^②一五九五年加封龙虎将军。^③努尔哈赤一面做明朝的官吏，一面以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为中心，逐渐统一女真各部。明末政治的腐败，为努尔哈赤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明代，女真人共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个大部。建州女真包括苏克苏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地区东跨长白山、西至抚顺附近、南至鸭绿江、北至松花江上源。海西女真包括乌拉、辉发、哈达、叶赫等部，也称扈伦四部，分布在开原以东以北，直至松花江中游一带。“野人”女真包括许多部落，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女真各部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都过定居的农业生活，兼营狩猎和采集等副业，十五世纪中期

① 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

② 《明神宗实录》，第215卷，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条。

③ 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

已进入奴隶社会。“野人”女真主要从事渔猎和牧畜，只有少数部落兼事农耕，社会发展水平低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

努尔哈赤首先从统一建州女真着手。一五八三年，他起兵攻打苏克苏护河部的尼堪外兰，一五八四年攻打浑河流域的浑河部和佟家江流域的栋鄂部，一五八七年攻克浑河上游的哲陈部，一五八八年征哈达河上游的完颜部，一五九一年招抚鸭绿江部，一五九三年攻取长白山北麓的珠舍里部和讷殷部。前后用兵十一年，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

接着，努尔哈赤开始统一扈伦四部。一五九九年，他合并了以哈达河流域为中心的哈达部，一六〇七年合并辉发河流域的辉发部，一六一三年攻取松花江流域的乌拉部。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称汗，以赫图阿拉为兴京，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金建立后不久，又收服了叶赫河流域的叶赫部，于是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尽为后金所有。

在收服扈伦四部的同时，努尔哈赤即着手招抚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下游各部。当时分布在这一带的有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使犬部和使鹿部等，包括赫哲、恰喀拉、奇勒尔和费雅喀等族人。一六〇九年努尔哈赤出兵收服东海窝集部的瑚叶路，^①揭开了统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序幕。接着，他又派兵至图们江北岸、绥芬河流域和

^① 《满洲实录》，第3卷，第64页。瑚叶路以瑚叶河得名，该河在兴凯湖以东，西北流入乌苏里江，即今苏联刀毕河。

牡丹江一带，招服窝集部内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玛察四路。①一六一一年努尔哈赤的儿子阿巴泰台吉等招服了乌苏里江流域窝集部的乌尔古辰和木伦二路。②一六一四年努尔哈赤又遣兵收服东海窝集部的雅兰路和西林路。③雅兰路以雅兰河得名，西林路以西林河得名，这两条河都位于海参崴东面，南流入日本海。从一六一六年起，努尔哈赤又先后招服乌苏里江下游西岸挠力河流域的诺洛路、七星河流域的石喇忻路，东岸阿万河（阿翁河）流域的阿万部，和黑龙江下游的使犬路。④使犬、诺洛、石喇忻三路路长四十人亲自到兴京朝见，被任命为后金的官员。⑤清初所谓“使犬路”或“使犬部”，包括赫哲、费雅喀两族。《清朝文献通考》记载：“自宁古塔东七百余里外，沿松花江、大乌拉江（即黑龙江）直至入海处，两岸为赫哲、费雅喀所居，其往来行猎并皆以犬，即所谓使犬部也。……自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即招服使犬路，嗣后全部内附。”⑥赫哲和费雅喀都以“捕鱼为生”，

① 《满洲实录》，第3卷，第68—69页。

② 同上书，第71—72页。《吉林通志》说：“乌尔固辰路，一作库尔布新，河名也，在兴凯湖东北，入乌苏里江，路亦以河名”。（第12卷，第21页）库尔布新河是乌苏里江东边的一条支流。（《大清一统舆图》）《满洲源流考》记载：“自宁古塔东行千余里，住乌苏里江两岸者曰木伦（即木伦）。太祖辛亥年（一六一一年）征降”。（第8卷）

③ 《满洲实录》，第4卷，第16—17页。

④ 同上书，第57页；第8卷，第2页。

⑤ 《清太祖实录》，第5卷，第9—10页。

⑥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

用鱼皮做衣服，所以“俗亦谓之鱼皮部”。^① 努尔哈赤还派兵“将东海岸散居之民尽取之”，“其岛居负险不服者”，也“乘小舟尽取之”。^② 一六二六年，努尔哈赤病死，子皇太极继汗位。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在这前后，瓦尔喀和使鹿等部所属各部落相继归附，其中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尼满河流域的尼满部，阿库里河流域的阿库里部，锡霍特山以东额勒河流域的厄勒部，约色河流域的约锁部，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部和兀尔吉（乌尔吉）部，以及锡霍特山北段和黑龙江下游的使鹿部等等。^③ 原来明朝奴儿干都司所属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黑龙江下游一带，都归清朝管辖，当地各族人民便从明朝的臣民变成了清朝的臣民。

同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下游一样，原属明朝奴儿干都司管辖的黑龙江上、中游地区，也逐步转归后金管辖。^④ 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派兵收服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在黑龙江北岸连取十一寨。^⑤ 这是他统一黑龙江上、中游地区的第一步。“萨哈连”是满语“黑”的意思，“乌拉”是“江”。黑龙江古称“黑水”，萨哈连部就因居于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

② 《满洲实录》，第4卷，第60页；《清太祖实录》，第5卷，第8页。

③ 《清太宗实录》，第12卷，第41—42页；第21卷，第21—23页；第25卷，第25—27页；第37卷，第1—2页；第58卷，第24页。

④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本朝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天命年间（一六一六——一六二六年），黑龙江人次第归附。”（第271卷，《舆地》三）

⑤ 《满洲实录》，第4卷，第54—57页；《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第五排三。

黑龙江流域而得名。

招抚萨哈连部后不久，黑龙江中游北部地区的萨哈尔察部部长萨哈连也归附后金，并成了后金的额驸。^①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攻打抚顺时，萨哈连额驸随军从征，很受器重。在野营中，努尔哈赤还亲自向他讲述“金朝往事”。^②“萨哈尔察”是满语“黑色貂皮”的意思，因为精奇里江至松、黑两江会合处一带出产黑貂，后金使用它来称呼这个地区的居民。从民族成份说，当时所谓的“萨哈尔察部”，主要是指达斡尔族。^③

一六二六年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继续经营黑龙江流域。他强调指出：“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因此，对当地各民族应该采取“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的态度。^④也就是说，要着重采用招抚的办法。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黑龙江其他各部纷纷前来归附。例如：一六二七年二月，“黑龙江

① 后金和清代制度，皇族女儿的丈夫称为“额驸”。

② 《清太祖实录》，第5卷，第14页。

③ 明末清初，达斡尔族常被称为“萨哈尔察部”或“索伦部”。以清朝额驸达斡尔首领巴尔达齐为例，他有时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额驸巴尔达齐”，（《清太宗实录》，第28卷，第17页）有时称“萨哈尔察部落额驸巴尔达齐”，（同上书，第41卷，第24—25页）有时又称“黑龙江索伦部头目巴尔达齐”。（同上书，第23卷，第8页）巴尔达齐住地在精奇里江流域。据《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松、黑两江会合处以西的苏鲁河一带也是萨哈尔察部的住地。可见，萨哈尔察部分布于精奇里江至苏鲁河的广大地区。

④ 《清太宗实录》，第21卷，第14—16页。

人来朝，贡名犬及黑狐、元狐、红狐皮，白猓猓独、黑貂皮、水獭皮、青鼠皮等物”。^①一六三一年八月，“黑龙江虎尔哈部落^②托黑科等四首领来朝，贡貂、狐、猓猓独等皮”。^③一六三四年二月，“黑龙江地方羌图里、嘛尔干率六姓六十七人来朝，贡貂皮六百六十八张”，^④等等。尤其重要的是：同年五月，“黑龙江地方头目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⑤这个巴尔达齐在文献记载中有时也称“索伦部头目”。^⑥“索伦部”是清初对黑龙江上、中游的索伦（鄂温克）、达斡尔和鄂伦春等族的总称。当时索伦部有两个著名的首领，一个是巴尔达齐，一个是博木博果尔。巴尔达齐是达斡尔人，居住在精奇里江畔的多科屯，^⑦以精奇里江的江名为姓，所以叫做精奇

① 《清太宗实录》，第1卷，第20页。

② 虎尔哈部，也称库尔喀部。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称松花江虎尔哈。居住在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的称东海虎尔哈。居住在黑龙江中游一带的称黑龙江虎尔哈。

③ 《清太宗实录》，第9卷，第11页。

④ 《清太宗实录》，第17卷，第5页。

⑤ 《清太宗实录》，第18卷，第20页。

⑥ 同上书，第34页。

⑦ 《清太宗实录》，第51卷，第10页；《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5页。苏联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在谈到巴尔达齐住地时指出：一六四四年春曾在结雅河航行的瓦西里·波雅科夫，向雅库次克统领报告说，从西林木迪河口下开始，“沿结雅河两岸，住着种地的达斡尔人和巴尔达齐公爵的部众；巴尔达齐本人则住在托木河口下行有一天路程的城镇；从巴尔达齐城航行到结雅河口也有一天路程。我们认为，巴尔达齐城的遗址恰好位于从托木河口至结雅河口中途的谢米奥杰尔克村附近。”见《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3册，第24页。

里氏巴尔达齐。巴尔达齐率领族人归附后金后，索伦部的各部长也相继来朝。仅在一六三四年十月，就有索伦部长京古齐、哈拜、孔恰泰、吴都汉、讷赫撤、特白哈尔塔等，“来朝贡貂、狐皮”。^①接着，精奇里江流域的额苏里屯、噶尔达苏屯、戈博尔屯、浑秦屯、博和里屯、得都尔屯，精奇里江支流乌尔堪河畔的乌尔堪屯，以及黑龙江上游呼玛尔城对岸的吴鲁苏屯（即乌鲁苏穆丹城）等等，也先后归附后金。^②巴尔达齐由于对统一黑龙江流域有功，得到皇太极的宠信，娶了皇族的女儿，成为后金的一位额驸，其后又被封为阿思哈尼哈番（满语，意为男爵）。^③

博木博果尔在黑龙江一带也有很大的影响，上中游“南北两岸各城屯俱附之”，^④其中以雅克萨城、多金城、铎陈城、阿萨津城、额尔图屯等最为著名。一六三七年，博木博果尔归附清朝，并亲自到盛京（沈阳）朝见皇太极，贡马匹、貂皮等物。^⑤同年，他在清朝将领俄尔多木的统率下，至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搜捕逃人。博木博果尔归附以后，清朝迅速地统一了整个索伦部。《清朝文献通考》记载：“索伦、达呼尔（达斡尔）二部，居东北境之额尔古纳河及精奇尼（里）江之旁，……并服属于太宗文皇帝（皇太

① 《清太宗实录》，第20卷，第30页。

② 《清太宗实录》，第23卷，第26—27页；第39卷，第2页；第51卷，第10页。各屯位置参看《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③ 《清太宗实录》，第28卷，第17页；《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5页。

④ 《黑龙江志稿》，第54卷，《博木博果尔传》。

⑤ 《清太宗实录》，第35卷，第3页。

极)”。^①精奇里江畔的额苏里屯以东“约六日程，有未通者三十九屯”，也在一六三七年臣属清朝，缴纳贡赋。^②

贝加尔湖以东各部，也先后纳入清朝的管辖之下。一六三四年，游牧于鄂嫩河、尼布楚一带的蒙古族茂明安部前来归附，皇太极曾特开“大宴”，隆重庆祝。^③一六三六年，清朝军队到达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招服了当地的使鹿部。^④在这以后，至一六四〇年，清朝又两次派军队到温多河(鄂嫩河下游支流)以西地区和齐洛台(今苏联赤塔)一带。^⑤

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的经营，明朝奴儿干都司的辖境，全被清朝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一六四二年，皇太极致书明朝崇祯皇帝说：“予纘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迹诸国，在在臣服”。^⑥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清朝的东北疆域。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各族归附清朝后，很大一部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

② 《清太宗实录》，第34卷，第10页。

③ 《清太宗实录》，第20卷，第33—34页；《清圣祖实录》，第143卷，第14页。

④ 《清太宗实录》，第30卷，第6页。

⑤ 《清太宗实录》，第36卷，第3—7页；第48卷，第8—9页；第51卷，第8—10页；第53卷，第20—21页。

⑥ 《清太宗实录》，第61卷，第3页。

分迅速与满族融合。“满族”的名称出现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皇太极鉴于归附后金的民族日益增多,需要有一个包括女真人和同女真人融合的其他族人在内的统一名称。一六三五年,他正式宣布废除诸申(即女真)族名,改称满洲,这就是满族名称的由来。《八旗通志·八旗满洲谱系》记载了六百二十五个满族姓氏和分布地区,其中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姓氏有一百三十九个,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强,由此可见,黑龙江流域的居民是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许多地名都来源于满语(女真语),例如,“萨哈连乌拉”(黑龙江)就是满语,“萨哈连”是“黑”,“乌拉”是“江”。沙俄把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称为“萨哈林”,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外兴安岭的“兴安”,意思是“极寒处”。黑龙江下游北岸的格林河的“格林”,意思是“众多”。黑龙江下游南岸的著名湖泊“奇集”,也是满语,意为“海参”。乌苏里江的“乌苏里”,意为“天王”。纵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大山“锡霍特阿林”也是满语,“锡霍特”是“牲畜短少”的意思,“阿林”是“山”。^① 乌苏里以东的毕歆河、尼满河和阿库里河,也都是满语,“毕歆”意为“鞍辔饰件”,^② “尼满”意为“山羊”,“阿库里”也称“阿库密”,意为“鱼皮衣”,如此等等。

① 俄国人阿尔谢尼耶夫在《在乌苏里边区的密林中》说:“在古代中国地图上,这座分水岭被称为锡霍特—阿林。当地汉人称为锡霍特岭”,在锡霍特—阿林山口有一座小庙,“庙旁写着‘山门镇威’,‘昔日秦国为大帅,今在大清镇山林’”。见该书1951年莫斯科版,第118、174页。

② 毕歆河,也写为“必兴河”或“毕新河”,今苏联称为毕金河。

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曾经指出，“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是“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①这一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居民，有的直接编入满洲八旗。八旗制度始建于努尔哈赤时期，是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组织，以牛录为基层单位，设牛录章京统辖。在《清太宗实录》中，就记载了大批索伦牛录章京的名字。^②编入八旗的人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负有平时生产、战时出征的义务。八旗中的有名氏族那木都鲁氏（住绥芬河流域），富勒察氏（住乌苏里江下游一带），鄯扎氏（住乌苏里江、雅兰河流域），阔绰里氏（住阿库里河流域），乌扎拉氏（住黑龙江下游），精奇里氏、博和里氏、郭贝勒氏、噶尔达苏氏、额苏里氏（都居住精奇里江流域），鄂卓氏（居雅克萨城）等，都出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③其中索伦兵勇敢善战，在清初卓著战功，被誉为八旗劲旅。没有编入八旗的居民，清政府也把他们编为户籍，以村屯或氏族为单位，“各设姓长（族长）、乡长，分户管辖”。^④这些村屯遍布于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直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库页岛上著名的村屯有普隆霭、伊对、特肯、拉喀、萨伊、皮伦冈、额里野等。各村屯“有警则声气相通，安常

①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页。

② 单是崇德六年（一六四一年）六月甲寅一条，就载有十六个索伦部牛录章京的姓名。见《清太宗实录》，第56卷，第6页。

③ 《满洲八旗姓氏通谱》，第21、26卷；《满洲八旗通志》二集，《八旗满洲谱系》；《勤勇公纪恩录》。

④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

则渔猎得所”。^①八旗制度和姓长、乡长制度的建立，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卫、所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此外，从努尔哈赤时起，清政府就在宁古塔设官镇守。一六三六年，皇太极任命吴巴海为镇守宁古塔副都统，从此，宁古塔便成为清政府统治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政治中心。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各民族要定期向后金（清朝）缴纳贡赋。索伦部、萨哈尔察部、虎尔哈部、使鹿部、使犬部等，每年缴纳貂、狐、猞猁、海豹、水獭等毛皮，如一六二七年萨哈尔察部缴纳“貂、狐、猞猁皮”，^②一六二九年虎尔哈部缴纳“海豹皮”，^③一六三四年索伦部缴纳“貂、狐皮”，^④一六三五年使犬部缴纳“黑狐、黄狐、貂鼠、水獭等皮”，^⑤一六四一年东海库尔喀部缴纳海豹皮，^⑥一六四二年使鹿部缴纳貂皮，^⑦等等。在缴纳的各种土特产中，貂皮是最重要的一项。《清朝文献通考》记载：“索伦、达呼尔为东北最远之部，散处山林，以捕貂为业，亦称树中人。自国初天命、天聪年间，即相率内附。其后列于军伍，多以材勇自效。至于鄂伦春，一名奇勒尔，其所居益为辽远，使马鄂伦春在诸部之外，使鹿鄂伦春又在使马之

① 《吉林通志》，第17卷，第30页。

② 《清太宗实录》，第3卷，第38页。

③ 《清太宗实录》，第5卷，第18页。

④ 《清太宗实录》，第20卷，第30页。

⑤ 《清太宗实录》，第22卷，第3页。

⑥ 《清太宗实录》，第58卷，第22—23页。

⑦ 同上书，第24页。

外。……特以丰貂之产岁时献纳。”①《卜魁纪略》也记载：“混同江（黑龙江下游）以东有喜鲁林山，山在江之南，为奇勒尔、赫哲人等所居。江岸之北有库鲁河（今苏联库尔河）、奇穆尼河（今苏联毕腊河）。库鲁河以西，奇穆尼河以东，亦奇勒尔、赫哲人等所居。又东有阿克特里山，又东北为费雅喀人等所居。混同江口（即黑龙江口）有看舟河，会江入海。隔海有岛（库页岛），为费雅喀人等、库叶人等、鄂伦春人等所居。皆岁应贡貂。”② 乌苏里江以东的恰喀拉族人间年五月会集于尼满河地方，“交纳貂皮”。③ 库页岛居民每年交纳貂皮的地点，是在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乡。④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远在一六四三年沙俄侵略者第一次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以前，清朝已代替明朝对这个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管辖。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外兴安岭以南的整个东北地区，由盛京总管统辖。一六四六年，改总管为按班章京。⑤ 一六五三年，清政府把盛京按班章京所辖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和尼布楚等地，划为单独的行政区，在原设的宁古塔副都统之上，增设宁古塔按班章京，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管辖。一六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 271 卷，《舆地》三。

② 英和，《卜魁纪略》。

③ 《清朝文献通考》，第 271 卷，《舆地》三。

④ 同上。

⑤ 《清世祖实录》，第 7 卷，第 5 页；《清朝文献通考》，第 271 卷，《舆地》三。

六二年，宁古塔按班章京改称宁古塔将军。一六八三年，清政府又把原属宁古塔将军管辖的亨滚河上源支流哈达乌拉河、黑龙江北岸的毕占河以及东流松花江等河流以西之地分出，划为黑龙江将军辖区；这些河流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仍归宁古塔将军管辖。^①黑龙江将军的治所最初设在黑龙江左岸的旧瑗珲城，^②即今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精奇里江东岸的维肖洛耶村。^③

总而言之，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从远古起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繁衍的地方。早在俄罗斯人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好几百年以前，这个地区已经纳入了中国唐朝的版图，从那时起，一直由中国历朝政府所管辖。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府管辖这一地区已有近千年之久，而当时俄国人甚至连黑龙江是什么样子都还没有看见过。有些沙俄的御用学者胡说黑龙江地区是俄国人“发现”的“无主土地”，“原为俄国所有”，“从来不属中国”。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捏造。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无论沙俄侵略者歪曲历史的本领有多大，也无法勾销这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

①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2卷，第23页；《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

②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③ 舒尔曼：《马克的黑龙江之行》，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4册，1958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第116页。

第二章

沙皇俄国侵略 黑龙江地区的开端

第一节 沙俄向东方的扩张和 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一、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吞并伏尔加河流域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即中国唐朝政府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立行政管辖机构七百多年以后，俄罗斯才形成统一的国家。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是由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在俄国古代文献《伊巴节夫编年史》中，公元一一四七年才第一次提到莫斯科这个地名。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人西征，拔都于一二三八年焚毁莫斯科，把东欧平原上处于封建分裂状态的罗斯诸公国并入了钦察汗国的版图。十三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幼子丹尼尔（一二七六——一三〇三年）得莫斯科为世袭领地，才开始有了莫斯科公国。

最初的莫斯科公国，只占有地处东北罗斯的莫斯科

河中游的一小片土地。十四世纪时，它已发展成这一带的商业中心，并通过收买或征服邻近诸侯，逐渐扩展领地。丹尼尔的次子伊万（一三二五——一三四一年）继位时，由于富甲东北罗斯而获得了“卡里达”（意即“钱袋”）的绰号。伊万·卡里达以重金奉承金帐汗（即钦察汗），亲自出马替汗镇压罗斯诸侯的叛乱，博得了汗的欢心。一三二八年，金帐汗乌兹别克封伊万·卡里达为“大公”，赋予他代汗向罗斯诸侯征收赋税的权利。从此，莫斯科获得了“大公国”的头衔，开始把金帐汗对东北罗斯诸侯的统治权抓到自己的手里。^① 马克思指出：“伊万·卡里达由于充当了金帐汗的忠顺走卒而得以窃取汗的权力来对付与自己竞争的诸侯并统治自己的臣民。”“伊万·卡里达利用了汗，借其帮助打倒了最危险的敌手并扫除了侵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② 伊万·卡里达的后代直到伊万三世（一四六二——一五〇五年）都一贯奉行这一政策。

十四——十五世纪，东北罗斯的居民逐渐形成为操同一语言的俄罗斯民族。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伊万三世及其子瓦西里三世（一五〇五——一五三三年）通过兼并其他俄罗斯诸侯的领地，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

① 塔吉谢夫：《俄国史》，第5卷，196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84—85页；索洛维约夫：《俄国通史》，第2册，第3卷，1960年莫斯科出版，第231—232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秘密外交史》。转引自鲍爵姆金等编：《外交史》，第1卷，1941年莫斯科出版，第130页。

家。^①一四七六年，伊万三世停止向钦察汗缴纳赋税，并于一四八〇年率军挡住钦察汗军队的进攻。从此，莫斯科大公国摆脱了钦察汗国的控制。一四八九年，伊万三世自称“上帝所恩赐的全俄罗斯大君主”。到瓦西里三世时，俄罗斯所有的土地都并入莫斯科大公国的版图，其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及德聂伯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②面积共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③

当时，在俄国的东南边疆之外，东起额尔齐斯河下游、西到克里米亚半岛、包括伏尔加河中、下游这一大片原钦察汗国的领土，仍归鞑靼人^④所有。它们分别属于从钦察汗国分裂出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喀山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同俄国接壤。十六世纪以前，莫斯科当局在东南边境建立了一条碉堡线：东起尼什·诺夫哥罗德，沿奥卡河而至谢尔普霍夫，再从谢尔普霍夫延伸至图拉和科节里斯克。

① 一四七八年兼并了诺夫哥罗德；一四八五年兼并了特维尔；一五〇三年兼并了车尔尼戈夫；一五一〇年兼并了普斯科夫；一五一四年兼并了斯摩棱斯克；一五一七年兼并了梁赞。见帝俄《大百科全书》，第16卷，“俄罗斯”条，1904年彼得堡出版，第514—515页。

② 潘克拉托娃等编：《苏联通史》，第1卷，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152页。

③ 沙哈罗夫：《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式》，载苏联《历史教学》杂志，1961年第4期。

④ 鞑靼即塔塔儿，原系我国漠北各部中势力最大的一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将它并入。“鞑靼”一词一度成为蒙古各部的通称。蒙古人西征时，中亚人和欧洲人把他们统称之为“鞑靼”。钦察汗国的鞑靼人是由突厥化了的蒙古人和当地居民，主要是操突厥语的居民融合而成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奥卡河边防线”，即俄国的东南国界线。^①至于西伯利亚汗国以东的亚洲北部各民族，与俄罗斯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十五、十六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莫斯科政权是俄国封建农奴主利益的集中代表，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农奴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一四九七年，伊万三世颁布法令，规定农民只准在结清一切帐目后，于“犹里节”（即俄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后各一个星期中离开封建主他往。一五八一年，伊万四世明令五年内不实行“犹里节”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取消了农民在这一期间离开封建主的权利。此后，封建主出卖土地得连同农奴一起出售，农奴制的基本特征——生产者（农奴）对土地占有者（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在法律上固定下来。

俄国封建农奴主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莫斯科政府的政策：在对内“**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农奴的束缚**”的同时，对外“**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②十五世纪下半叶伊万三世当政时，俄国迈出了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开始了对东北方一些弱小民族地区的侵略：一四七二年侵占彼尔姆，一四八九年侵占维亚特卡，一四九九——一五〇〇年侵占乌格拉。伊万三世还借口他娶拜占廷帝国（东罗

①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1947年莫斯科出版，第328页。

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81页。

马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亚为妻,自命为拜占廷帝国的“继承人”。十六世纪初,俄国统治集团更公然发出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叫嚣。普斯科夫修道院的僧侣菲洛费上呈瓦西里三世的报告,集中表达了当时俄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图,他写道:“莫斯科是伟大的世界首都,是古罗马和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而第四罗马是不会有的。”^①这是俄国妄图永远称霸世界的野心的第一次大暴露。

一五四七年,伊万四世开始亲政。他在加冕典礼上正式宣布采用古罗马皇帝“恺撒”的称号,自称“沙皇”(拉丁名“Caesar——恺撒”在俄语中发生音变,读作“Царь——沙皇”)。从此,“沙皇”成为俄罗斯君主的专称。这一事实表明:伊万四世不但决心在国内确立起象古罗马皇帝那样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在国外也要步凯撒的后尘,为实现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而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扩张。

伊万四世为了加强他的统治,把一些封建领主及其家族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把他们的领地分封给为他效劳的军事贵族、农奴主和教会。这些社会势力作为沙皇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沙皇政府为了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贪欲,从此加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① 葛列科夫等编:《苏联通史》,第1卷,1948年莫斯科出版,第287—289、296—297页。

俄国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说：“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向国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①伊万四世对周围各国的领土扩张是从“向东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开始的。^②喀山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土地富庶，首府喀山城是东方商道的枢纽，南经伏尔加河可通里海、阿塞拜疆和波斯，东溯卡马河越乌拉尔山^③可达盛产毛皮的西伯利亚汗国，地势扼要，因此成为伊万四世向东扩张的第一个目标。

一五四九——一五五〇年，伊万四世派军队远征喀山，惨败而归。但他仍不甘心，于一五五一年夏卷土重来，在靠近伏尔加河岸面对喀山城的地方，构筑斯维雅日斯克堡砦，作为进攻据点。一五五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沙皇亲自到斯维雅日斯克督战，二十五日率军十五万人渡伏尔加河，包围喀山城。他极力煽动宗教狂热，借口“保卫东正教”，驱使士兵去进攻“不信上帝的喀山人”。喀山鞑靼守军总共只有三万三千人，他们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英勇抗击沙俄军队的进攻，坚持了长达七个星期的浴血战斗。一五五二年十月十一日，喀山陷落。沙俄侵略军按照伊万四世“把喀山城的守卫者斩尽杀绝！”的

①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历史教程》，第1分册，1911年莫斯科第4版，第24—25页。

② 高尔基、斯大林等主编：《苏联国内战争史》，第1卷，1936年莫斯科出版，第58页。

③ “乌拉尔”一词源出鞑靼语，译意是带子。乌拉尔山由北向南延伸，构成欧亚两洲的分界。

命令，将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害，把妇女小孩连同财物掳掠一空。^①

但是，喀山汗国的各族人民（鞑靼人、玛里人、乌德摩尔梯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并未因城陷而终止。他们经常挫败俄军，甚至俘虏了俄国统领。斗争延续了六年之久。后来，由于喀山封建主的出卖，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才于一五五八年被镇压下去。沙皇把喀山汗国的土地分封给从莫斯科派来的军官、官吏和东正教会，汗国的各族人民则沦为农奴。

阿斯特拉罕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下游，与喀山汗国唇齿相依。伊万四世攻占喀山城后，就把侵略锋芒转向阿斯特拉罕。起先，莫斯科当局计划采用扶植傀儡的办法，使独立的阿斯特拉罕汗国变成俄国控制的仆从国家。一五五四年夏，沙俄把捷尔必失汗扶上台，同时派俄国的“东方通”普·屠格涅夫充任汗的“顾问”，规定汗国每年应向莫斯科进贡四万铜币和三千条鱼，俄国人享有进入阿斯特拉罕水域捕鱼的特权。但是，捷尔必失汗并不甘当傀儡，他在国内抗俄力量的支持下赶走了俄国“顾问”。一五五六年莫斯科派来大批军队，捷尔必失汗率众抵抗失败，阿斯特拉罕终被沙俄吞并。至此，整个伏尔加河流域落入了沙俄之手。

^① 塔吉谢夫：《俄国史》，第6卷，196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205—218页。

二、沙俄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和继续东侵

恩格斯指出：沙俄的对外扩张决不会半途止步，在它实现建立世界帝国野心的道路上，“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①。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以后，伊万四世随即策划继续东侵，向西伯利亚展开大规模的领土掠夺活动。当时沙俄正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与瑞典、立陶宛等国进行立沃尼亚战争（一五五八——一五八三年），无力向东方派出足够兵力，决定授权斯特罗干诺夫家族去完成这一使命。

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是乌斯丘格和彼尔姆地方许多盐场的所有者，是当时俄国的头号大商人。他们不仅在全国各地，而且也在西伯利亚等国外地方经商，销售的自产商品种类繁多，有食盐、铁器、干鱼等。他们从南方收购谷物，长途贩运北方；用玻璃珠、铃铛等廉价物品同西伯利亚人“交换”黑貂和北极狐等贵重毛皮，顷刻间获得神话般的巨利。他们还向远方国家出售蜂蜡和皮货，换回丝绸、呢绒和奢侈品。十六世纪后期，在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企业中劳动的雇工计有一万人，农奴达五千人。这个家族还替沙皇向北方少数民族勒索“毛皮税”，并接受国家的订货和包工。^② 一五五八年，伊万四世宣布把卡马

^① 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页。

^② 维坚斯基：《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商业家族》，1924年列宁格勒出版，第160—163页。

河中游和楚索夫河(卡马河的支流)流域这片当时根本不在俄国境内的土地“赐给”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授与在该地拓地殖民、筑城建寨、招募兵丁以至镇压当地居民的“全权”。^①一五七四年,沙皇又“特许”他们“越过乌格拉石崖(即乌拉尔山)进占塔格切、托博尔、额尔齐斯、鄂毕等河流域”,^②向独立的西伯利亚人民展开侵略活动。

沙俄入侵亚洲北部的第一个对象是位于乌拉尔山脉东边的西伯利亚汗国。这个鞑靼汗国最初的首都在秋明^③,后迁伊斯坦城。最先来伊斯坦城的俄商随东方国家商人称此城为失必儿(与西伯利亚是同名异译),并称其国为西伯利亚汗国。^④

十六世纪后期在库程汗统治下的西伯利亚汗国,其疆域东起鄂毕河中游西岸,西至乌拉尔山东麓,北自图勒河上游伸展到额尔齐斯河下游,南抵托博尔河上游和巴拉宾草原,纳税居民约三万余人。^⑤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

① 费尔索夫:《西伯利亚历史教程》,1920年莫斯科出版,第12—13页。

② 米勒尔:《西伯利亚王国记述》,第1册,1787年彼得堡出版,第70—73页。

③ “秋明”系鞑靼语,译意是“万人之城”。相传成吉思汗西征时在此地驻军万人,故有此名。

④ 据《元朝秘史》第92页及《元史》第132卷载,失必儿是元朝初年居住在这里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冯家昇等认为,失必儿就是古代汉文史书中的鲜卑。见《“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载《历史研究》杂志,1956年第10期。

⑤ 奥哥罗德尼科夫:《自远古至十九世纪初期的西伯利亚史纲》,第1册,1920年伊尔库次克出版,第217—234页。

西伯利亚。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岸这一广阔的北亚地区，原先并没有概括全区的名称。后来，沙俄在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之后继续往东扩张，把它在亚洲北部的一切征服地统称为“西伯利亚”。^①

一五七九年，斯特罗干诺夫兄弟招募了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一批哥萨克。^②叶尔马克一伙老巢在顿河，后来流窜到伏尔加河，抢劫来往客商，因劫掠前往莫斯科宫廷的波斯和布哈拉商队，伊万四世派军前去清剿。叶尔马克等畏罪逃到卡马河，接受了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招安，从此成为沙俄向东进行殖民扩张的得力工具。

一五八一年九月十日，叶尔马克率领八百四十人^③携带大量武器弹药、甲冑和粮食，出发远征西伯利亚汗国。他们溯楚索夫河上行到乌拉尔山区，在山隘过冬。第二年春天越乌拉尔山顺塔格尔河入图勒河；在通往汗国腹地的道路上肆意劫掠烧杀。

西伯利亚汗国不顾自己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英勇抗击来犯之敌，先后组织七次会战，消灭了大批沙俄入侵者。例如，一五八二年十一月一日在托博尔河口进行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决战时，就使敌人损失一百〇七人。可是，库程汗的主力在这一次战役中也遭到重大伤亡，结果

① 皮萨列夫：《西伯利亚历史地理概述》，1914年出版，第89—97页。

② “哥萨克”一词原出鞑靼语，意为“无家可归、以劫掠为生的亡命之徒”。

③ 内有哥萨克五百四十人，另三百人是在立沃尼亚战争中被俘的立陶宛人和德国人。

不得不放弃首都伊斯坦城，率领民众南撤，继续组织抵抗。

叶尔马克虽然打败了库程汗，占领了伊斯坦城，却无力镇压奋起反抗的人民。他懂得只凭自己的力量，征服不了西伯利亚汗国，便派人到莫斯科去求援，把掳掠所得的毛皮和土地献给沙皇。伊万四世亲自接见，当场正式宣布赦免叶尔马克匪帮，厚加赏赐，特地把两副盔甲和自己的皮衣赏给叶尔马克，并答应派出援军。

与此同时，库程汗迅速吸取了失败的教训。他在国都沦陷后不屈不挠地进行抗俄游击战争，歼灭了叶尔马克手下的主要头目和许多哥萨克。叶尔马克势单力薄，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一五八四年八月十四日夜晚，库程汗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夜袭，把叶尔马克匪帮的主力歼灭于额尔齐斯河畔。叶尔马克企图泅渡逃命，为滔滔的额尔齐斯河水所淹没。^①

叶尔马克毙命后，残部一百五十人仓惶逃回俄国，汗国首都为鞑靼人收复。但是，莫斯科很快又派来大批军队，在汗国的领土上构筑城堡：一五八六年建秋明新城，一五八七年建托博尔斯克（后来成为沙俄统治西伯利亚的中心），一五九三年建别廖佐夫，一五九四年建苏尔古特和塔拉，一五九六年建纳雷姆，公然实行武装占领。一

^① 萨多夫尼科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西伯利亚殖民史话，1581—1712）》，1905年莫斯科出版，第34—36页。

五九八年库程汗被迫退入南方草原，不久死去。但库程汗生前所领导的西伯利亚汗国人民的抗俄斗争并未停止。他们不断袭击沙俄殖民强盗，阻止了沙俄向托博尔河上游和巴拉宾草原的推进；特别在十七世纪中期，一度成功地进击秋明和塔拉等地，使托博尔斯克的沙俄侵略者胆战心惊。后来莫斯科当局调来成千的增援部队，才稳住了阵脚。^①

为了巩固沙俄在西伯利亚的殖民统治，莫斯科当局还利用了东正教作为精神支柱：一六二一年它把诺夫哥罗德的修士大司祭启朴里安调到托博尔斯克，充当第一任西伯利亚大主教。启朴里安到任后，大建教堂，广占田地，竭力对当地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和封建剥削。他还大力搜集叶尔马克及其同伙的传说，为这些侵略强盗树碑立传。一六三六年大主教的秘书沙佛瓦·耶西波夫把这些材料改编成册，这就成了宣扬叶尔马克“丰功伟绩”的第一部西伯利亚编年史（《耶西波夫编年史》）。在耶西波夫的笔下，这帮罪恶滔天的殖民强盗竟然成了“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匪首叶尔马克竟然成了“开辟西伯利亚的元勋”。俄国教会还给叶尔马克加上神圣的尊号，给他的画像添上耀眼的光轮，并且把他的同伙全部列入东正教殉道者的名册中，要求教徒在祈祷时向他们顶礼膜

^①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194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29—30、92—115、411—422、447—465页。

拜。^①后来，莫斯科政府还在托博尔斯克为叶尔马克树立一座高达七俄丈半^②的大理石纪念碑，供人“瞻仰”。^③沙俄僧俗两界的大封建头子如此煞费苦心地表彰叶尔马克，目的是为了鼓励活着的侵略者步他的后尘，继续向外进行殖民扩张！

与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同时，十六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出现了一批大商业资本家。到十七世纪，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于各地区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和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开始形成了全俄市场。

在上述情况下，国内外贸易对东方毛皮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因俄国生产落后，可以向国外输出的产品不多，所以拚命掠夺西伯利亚出产的毛皮来增加出口。据统计，掠自西伯利亚等地的毛皮财富约占当时整个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由于缺乏贵金属，在十七世纪的国家财政中，貂皮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④

因此，叶尔马克对西伯利亚汗国的征服，不仅强烈地

①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194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68—71页。

② 1俄丈=3俄尺=2.134公尺。

③ 萨多夫尼科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第37页。

④ 巴赫鲁申：《十九世纪中期以前西伯利亚殖民史纲》。转引自古多什尼科夫编：《西伯利亚历史文选》，1932年莫斯科—伊尔库次克出版，第31页。

激起伊万四世继续东侵的野心,而且也使俄国的贵族、军官和商人投机家为之神魂颠倒,他们同做着“黄金探险梦”的西欧殖民者一样,一心向往东方神话般的财富。他们奉沙皇政府的训令,派遣哥萨克“前往探查新土地,驱使更多交毛皮税的异族人皈依皇上。”^① 这些沙俄侵略者尽管不象西班牙人在美洲那样地找到那么多黄金,却从西伯利亚“异族人”那里掠夺到象金子一样贵重的毛皮。

列宁曾强调指出,沙俄征服西伯利亚和十六——十八世纪的欧洲国家争夺殖民地是同一性质的。^② 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和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一样,以最残酷的暴力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差别只是:前者的掠夺对象是亚洲北部的“毛皮王国”,后者的掠夺对象则是美洲的“黄金王国”。苏联学者梁士琴科写道:“露骨的掠夺,用酒灌醉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征毛皮税,以假珠宝和廉价物交换贵重皮货,这些便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莫斯科上层贵族和商业资本‘田园诗式’的积累资本的方式。它们决不亚于美洲和非洲的‘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而且给罗曼诺夫家族、斯特罗子诺夫家族及许多其他贵族和工业家的财富,奠定了基础。”^③

十七世纪时,西伯利亚大多数民族都处在较低的社

①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58年莫斯科出版,第16页。

② 参见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6页。

③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1948年莫斯科出版,第12—13页。

会发展阶段上,有些还过着氏族生活,各民族之间联系很少。这种状况使各民族不可能结成统一的抗俄力量。因此,在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之后,沙俄竟能以有限的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肆无忌惮地向东推进,^①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于一六三九年到达鄂霍次克海岸。从一五八一年叶尔马克开始侵入西伯利亚算起,他们从乌拉尔山麓推进到太平洋西岸总共只用了不到六十年的时间。

西伯利亚的地理条件也有利于哥萨克迅速东进。这里的三大河流(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都由南向北注入北冰洋,但是它们的支流多数是东西走向,各水系的支流的源头之间相距极近,分水岭又容易跨越,这种状况使俄国侵略者得以采取惯用的“水陆联运法”向东扩张。^②

侵吞西伯利亚汗国后,哥萨克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过程,可以按照他们跨越各大水系的先后,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十七世纪初期由鄂毕河流域跨到叶尼塞河流域,分二路:北路从鄂毕河下游出发,南路由鄂毕河中游出发。一六〇〇年,沙皇波里斯·戈都诺夫(一五九八——一六〇五年)派遣军事远征队到鄂毕河口东岸的曼加泽亚地方,经过激烈的战斗把当地聂尼茨人的反抗镇压下去之后,于一六〇一年建立了曼加泽亚堡。这

① 俄国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编:《俄国亚洲部分》,第1卷,第1篇,1914年彼得堡出版,第13页。

② “水陆联运法”就是沿江湖行舟,至水尽处即连船带物从陆上搬运,遇水道又继续驾舟前进。

座城堡就成了哥萨克从北方向叶尼塞河乃至勒拿河流域扩张的据点。一六〇七年，哥萨克在叶尼塞河下游建立土鲁汉斯克冬营，并从这里向下通古斯河和中通古斯河伸展势力。南路从鄂毕河的支流凯特河上溯，然后进入叶尼塞河中游。一六一九年，俄国侵略者在这里建立叶尼塞斯克城堡，它很快变成了沙俄向东南方向进行扩张的主要据点。

最初，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鄂温克人以纯朴心理盛情款待这些远方来“客”。但是，这些豺狼成性的俄国强盗却采取极端野蛮的手段，剥去他们用以蔽体的皮衣，抢走他们赖以糊口的食物，绑架“人质”，勒索毛皮。这些暴行激起了鄂温克人的强烈反抗。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十七世纪末，对哥萨克的袭击从未间断。

在侵占叶尼塞河中、下游以后，哥萨克继续溯此河南行，侵入吉尔吉斯人^①聚居的上游地区。早在十七世纪初，哥萨克在鄂毕河的支流托木河流域构筑托木斯克（一六〇四年）和库兹涅茨克（一六一八年）两个堡寨，就曾遭到吉尔吉斯人的坚决抵抗。一六二八年，大队俄国侵略

① 吉尔吉斯族在中国古籍中先后称为鬲昆（《史记·匈奴传》）、坚昆（《汉书·匈奴传》）、契骨（《周书·突厥传》）、结骨（《北史·铁勒传》）、黠戛斯（《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黠戛斯传》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在其地设置“坚昆都督府”以统其众，“隶燕然都护”。《元史》作乞儿吉思或吉利吉斯，其地属元朝的岭北行省。明代，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吉尔吉斯人，先后由我国蒙古族的瓦剌部和鞑靼部管辖。吉尔吉斯族在清代称布鲁特，今天在我国境内的称柯尔克孜。

军溯叶尼塞河到红岩地方强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堡，再次遭到吉尔吉斯人的迎头痛击。俄国侵略者被当地居民和闻讯赶来支援的附近各族人民团团围住。侵略者龟缩堡内，力不能支，哀求莫斯科火速派兵前来援救。莫斯科当局打算从托木斯克调兵前往，可是托木斯克也自顾不暇，无能为力。^①沙俄侵略者南进的野心被挫败后，便转身向东扩张。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支哥萨克队伍溯上通古斯河（鄂温克人称叶尼塞河，布里亚特人称安加拉河）到布里亚特草原的边缘，在河岸建立了勃腊茨克堡砦（一六三一年）。布里亚特人奋起御敌，一六三五年，他们全歼从叶尼塞斯克增援勃腊茨克的沙俄部队。^②

第二阶段是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起，由叶尼塞河流域伸展到勒拿河流域。也分二路：北路由曼加泽亚出发，南路由叶尼塞斯克出发，两路哥萨克都先后到达勒拿河中游。一六三二年在雅库特人聚居的中心建立了勒拿堡砦，后来更名为雅库次克，由沙俄政府设统领进行统治。当时鄂毕河、叶尼塞河流域的毛皮兽，由于沙俄殖民者无止境地勒索和搜捕，日益减少，因此，沙俄殖民者纷纷东来，搜寻新的财富。他们成群结队来到雅库次克，并进一步从这个据点四出劫掠：往北到北冰洋沿岸，往东到鄂霍

①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第49—63、257—263、342—349、433—435页。费歇尔：《西伯利亚史》，第254—296、433—455、483—510页。

② 费歇尔：《西伯利亚史》，第350—352页。

次克海沿岸，往东北到尤卡基、科里雅克、楚阔茨和堪察加等民族地区，往东南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由此可见，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地区正是它征服西伯利亚的继续和发展。苏联早期历史学家霍多罗夫指出：“沙皇俄国的殖民政策（即征服政策）早在它的最初阶段，目标就比西伯利亚一地更为远大”，“征服西伯利亚政策本身同时也就是图谋进入中国”。^①这一论断，阐明了沙俄征服西伯利亚与侵略我国领土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二节 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开端

一、波雅科夫的武装入侵

沙俄侵略势力到达东西伯利亚以后，立即将矛头指向毗连的中国黑龙江地区。

俄罗斯人居住在东欧平原，对于中国的内河黑龙江本来一无所知。直到一六三六年沙俄殖民者才模模糊糊地听说外兴安岭以南有一条黑龙江，其时黑龙江地区归入中国版图已经有许多世纪了。

一六三八年，一个名叫伊万·莫斯克维金的哥萨克，受布塔尔斯克堡管事的派遣，率领三十名哥萨克离阿尔丹河，去寻找“新土地”和银矿。莫斯克维金一伙沿途烧

^①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与远东研究》，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9年第25期。

杀抢掠，遭到当地居民的痛击，损失惨重。一六三九年，这一伙人窜抵鄂霍次克海岸乌利亚河口，筑营过冬，然后沿海岸向南航行到珊塔尔群岛。他们从被俘的当地鄂温克人处第一次听说有一条流入“东海”的大河，河岸有一座“银山”。一六四〇年，莫斯克维金将有关这条大河的传闻带回上勒拿斯克，这是沙俄“关于黑龙江地区的最早消息”。^①

另一个哥萨克马克西姆·佩尔菲利耶夫的活动，证实了莫斯克维金提供的情报。一六三八年，他带领三十九人出发，溯维季姆河上行，抵该河支流崔巴河，得知外兴安岭南边确有一条大河，沿岸聚居着达斡尔人，其中一个头人名叫拉夫凯。“达斡尔地方”^②农牧发达，当地居民和中国其他民族进行着频繁的物物交换。一六四〇年，佩尔菲利耶夫在归途中于安加拉河畔晋见从莫斯科派往雅库次克的统领彼得·戈洛文，报告了有关情况，并献给他一些在“远征”途中掠夺来的银制品和兰靛。

一六四一年初，戈洛文为了掠夺我国黑龙江地区的粮食和寻找白银，派遣哥萨克头目巴赫捷亚罗夫带领七十人的远征队去寻找黑龙江。这一帮人沿着佩尔菲利耶夫的旧路维季姆河前进，结果并未找到黑龙江，只得于一

①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1895年彼得堡出版，第274页。

② 十七世纪时，俄国人所谓的“达斡尔地方”，系指包括石勒喀河流域和黑龙江上、中游一带在内的中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六四二年返回雅库次克。^①

以上是沙俄关于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最初传闻和入侵的最初尝试。此后，西伯利亚的统领们更加积极地策划向“达斡尔地方”派出“远征队”，那些杀人越货的盗匪、妄想发横财的投机家以及各色各样的亡命徒，也都对“达斡尔地方”垂涎三尺。他们的侵略活动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兼并这片中国领土可以扩大俄国农奴主和新兴商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范围，可以掠取更多的财富。沙俄当局侵略黑龙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东西伯利亚的粮食供应问题。当时被沙俄殖民者征服的西伯利亚各民族，都以渔猎、畜牧为业。沙皇政府不得不从乌拉尔山以西及托博尔斯克等地向东西伯利亚运粮，以供应军队和移民的需要，但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供不应求。这对巩固沙俄在东西伯利亚的殖民统治十分不利。“达斡尔地方”据传粮源丰盛，这就更加促使沙俄当局迫不及待的要加以侵占。

沙俄第一次武装侵入中国黑龙江地区，是瓦西里·波雅科夫的所谓军事“远征”。

雅库次克统领戈洛文在“寻找”黑龙江失败后，决定投入更大的赌注，从事新的冒险。一六四三年，戈洛文派遣他的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再一次“远征”黑龙江。行前，戈洛文向波雅科夫颁发指令，责成他改经阿尔丹河前往精奇里江和黑龙江，“为国君征收毛皮贡赋，寻找尚

^① 费歇尔：《西伯利亚史》，第571页。

未纳贡的人，以及银、铜、铅矿和粮食”，“修筑堡砦”，探明“当地人同中国的关系，中国官员是否到该地去，去干什么”等等。“如当地人拒绝交贡，就对他们作战。”^①

波雅科夫是随戈洛文一同从莫斯科派到勒拿河来的，为人残忍贪鄙，嗜血成性，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样一个人充当了沙俄侵华的急先锋，这绝不是偶然的。

一六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波雅科夫带领军役人员一百一十二名、无业游民十五名、征税官二名、翻译二名、铁匠一名，共一百三十二人从雅库次克向中国黑龙江地区进发。“远征队”配备铁炮一门、炮弹一百发、火药及铅弹各八普特^②十六磅，每人发枪一支。这一伙人沿勒拿河下行，经阿尔丹河、乌丘尔河、戈诺姆河到达努亚姆卡河^③时，江河已经开始封冻。波雅科夫下令伐木造房，准备过冬。但当他听说黑龙江距此不远时，就在努亚姆卡河冬营留下四十二人，交哥萨克五十人长米宁指挥，看管粮食、船只及其他笨重物品，并命令他们于来春解冻后到精奇里江去同他会合。波雅科夫自己则迫不及待地带领九十人往西南方向继续前进。他们于十月底从努亚姆卡河冬营出发抵该河河源，翻越外兴安岭，于十一月七日闯入

①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1946年莫斯科出版，第40页；并参阅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1914年美国克利夫兰出版，第35页。

② 1普特=16.38公斤。

③ 一称纽约姆卡河，戈诺姆河的小支流。

中国精奇里江右岸支流勃良塔河，十一月二十一日转入精奇里江，然后在该江另一支流乌姆列坎河筑营过冬。

波雅科夫在乌姆列坎河口第一次看到达斡尔人。这个地方是达斡尔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波雅科夫一伙侵入后，淳朴的达斡尔居民将他们当做“远方来客”“热情接待”，“并供给他们食物”^①。但是，这些不速之“客”，竟以绑架多普蒂乌尔作“人质”和漫无止境的敲诈勒索来“报答”达斡尔人的盛情款待。波雅科夫在这里得知：达斡尔人向中国的一位“大人物”交贡，从乌姆列坎河口到这位“大人物”的驻地要走一个半月；达斡尔人并不开采银、铜、铅矿，所有的金属制品及布匹都是从中国内地运来的。^②他明知黑龙江流域是中国领土，但是他竟然不把中国的主权当一回事，继续肆意妄为，作恶多端。达斡尔居民很快就认清了他们的豺狼本性，拒绝向他们供应食粮，使这些侵略者面临饥饿的威胁。

波雅科夫听说西林木迪河口的达斡尔村屯有粮食，立即派哥萨克五十人长尤里·彼特罗夫带领七十人去抢劫。波雅科夫采取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惯用手法，命令彼特罗夫先将头人诱出屯子，强行绑架，然后勒索粮食和貂皮。这个屯子住着三个达斡尔头人：多西、科尔帕和多瓦里亚。他们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出屯会见彼特罗夫。

①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22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1916年赤塔出版，第54页。

②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1951年莫斯科出版，第102页。

哥萨克趁机绑架了多西和科尔帕。彼特罗夫强迫他们叫村民交出燕麦四十筐、牲畜十头,并在屯外给他们腾出三所住房。这个要求实现后,彼特罗夫又要求进屯。多西、科尔帕坚决拒绝,警告他们说,如果进屯,村民就要武装抵抗。但彼特罗夫置若罔闻,悍然对屯子发动猛攻。达斡尔村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村内村外的民众一齐出动,左右夹攻,狠狠地打击来犯之敌。沙俄侵略军支撑不住,退守屯外的住所,被围困了三天三夜,最后趁达斡尔人不备,于黑夜逃走。达斡尔人民在这场英勇的自卫战中,打死敌军十名,打伤包括彼特罗夫在内的敌军五十名。这是中国黑龙江地区居民的第一次武装抗俄斗争,它给首次入侵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当头一棒。敌军不仅没有抢到粮食,而且死伤过半。残敌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彼特罗夫一伙就这样空手回到乌姆列坎河冬营,这时波雅科夫侵略军平均每人只剩下三十磅口粮了。附近的村民已经全部转移,粮源断绝。余下的粮食必须维持三个半月,到春汛开始后,才能从外兴安岭北面运粮到精奇里江来。丧心病狂的波雅科夫,兽性大发,竟然唆使哥萨克吃人肉。据哥萨克回国后联名写的一份材料说,波雅科夫命令他们“去吃被打死的异族人”^①。瓦西里耶夫也说:“哥萨克吃掉了五十个异族人。”^②这一令人发指的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58—59页。转引自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汇编(从早期到1917年)》,第1卷,1972年纽黑文、伦敦出版,第269—270页。这里所说的“异族”即我国达斡尔族。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58页,注1。

暴行充分证明，沙俄侵略者是一伙地地道道的灭绝人性的豺狼。由于波雅科夫匪帮吃人肉的兽行，黑龙江地区人民从此把他们叫做“吃人恶魔”。^① 戈尔德在《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一书中指出，“波雅科夫的行径给黑龙江居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谁要一提起哥萨克，“就使他们想到拷问、拐骗、死亡和吃人”。^②

一六四四年春，米宁带领留在努亚姆卡冬营的四十二人到精奇里江同波雅科夫会合，运来粮食给养。波雅科夫有了吃的，又开始新的侵略活动。他们顺精奇里江下行，过西林木迪河口。再往下，两岸的达斡尔村落越来越多，耕地葱翠，牛肥马壮。据波雅科夫本人的报告，达斡尔人“种六种不同的庄稼：大麦、燕麦、黍、大麻、荞麦和豌豆”；饲养“马、牛、绵羊，还有很多的猪和鸡”。这里园艺发达，出产黄瓜、豆荚、蒜、苹果、梨、核桃和榛子。^③森林中有大量的黑貂、红狐、玄狐、大山猫等毛皮兽。达斡尔人常以这些毛皮同前来精奇里江的中国内地商人交换绸缎和棉布。^④ 他们继续下行，过托木河口，经清皇室额驸、索伦部长巴尔达齐驻地，再航行一天时间，闯入了我国东北部最大的内河黑龙江。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58—59页。转引自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汇编（从早期到1917年）》，第1卷，第270页。

②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56页。

③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54页。转引自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22页。

④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1951年莫斯科出版，第107页。

波雅科夫听说黑龙江上游并不出产他企图搜寻的白银，便决定沿江下驶，向居住在中、下游一带的中国少数民族勒索“毛皮贡赋”。他们每到一处，都遇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抵抗，阻止他们上岸。有些地方的居民事先听说“吃人恶魔”来了，立即烧毁村庄，将人畜财物转移一空。在行经“杜切尔人^①地方”时，波雅科夫派哥萨克十人长叶尔莫林带领二十五人出发去“探察咸水”。^②这帮人在归途中遭到当地居民出其不意的袭击，除两人逃命外，其余的人，包括叶尔莫林在内，全部被歼。^③波雅科夫一伙继续下行，过松花江口、乌苏里江口，经赫哲人住地，最后窜到黑龙江口费雅喀人住地，在那里强建冬营，度过了一六四四——一六四五年的冬天。

波雅科夫一伙在江口过冬期间，继续蹂躏中国人民，绑架了三名费雅喀头人，强索貂皮。费雅喀人断绝他们的粮源，使得他们饥寒交困，朝不保夕。波雅科夫手下的一百三十二人，闯入黑龙江仅仅一年，这时只剩下五十多

① 按“女真”原作“朱里真”，又作“朱里扯特”，“主儿彻惕”，“主儿扯惕”，“拙尔察歹”，即满语之“珠申”。（《黑龙江志稿》，第1卷，《地理志·沿革》，第20页）俄语的 Дучеры 或 Джючеры 显然是“朱里扯特”……等即“女真”的转音。札尔金德在《契丹及其族属》一文中也承认，杜切尔是女真（朱里真）一名的转音。（《苏联民族学》杂志，1948年第1期）杜切尔人聚居于精奇里江口以下，松花江口上下的黑龙江沿岸。巴赫鲁申指出：“杜切尔人在生活方式上和达斡尔人没有任何区别，……同达斡尔人一样向中国皇帝进贡。”（《哥萨克在黑龙江上》，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第14页）

② 即寻找黑龙江口外的大海。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57页。

人，损失过半。如原路返回，必将全部被歼或全部饿死。这个绝望的处境，迫使他决定立即从海上逃跑。

一六四五年初夏，波雅科夫带领残部出黑龙江口北逃。这伙人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挣扎了八十四天后，被海浪抛到乌利亚河口的岸边，才侥幸没有葬身海底。他们在这一带找到先前莫斯科维金遗弃的冬营，在那里度过了第三个冬天（一六四五——一六四六年）。

一六四六年春，波雅科夫在乌利亚河口留下二十人向当地居民勒索“毛皮贡赋”，余众由他率领，越朱格朱尔山，经马亚河、阿尔丹河进入勒拿河。一六四六年七月，这一伙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沙俄侵略军，狼狈不堪地回到雅库次克，距出发的时间约三年整。

波雅科夫给新上任的雅库次克统领普什金带回一张他绘制的入侵黑龙江地区的线路图、三个被绑架的费雅喀头人和从黑龙江地区搜刮来的四百八十张貂皮、六个皮桶，作为他到过黑龙江的见证。他还向普什金详细报告了入侵黑龙江的经过及当地的地理、民族、物产等情况，极力宣扬这个地区的富饶和侵占的“必要性”。他说：占领黑龙江“将使国君获得巨大利益，因为那个地方人烟稠密，盛产谷物和貂皮，……河里鱼产丰富，国君的军队在那个地区绝不会有缺粮之虞。”^①他还狂妄地宣称，只要派去三百人的军队，修上三个堡砦，每个堡砦驻扎五十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57页。转引自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23页。

人,其余一百五十人到各地去收取“毛皮贡赋”,就能征服黑龙江。^①

波雅科夫的入侵,探明了黑龙江地区的许多重要情况,极大地刺激了沙皇政府本已十分炽热的掠夺野心,为以后发动新的入侵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在黑龙江的强盗行径,从一开始就将老沙皇的疯狂侵略性、野蛮性暴露无遗,并唤醒中国人民奋起自卫,消灭敢于来犯的入侵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入侵又为沙俄侵略者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哈巴罗夫的侵略罪行

一六五〇——一六五三年哈巴罗夫匪帮对黑龙江地区的武装入侵,规模和破坏性比波雅科夫的入侵更大,它集中地说明了沙俄对华政策的掠夺本质。

雅库次克统领普什金接到波雅科夫关于黑龙江的报告后,大为兴奋,立即上奏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一六四五——一六七六年)说,达斡尔地方是“产粮牧畜之地”,建议派军队前往占领。^②但是,这件事毕竟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容易:一是交通不便,气候严寒;二是西伯利亚的兵员、粮食、武器、弹药一概不足。即使雅库次克的哥萨克倾巢出动,也未必能凑成一支稍为象样的军队。

①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1946年莫斯科出版,第68页。

② 转引自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1951年莫斯科出版,第112页。

正当沙俄当局急不可待而又束手无策之际，有一个名叫叶罗菲·哈巴罗夫的人，声称他知道一条去黑龙江的“近路”，请求“自费”装备“远征队”去征服黑龙江，这正好投合了当局的心意。

哈巴罗夫是欧俄乌斯丘格县人，一度在家乡经营煮盐场。一六三六年，哈巴罗夫抱着发横财的动机到叶尼塞斯克经商，一六三八年迁居勒拿河畔，在基廉加河口开办煮盐场和磨坊，雇工垦荒，兼营钱庄、运输、毛皮、粮食批发等业。他贪婪、残忍、狡诈、不择手段。凭着一套吸血鬼的本领，他不久就成了东西伯利亚有名的暴发户。后因犯盗窃罪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哈巴罗夫自愿充当侵华鹰犬，为沙俄掠夺中国黑龙江流域出力卖命。

一六四九年春，弗兰茨别科夫继普什金任雅库次克统领。哈巴罗夫立即求见，递上呈文一封，提出他的“征服黑龙江”的计划。呈文中说，前次远征黑龙江的路线不对，而他，哈巴罗夫，知道一条“经奥廖克马河和通吉尔河”到黑龙江的“近路”。^①他请求让他招募一百五十名志愿人员，组成“远征队”，去征服“大山（即外兴安岭）那边尚未纳贡的人”。远征的费用、粮食、船只及各种备用品，由他自己负担，如果此行能使当地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

^① 哈巴罗夫并不是这条路的发现者。一六四七年，猎人克瓦什宁曾经由通吉尔河潜入黑龙江。一六四八年，军役人员瓦·尤里耶夫派拉雷诺夫等经通吉尔河潜往黑龙江上游左岸支流鄂尔河口（俄国人称乌尔略河）一带，并测量了黑龙江的宽度。哈巴罗夫可能是从他应用的猎人口中知道这条路的。

“归依国君最高统治之下，则将从征收毛皮贡赋获得巨大利益。”^①

弗兰茨别科夫是沙俄对外侵略计划的忠实执行人、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接到哈巴罗夫的“征服黑龙江”计划，如获至宝，认为实现这个计划不仅可以向沙皇报功，而且他还可以同哈巴罗夫合伙分赃。因此，弗兰茨别科夫急忙指使哈巴罗夫招募“志愿人员”。在他的直接支持下，哈巴罗夫的“远征队”在提出申请后不到一个月就出发了。

一六四九年三月，哈巴罗夫带领七十人^②的“远征队”从雅库次克向黑龙江进发。行前，弗兰茨别科夫按照沙皇政府的指示精神，发给哈巴罗夫如下的指令：尽力使拉夫凯臣服，寻找银矿并“征收毛皮贡赋”；在从奥廖克马河、通吉尔河至外兴安岭途中，“应于适当地方修筑堡砦，由那里出发进行远征”；如拉夫凯“自愿归顺”，“则应向他们收贡”，“听其留住原地”。如拒绝投降，“可靠上帝的帮助对他们使用武力，采取常用的战争手段征服他们，出其不意地进攻他们，……为沙皇夺取贡品。”“收来的贡品及宣誓效忠愿为臣民者，须登记造册，”“凡所经河流，皆须绘制成图，记上当地居住的民族。”^③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62页。

② 因雅库次克人口稀少，未招足预定人数。

③ 《历史文献》，第4卷，第67—70页。转引自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1914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第20—21页。同见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1963年伦敦出版，第97页。

哈巴罗夫匪帮遵照这一指令，按预定路线由勒拿河经奥廖克马河拉纤上行，于一六四九年入冬前抵通吉尔河口过冬，一六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踏冰溯通吉尔河，然后越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支流鄂尔河谷地及往下的黑龙江沿岸地方。



哈巴罗夫匪帮窜扰黑龙江

在鄂尔河口往下的黑龙江沿岸，共有五座达斡尔城砦，属达斡尔头人拉夫凯管辖，第一个城砦是拉夫凯驻地，即所谓“拉夫凯城”，第三个城砦即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驻地雅克萨。^①当地达斡尔人听到沙俄殖民者武装入侵的消息，早已将人畜财物转移一空。哈巴罗夫率众闯入前三个城砦，找不到一个人影，便在雅克萨停留下来。这时，白发苍苍的头人拉夫凯带领他的弟弟希尔基涅依、

^① 《清圣祖实录》，第143卷，第14页，称：“雅克萨系我国虞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沙俄）所窃据。”

基尔杰加，以及女婿和仆人一行五人乘马前来察看动静。拉夫凯通过翻译责问哈巴罗夫：“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哈巴罗夫诡称“是做生意和送礼来的”。拉夫凯当即予以揭露：“你为什么骗人？我们知道你们哥萨克，有个名叫克瓦什宁的哥萨克以前到这里来过。……你们想把我們全部杀死，抢走我们的财物，掳掠我们的妻子儿女。”这番话戳穿了他的谎言，于是哈巴罗夫撕下假面具，悍然要求达斡尔人向沙皇“纳贡”。拉夫凯当场加以拒绝，说：“你们是什么人，还是等着瞧吧！”话音未落，便回马疾驰而去。^①

哈巴罗夫为了绑架拉夫凯等作“人质”，率众在后面紧追，没有追上。他们接连闯进第四、第五座城砦，依旧看不见人影，最后才搜索到一个老妇人。哈巴罗夫给这位年迈妇女带来的“礼品”，原来不是别的，而是刑棍和烈火。他“给她上刑，用火烧她”，要她说出拉夫凯和居民逃离城砦的原因和“计谋”，^②以及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哈巴罗夫从她那里得知达斡尔人向清朝皇帝进贡，中国有强大的军队、使用火枪作战后，自知兵力不足，急忙集合部众窜回“拉夫凯城”，在这里留下五十个人，交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指挥，自己匆匆赶回雅库次克去收罗更

① 费歇尔：《西伯利亚史》，第586—587页；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4—25页；萨多夫尼科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第88—89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65页。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5页；萨多夫尼科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第89页。

多的侵略军。

一六五〇年六月六日，哈巴罗夫回到雅库次克。他向弗兰茨别科夫呈上从“达斡尔地方”勒索来的毛皮和黑龙江生长的小麦标本，还有一幅“达斡尔地方”略图和一份调查“记录”，请他转呈沙皇报功。哈巴罗夫报告说，“达斡尔地方”到处是广阔的田野、牧场和大森林，农牧发达，盛产毛皮兽，“比整个西伯利亚还要美丽富饶”。^①他还说，要征服黑龙江，须有一支六千人的军队。弗兰茨别科夫完全接受这一建议，当天就奏请沙皇派六千军队去征服黑龙江。奏文称：“如达斡尔众头人归顺陛下，并于达斡尔地方从事耕作，那时将无需再向雅库次克运粮。……达斡尔地方比勒拿河更加有利可图。”^②沙俄侵略强盗头脑发昏，大做其扩张美梦。那时西伯利亚的沙俄军队和移民人数极少，哈巴罗夫第一次预定招募的一百五十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没有凑足半数，现在竟提出调集六千军队，完全是一片呓语。

事实上，哈巴罗夫第二次只招到一百一十七名侵略军，加上弗兰茨别科夫拨给的二十一名军役人员，共一百三十八人。^③一六五〇年七月二十日，哈巴罗夫就带着这帮人和三门大炮、一些枪支弹药从雅库次克出发，第二次前往黑龙江。行前，弗兰茨别科夫奉沙皇阿列克塞·米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6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67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1969年莫斯科出版，第126页。

哈伊洛维奇的命令，发给哈巴罗夫一道“远征达斡尔地方”的新指令和一封转交“博克达汗”^①即清朝皇帝的信件。^②指令责成哈巴罗夫向“博克达汗”宣布：沙皇“伟大威严，拥有众国，国君（沙皇）之征战，所向无敌”，“博克达汗”及其臣民均应永为沙皇“奴仆”。“我国君不知尔地情况，……今敕令派军前往，非为作战。”“因有众多之国家为国君效力，向国君进贡，尔博克达及其人众亦当向国君贡上金银宝石及花绸。”这个指令还指示哈巴罗夫，如“博克达汗”及其臣民接受沙皇统治，缴税纳贡，则可“留居原住城镇，毋庸畏惧，国君自当命所属军队保护彼等”；如拒绝交出“人质”及毛皮，哈巴罗夫“可用战争平定之”，“毁灭并占领其城池”，将拉夫凯、希尔基涅依、基尔杰加、“博克达汗”及其他“拒不缴纳毛皮贡赋之人，连同妇幼，一概斩尽杀绝”。^③另一封转交“博克达汗”的信也说：今派哈巴罗夫出使中国，宣示沙皇“恩宠”，要求中国皇帝“归顺”沙皇，永为“臣仆”。如“尔博克达汗”拒绝归顺，沙俄就要动武，将中国男女老幼“斩尽杀绝”。^④这些杀气腾腾的文件，充分暴露了老沙皇的豺狼本性和鲸吞全中国的野心。

哈巴罗夫携带这两份文件，率领新招来的侵略军，于

① “博克达”源于蒙语。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蒙古十六个部四十九个封建主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大汗的继承者，并奉上“博克达·彻辰汗”（即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以后“博克达”汗即指清朝皇帝。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26—130页。

③ 同上书，第126—128页。

④ 同上书，第129—130页。

一六五〇年九月底再次侵入黑龙江。在他离开黑龙江期间，斯捷潘诺夫曾对拉夫凯的兄弟——头人希尔基涅依驻地发动十二次武装进攻，绑架了他的妻儿，随后又对雅克萨发动进攻。阿尔巴西坚决抵抗，予敌重创。哈巴罗夫闻讯赶来，再次进攻雅克萨。使用弓箭的达斡尔人从中午坚守到黄昏，因伤亡太大，被迫转移。哈巴罗夫就这样强占了中国的雅克萨城。他又派出一百多名侵略军连夜追赶达斡尔人，许多居民惨遭杀害和洗劫。接着，哈巴罗夫在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强筑斯特列尔卡堡砦，并加固了雅克萨的工事，作为沙俄在黑龙江的主要侵略据点，取名阿尔巴津。^①

哈巴罗夫在盘踞雅克萨期间，不断派人四出袭击达斡尔居民，捕捉人质，掳掠妇女。“有一次，哈巴罗夫命令将全部男俘溺死”。他还强迫人质给侵略军作苦役，稍不服从即任意砍杀。哈巴罗夫强奸希尔基涅依的妻子未遂，“便于夜间将她掐死”。巴赫鲁申正确地指出：哈巴罗夫“以肆无忌惮的残酷手段对待被战胜者”，他的行为“毫无道德基础”。^②

在这前后，哈巴罗夫探知，在精奇里江口以上的黑龙江沿岸共有九个达斡尔头人的驻地，^③“他们都是清朝皇

① 瓦西里耶夫说：“阿尔巴津……是以头人阿尔巴西的名字命名的。”见《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68页。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7—28页。

③ 这九个头人是：拉夫凯、希尔基涅依、阿尔巴西、阿图依、达萨乌尔、斑布赖、桂古达尔、科科列依和肖契卡巴亚。

帝沙姆沙汗（即顺治帝，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年在位）的进贡者。”^①他据此断定，侵占黑龙江，势必要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于是再一次请求弗兰茨别科夫派援军来“对沙姆沙汗作战”。弗兰茨别科夫根据哈巴罗夫的申請，立即上奏沙皇说：“国君如欲占领达斡尔地方，并控制沙姆沙汗……，即请派一支大军到达斡尔地方去。”^②

一六五一年八月，弗兰茨别科夫派遣特·契奇金带领一百三十六人，配备火药及铅弹各三十普特，前往黑龙江支援哈巴罗夫，并携有交给哈巴罗夫的指令一道，^③授权契奇金“出使”北京的指令一道，^④及弗兰茨别科夫致顺治帝的书信一封。^⑤弗兰茨别科夫责成契奇金向哈巴罗夫移交兵员后，即动身前往北京投递信件。这封信除了重弹头年致中国皇帝信中的侵略老调外，竟无耻地反诬我国达斡尔头人拉夫凯、阿尔巴西等向沙俄殖民者“多次寻衅”，并威胁顺治帝说，沙皇兵力强大，“仅在西伯利亚国一处，即有俄罗斯人甚众，尔沙姆沙汗远非敌手”，“望勿触怒我国君沙皇，着即呈献金、银、花绸、宝石、毛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68页；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591页，“世祖”条注。

② 《历史文献》，第4卷，第76页。转引自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70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30—131页。

④ 同上书，第131—132页。

⑤ 同上书，第132—134页。

皮，竭尽全力为之。”^①

哈巴罗夫在向弗兰茨别科夫请求增援后，不等援兵来到，便于一六五一年六月十三日率领侵略军从雅克萨出发，沿江下犯。

六月十五日，哈巴罗夫一伙窜到头人达萨乌尔的村砦，纵火烧毁了全村房屋。

六月十六日，哈巴罗夫匪帮窜犯头人桂古达尔的城砦。^②达斡尔族人民为了保卫国土，抗击沙俄侵略，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这个城砦里集中了上千名达斡尔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分三个防区，四周围以土墙。土墙无门，但有地下出入口。土墙外有两道深沟环绕。城砦内还修了通向黑龙江岸的坑道，安置妇幼、牲畜、粮食。在哈巴罗夫到来之前，居民实行坚壁清野，烧掉城砦外的全部村舍，充分表现了达斡尔人民抵抗沙俄侵略的坚定决心。

当哈巴罗夫匪帮窜抵城砦时，头人桂古达尔率众出城，列于江岸，阻止敌人上岸。^③哈巴罗夫突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名达斡尔人。桂古达尔下令转入城砦固守。哈巴罗夫要求达斡尔人“不战而降”，向沙皇交纳“毛

① 按：这封信没有送到北京。一六五四年，契奇金一行五人在赴京途中要伏要马，大肆骚扰，并扬言要同清政府“分地”，将黑龙江以北地区划给俄国。当地居民激于义愤，将这伙侵略者全部消灭。

② 据哈巴罗夫本人的报告，清政府在该城设有官吏，并向居民征收赋税。见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35页。

③ 同上书，第134页。

皮贡赋”。桂古达尔严正地回答说，“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进贡，哪有给你们贡品？要我们向你们交贡，除非我们全都死光。”^①达斡尔人万箭齐发，使侵略军无法接近城砦。哈巴罗夫后来描绘当时的情景说：“田野里就象长满了箭一般”。^②可见达斡尔人民的抵抗是何等英勇！战斗彻夜激烈地进行，沙俄侵略军用大炮轰击一个通宵，才于六月十七日凌晨在墙上打开一个豁口，冲入第一防区。被迫退入第二防区的达斡尔人，在哥萨克枪炮的轰击下，有二百一十四人惨遭杀害。最后，他们退入第三防区。



沙俄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

哥萨克冲入第三防区后，达斡尔人民宁死不屈，用梭镖抗击敌人的枪炮。沙俄侵略军兽性大发，乱砍乱杀，血洗全城。他们“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砍头”，“共杀死大人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9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73页。

和小孩六百六十一人”。他们还抢走妇女二百四十三人，儿童一百一十八人，合计一千〇二十二人，几乎是桂古达尔城砦的全部人数，只有十五个人幸免于难。^①那些被劫的妇女，被哥萨克就地“分配”和蹂躏。戈尔德叙述当时的情景说，“妇女和儿童在惨遭杀戮或被哥萨克掳走时的哭叫，淹没了哥萨克的狂吼，哥萨克的双手滴着父亲们、丈夫们和兄弟们的鲜血。”^②达斡尔族人民保卫桂古达尔城砦的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反抗侵略，不怕牺牲，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纪念。

沙俄侵略军的屠刀并没有吓倒达斡尔族人民，他们不屈不挠地继续坚持抗俄斗争。哈巴罗夫在桂古达尔城停留的四十多天中，派人四出诱降，毫无结果。达斡尔人民用杀死诱降者的行动作了坚定的回答。

一六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哈巴罗夫率众继续沿黑龙江下侵，八月二日抵头人班布赖的村砦。村内空无一人。九月四日，哈巴罗夫继续下驶，一直窜到精奇里江口附近的托尔金屯。这个屯子是达斡尔头人托尔加、奥穆捷、图龙恰兄弟三人的住地，该屯即以托尔加的名字命名。兄弟三人是清朝索伦部长额驸巴尔达齐的亲戚^③，

① 列别杰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1卷，《哈巴罗夫呈文》，1949年苏联国家科学教育出版社第3版，第438—440页。值得注意的是，齐赫文斯基主编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全部删去了同一呈文中有关桂古达尔城大屠杀的内容。见该书第134—135页。

②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5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74页。

素来向清政府进贡。

阴险狡诈的哈巴罗夫趁头人和居民在城外饮宴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城楼制高点。头人奥穆捷首先发现敌人，立即上马高喊报警。托尔加、图龙恰和部分居民（男女共二百七十人）逃避不及，徒手搏斗，力竭被俘。哈巴罗夫强索貂皮，托尔加等回答说：“清朝皇帝不久前派人来，我们把毛皮向他们进贡了”。^①九月十四日，当地居民经过周密的布置，突然全体逃走。哈巴罗夫气急败坏，指责托尔加“唆使”居民这样做，对他施以酷刑，“用火烧，用鞭子抽”。^②托尔加面不改色，怒斥道：“既然落到你们手里，只有一死，要砍头就砍头吧！”^③哈巴罗夫无计可施，放火烧掉村寨，于九月十八日带着头人托尔加继续往黑龙江下游窜犯。托尔加不堪凌辱，在途中伺机取刀自尽，以此向野兽般的沙俄入侵者表示抗议。^④

哥萨克沿江下行十余天，过“杜切尔人”（女真人）聚居的地区，沿途烧杀掳掠，于十月五日窜到松花江口。附近土地肥沃，有杜切尔人的大村屯。沙俄侵略军上岸抢劫，杀死青壮人，掳掠妇女，按哥萨克的“习惯”强行“分配”。他们继续下驶，于十月十日窜抵黑龙江下游宏加力河口。这里的黑龙江左岸有一个房屋栉比的“阿枪人”（赫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40页。

哲人)①村落,即中国的乌札拉村。哈巴罗夫决定在这里筑营过冬。赫哲族居民闻讯齐奔江岸,阻止他们登陆。哈巴罗夫下令开枪,强行上岸,然后在江岸一处峭壁的穹窿下修了一个冬营,称做“阿枪斯克”。②

① 《清朝文献通考》说:“自宁古塔东七百余里外,沿松花江、大乌拉江(黑龙江)直至入海处,两岸为赫哲、费雅喀部所居,其俗不知耕种,以捕鱼为生,其来往行猎并皆以犬,即所谓使犬部也,俗亦谓之鱼皮部。……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盖与编户无异云。”(第271卷,《舆地》三,第7278—7279页)萨英额《吉林外纪》说:“……松花江(当时黑龙江下游亦称松花江)下游齐集以上,至乌苏里江东西两岸者,谓之赫哲”。(第8卷)《吉林通志》说:“自乌苏里江口溯混同江南岸东至海滨,旧界赫哲……人等居址。”(第17卷,第32页)苏联科学院1956年出版的《西伯利亚民族志》说:“在乌苏里江口以下,居住着纳特基人,他们有时被称为阿枪人。我们有一切根据可以推断,纳特基人(阿枪人)就是那乃人。”同书中还说,那乃人在满语中称为赫哲。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0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77页。马克十九世纪中叶闯入我国黑龙江“游历”途中,在乌苏里江口往上不远的黑龙江陡岸一个突出部分的顶上,发现一个方形碉堡的遗迹,便认为这是“阿枪斯克”所在地。(马克:《黑龙江旅行记》,1859年彼得堡出版,第160页)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吉林通志》称:自乌苏里江口往下的黑龙江岸赫哲人居址依次为:库鲁河源、库鲁河阔绰、霍尔阔布勒氏、乌尔滚克勒氏、乌札拉村、卓尔别河……。 (第17卷,第32页)据此可以断定这个村落(乌札拉村)不在乌苏里江口附近。曹廷杰的《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一书称:“乌札拉部,在今伯利(伯力)下六百里,……由伯利东北行俄里二百七十里,至松花江南岸俄屯麻宜美斯克地方,其处有山,华人称金山……对岸为玻兰侯温(侯温,赫哲语,意思是“湖”,今苏联仍称玻兰湖),出口处有山产银,华人呼银山,……银山下有乌札拉地方名。顺治九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罗刹(即闯入黑龙江的俄国侵略者)战于乌札拉村,当即其处。”(《辽海丛书》本,第25—26页)费歇尔所著《西伯利亚史》附图二《早期西伯利亚地图》将“阿枪斯克”标在宏加力河口的黑龙江左岸,与中国文献记载相符。

英勇的赫哲人民决不容许侵略者任意蹂躏祖国的神圣领土，他们暗中调查敌人动向，准备给以狠狠的打击。十月十六日，哈巴罗夫派一百人外出抢鱼，冬营里只留下一百〇六人。赫哲人抓住这一时机，联合女真人于十月十九日拂晓前向哈巴罗夫冬营发动进攻。他们带来大量干柴及其他引火物，准备放火烧掉冬营，把沙俄侵略军一网打尽。哥萨克从睡梦中惊醒，凭借有利的地形和优势火力进行顽抗。手持弓箭的赫哲人和女真人经过激烈搏斗，因伤亡过重，被迫退却。两天后，外出抢鱼的哥萨克满载着抢来的干鱼回到“阿枪斯克”。他们有了过冬食物，加固了冬营的工事。整个冬天，他们不断从“阿枪斯克”出发，袭击附近村庄，绑架“人质”，掠夺毛皮，到处骚扰，无恶不作。^①

赫哲和女真族人民攻打哈巴罗夫的冬营失利后，决定请求政府给予支援。巴赫鲁申指出：“中国皇帝——达斡尔地方至高无上的君主……是他们唯一的和当然的保护者。”^②这次战斗发生后不久，当地居民即派人到宁古塔向清朝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报告哈巴罗夫匪帮在黑龙江烧杀淫掠的情况，请求派兵剿灭。^③海色据以上报。清政府于是命令海色“率所部击之（即沙俄侵略军），战于乌札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0—41页。

② 同上书，第41—42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36页。

拉村”。^①

一六五二年四月四日拂晓，海色率军突袭沙俄侵略军巢穴阿枪斯克。达斡尔、女真、费雅喀、赫哲等族人民纷纷前来协助正规军作战。哥萨克从睡梦中惊醒，恐慌万状，逃跑不及，被清军打死十名，打伤七十六名（包括哈巴罗夫）。中国的大炮将城墙打塌三处，士卒们奋勇争先，以势如破竹之势突入敌人堡砦。丧魂失魄的沙俄匪军，这时纷纷祈求上帝救命。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海色却犯了严重错误。他不是号召部下乘胜狠狠地打击敌人，消灭仍在负隅顽抗的敌人有生力量，而是麻痹轻敌，下令“不许放火（烧城），不许杀哥萨克，要抓活的！”^②在这个错误方针的指导下，清军不能给敌人以杀伤，并使惊魂未定的敌人得到喘息和反扑的机会。狡诈多端的哈巴罗夫乘机下令拉来大炮，向正在冲入堡砦的密集的清军猛轰，使清军遭受重大伤亡，最后被迫撤围。

乌札拉村之战是中国正规军对沙俄入侵者的第一次作战。它揭开了中国军民联合进行抗俄斗争的序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战斗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给予入侵者以极沉重的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正如戈尔德所说，乌札拉村之战“抑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五，《平定罗刹方略一》。这个记载证明“阿枪斯克”位于乌札拉村。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35页。

制了俄国人的放肆行为，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①

一六五二年五月三日，哈巴罗夫害怕中国军队再来讨伐，装备了六只木船，扔下“阿枪斯克”冬营往黑龙江上游逃跑。清政府组织军民在松花江口进行堵击。由于得风势之便，哈巴罗夫混过了松花江口，继续上逃。

在这以前，契奇金带领的一百三十六名侵略军已经到达黑龙江。一六五二年五月十五日，契奇金派哥萨克纳吉巴带领二十六人从班布赖村砦出发，顺流而下，去寻找哈巴罗夫。纳吉巴沿途每经一岛，都留下特殊标记。但哈巴罗夫只顾往上游逃跑，没有发现这些标记，因此两股侵略军走岔了路。纳吉巴继续下行直到黑龙江口，沿途遭到中国居民的沉重打击。同波雅科夫一样，他们不敢从原路返回，只好经海上逃回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一伙在上逃途中遇见契奇金的百多名援军，人数突增。但他们仍然惊慌不安，一口气逃到精奇里江口。哈巴罗夫风闻中国“要开一万大军”来消灭他们，^②便急忙在黑龙江南岸支流呼玛河口修筑一个堡砦，称为“呼玛尔斯克”。他报告雅库次克统领弗兰茨别科夫说：“为了不损害国君的库存，不白白牺牲哥萨克兵丁，我们不敢在结雅河（即精奇里江）口或松花江口的达斡尔地方扎营，”“靠这样少的人要占领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

①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9页。

② 索洛维约夫：《俄国通史》，第6册，第12卷，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596页。

“因为这个地方人烟稠密，而且他们有火枪。没有接到国君的谕旨，我们又不敢离开这个地方和阿穆尔河。”^①上面这段自供，清楚地说明了哈巴罗夫匪帮孤立、惶惑、走投无路的绝望处境。

这时，哈巴罗夫侵略军乱成一团，部下发生哗变，有一百三十六人从呼玛河口带走三只船窜往黑龙江下游。哈巴罗夫率众追赶到黑龙江下游，攻克并平毁了哗变者的冬营，另筑冬营，在那里度过了一六五二——一六五三年的冬天。他的处境越是绝望，兽性越加发作。例如，在一次袭击费雅喀村落失败后，他竟然将绑架来的费雅喀头人明加尔恰“劈为两半”。^②

一六五三年春，哈巴罗夫再一次上溯黑龙江，肆意窜扰，沿途将两岸的费雅喀村屯和渔场尽行破坏。此后不久，他和沙皇政府派来的莫斯科贵族季诺维也夫发生矛盾，后者解除了哈巴罗夫的职务，将其押解回国“受审”，^③于一六五五年抵莫斯科。沙皇政府对哈巴罗夫这样一个忠实鹰犬备加恩宠，他不但被“宣告无罪”，而且被封为贵族士官，奉命管辖伊利姆斯克县的几个村庄。

高尔基、斯大林等编著的《苏联国内战争史》一书指出：沙俄的每一个侵略步骤，“都是以火、血和暴力为标记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371页。转引自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汇编（从早期到1917年）》，第1卷，第272页。

② 巴赫鲁中：《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0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92页。

的。”^①这个论断完全适用于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等殖民强盗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

中外史籍,包括旧俄和早期苏联的许多著作在内,对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等沙俄入侵者的暴行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谴责。

《清圣祖实录》指出:“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奇勒尔诸部,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②

英国学者约翰·巴德雷在《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指出:哈巴罗夫继波雅科夫之后“用火与剑蹂躏了黑龙江”,“对达斡尔人和其他当地居民极端残酷。”^③

帝俄科学院院士费歇尔在《西伯利亚史》中写道,哈巴罗夫在黑龙江“把杀人不当一回事”,“靠抢劫为生”。^④

米登多尔夫在《西伯利亚旅行记》一书中记载:沙俄早期侵略者在黑龙江“把父母的身体搭成烤架烧烤孩子”。^⑤

① 高尔基、斯大林等主编:《苏联国内战争史》,第1卷,第58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19卷,第6—7页。

③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1919年伦敦出版,第195页。

④ 费歇尔:《西伯利亚史》,第594、608页。

⑤ 米登多尔夫:《西伯利亚旅行记》,第4卷,第174页。转引自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1861年伦敦出版,第19页注。

格鲁兹捷夫指出,哈巴罗夫等哥萨克“和匪徒相差无几,他们去到遥远的地方,纯粹出于贪利之心”,他们在黑龙江“拿走他们想要拿走的一切”。^①

格鲁兹多夫斯基指出,哈巴罗夫一伙“外出打猎时,很少注意人和野兽之间的区别”。^②

托尔加谢夫写道:哈巴罗夫在中国黑龙江的行径“是抱着征服目的的名副其实的远征”。^③

另一个旧俄学者达维多夫写道:“我们掌握的有关上述时期(指十七世纪中叶)的全部资料,显现了一幅早期外来的俄国人以不人道态度对待黑龙江各部落的可怖图景。”^④

苏联早期的许多作品,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早期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的兽行。洛巴金谴责说,哈巴罗夫等人在中国黑龙江流域到处刮起“血腥的、毁灭一切的风暴。”^⑤巴赫鲁申在《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一书中写道:“俄国人的入侵以及伴之而来的对居民的残酷杀害和对这块土地的蹂躏,给和平的达斡尔地区留下了骇人听闻的印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一繁荣富饶的地区

① 格鲁兹捷夫:《阿穆尔》,1900年彼得堡出版,第5页。

② 格鲁兹多夫斯基:《滨海—阿穆尔边区》,191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第62页。

③ 托尔加谢夫:《远东的冒险家》,1907年莫斯科出版,第6页。

④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1911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第11页。

⑤ 洛巴金:《滨海地区民族志》,载《滨海地区的自然和经济》,192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第一部分,第143页。

变成了荒野：城堡成了废墟，田园荒芜，……居民背井离乡。”^① 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也说：哈巴罗夫是“十七世纪俄国的侵略者”，是“沙俄在远东的侵略计划和殖民政策的传导人”。^② 类似的话还见于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这本书明确指出：哈巴罗夫等在黑龙江地区“焚毁居处，杀害居民，捕捉俘虏”，他们的行径是对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征服”。^③

历史的正义法庭和世界公论早已将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沙俄入侵者钉上了耻辱柱，这是永远无可更改的事实。

三、斯捷潘诺夫的可耻覆灭

正当哈巴罗夫在黑龙江烧杀掳掠的时候，沙皇政府已在策划对这个地区发动新的大规模入侵。哈巴罗夫侵入黑龙江的消息一传到莫斯科，立刻被当作一项叶尔马克式的功勋加以“传颂”。为了支援哈巴罗夫，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决定派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率领三千军队大举入侵黑龙江，妄图一举“征服”这片中国领土。沙皇政府行文维尔霍图里叶和托博尔斯克，命令于一六五二——一六五三年两年中每年为拟议中的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1页。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59卷，1935年莫斯科出版，第372—373页。

③ 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1卷，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254页。

远征造好四十艘船只，备足营造另六十只船的木料，并于一六五二年三月派贵族季诺维也夫先行。季诺维也夫的任务是：增援哈巴罗夫；调查中国在黑龙江地区的兵力情况；筹备作战物资，特别是为计划中的三千“远征军”筹办口粮。

一六五三年一月底，沙皇正式谕令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率军队出发。但当时沙俄因吞并乌克兰引起与波兰的矛盾，同土耳其、瑞典的关系也日趋恶化，无暇东顾；同时也无法在西伯利亚解决三千俄兵的口粮问题，因此决定收回上述成命，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远征”结果没有得逞。

季诺维也夫带领一百五十名援兵于一六五三年夏天窜入黑龙江地区，直抵呼玛尔斯克堡，因听说哈巴罗夫已去下游，便尾随其后，同年八月在精奇里江口找到了他。季诺维也夫以沙皇的名义向哈巴罗夫一伙颁发奖章、奖金，以资“鼓励”，并传达了在中国领土上修筑堡砦、令哥萨克自己种地、备足三千军队二年口粮等指示。

不久，季诺维也夫和哈巴罗夫因为争夺权势发生冲突。哈巴罗夫专横跋扈，紧紧抓住他的权力不放，不让季诺维也夫过问，并利用哥萨克不愿种地筑堡的情绪去反对季诺维也夫，几乎导致哗变。季诺维也夫痛殴了哈巴罗夫，揪掉他的胡子，并以侵吞公物罪撤销他的首领职务，押回莫斯科。哈巴罗夫的部下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被任命为“大阿穆尔河—新达斡尔地方长官”。季诺维

也夫因害怕哥萨克闹事，和哈巴罗夫同时离开黑龙江返回莫斯科。

斯捷潘诺夫自接任俄军头子之日起就陷入了困境。黑龙江一带经过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匪帮轮番洗劫，破坏十分严重。冈索维奇说：“黑龙江两岸的居民，一部分被俄国人的索贡和收粮弄得一贫如洗，一部分四散奔逃，一部分由（清）政府下令向满洲内迁。富饶的黑龙江变成一片废墟，俄国人足迹所至，到处都发现被烧毁的当地人的住宅。”^①拉文斯坦说：“俄国人来到黑龙江之初，土著居民是种地养畜的。十年后，田野变成荒漠；这个以前外运谷物的地方，甚至不能养活本地已经减少了的人口。”^②这场空前浩劫，不但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也破坏了入侵者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使他们连食物也发生问题。清政府为对抗沙俄侵略，采取内迁居民的政策，将“索伦、达呼尔南徙于嫩江之滨”，^③将女真人“从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迁往库尔瀚江（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④这就使入侵者的处境更加狼狈，朝不保夕。费歇尔说：“清朝皇帝下令从至今居住着达斡尔人的黑龙江上游迁走全部居民，徙于松花江和嫩江之滨。这样，俄国人的口粮顿时全部断绝。由于他们没有存粮，因此不可

①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48页。

②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25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卷，《索伦诸部内属述略》。

④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213页。

能在黑龙江久留。”^①

斯捷潘诺夫匪帮必然溃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清政府采取了坚决抵抗沙俄侵略的方针，直接出兵驱逐入侵者。哥萨克匪帮开始侵入黑龙江，正值中国明清两朝交替之际，那时清军入关未久，关内战事方酣，清政府暂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沙俄入侵的严重性。中国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俄斗争，给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斗争是分散的，没有后方的支援，缺少统一的指挥和部署。沙俄侵略者乘机肆虐，烧杀掳掠，使美丽富饶的黑龙江岸，变成满目疮痍，众多的中国居民淹没于血泊之中。这些严酷的事实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沙俄入侵者是威胁中国安全的十分凶恶和危险的敌人，于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北边疆，坚决抗击沙俄侵略。一小撮沙俄入侵者从此处在中国军民的铁拳打击之下，他们的可耻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有些旧俄和西方学者将沙俄早期对黑龙江地区侵略的失败归因于强盗头子斯捷潘诺夫个人的无能，甚至以此来衬托另一个强盗头子哈巴罗夫的“雄才大略”，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解释。

事实上，在哈巴罗夫窜扰黑龙江的后期，侵略者的处境早已岌岌可危了。斯捷潘诺夫接管指挥权后，带领着一支给养不足、没有后援、士气极度低落的军队。他们到处挨打，东逃西窜，活象一群丧家之狗。尽管他们仍在拚

^① 费歇尔：《西伯利亚史》，第615页。

命挣扎,但是败局已定,无论如何也没法挽回了。

一六五三年秋,给养耗尽的斯捷潘诺夫听说松花江有粮,率众前往。他们在江口一带的田野里抢割了庄稼后,遁往江口下游过冬。第二年春天,斯捷潘诺夫一伙又上行至松花江口,遇见以卡申采夫为首的五十名哥萨克。两股侵略军合并后,于五月三十一日倾巢窜犯松花江,上驶远达三天行程。^①这是哈巴罗夫想做而没有敢做的事,但是饿狼般的斯捷潘诺夫,现在居然做了出来。

清政府目睹沙俄入侵者在黑龙江流域的窜扰侵袭,决定再次派兵围剿。一六五四年春,遣“轻车都尉明安达哩(礼)统兵征罗刹”。^②明安达礼听说哥萨克正侵入我东北腹地松花江,立即率领所部及前来助战的达斡尔等族人民往讨。战斗于六月十六日开始,一共持续了三天。中国军队水陆并进:骑兵列于江岸,江上船艇齐发,大炮从江岸的工事后面向敌船猛轰。斯捷潘诺夫一伙遭到出其不意的堵击,乱了阵脚,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赶出松花江口,向黑龙江上游仓惶逃命。^③他们在呼玛河口遇见经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侵入黑龙江、以别克托夫为首的六十三名沙俄哥萨克。别克托夫告诉斯捷潘诺夫:黑龙江上游没有粮食。斯捷潘诺夫进退两难,上游无粮,下游有中国军队,便决定在呼玛尔斯克废堡中过冬。^④从这年秋天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93页。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61卷,《北徼事迹表上》。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97页。

④ 这个沙俄堡砦当时已被中国居民拆毁。

开始，他们就集中全力修复和加固这个堡砦。堡砦外面筑两道木墙，中间填土。墙角修护壁，墙外挖了一条两俄丈宽一俄丈深的壕沟。沟外还打上木桩，沟旁地上布满了铁蒺藜。堡砦中筑了几个土台，上置大炮，可以居高临下向四面射击。斯捷潘诺夫一伙缩在这个乌龟壳中，准备负隅顽抗，应付即将到来的清军的围困。

当时清政府的战略，是将沙俄入侵者逐步赶向黑龙江上游，直至将他们赶出中国领土或全部消灭为止。一六五五年，清政府再派明安达礼“自京师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①明安达礼部三月二十四日抵达呼玛尔斯克堡后，先将在砦外伐木造船的二十名俄兵全部消灭。斯捷潘诺夫派出八十七人出砦寻衅，又被全部打死。中国军队将敌砦四面包围，以箭附书射入城内，勒令投降，敌人置之不理。明安达礼于是下令在附近小丘上安置大炮，轰击敌砦。四月五日午夜，清军运去云梯、钩竿、火药包等攻城器材，发起猛攻，从午夜一直打到天明，没有攻下。明安达礼令所部后退一里半，安营扎寨，截断敌人水源，捣毁留在岸边的敌船，日夜猛轰敌人城堡。当时，被压缩在堡砦内的敌人即将弹尽粮绝，面临全面崩溃，只有从“斋戒祈祷”中来“寻求力量”了。^②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五，《平定罗刹方略一》。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206—208页；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30页；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7页。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安达礼在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看不见敌人行将灭亡的明显事实，强调清军粮饷不足，下令撤退，以致这次战役虽然“颇有斩获”，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就当时情况说，明安达礼事前对后勤工作缺少准备，清军千里跋涉，“粮饷不继”，确实不利于持久作战。后来康熙帝（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批评明安达礼“轻进”，非常中肯。但是另一方面，俄军面临的困难比清军更大，正如巴赫鲁申所指出，当时“这一地区已被俄国人的蹂躏所破坏，劫掠一空，……粮食吃尽，火药和铅弹的储备也已告罄。”^①中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作战，缺粮决不象俄军那样严重。如明安达礼再坚持围困若于时日，斯捷潘诺夫一伙必将束手就擒，这是确定无疑的。

一六五五年四月十五日，明安达礼率领全军撤离呼玛。这一行动大出斯捷潘诺夫一伙的意料，他们认为这是“救世主显圣”，说什么“上帝”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使他们死里逢生，斥退了“异教徒”。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呼玛尔斯克的撤围，并没有使沙俄侵略军摆脱困境。他们弹尽粮绝，加之中国军民即将再次进剿的消息频频传来，更使沙俄侵略军心惊胆战，惶恐不安。一六五五年六月至八月，斯捷潘诺夫两次给雅库次克统领写信求援，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7页。

信中说：“目前军队存粮告罄，我们现在住在呼玛尔斯克堡寨，生活极为困难，我们吃草根树皮；所有的存粮早已在被围时吃掉。……我们挨冻受饿，各方面都非常困难，大阿穆尔河的国君库存火药也用光了。……而中国皇帝的军队，以及在他统治下的达斡尔人、杜切尔人及其他各族人则人数众多，就在跟前。哪里也不让我们这些国君的奴仆久留。”^①这是绝望的呼号。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侵略军内讧不断，一些人扬言要拉走队伍，自寻生路。沙皇政府闻讯，急忙给斯捷潘诺夫送来一道打气的嘉奖令。但是纸上的嘉奖岂能充饥。斯捷潘诺夫匪帮已被中国人民打得丧魂落魄，怎样打气也不中用了。

一六五五——一六五六年冬，斯捷潘诺夫一伙再次窜到松花江抢粮，发现中国政府已命令当地人迁走。沙俄侵略军没抢到粮食，就窜到黑龙江下游去抢鱼，在江口度过了冬天。

一六五六年春，斯捷潘诺夫率众再次溯黑龙江上驶，途中见到被当地居民烧毁的另一股沙俄入侵者的船只残骸和许多饿死、打死的侵略军尸体，^②愈感到末日将至。他们窜到精奇里江口，还是找不到食物，这时别克托夫一伙人因走投无路，决定逃离黑龙江，斯捷潘诺夫便借口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209、213页。

② 这一伙人以米哈依尔·索罗金和雅可夫·索罗金兄弟为头子。他们在勒拿河抢劫后窜往黑龙江，逐渐发展到三百人，在黑龙江到处劫掠，肆虐多端。后来一部分人被当地居民打死，其余的全部饿毙。

“护送”别克托夫回国，派出五十名部下同行，^① 临行嘱咐他们不要再回来。他向雅库次克殖民当局报告说，他无法养活自己的队伍，打算“放弃”黑龙江，但“由于没有得到沙皇的谕旨，不能离开”。^②

此后直到一六五八年夏，这一群饿狼继续在黑龙江来回窜扰觅食。与此同时，清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以便趁机将这一伙恶贯满盈的侵略者一网打尽。

一六五七年，沙尔瑚达所部在尚坚乌黑痛击并打败了俄国侵略军。

一六五八年，清政府再遣沙尔瑚达率军一千四百人（包括非作战人员）讨伐斯捷潘诺夫，七月十一日在松花江口附近同沙俄侵略军遭遇。沙尔瑚达命令由四十七艘船组成的中国船队拦住敌船，用炮火将敌人驱赶到岸上，再给以致命的打击。斯捷潘诺夫匪帮共五百人，其中一百八十人在战斗开始时往黑龙江上游遁逃，另一些人慑于清军的声威，不战而降；^③ 匪首斯捷潘诺夫在战斗中丧命，还有二百七十人被击毙或生俘。沙尔瑚达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顺治帝“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④ 第二年，清军收复雅克萨，拆除

① 其中四十一人随后在途中饿死。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213页。

③ 费歇尔指出，这些人是“自愿投降中国人”的。见《西伯利亚史》，第627页。

④ 《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4—5页。

了哥萨克强建的堡砦。^①沙俄另一个侵略据点——呼玛尔斯克，也被当地中国人民再次连根拔除，付之一炬。^②一六六〇年，哥萨克军一股窜犯黑龙江下游费雅喀族地区，清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率兵往剿，在伯力北面古法坛村附近“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伏发，贼即四遁。我兵追袭，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③至此，入侵者的枪声已趋沉寂，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沙俄侵略势力全部肃清。中国军队在当地各族人民配合下，取得了歼灭沙俄入侵者的全面胜利。

① 塞雷伯列尼科夫：《阿尔巴津人》，1922年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出版，第4页。

②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238页。

③ 《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6页。

第 三 章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

第一节 沙俄侵略军的卷土重来

一六五八——一六六〇年中国军队抗击沙俄入侵的胜利，给予哥萨克侵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他们迅速征服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迷梦。但是，沙皇政府野心不死，“并没有放弃占领黑龙江的计划”。“它决定用哥萨克部队在外贝加尔建立堡垒”，然后“逐步地向黑龙江地区扩展势力”。^①就在斯捷潘诺夫覆灭的当年，另一批来自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殖民者已经出现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流域。清政府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在歼灭斯捷潘诺夫后放松警惕，从沿江一带撤退军队，忽视了东北边防的进一步加强，因而使沙俄侵略者重新得到可趁之机。

沙俄早期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武装入侵，主要循两条路线。一路从雅库次克出发，越过外兴安岭向南推进。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等人，大体上都是沿这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03页。

条路线闯入黑龙江的。

另一路以叶尼塞斯克为侵略基地，逐步向东南方伸展触角。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初，叶尼塞斯克沙俄殖民当局听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盛产金银、貂皮和粮食的“迷人传闻”，为掠夺财富的贪欲所驱使，即已开始寻找通往那里的道路。一六四四年，哥萨克百人长柯列斯尼科夫率所部从叶尼塞斯克向东进发，去“探寻不论何地的白银或银矿”。^①他们沿安加拉河窜到贝加尔湖南岸，受到我国蒙古族人民沉重打击，被迫折向北行，一六四六年在上安加拉河口建立同名的堡砦。同年冬，柯列斯尼科夫听说贝加尔湖东岸有银矿，立即派小股侦察部队前往探寻。他们一直窜到我国蒙古族游牧的叶拉夫纳湖地区和色楞格河附近，大肆骚扰。不久，柯列斯尼科夫在上安加拉堡留下二十名哥萨克，自己返回叶尼塞斯克。一六四七年，贵族士官帕哈波夫带领八十名哥萨克从冰上穿过贝加尔湖，出现在该湖东南岸。当地布里亚特族人民进行抵抗，遭到沙俄殖民者残酷镇压。一六四八年，叶尼塞斯克殖民当局又派加尔金带领六十名哥萨克侵入贝加尔湖以东，在该湖东岸强筑巴尔古津堡，并对当地居民进行血腥的“讨伐”，凶狠残暴胜过虎狼。巴赫鲁申曾把他们同十六世纪征服美洲印第安族印加帝国，以残酷、贪婪和背信弃义闻名世界的西班牙殖民强盗毕萨罗相比，称之为“典型的俄国毕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41页。

萨罗”。^① 巴尔古津是沙俄在我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强建的第一个侵略基地，俄国殖民者以此为中心，逐步把掠夺毛皮的范围扩大到穆亚河、维季姆河和昔洛克河一带。

继加尔金之后，一六五〇年柯列斯尼科夫再次来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并派索福诺夫等赴石勒喀河掠夺毛皮。索福诺夫一伙一直窜到位于石勒喀河和尼布楚河汇合处的我国尼布楚地方，因遭到当地人民抵抗，结果未能得逞。他们从失败中得出结论：必须在当地修筑堡砦，实行武装占领，否则“便无法迫使通古斯人缴纳毛皮实物税，因为那里的通古斯居民人数很多”。^② 叶尼塞斯克统领帕什科夫对此深表赞同，于一六五二年下令派殖民经验丰富的百人长别克托夫前往筑堡。别克托夫接到命令立即率领部队出发，沿色楞格河、昔洛克河、音果达河东犯，“途中有许多通古斯人住房的遗迹，但没有一个通古斯人。居民听说俄国人来到，马上四散逃避。”^③ 一六五三年冬，入侵者闯到尼布楚地方，在这里强建了一座小堡砦。当地中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许多人不愿屈从沙俄的殖民统治，向东撤退到嫩江流域。^④ 沙俄入侵者孤立

① 巴赫鲁申，《十六、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纲》，载《巴赫鲁申学术著作集》，第3卷，第1分册，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154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45页。“通古斯人”在这里主要指我国鄂温克族。

③ 同上书，第48页。

④ 索伦部头人根忒木尔也于此时从尼布楚迁往嫩江。据张伯英编《黑龙江志稿》记载，根忒木尔曾由清政府授以佐领之职，见该书第54卷，第13页。

无援，粮食匮乏，军心涣散，一六五五年终于被迫撤离尼布楚，逃窜到黑龙江去投奔斯捷潘诺夫，他们所建的堡砦也被当地居民彻底平毁。当时沙俄殖民者还一度打算在额尔古纳河岸建立冬营，强迫居民“纳贡”，但本地人民坚决抵制，迁徙一空；^① 结果，沙俄的侵略野心又遭挫败。

此后，帕什科夫仍不放弃他的东侵计划，坚决主张增派军队到石勒喀河建立侵略据点，再从这里逐步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莫斯科当局十分赞许这一计划，决定派帕什科夫亲自出马，前往石勒喀河执行筑堡任务，并拨给他数百名军役人员和大批枪炮弹药。^② 一六五六年夏，帕什科夫率领这支哥萨克军队从叶尼塞斯克出发，沿着前述别克托夫等人经过的路线向东推进。一六五七年，他们在昔洛克河岸建伊尔根斯克堡，随即转往音果达河，在这里建造平底木船多艘，然后顺流而下，闯入石勒喀河流域，一六五八年在尼布楚强筑涅尔琴斯克堡，实行军事占领。^③

从一六五八年，起，尼布楚成为沙俄在黑龙江上、中游一带殖民势力的中心。帕什科夫既是尼布楚的统领，又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278页，附注2。

② 这支沙俄侵略军的总数，一说为三百人，一说为五百六十六人。为了武装这支军队，沙皇政府除枪炮外还提供了五十普特火药，一百普特铅弹及其它军用物资。

③ 何秋涛《尼布楚城考》说：“尼布楚城本中国蒙古属地，……尼布楚亦作尼布潮、尼布抽、尼布绰，又作泥朴处，又作泥扑处，又作你不褚，实一地而译文各异。”（《朔方备乘》，第15卷）涅尔琴斯克是尼布楚的转音，后面加上一个俄语字尾。

兼黑龙江地区沙俄侵略军的总头目。一六五八年七月，帕什科夫派遣波塔波夫赴黑龙江同斯捷潘诺夫联络，命令后者抽调一百人到尼布楚，以加强尼布楚的兵力，余部集中雅克萨，等候帕什科夫亲自前来视察。但斯捷潘诺夫此时已被中国军队击毙，来不及执行这位新长官的指示了。波塔波夫走到中途，正碰上斯捷潘诺夫的残部狼狈西逃，他们把波塔波夫供自己食用的干粮抢得精光，波塔波夫无可奈何，只得饥肠辘辘地逃回尼布楚去报告一切。^①

斯捷潘诺夫全军覆没的消息，对于帕什科夫不啻是当头一棒。此时尼布楚俄军粮食极度匮乏，以致不得不宰杀马匹充饥，哗变逃跑的士兵与日俱增，沙俄殖民者一时不仅无力重新侵入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就连在尼布楚也立足不稳。帕什科夫力图从本国招募农民来尼布楚耕种，但是万里迢迢，应募者寥寥无几。一六六〇年，沙皇政府改命贵族士官伊拉雷昂·托尔布津为尼布楚统领，可是他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当一六六二年托尔布津到任时，尼布楚境内共有三座堡垒，即涅尔琴斯克堡、伊尔根斯克堡和车勒姆宾斯克堡。^②三个堡垒中的军役人员总共只有七十五人，并且此后不断逃亡。当地居民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沙俄入侵者，迫使他们龟缩在堡内，风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36页。

② 伊尔根斯克堡和车勒姆宾斯克堡均位于尼布楚以西，一在昔洛克河上游，一在今赤塔西北。

声鹤唳，草木皆兵，处境十分狼狈。一六六二年五月，托尔布津向叶尼塞斯克统领求援说，由于兵力不足，他既无法征收到“毛皮实物税”，也无能力使堡砦免受“异族人”攻击。“如果不增加涅尔琴斯克和伊尔根斯克堡的军役人员，如果不运送粮食前来，我和服役的军役人员们将要饿死。”一六六四年他又向雅库次克统领呼吁：“我的三座堡砦中共有四十六人。他们坐受蒙古人围困，眼看即将饿毙。”^①托尔布津在尼布楚数年，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这种窘境。

正当沙俄殖民者困守尼布楚、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六六五年在伊利姆斯克发生一起切尔尼果夫斯基匪帮杀人越货的事件，它给沙俄带来了重新侵入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机会。

切尔尼果夫斯基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俄籍波兰人，一六三八年因犯罪充军到叶尼塞斯克，后来在勒拿河上乌斯季一库特的煮盐场充任监工。一六六五年他因私愤和伊利姆斯克统领拉·阿·奥布霍夫发生冲突，纠集同伙杀死奥布霍夫，捣毁本地商店，抢劫了财物，然后向黑龙江逃之夭夭。随切尔尼果夫斯基逃走的罪犯共八十四人，其中包括一名东正教士，名叫叶尔莫根。他们沿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被当地居民击毙十五名，其他六十多人一直窜到我国雅克萨城故址，在以前哈巴罗夫所建阿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08、110页。

尔巴津堡砦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座长十八俄丈、宽十三俄丈的长方形城堡,四周围以木墙。墙外有堑濠环绕,深二俄丈。城堡内共有三座哨楼,一座设在堡门上端,监视出入;临江的一面,两端也各设哨楼一座,楼上站岗放哨,楼下是匪徒们的住所。巴赫鲁申把切尔尼果夫斯基一伙的巢穴称做“阿尔巴津贼堡”,^①是十分确切的。



阿尔巴津贼堡

切尔尼果夫斯基等在雅克萨建立据点后,随即四出劫掠,继续扩大活动范围。一六六六年,他们竟明火执仗地闯到呼伦贝尔一带地方,强迫居民缴纳毛皮,并竭力煽动附近的中国少数民族头人背叛祖国。沙俄历史学者塞雷伯列尼科夫毫不掩饰地承认,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伦部头人根忒木尔,就是在切尔尼果夫斯基的策动下,于一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2页。

六六七年背叛中国投靠沙俄的。^①这个无耻的叛国犯逃入俄境后，沙俄殖民当局如获至宝，立即由托尔布津亲自接受他加入“俄国国籍”，并给以种种奖赏，^②妄图引诱更多的中国边境居民叛国投俄。这种明目张胆的颠覆活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愤慨。清政府多次向俄国提出抗议，要求引渡根忒木尔，但沙俄始终坚持侵略立场，拒不交还，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两国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争端。

一六六八年六月，切尔尼果夫斯基进一步派遣哥萨克六十人赴精奇里江侵扰达斡尔族居民，捕捉人质，勒索毛皮；第二年七月，他又派数十名哥萨克深入到今齐齐哈尔附近进行劫掠。^③这些侵犯中国领土，蹂躏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极受俄国政府赞赏和支持。从一六六九年起，尼布楚统领阿尔兴斯基即与切尔尼果夫斯基经常通信，紧密勾结，并在给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公文中公然将切尔尼果夫斯基称做“阿尔巴津管事”。切尔尼果夫斯基也竭力向沙俄行政当局谄媚讨好，每年将掠到的大批赃物——贵重毛皮，以什一税的形式呈献给尼布楚统领，有

① 塞雷伯列尼科夫：《阿尔巴津与阿尔巴津人》，载《中国福音报》，1935年北京出版，第90页。

② 随后在一六八二年，沙俄政府更公然召根忒木尔祖孙三人赴莫斯科觐见沙皇。老贼根忒木尔中途病死，其子卡塔奈由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塞维奇（一六七六——一六八二年）亲自接见，封为贵族，赏以重金，并指示尼布楚统领为他建造新住宅。一六八四年，这个卖国贼受洗入东正教，取了俄国名字，叫做“巴维尔·根忒木洛夫”。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29页。

时还派人直接送往莫斯科。这样，沙皇政府就与这个匪帮建立了合伙分赃的关系，共同的侵略利益把他们紧紧地结合起来。

到一六七一年，切尔尼果夫斯基居然派出请愿团，大摇大摆地到莫斯科去，要求沙皇对他们正式宣布“特赦”。这个请求颇使克里姆林宫左右为难：一方面，切尔尼果夫斯基等杀死统领，按照法律规定断不能宣布无罪；另一方面，他们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有“功”，又理应给予褒奖，以资鼓励。经过再三盘算，它终于想出一个狡猾的解决办法：一六七二年三月十五日，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为了维护俄国的“法律尊严”，冠冕堂皇地颁发一道谕旨，宣布将杀人犯切尔尼果夫斯基等十七人判处死刑，从犯四十余人鞭责、砍手。但是事隔一天，三月十七日他又颁发另一道“仁慈谕旨”说，切尔尼果夫斯基等带罪图功，前往达斡尔地方，“于阿尔巴津城建立堡砦，召集居民纳贡，拘捕人质，经营耕地，着即免于惩处，听其仍留阿尔巴津。”^①同时，罪犯们还得到了各种奖赏：切尔尼果夫斯基被任命为阿尔巴津管事，他的部众得到了两千卢布饷金。^②于是这一伙罪恶累累的强盗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俄国的正式官兵。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强盗政策，沙皇就是戴皇冠的强盗，他对切尔尼果夫斯基等匪类这样赏识和器重，是毫不足怪的。

①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1909年莫斯科出版，第16页。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6页。

自正式收编以后，切尔尼果夫斯基一伙对沙皇当局更加感恩戴德，极力推行俄国政府既定的侵略扩张政策。雅克萨作为沙俄侵华的前哨阵地，地位日渐重要，前来的形形色色沙俄殖民分子与日俱增。在雅克萨附近开始出现若干哥萨克村屯：波克罗夫斯卡雅，伊格那申诺，奥捷尔那雅，波格达耶瓦，安德鲁希金纳，莫纳斯蒂尔欣纳，潘诺沃等等。这一带地方土地肥沃，沙俄侵略者强行殖民屯垦，蓄谋久据，把它作为进一步向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扩张的主要据点。

一六七五年，切尔尼果夫斯基倾巢出犯，带领部众三百人窜到黑龙江以南几百里远的甘河地区，妄图裹胁当地达斡尔族部落叛国投俄。^①这是切尔尼果夫斯基一伙在中国领土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侵略行动。达斡尔族人民不甘受沙俄奴役，趁俄军不备，连夜南撤到嫩江一带。切尔尼果夫斯基等不敢继续深入，慌忙退去。^②

与切尔尼果夫斯基匪帮重占雅克萨同时，沙俄殖民者在贝加尔湖东南岸一带也加紧了侵略步伐。一六六五年秋，哥萨克五十人长舒利金奉巴尔古津堡管事萨莫依洛夫之命，率领军役人员八十多名，悍然侵入我国蒙古族聚居的色楞格河下游地区。一六六六年春，他们在楚库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478—479页。甘河是嫩江上游的一条支流。

②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292页。

河和色楞格河汇合处附近强筑色楞格斯克堡，作为向蒙古腹地扩张的主要据点，接着又在乌达河口强建乌金斯克冬营（后来也改建为堡砦）。一六七四年，沙俄殖民者进一步在叶拉夫纳湖畔强筑叶拉文斯克堡。这一系列侵略行径严重地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中国北部地区的安全，使中俄关系不可避免地更加紧张和恶化。

第二节 为侵略扩张服务的 沙俄对华外交

沙俄政府一方面疯狂推行武力扩张政策，不断地侵占中国领土，另一方面还使用外交手段，多次向北京派遣使团，力图通过这一途径在中国广泛地搜集情报，伸展政治、经济势力，开辟商品市场，甚至狂妄地要求清政府“臣属”沙俄，蓄谋把全中国变为沙皇俄国的殖民地。

一、巴依科夫出使北京的前前后后

有些历史书中记载，沙俄政府早在一五六七年即曾派哥萨克头目伊万·彼特罗夫和布尔纳什·雅勒切夫二人出使北京，据称这是沙俄首次向中国派出的外交使团。^①但是后来的研究证明，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外

^① 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和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等书均持此说。

交使团。^①

沙皇政府向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的裴特林使团。早在一六一六年，沙皇政府曾派遣图敏涅茨潜赴喀尔喀蒙古西部的科布多地区进行阴谋活动（详见第四章），后者在科布多期间，曾听到关于中国内地情况的种种传闻，他回到俄国后在报告书中写道：北京城的规模是“如此宏伟，骑马绕城走一圈也需要十天时间”。又说，中国盛产黄金、白银、生丝、绸缎、天鹅绒、小麦、大麦、燕麦、小米等等，应有尽有。^② 这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激起了俄国政府的贪欲，一六一八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一六一三——一六四五年）为了获得关于中国内地情况的详细材料，决定派裴特林出使北京。五月中旬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经喀尔喀蒙古、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和宣化等地，于同年九月到达北京。鉴于沙俄一再觊觎我国西部地

① 早在一八八二年，特鲁塞维奇在《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一书中，即已对俄国曾否派出过这样一个使团提出怀疑，见该书一八八二年莫斯科版第2页。一九二五年巴托尔德在《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中明确指出，一五六七年俄国根本不曾向北京派遣任何使团，见该书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版第187页。彼特罗夫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从未到过北京。所谓彼特罗夫的出使报告，内容与一六一八——一六二〇年裴特林使团的报告完全相同，其中谈到的旅途见闻，与十七世纪初的实况恰恰相符，而不符合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情况。因此，这份据称是一五六七年彼特罗夫等所写的出使报告，实际上是张冠李戴，把人名和年代都弄错了。还应该着重指出：关于所谓彼特罗夫出使北京一事，中国历史文献中从无任何记载。

②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第40页。

区，明朝政府对裴特林一行不能不有所警惕；^① 尽管如此，他们在北京还是受到了适当的礼遇，万历帝（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并给予国书，指出：“尔为大国，而中国亦不小也”，^② 建议两国平等往来。一六一九年春，裴特林等回到俄国。使团在出使中国期间搜集了地理、物产、交通、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为沙俄进一步侵华准备了条件。俄国政府对裴特林使团的“收获”极为满意，并指示西伯利亚殖民当局进一步搜集有关中国的各项情报。

裴特林使华以后，莫斯科同北京的外交接触中断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衰朽的明朝封建政权在农民起义打击下日趋崩溃，一六四四年清军乘机入关，建立起统治全国的清朝中央政权。同一时期，西伯利亚的沙俄殖民势力继续向东推进，并趁清军南下之机武装侵入黑龙江流域，野蛮地蹂躏中国领土，使中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在一六五二年导致两国武装部队的直接冲突——乌札拉村之战。

在这种形势下，沙俄政府一面顽固地坚持武力侵略方针，继续向黑龙江增派兵力，运送枪炮弹药；一面决定向清政府派出外交使团，妄图用伪善的“友好”姿态粉饰其武力侵略行动，欺骗、麻痹清政府，并进一步搜集情报和获取通商利益。一六五三年，雅库次克沙俄殖民当局派军役人员阿芬纳西耶夫等前往北京，因在喀尔喀遇阻，

①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1960年莫斯科出版，第119页。

②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1930年北平出版，第526页。

被迫折回。^①一六五四年二月，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指派费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依科夫出使中国。按照俄国政府给他的训令，此行主要任务是：一、转达沙皇同中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二、探听清政府对俄方针和通使、通商的可能性；三、详细调查中国的商品、物产、交通、军备、财政、人口、城市等等。^②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并有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一件，首先吹嘘俄国如何强大，邻邦如何畏服，甚至伪造家谱，自称是“统治全世界的奥古斯都·恺撒”^③的嫡系子孙，俨然以罗马帝国侵略扩张事业的继承者自居。接着，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谈其对华“亲善”，再三表示愿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④显而易见，如果他果真具有这种诚意，那就应该切实保证停止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野蛮侵略，因为这个问题正是妨碍中俄之间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症结所在。但国书中对于这一重大的原则问题竟然装聋作哑，故意回避；在俄国政府给巴依科夫的训令中，也没有提到黑龙江问题。这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高唱入云的所谓“亲善”和“友谊”是假，推行武力侵略是真。

①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第132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52—165页；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882年喀山出版，第9页。

③ 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公元前二十七年——公元十四年在位），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以穷兵黩武著称于世。

④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165—168页。

一六五四年七月，巴依科夫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溯额尔齐斯河至斋桑湖，然后经蒙古等地，于一六五六年三月上旬到达北京。使团入城前，清政府派员出迎，并按照传统礼节，以中国皇帝的名义敬以奶茶，但这种善意的礼遇竟被巴依科夫当场拒绝，粗暴无礼地将奶茶退回。进城后，巴依科夫又在接待规格问题上无理取闹。当时沙俄的外交代表分为三级，最高一级是全权大使，其次是公使，最低一级是急使。巴依科夫不过是一名急使，可是他一定要当面向顺治帝递交国书，而拒绝由清政府的任何高级官员转递；清政府要求他尊重中国的习惯，但巴依科夫始终置之不理。不仅如此，据当时正在北京的荷兰使团人员记载，这些俄国人还在中国首都“胡作非为”，扰乱治安，^①以致激起公愤。

更不能容忍的是，正当巴依科夫率领的“亲善”使团访问北京的时候，全副武装的沙俄哥萨克却在黑龙江上继续干着杀人放火、攻城掠地的罪恶勾当。清政府为此向巴依科夫提出质询，他竟诡称斯捷潘诺夫是不受俄国政府约束的盗匪，其所作所为并未奉有莫斯科的命令，与俄国政府完全无关！^②这种拙劣的谎言表明，沙俄方面根本不愿停止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武装侵略，也不愿就这一问题进行稍微严肃认真的讨论。由于俄方的这一立场，以致谈判半年之久，毫无结果。最后在一六五六年九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53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7页。

月，清政府认识到交涉无望，不得不通知巴依科夫离京回国。^①

巴依科夫使团虽然在外交上未遂所欲，但是在出使中国期间却“搜集了许多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情报”，^②探明了经西伯利亚前来中国的道路，并详细调查了北京、张家口和归化城等地情况。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商业上的好处。使团来华前，沙俄政府特别从国库中拨款五万卢布交给巴依科夫，购买大批毛皮等商品运到北京出售，随后又从北京购买中国货物运回本国，一往一返，获得巨利。

一六五七年下半年，巴依科夫一行回到俄国。在使团返俄以前，莫斯科当局忽然听到一种谣传，说由于俄国继续对黑龙江地区进行武力侵略，中国政府已将巴依科夫拘留。这个消息使作贼心虚的沙俄政府大吃一惊，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慌忙指派阿布林到北京进行交涉，并命令外交事务衙门拟就一封致顺治帝的国书，交他带去。国书中说：“朕大君主、大沙皇现已获悉：朕之士卒与毗连朕世袭领地西伯利亚之达斡尔地方居民因故相争，致动于戈，而不知该达斡尔地方属于贵皇帝。以此之故，朕之贵族费多尔·巴依科夫遂遭贵皇帝拘留于中

① 雅科夫列娃也承认这一点。她说：这个“出使中国的俄国外交使团的失败，基本原因是由于在黑龙江上形成的某种政治形势。”见《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97页。

②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第151页。

国。”国书中要求清政府立即将巴依科夫释放，并赌咒发誓说：从今以后，“朕大君主、大沙皇决不准朕之士卒再赴达斡尔地方，且谕彼等与达斡尔人和睦相处”。^①在这里，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亲口承认“达斡尔地方”即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流域和黑龙江上、中游一带是中国的领土，并保证沙俄军队不再侵犯。可是，正当阿布林等准备启程之际，巴依科夫已经安全地回到托博尔斯克。沙俄当局获悉后，如释重负，连忙收回上述的国书，并另备一封新国书，其中只谈通商，对停止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再也不提一字。这一出尔反尔的行动，生动地表明了沙俄外交的奸诈和卑劣。

一六五八年，伊·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携带新国书，率商务使团前往北京贸易，一六六二年返俄，获利一倍以上。一六六八年，沙俄政府再派阿布林到中国贸易，运来总值四千五百卢布的毛皮等货物，在北京售去大半，得银一万一千五百多两（当时一两白银相当于一卢布），然后又用此款购中国货物赴俄销售，共得一万八千七百多卢布，获利达三倍以上。^② 这些事实表明，俄国对华贸易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掠夺性。

二、米洛瓦诺夫和尼果赖使团

巴依科夫使团回国以后，十多年间沙俄侵略者继续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229页。

②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第160—161页。

侵扰中国东北边疆，领土野心有增无已。六十年代中，黑龙江地区连续发生沙俄重占雅克萨和煽动根忒木尔投俄等事件，使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不能不问。一六七〇年春，宁古塔将军巴海奉命派员赴尼布楚投递文书，对沙俄侵略黑龙江提出质问，要求引渡根忒木尔，并提议俄方派人前来北京商谈，以期改善两国关系。为了保证俄国使臣的人身安全，清政府甚至表示愿留三人在尼布楚为质。^①这种克制态度，充分表明清朝方面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但是，尼布楚统领阿尔兴斯基接到文书后，却把中国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决定趁机进行外交讹诈，于四月下旬指派军役人员伊格那蒂·米洛瓦诺夫等十人出使北京，发给训令，详细指示他们：

一、“倘中国皇帝询及根忒木尔因何未曾遣回，则汝伊格那蒂等应谓，无大君主之谕旨不敢将根忒木尔遣回。”

二、“倘向汝等询及雅克萨城哥萨克人事件之时，汝辈各使臣等应谓，我国统领由哥萨克人等得悉，有不法之达斡尔人及杜切尔人等来至雅克萨城，并于该处杀死军役人员十二名，且将马匹及牛羊劫夺而去。……哥萨克因彼等寻衅，故前往讨伐。”

三、俄国人得“在中国境内及两国间自由通商”。

四、“应告知中国皇帝，……彼中国皇帝应尽力求得

^①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22页。

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沙皇及大公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陛下之恩惠，归依沙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纳入贡赋。”“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于敌人之侵害”。^①

这四条中，前两条实际上是针对上述清政府文书而发：第一条坚持在中国边境地区搞颠覆活动的一贯方针，拒绝交还叛国投俄分子根忒木尔；第二条为重占雅克萨百般辩护，颠倒黑白，把我国达斡尔等族人民反侵略的斗争诬蔑为“寻衅”，而俄国的侵略行径反倒似乎成了“正义”行动。后两条是沙俄方面向清政府进一步提出的反要求：第三条企图打开中国大门，听任俄国人在中国全境自由经商；第四条是训令的核心，它表明沙俄的野心不仅限于侵吞黑龙江流域，而且妄图要清政府接受沙皇的“最高统治”，永远称臣纳贡，从而一举灭亡中国，把全中国人民变为沙俄的殖民地奴隶。沙俄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示要同中国“友好亲善”，用意到底何在？这个训令就是清楚的答案。

同年夏，米洛瓦诺夫一行经额尔古纳河、根河、嫩江及热河等地到达北京，^② 声称奉沙皇谕旨前来出使，并且

①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1936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第1件；并参看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270—271页。

② 这是当时从西伯利亚前来北京的一条最便捷的交通路线。一六七五年尼果赖出使中国，也选择了这条路线。

把阿尔兴斯基的上述训令直接交给清政府，狂妄放肆达于极点。但由于缺乏通晓俄文的译员，清政府当时并不知道这一文件中要求中国臣属沙俄的侮辱性的内容。米洛瓦诺夫在北京期间受到了良好待遇，康熙帝亲自接见，并赠给衣、帽、绸缎等礼物。^①八月，清政府派达斡尔总管孟额德陪同使团返尼布楚，将康熙帝致沙皇的一封国书面交阿尔兴斯基，重申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愿望。国书中写道：“朕治下之捕牲人于石勒喀河捕貂，归来奏称：有切尔尼果夫斯基所部少数罗刹盘踞雅克萨，侵扰我边民达斡尔与女真人。朕曾欲出兵讨之，然闻彼等系察罕汗臣民，故终未下令讨伐，……自兹以后，毋复扰我边民，为非作歹。”^②孟额德并向阿尔兴斯基历数切尔尼果夫斯基一伙侵犯中国领土、残害中国边民的种种罪行，要求阿尔兴斯基加以制止。当时阿尔兴斯基曾表示不许切尔尼果夫斯基等恣意妄为，^③并答应引渡根忒木尔，^④但是他根本不曾实现这些诺言。此后，孟额德又多次去尼布楚，要求俄方对上述国书作出正式答复，沙俄政府竟置若罔闻，不加理会。这种横蛮无理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两国

① 据米洛瓦诺夫自述，“他们在北京逗留了五星期零三天，得到了充足的食物——小麦、羊肉、牛肉、鱼类”及各种蔬菜，“饮料有上等红酒和奶茶”。见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202页。阿尔兴斯基也报告沙皇说，米洛瓦诺夫等在北京“受到很高的礼遇”。见同书，第197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第276页。

③ 同上书，第280页。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33页。

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一六七五年，沙俄政府又派外交使团前来中国。当时它刚刚竭尽全力镇压了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一六六七——一六七一年），国库十分空虚；在国外，由于第三次英荷战争（一六七二——一六七四年）的影响，俄国同西欧的贸易额日益缩小。这些因素，促使沙俄政府力图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同时，它还企图通过这次出使更深入地刺探中国的近况，特别是盗窃军事情报。

一六七五年二月，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指派尼果赖·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以大使名义出使北京。尼果赖出身于摩尔达维亚的贵族家庭，曾长期在摩尔达维亚宫廷供职，封为“斯巴达尔”。^①后来他图谋篡夺君权未遂，按叛逆犯治罪，割去鼻孔之间的软骨，并被驱逐出境。一六七一年，尼果赖经东正教会介绍赴莫斯科，在俄国外交事务衙门任译员，由于擅长搞阴谋权术，受到长官赏识，很快便在沙俄外交界显露头角。

一六七五年三月，尼果赖率随行人员一百六十人从莫斯科出发，并派前述的未洛瓦诺夫先赴北京联系。同年七月尼果赖抵叶尼塞斯克，在该地接到情报说，目前中国皇帝由于“三藩之乱”，“力量极其虚弱，十分畏惧哥萨

^① 曼考尔说，“斯巴达尔”一词出自罗马尼亚文，是一种贵族等级，意为“骑兵指挥官”或“为君主持剑的贵人”。此字在俄语中转为“斯巴伐利”，许多中俄关系史著作把斯巴伐利误作人名。参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324页，注9。

克”，俄国只要出动两千军队，就不仅可以征服整个达斡尔地区，而且可以把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统统征服。^① 他根据这些情报作出判断说，“目前正是建立勋业的一个有利时机”，认为沙俄应该趁机出兵进攻中国。^② 尼果赖对于形势和中俄力量对比的估计，同他来华以后所持的极端骄横的态度有密切关系。

九月中旬，尼果赖途经伊尔库次克，特别会见了根忒木尔，保证决不把他交还中国。同年十二月使团抵尼布楚，并继续东行，渡额尔古纳河，于一六七六年二月抵达嫩江。清政府获悉使团入境后，特派礼部侍郎马喇前往迎接，三月十二日和尼果赖在嫩江首次会见。马喇问道：一六七〇年康熙帝致沙皇国书中，要求沙俄停止侵略中国领土并交还根忒木尔，这次他是否带来了俄方的答复？尼果赖诡称，沙皇政府由于文字隔阂，至今并不知道中国国书的内容。马喇当即反驳说，一六七〇年米洛瓦诺夫初次来京时，清政府已将国书内容告知，随后孟额德陪同米洛瓦诺夫赴尼布楚，又向尼布楚统领阿尔兴斯基作了详细说明，因此，俄国政府绝不可能不了解国书的内容。接着，马喇要求尼果赖出示沙皇阿列克塞致康熙帝的国书，但尼果赖坚决不从，定要到北京面交中国皇帝。马喇说：“如果你不愿出示信件，至少应该把它的内容告诉我，因为我奉有命令，如果信中有威胁或无礼的词句，就把你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257页。

②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79—80页。

们送回俄国。”尼果赖说，“信中只表示希望建立友邻亲善的关系”，别无其它。马喇说，既然如此，就请把这句话用俄文写下来。^①但这一要求又遭尼果赖无理拒绝，首次会见不欢而散。

第二天，马喇针对尼果赖的态度和长期以来沙俄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做了重要发言。他尖锐地指出：

“你连亲口对我们说过的话，也不肯用俄文写下交给我们。我们无法相信你的话，因为你完全言行不一，如同巴依科夫和在他以后来华的一些俄商一样。过去若干年中，你们俄国人说的是一回事，干的却是另一回事。沙皇派遣你出使中国已有一年之久，可是你们的人——雅克萨的哥萨克，为数达三百人之多，直到最近还武装侵犯我国边境的村屯，图谋掳掠人口和进行洗劫。……更有甚者，就在你们从尼布楚前来这里以后，上述雅克萨的哥萨克们竟乘船沿黑龙江和精奇里江行驶，抓了一些我国纳贡者和毛皮商人，威胁他们说：‘沙皇已命令我们沿黑龙江和其他河流建立城镇，你们必须向我们纳贡，如若不然，我们就彻底消灭你们。’……那些哥萨克每天还对我国人民施以其他暴行，尽管我们这方面并未侵犯他们。我国地方官员在米洛瓦诺夫离去以后，向皇帝奏报了所有这些情况：米洛瓦诺夫曾说大使（指尼果赖——引者）是为了和平使命而来的，而哥萨克们却已经向我们开战了。既然如此，沙皇的使节是不是前来宣战的呢？是不是前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299页。

来向我国皇帝索取贡赋，或者进行某种恫吓呢？我国皇帝派我急速前来彻底查明你来华的目的，因为我们是不信任你的。对于一个一方面派出大使，而另一方面却开始战争行动的国家，我们能够期望什么和平与友谊呢？既然战争正在进行，还有什么贸易可言？显然，……你们在对我们玩弄阴谋诡计。无论如何，你们若不管束你们的边民，两国君主之间就根本谈不到友好问题。我们顾全沙皇的体面而容忍了他们，但我们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平定他们的。”^①

这一席话义正辞严地谴责了沙俄的侵略行径，揭穿了他们的两面手法，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和平诚意和抵抗侵略的决心。尼果赖竭力狡辩，竟说哥萨克入侵者“并未使中国人遭受任何损失，也没有伤害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马喇立刻针锋相对地指出：哥萨克们的确是“善良的人”，他们来同中国人做生意，邀请中国人做客和赴宴，“然后就把他们紧紧捆绑起来，夺去他们的全部貂皮，并一面殴打他们，一面吼叫：‘把你们藏起来的其余貂皮统统拿出来！’”“你们的哥萨克就是这样一类善良的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象他们一样的人了。”^②尼果赖被驳得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00—301页。

② 同上书，第301页。顺便指出，沙俄殖民者在西伯利亚也一贯采用这种掠夺手段。“官方文件承认，俄国商人有时邀请‘（西伯利亚）人去作生意，掳走他们的妻儿，抢劫他们的财产和牲口，并对他们进行各种迫害。’”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5卷上册，中译本，第200页。

体无完肤，理屈辞穷，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他这次出使获得成功，以后可以设法防止再发生此类事件。

双方在嫩江就两国关系和递交国书的程序等问题谈判很久，由于尼果赖的顽固态度，结果毫无进展。马喇向北京请示办法，清政府继续抱着和平解决中俄边境问题的愿望，经王、大臣集议后决定允许尼果赖等进京。四月下旬使团自嫩江启程，经松辽平原西部及热河等地，五月下旬到达北京。此后，尼果赖的态度仍无改变，不断无理取闹。清政府要求将国书先送礼部翻译，但尼果赖一口拒绝，坚持要直接递交康熙帝，甚至暗示要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进行颠覆活动，威胁清政府说：“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有朋友也有敌人”！双方就递交国书的仪式问题一直谈判到六月中旬，清政府决定采取妥协办法，在午门特设一张铺着黄绸的御案，由尼果赖把国书放在桌上，实际上满足了他的要求。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十八日，尼果赖按照沙皇的训令，又向清政府递交一份照会，提出了释放被俘的哥萨克入侵者，中国派使团携带宝石、金银、绸缎等赴俄“报聘”，中国每年向俄国输出白银四千普特及各种宝石，俄商得在中国各地自由贸易等十二条要求。^①可是对于清政府多次向沙俄提出的停止领土侵略及引渡根忒木尔的要求，照会中却照旧置之不理，实际上采取了完全拒绝的态度。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30页。

同时，尼果赖还同在清廷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耶稣会士南怀仁（原名费迪南德·维比斯特）等暗中勾结，进行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活动。尼果赖因南怀仁身居要职，经常出入宫廷，所以百般笼络，力图收为己用；南怀仁希望得到沙俄同意，为耶稣会开辟一条从罗马经莫斯科到北京的较近便的交通路线，因此也向尼果赖曲意逢迎，竭力讨好。他利用担任译员的机会接近尼果赖，表示“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沙皇效劳”。^①他偷偷地把私绘的中国地图送给尼果赖。他多次将清政府的机密，特别是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的战略计划用拉丁语密告尼果赖，并要尼果赖在圣像前面发誓，不得把他说的话向任何人吐露，“也不得在离开中国之前把这些话记录下来”。^②正如一位罗马尼亚学者所说，南怀仁与尼果赖的勾结是“确确实实的叛逆行为，因为他把中国的全部国家机密都向这位大使泄露了。”^③在中俄关系史上，沙俄曾不止一次收买西方国家在华的耶稣会士充当侵略工具，而启其端者正是这个尼果赖。

尽管尼果赖的所作所为如此恶劣，清政府还是给予他适当的礼遇，由康熙帝接见、赐宴并赠给礼物。另一方面，清政府在九月中旬向尼果赖郑重声明：中国方面以前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337页。

② 同上。

③ 潘奈台斯库：《尼果赖·米列斯库传》，第109页。转引自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1949年纽约出版，第117页。

多次给俄国去信，要求停止侵略中国领土并交还根忒木尔，但迄今未得到回答；有鉴于此，清政府这次不再函复沙皇，因为已没有别的话要说。中国方面希望：一、俄方另派使节把根忒木尔交来；二、出使中国的人应当明白道理；三、停止侵扰中国边疆，保持边境安宁。如果这三点不能办到，中俄之间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尼果赖要求对前述十二条作出具体答复，清政府回答说：只要俄方满足中国提出的三条要求，“我们不仅准备接受十二条，而且准备接受一百二十条”，^①但是，如果俄国人不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一条也不能接受。

九月下旬尼果赖等离北京回国，马喇奉命陪同使团直到边境。他在途中再三提醒尼果赖说，今后俄国人不得再侵犯中国领土。尼果赖表面上满口应承，但返俄后却在出使报告中建议沙俄政府说：“只要沙皇陛下在额尔古纳河或海拉尔河建立一个堡砦，所有居住在尼布楚与嫩江之间的土著人民就会臣服沙皇。”^②他还写道：“虽然中国人有大炮、火绳枪和其他武器，可是不懂得按军事科学的要求行动，因此，一支不大的欧洲军队（指沙俄军队——引者）就可以把他们制服。”^③这些出自沙俄“和平使者”之口的狂妄叫嚣，再一次道破了它愿同中国“友好亲善”的真情。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406页。

② 同上书，第420页。

③ 尼果赖：《西伯利亚与中国》，1960年基希涅夫出版，第224页。

第三节 正义的雅克萨攻城战

一六七六年以后，沙俄侵略者无视清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警告，继续在黑龙江流域加紧实行武力扩张。他们强占土地，“抢劫居民，掳掠妇女，向中国的臣民勒索毛皮税，在中国的国土上捕貂，在中国的江河中采集珍珠。这些事件不止一次受到中国理藩院指责，但是（俄国）对于所有这些照会通常不予理睬。”^①

一六七七——一六七九年，沙俄入侵者进一步向精奇里江一带推进，先后强筑上结雅斯克堡和德隆斯克堡，并在精奇里江的支流西林木迪河地区建立了昔林宾斯克堡。

一六八〇年，俄国政府为了加强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任命御前侍卫伏耶科夫为尼布楚统领。他上任后立即按照莫斯科的训令积极扩充军备，增加兵员，组织“远征”，力图侵占更多的“新土地”，把它们置于沙皇的“最高统治”之下。^②

一六八一年，伏耶科夫派十人长瓦西里·米洛瓦诺夫和伊万·伏尔加率领哥萨克二十多名，携带枪炮弹药闯到额尔古纳河，在东岸强筑了一座小堡砦，命名为额尔

①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27页。

② 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史》，1902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第12页。

古纳堡，并从这个侵略据点四出劫掠毛皮和粮食。他们还擅自勘查矿藏，在距离该堡十俄里的地方找到一个银矿。这一“发现”很受莫斯科政府重视，沙皇曾亲自下令派人前往开采；但由于沙俄入侵者在额尔古纳河立足未稳，力量不够，结果事与愿违，未能得逞。

同年，沙俄政府还下令在黑龙江流域扩大征收“毛皮实物税”的范围。根据这一训令，伏耶科夫一面派遣贵族士官西诺特鲁索夫带领哥萨克数十名闯到黑龙江口一带掠夺毛皮，一面指派前述以使节身份到过北京的伊格那蒂·米洛瓦诺夫率领船只五艘，前往精奇里江和西林木迪河活动。米洛瓦诺夫等在这片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测绘了地图。他们发现一六七八年修筑的上结雅斯克堡已被江水冲塌，于是又在勃良塔河与精奇里江汇合处附近另筑了一座新结雅斯克堡。此外，米洛瓦诺夫还极力主张在精奇里江口建立一座城砦，^①作为俄国在黑龙江中游的前哨阵地。沙俄政府对米洛瓦诺夫的侵略才能颇为赏识，命令他亲自在精奇里江地区驻守，并增调一支军队归他指挥。这一带地方的沙俄堡砦直属尼布楚管辖，地位与雅克萨平行。^②

一六八二年，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悍然进行战

① 沙俄历史学者瓦西里耶夫在谈到米洛瓦诺夫的这一侵略主张时写道：“米洛瓦诺夫比穆拉维约夫早一百八十年就预先断定，在结雅河口宜于建立城市。穆拉维约夫可能是从米洛瓦诺夫得到这种想法的。”见《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58页。

②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42—43页。

争挑衅，制造了一起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事件。他们在城郊“仁慈救世主”修道院霸占的土地上，把二十名中国猎户骗进一间屋中活活烧死，并抢走了这些猎户的全部财物和马匹。^①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两国关系愈加恶化。同年，以弗罗洛夫为首的六十一名哥萨克从雅克萨下驶，一直窜到亨滚河，在这里强建了杜契钦斯克冬营。接着，另一批沙俄侵略军（共六十三人）在莫克罗舒博夫带领下也闯入亨滚河地区。他们和弗罗洛夫等合在一起，闯到黑龙江下游，对当地费雅喀等族居民进行屠杀，“打死了很多人”，然后又回到亨滚河，到处烧杀掳掠。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被迫实行抵抗，消灭沙俄侵略军十余人。当地费雅喀等族居民三百多人也组织起来，进行战斗，击毙入侵之敌多名。^②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在尼果赖返回俄国后五、六年间，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咄咄逼人地愈益加紧了；侵略的范围已不仅限于黑龙江上游一带，而且还包括中、下游地区和额尔古纳河东岸。

面临着来自沙俄的严重威胁，清政府不能不有所警惕和准备。一六七六年，清政府下令将宁古塔将军治所移到乌喇（今吉林市），“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双帆楼櫓，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

① 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史》，第14页。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70—72页。

帆檣，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入侵者）。"^① 一六八一年，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从这时起，清政府即着手全面加强东北边防，储备粮食，建筑仓库，增造运输船和战舰，设立驿站系统，开辟沟通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交通干线，并在瑗珲、呼玛尔和额苏里等地建立木城，置兵屯守，以防止沙俄的进一步入侵。^② 康熙帝并于一六八二年春亲自出巡东北，视察了盛京和吉林乌喇等地的防务，准备抗击沙俄侵略军。另一方面，清朝政府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俄之间存在的问题。“一六八一和一六八二年，中国两次派遣使者到尼布楚，要求举行谈判，同时派人赴雅克萨投书，谴责该地俄人的残暴行为，并要求他们撤回本国。每当俄国人被俘，中国人总是友善地对待他们，遣送他们回国，有时让他们捎去致俄方的信件。但无论是这些善意的行为也好，恳请也好，或者致莫斯科的信件也好，都不曾得到使人满意的结果。”^③

一六八二年九月，康熙帝为了掌握雅克萨俄军的动向，派副都统郎谈和一等公彭春前往调查，指示他们说：“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昔发兵进讨，未获翦除，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过牛满、恒（亨）滚诸处，至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

①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记》，卷下，第6页。

②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14—15页。瑗珲城初设在黑龙江北岸，位于精奇里江口附近，后迁到南岸。额苏里也设在江北，位于瑗珲西北八十里。见《黑龙江志稿》，第3卷，第15页。

③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57页。

尔等此行，……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度罗刹断不敢出战，若以食物来馈，其受而量答之。万一出战，姑勿交锋，但率众引还。”^①郎谈等调查归来，奏称：“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同意这种估计，但他仍然不赞成马上诉诸武力，主张“暂停攻取”，希望璦琿等处建城后，可以迫使雅克萨俄军撤走。^②正如俄国历史学者达维多夫所指出，中俄双方的“态度完全相反”；沙俄所持的态度是“掠夺加杀戮”，而中国则“真心地爱好和平”。^③

一六八三年七月，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又蠢蠢欲动，由梅勒尼克带领六十七人，分乘船只六艘顺江而下，企图到牛满河地区进行劫掠。当他们行至精奇里江口时，被驻泊该地的中国兵船截获，沙俄侵略军三十多名被俘，余众四散逃命，有二十多人向乌第堡逃窜，在中途又被达斡尔等族人民击毙十五人。^④清军趁胜溯精奇里江而上，生俘盘踞新结雅斯克堡的全部沙俄侵略军，平毁了德隆斯克和昔林宾斯克等堡砦。附近的中国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居住在牛满河地区的奇勒尔人，在奚鲁噶奴带领下同沙俄侵略军展开激战，“杀十余罗刹”。^⑤居住在精奇里江地区的鄂伦春族人民在朱尔铿

① 《清圣祖实录》，第104卷，第9页。

②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14—15页。

③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第13页。

④ 巴赫鲁中：《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76—78页。

⑤ 《清圣祖实录》，第113卷，第9页。

格率领下，协助清军追歼逃敌，“杀五罗刹，并获其鸟枪”。^① 亨滚河一带的费雅喀族人民也积极投入战斗，“击杀罗刹甚众”。^② 到一六八三年底，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上已无俄军踪迹。但俄国在黑龙江流域主要的侵略据点雅克萨仍在哥萨克军队占领之下，严重地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中国边境的安全，因此，收复雅克萨便成了清政府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六八三年秋，在清军击溃梅勒尼克所部沙俄侵略军以后，康熙帝又作了一次谋求和平解决的努力，谕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说：“鄂（俄）罗斯国罗刹等，无端犯我索伦边疆，扰害虞人，肆行抢掠，屡匿根忒木尔等逃人，过恶日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剿灭，屡行晓谕，令其自释过愆，速归本地，送还隐匿逃人。前次所差彼使尼过来（即尼果赖），亦经晓谕。但罗刹尚执迷不悟，反遣其部下人，于飞牙喀、奇勒尔等处，肆行焚杀，又诱索伦、打虎儿（达斡尔）、俄罗春（鄂伦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室，尽行焚死。此曹虽经晓谕，藐不畏法，因特遣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处，不许罗刹仍前恣意妄行，遇即擒杀。顷者罗刹诸人，经过黑龙江地方，遇我将卒，降其三十余人。奏至，朕体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豢养，使各得其所。今雅克萨、尼布潮罗刹等，若改前过，将根忒木尔等逃人送来，急回本地，则两相无事，于彼为益不浅；倘犹执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3卷，第9页。

^② 同上。

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如路远难归，倾心投诚者，朕亦纳之，必加恩恤，使各得其所。尔院即遵旨，明白具文，遣招降罗刹内宜番、米海罗莫罗对，执书晓谕。彼有何言，令其回奏。”^① 清理藩院遵照上述谕旨拟就文书，派遣俄俘前往雅克萨等处投递。但沙俄不仅不予答复，反而蓄意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急忙由沙皇颁发一道特别诏书，命令从西伯利亚各地招募一千名哥萨克兵，携带枪炮弹药前往黑龙江地区增援。^② 同时，沙俄政府还决定在雅克萨建立所谓统领辖区，妄图把这片中国领土正式并入沙俄的版图，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贵族士官阿列克塞·托尔布津（旧译额里克谢）为第一任统领，到雅克萨指挥作战。^③

一六八四年，沙俄侵略军又屡次窜到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④ 力主出兵雅克萨，认为“若不速计剿抚，则赫哲、飞牙喀、奇勒尔人民必被残害。”^⑤ 副都统马喇也建议一而敕令喀尔喀车臣汗禁止所属商民与俄人贸易，一面派人到雅克萨割其田禾，断其粮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2卷，第4—6页。

② 随后从托博尔斯克派出军役人员六百余人，由杯敦率领开赴雅克萨，“一路上兵士到处乱窜，跟当地土著居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人民抗俄斗争打乱了侵略军的日程表，当一六八五年六月清军进攻雅克萨时，这支沙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在一六八六年第二次雅克萨战役中，他们是沙俄侵略军的主力。参看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81、87—88页。

③ 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史》，第15页。

④ 一六八三年十月，萨布素由宁古塔副都统升任黑龙江将军，驻守瑗珲。

⑤ 《清圣祖实录》，第114卷，第3页。

源,然后“量遣轻骑”攻取。^①清政府多年来不断呼吁和平,希望劝说沙俄侵略军自动退出中国领土,但结果适得其反;面临着这一严酷的事实,它终于不得不接受沙俄的狂妄挑战,决定行使自卫权利,以反侵略战争来抗击沙俄的武力侵略。一六八五年二月,康熙帝下令由都统公彭春、副都统郎谈、班达尔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统兵,水陆两路进取雅克萨。三月初,达斡尔副头目倍勒儿率领本族健儿三十多人先赴雅克萨侦察,在城北“生擒罗刹七人”,^②探明了城内俄军设防的情况,为清军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四月,清军自瑗珲出发,六月二十三日抵雅克萨城下,当即向托尔布津发出分别用满、蒙、俄三种文字书写的通牒,警告他们说:“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搆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亨)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搆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③沙俄侵略者恃强负固,对通牒置若罔闻。二十五日晨,俄军一股从上游乘筏赶到雅克萨增援,“持兵器来犯”,中国士兵“直跃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5卷,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120卷,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119卷,第7页。



清军围攻雅克萨

上筏”，把他们全部歼灭。当晚，清军开始攻城，一面“于城南进兵，设挡牌土垒，施放弓弩”，一面“潜进红衣炮于城北攻之”，并“于两翼设神威将军炮夹攻”。同时，彭春、郎谈等还在城东南江面密布战船，以防敌人从水上逃走。经过彻夜激战，沙俄侵略军死伤累累，力竭势穷。第二天清晨，郎谈又下令在“城下三面积柴，将焚城”。托尔布津走投无路，于是出城到清营乞降。彭春等给予投降的敌人宽大待遇，“愿归者六百余人，并其器物，悉与遣归”，^①甚至准许携带随身武器（大炮除外）回尼布楚，并供给他们马匹和食物。^②托尔布津等感激涕零，“稽顙而去”，答应今后不再到雅克萨骚扰。有四十五人要求留在中国，彭春也准其所请。雅克萨被沙俄侵略军窃据二十年之久，

①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17页。

②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59页。

至此遂告克复。

在这次战役中，清军至多不超过三千名，其中有满人、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等，是一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反侵略队伍。他们的武器除了若干门铜炮以外，只有刀、矛和弓箭，连在这次战役中号称劲旅的四百名福建“藤牌兵”，也只有藤牌和片刀。反之，雅克萨俄军城防坚固，他们不仅有大炮，而且普遍地使用火枪和手榴弹等新式武器，装备远较清军精良。但是，清军进行的是反侵略的义战，得到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士气高昂，作战勇敢；同时，康熙帝吸取一六五五年明安达礼攻打呼玛尔斯克时“轻进”的教训，在这次战争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所以，清军虽在武器方面处于劣势，却终于打败了全副武装的沙俄侵略军。

雅克萨收复后，清军当即将沙俄强建的堡垒焚毁，然后撤退到瑗珲等地，而没有继续在雅克萨设兵防守，也没有割取雅克萨附近的田禾，断其粮源。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以致不久以后沙俄侵略军又卷土重来。

正当清军从雅克萨撤退的时候，沙俄尼布楚统领乌拉索夫却在千方百计地集结兵力，准备反扑。一六八五年七月，乌拉索夫派遣哥萨克兵七十人赴雅克萨侦察，获悉清军已经撤走。八月，大批沙俄侵略军在托尔布津率领下再次窜到雅克萨，在旧堡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座城堡，四周围以方形土墙，宽四俄丈，高一俄丈半，上面架设大炮。城堡中修盖了火药库、军需仓库和粮仓。建堡工程

从一六八五年秋开始，历时半年始告完成。

俄军再次侵占雅克萨，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动引起清政府极大愤慨。一六八六年二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称：“罗刹复来雅克萨，筑城盘踞，臣请于冰消时，督修船舰，亲率官兵，相机进剿。”^①康熙帝命理藩院郎中满丕“确探情形”，后者遣索伦副头目乌木布尔代等赴雅克萨侦察，证明萨布素所奏属实。三月六日康熙帝接到满丕的奏报，立即下令讨伐，颁发谕旨说：“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如前所请，速修船舰，统领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并量选候补官员，及现在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建义侯林兴珠率往。”^②同月，雅克萨俄军首先采取战争行动，由杯敦率领三百人窜到呼玛河地区，对驻守该地的中国军队发动偷袭，杀死清军三十名，从而再次挑起战端。七月十八日，清军二千余人进抵雅克萨城下，要求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答，于是清军开始攻城。俄军多次冲出城外，企图突围，都被清军逐回。继而清军更于城外“掘长堑、立土垒以困之”，^③断绝城中水源，并用大炮向敌堡猛烈轰击，使沙俄侵略军遭受重创。九月，托尔布津被清军

① 《清圣祖实录》，第124卷，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③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19页。

炮火击中腿部毙命，杯敦继任为统领。不久严冬来临，俄军困守孤城，饥寒交迫，加之坏血病流行，死者枕藉。到一六八七年初，在八百二十六名沙俄侵略军中，只剩下一百五十人，而且此后继续大批死亡，到春天又减至六十六人，^①“已经根本谈不上继续实行抵抗”。^②

雅克萨沙俄侵略军的败讯，使莫斯科政府感到一筹莫展。当时，它在南方正忙于夺取克里米亚，在西方准备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无力抽调大批军队到遥远的黑龙江流域作战。西伯利亚各沙俄据点的兵员、军火和粮食都感不足，也不可能给雅克萨俄军以有力支持。^③由于军事侵略未能得逞，沙俄不得不接受中国方面曾经多次提出的和平建议，决定同清政府举行谈判。一六八六年秋，正当清军第二次围攻雅克萨、孤城指日可下之际，沙皇政府所派的急使魏牛高和法俄罗瓦二人来到北京，向清政府投递国书，其中一面大言恫吓，扬言沙皇“已派出无数雄兵”前往雅克萨“讨平敌人”，一面声明俄国政府已正式指派费要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戈洛文为大使，前来同中国举行边界谈判，并请求清政府停战，“乞撤雅克萨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86页；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89页。又《八旗通志》记载：俄军最后“惟余二十余人，亦皆羸病。”见初集，第153卷，第20页。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89页。

③ 弗拉基米尔在《俄国在太平洋与西伯利亚铁路》（1899年伦敦出版）一书中指出：“当时俄国人在整个西伯利亚人数很少，而且非常分散，真正可以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基地远在欧俄。”见该书第138页。

之围”。^①

当时，被迫采取自卫手段的中国军队虽已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但清政府一如既往，仍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俄争端。一六八六年九月，就在魏牛高等到京前不久，清政府又写了两封致沙俄的国书，建议两国立即举行会议，“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则两界人民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②明确地提出了划定两国边界的主张。这两封国书分别委托当时即将离华返国的荷兰使臣巴兹和凯策尔、耶稣会士闵明我（原名弗·格里玛尔迪）携往欧洲，转交沙俄政府。魏牛高等来京提出停战和举行谈判的要求后，康熙帝立即允其所请，十一月十三日谕大学士等说，“鄂罗斯察汉汗以礼通好，驰请解雅克萨之围。朕本无屠城之意，欲从宽释。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③同时，康熙帝并将一件致沙皇的国书交魏牛高，正式同意撤雅克萨之围和举行边界谈判。魏牛高等在北京期间，按照沙俄政府给他的秘密训令同耶稣会士南怀仁进行了接触，搜集了关于中国兵力和武器装备的重要情

① 《清圣祖实录》，第127卷，第24页；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1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27卷，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24页。“察汉汗”系蒙语，意为“白汗”。清初称沙皇为察汉汗。

报,随即于十一月下旬携中国国书匆匆回国。^①

十二月,康熙帝所遣亲军侍卫马武到达雅克萨前线,宣布停止攻城。清军立即无条件停火,“回驻大营,合兵防守”。^②从这时起,“狭义的包围已经停止,仅仅继续保持着一种并不严格的封锁。”^③当时城内俄军粮食告罄,一六八七年一月,“罗刹酋长杯敦遣人来求饮食”,清军立即给予救济。^④二月下旬,康熙帝派太医二人赴雅克萨,为前线将士治病,并指示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说:“至于罗刹,虽与我兵对垒,但我兵攻雅克萨城,从未诛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罗刹,亦应听其就医,使还彼国”。^⑤同年五月十六日,清军又主动地后撤二十里,完全停止了对雅克萨的封锁,允许城内俄军自由进出,甚至准许他们与尼布楚联系,并不干涉。^⑥这种态度,再次表明了清政府和平解决中俄边界问题的诚挚愿望。

当时康熙帝亟盼同沙俄的谈判早日举行,指示喀尔喀土谢图汗及时报告俄国使臣到达边境的消息。八月十八日,康熙帝据土谢图汗奏报,获悉俄使将至,立即下令从雅克萨无条件撤军,使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下来,为即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8页。

②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20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87页。

④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20页。

⑤ 《清圣祖实录》,第129卷,第2页。

⑥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20页;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90页。

将开始的中俄边界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六八七年八月，清军全部从雅克萨撤退到瑷珲、嫩江一带，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攻城战至此宣告结束。

第四节 《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一、使团的派遣和谈判的准备

为响应清朝政府关于举行边界谈判的建议，俄国政府于一六八五年十二月指派戈洛文、乌拉索夫和尤金为全权大使，负责同中国进行谈判。戈洛文出身大贵族，历任御前侍官等职，就任首席谈判使臣后，俄国政府临时加授他布良斯克总督的头衔，以突出其身份。乌拉索夫长期在西伯利亚任军职，曾任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统领，一六八三年起调任尼布楚统领，富于侵略经验。他的新头衔是叶拉托姆斯克总督，地位仅次于戈洛文。尤金是使团的第三号人物，任命不久即被更换，改由熟悉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一带情况的叶尼塞斯克秘书官柯尔尼茨基充任。

使团启程前，沙俄外交事务衙门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授予秘密训令，详细地指示他们：谈判时应竭力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国，并应向中方宣布，沙皇政府已下令派遣“无数精兵”，携带大量武器弹药前往达斡尔地区作战，只是在接到中国皇帝建议停战的国书后才同意举行谈判。戈洛文等受权只在沙俄占领区内签订条约，不得在中国

境内其他地方进行谈判。训令的补充条款指示说：一、应力争以黑龙江为界；如中方不同意，则争取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及其以西的黑龙江为界；如中方再不同意，则争取以雅克萨为界，俄国人得在黑龙江、牛满河和精奇里江渔猎。二、如中方不接受上述划界方案，则俄国使臣应争取缔结临时停战协定，然后做好准备，进行战争。三、要求中国每年向俄国输出纯净白银一千至三千普特，以及生丝等产品。四、使团应向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投递文书，要求他在俄国一旦对华作战时以全部兵力援助俄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使们应不惜赠送任何礼物”。^①这一训令表明，当时俄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取得黑龙江以北的全部或一部分中国领土；如果在会议桌上达不到目的，它就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以求一逞，并蓄谋引诱外蒙王公叛清投俄，对清军实行里外夹攻。此外，俄方还希望通过谈判，从中国取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一六八六年二月五日，戈洛文一行在冯·施马伦堡和斯克列皮金上校率领的五百多名特种常备军护卫下，随带二百七十车弹药和粮秣，自莫斯科出发，途经托博尔斯克等地时又增募哥萨克兵一千四百余名，总数约达二千人之多。^②同年十月，使团行抵安加拉河畔雷布涅依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50—52页。

② 这个数字在沙俄和苏联出版的许多著作中记载大体相同，见班蒂

堡，即在此地过冬。一六八七年二月末，戈洛文接魏牛高北京来信，获悉康熙帝已下令无条件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心中疑神疑鬼，竟不相信中国方面会采取这一行动。同时，他得悉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一向效忠清朝中央，坚决反对沙俄的侵略扩张，于是放弃拉拢土谢图汗的原定计划，转而加紧笼络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③派人给呼图克图送信，要求他“通知有关中国的消息”，并随信送去了贵重的“礼物”，但呼图克图也不为所动。五月，戈洛文等自雷布涅依堡继续东行，九月下旬抵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随即派信使柯罗文赴北京将行止通知清政府，要求中方迅速派出使团，并建议以色楞格斯克作为谈判地点。

十月上旬，戈洛文又接到沙皇政府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发出的第二批训令，其中第三条着重指出：如中方不接受俄国政府前次列举的分界条件，则俄方可提议两国均不在雅克萨设堡、移民和驻军，俄军撤出雅克萨，俄国人得在其附近和牛满河、精奇里江一带渔猎。训令接着指出：应坚持这一条款。如有需要，即设法贿赂中国全权大臣，“不过要秘密地干，要谨慎从事，以免有损俄国大君主

什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52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89页，注1；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24页；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30页。又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一书说，戈洛文随带的兵力共为二千四百人。见该书第30页。

③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蒙古地区喇嘛教大活佛的法号。

的荣誉。”^①这说明，沙皇政府早在中俄谈判开始以前，已确定了退出雅克萨的方针，不再坚持“以雅克萨为界”的要求。当时俄国远征克里米亚失利，宫廷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日趋剧烈，因此沙俄政府决定必要时在中俄边界谈判中降低要价，以求迅速同中国达成和议。

另一方面，沙俄政府仍企图继续笼络呼图克图，并由外交事务衙门起草了文书，要求他帮助俄国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方在未来的谈判中对俄国作最大让步。但是事实证明，这一阴谋注定不可能实现。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沙俄逐步侵吞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特别是色楞格河下游一带，原属喀尔喀管辖，聚居在这些地方的布里亚特蒙古族本是喀尔喀的属民。一六七二年、一六七五年和一六八四年，喀尔喀王公曾几次向俄国提出抗议，要求沙俄侵略者退出色楞格斯克等地，并将布里亚特人归还喀尔喀，均遭拒绝。^②戈洛文带领重兵东来，愈使喀尔喀王公感到不安。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派人向戈洛文提出质问，并坚决要求归还原属喀尔喀的土地和人民。戈洛文气势汹汹，断然拒绝，使交涉迅速破裂。到一六八八年初，他知道诱骗喀尔喀王公叛清投俄的阴谋不能得逞，竟悍然决定使用武力，对喀尔喀人发动猛烈攻击。其时，割

① 索洛维约夫：《俄国通史》，第7册，第14卷，1962年莫斯科出版，第415页。

②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958年莫斯科出版，第109、111页。

据中国西部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正向喀尔喀进攻，戈洛文的行动给予噶尔丹以莫大帮助，结果使喀尔喀人两面受敌，遭致严重伤亡。在给沙俄外交事务衙门的报告中，戈洛文还建议俄国政府向准噶尔部派遣“使团”，极力主张同噶尔丹建立联盟，^① 并与噶尔丹进行频繁的接触。当时噶尔丹公开声称他得到了俄国的军火援助，他的军队中有俄国人参加作战；被喀尔喀人俘虏的准噶尔士兵也坦率供认，“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② 沙俄同噶尔丹相勾结的罪行，证据确凿，谁也抹煞不了。

就在俄军配合噶尔丹夹击喀尔喀军队的同时，戈洛文的信使柯罗文带着俄方关于从速在色楞格斯克附近举行中俄会谈的建议，于一六八八年三月下旬到了北京。清政府抱着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愿望，立即接受这一建议，于四月二十八日决定由“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舅舅佟国纲及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往主其议，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偕往”。^③ 索额图等动身前，康熙帝明确地告以谈判方针说：“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忒木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1972年莫斯科出版，第18页。

②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47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134卷，第3页。

尔等。及我兵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忒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①这个方针的基本点，就是要求收回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议定中俄边界，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

同年五月三十日，索额图等从北京启程，出居庸关，经张家口、归化城等地，并继续北行，穿过“寸草不生、地无勺水”的沙漠地带，七月下旬行抵克鲁伦河附近，为噶尔丹部叛军所阻。清朝使团当时仅随带卫队八百人，无法通过，因此只得折回。^②索额图派参领索罗希等持书赴乌金斯克，向俄方说明了使团不能前来的缘由，建议将会谈日期延至明年，地点另行商定。

同年九月，戈洛文再次对中国喀尔喀蒙古北部地区发动进攻，妄图用武力压服蒙古人民，巩固沙俄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殖民统治，以加强俄国使团在来年对华谈判中

^① 《清圣祖实录》，第135卷，第15页。

^② 详见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钱良择：《出塞纪略》。

的优势。十月十日，俄军侦知大批蒙古牧民在昔洛克河南岸游牧，突然在深夜实行偷袭，屠杀牧民约二百人，并劫掠了大批马匹牛羊。二十日，俄军又窜到哲得河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十一月，戈洛文进一步派人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诱降活动，要求蒙古台吉们“归顺”俄国，缔结保护条约，“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①除了个别丧心病狂的卖国贼以外，多数台吉都断然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使戈洛文吞并中国蒙古地区的计划遭到彻底破产。

早在戈洛文对喀尔喀蒙古发动新的武装进攻以前，沙俄外交事务衙门派出的秘书官罗吉诺夫已于七月间来到乌金斯克，向戈洛文送达第三批秘密训令。这时沙俄政府在国外远征克里米亚彻底失败，在国内又遭到贵族和商人普遍反对，危机四伏，因此迫切希望迅速同中国议和。训令中指示戈洛文说，如果清政府不愿在边境谈判，即授给罗吉诺夫全权，派他直接去北京订立条约。俄方事先拟定了四个条约草案：第一个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以黑龙江为界，这是俄国的最高要价；如中方不接受，则照第二个草案订约，即以雅克萨为界，而以雅克萨城归俄国；如再不接受则采用第三个草案，即俄国撤出雅克萨；第四个条约草案的中心内容是俄国撤出“达斡尔地方”，如中方对前三个草案都不接受，必要时可照第四个草案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383—385页。

订约。^①这就是说，还在中俄边界谈判开始举行以前，俄方已不仅决定退出雅克萨，而且考虑退出尼布楚等地；这一新方案同康熙帝提出的上述谈判方针实际上分歧不大，如果照此方案进行谈判，两国间的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但沙俄入侵者出于侵略本性，终究不甘心完全吐出所侵占的中国领土，按照上述第四个条约草案订约。戈洛文本来已将这个条约草案送交乌拉索夫签字，但随后又派人将它追回。^②

一六八九年三月上旬，罗吉诺夫从尼布楚出发，经额尔古纳堡、嫩江等地，五月十四日到达长城附近。前来迎接的清朝官员向他指出：沙皇政府以前来函中曾经声明，俄国使团东来是为了谋求两国之间“永久的睦邻友好亲善，而不是为了打仗”；现闻戈洛文“带有大量军队”，目的何在？中国方面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要求给予说明。罗吉诺夫矢口否认，谎称“全权大使（指戈洛文）根本没有带领大量军队。”^③二十三日，罗吉诺夫带着三个条约草案到达北京。他获悉清政府已决定再派使团赴边境会谈，因此对来京订约的使命秘不告人，而提议以雅克萨或尼布楚作为谈判地点。清政府立即同意在尼布楚举行会谈，并通知罗吉诺夫说，中国使团定于短期内启程，预期八月份

①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48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788页，注213。

③ 同上书，第481页。

可到达尼布楚。新组成的清朝使团仍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成员有内大臣都统一等公佟国纲，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马喇，都统郎谈，都统班达而沙，理藩院侍郎温达。此外还随带两名耶稣会士，充当拉丁文译员，即葡萄牙人徐日升（原名托马斯·贝瑞拉）和法国人张诚（原名弗朗索阿·热比隆）。索额图临行奏称：“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康熙帝当即表示：“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并调黑龙江兵一千五百人往会之。”^①在这个谕旨中，康熙帝主动提出把尼布楚等地让给俄国，这是一个重大的领土让步。当时沙俄同噶尔丹勾结的迹象日趋明显，使清朝政府深感不安；在罗吉诺夫逗留北京期间，清政府曾正式通过他要求俄方停止与噶尔丹继续勾结。^②康熙帝决定对俄国作上述让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迅速缔结和约，以防止沙俄侵略者进一步煽动噶尔丹叛清投俄，避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发生更剧烈的动荡。

一六八九年六月十三日，清朝使团自北京动身，出古北口北行，历时四十九天，于七月三十一日抵达目的地，

^① 《清圣祖实录》，第140卷，第30页。

^② 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1900年彼得堡出版，第69页。这个沙俄老牌的“汉学家”在该书中直截了当地把噶尔丹称为俄国的“天然同盟者”，并坦率承认沙俄与噶尔丹“久已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石勒喀河南岸扎营，与尼布楚城隔河相望。索额图早在六月中旬即遣人通知俄方，说中国使团不久即将到达，不料他们抵尼布楚后，俄国首席使臣戈洛文仍逗留在叶拉文斯克堡，迟迟不至。八月一日，索额图致函戈洛文，催促他迅速前来会谈。据《张诚日记》记载，信中大意说：“我们业已按照他们的要求，尽一切可能赶到，奇怪的是他们却连到达的确讯都没有。”信中还着重指出，中方“目前扎营处地方太小，而且牧草即将告罄”；清朝使团“之所以暂不渡河，为的是避免给他们以怀疑我方缔和诚意的任何理由”。^①戈洛文接信后，推说他没有及时赶到尼布楚是为了“避免旅途劳顿”，实际上却别有用心地忙于加强战备。他还粗暴地要求中国使团的驻地离开尼布楚城再远一些。对此，中方表示，戈洛文来到后不妨派人到清朝使团驻地察看一番，“如果全权特使方面的人知道哪里有宽敞处所，我们一定立刻移营”，^②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

八月十九日戈洛文终于来到尼布楚，随即就初步事项进行磋商。二十日双方达成协议：会议定于二十二日举行，地点在尼布楚城与河岸之间，临时搭设帐篷作为会场。双方还共同商定，两国使臣“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任何一方不凌驾于对方之上”。^③关于警卫问题，俄方

① 荷尔德：《中国概述》，1738—1741年伦敦出版，第2卷，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310页。

③ 同上。

提议每一方各带三百名卫士赴会，中方对此表示同意，并主张所有士兵“除佩带刀剑外，不带任何武器。”俄方始则表示反对，认为“全权大使所带士兵如不带武器，则不成体统”，^①经中方力争，最后戈洛文才接受这项建议，约定只带佩刀、斧钺，不得携带任何火器。此外，双方还约定在会场以外各置五百名卫队，中国卫队列于河岸，俄国卫队列于城下，双方从列队地点到会场的距离应该相等。^②

二、尼布楚谈判和条约的缔结

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中俄两国使臣举行第一次会议。

当天清晨，中国使团渡石勒喀河前往赴会。俄国使团同时乘马出城，以卫队和军乐队为前导，一路吹吹打打，奏战斗进行曲，前赴会场。两国使臣同时进入帐篷就座，双方各有三百名士兵在帐幕附近列队护卫。清朝卫队按照规定，一律只佩腰刀。俄国卫队表面上只带了马刀、斧钺和长矛，但他们暗中违反约定，竟秘密地揣着禁止携带的有很大杀伤力的手榴弹赴会。^③同时，尼布楚城内的俄军也全副武装，“作好了作战准备”。^④

会议开始后，戈洛文首先发言。他力图推卸沙俄发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496—497页。

②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10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05页。

④ 同上书，第506页。

动武装侵略的责任，诬指中国“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首先挑起战争。又说，沙皇为此派出“无数精兵携带大批弹药”，前来“讨平敌人”；现在中国皇帝既愿讲和，沙皇已下令停战，中方应赔偿俄国所蒙受的“损失”。^①对于这种淆乱是非的论点，清朝使臣当场加以驳斥，严正指出：“鄂嫩、尼布潮系我国所属毛明安诸部落旧址，雅克萨系我国虞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沙俄）所窃据”，^②并历数俄国入侵者蹂躏当地居民的罪行。^③清朝使臣还指出：由于沙俄不断对中国实行武力侵略，清政府不得已才采取自卫行动；一六八五年雅克萨俄军乞降时，“托尔布津曾经允诺不再到雅克萨来，不再建堡，不再寻衅扰乱”，^④但随后俄国人自食前言，又将雅克萨侵占，以致清军不得不第二次围城；魏牛高携带沙俄国书来到北京后，清政府立即撤雅克萨之围，决定同俄国进行和谈。这一席话，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中国的正义立场。

戈洛文捏造事实、强词夺理说，沙皇不知道中国臣民受到侵害，中国不当为“这类细小纠纷”同俄国打仗。又说，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向来不属于中国，而是俄国的土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06—507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43卷，第14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07页。清朝使臣在会上指出：沙俄入侵者对当地中国居民“多年来横施不可容忍的暴行，抢掠财产，夺走他们的妻子儿女，并将他们本人殴打至死。”

④ 同上书，第507页。

地，“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如果这些达斡尔居民在古代某个时候曾向中国皇帝纳税，那也是出于被迫，因为那些地方当时距沙皇陛下的城市尚远。当沙皇陛下的臣民在那些地方建立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及其它堡砦后，达斡尔居民即开始照旧向沙皇陛下交毛皮税。”^①

根据这种强盗逻辑，俄方在会上提出一个方案，要求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妄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它来能用武力得到的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这一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当即被中方拒绝，索额图等要求俄国人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并将尼布楚和雅克萨一带地方归还中国。他明确地指出，这些地方是中国蒙古族的土地，历来属中国所有。^②戈洛文无词以对，竟然表示“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③更不可思议的是，后来他竟在《出使报告书》中故意捏造中方的论据，说清朝使臣提出上述划界主张时所举的理由是：“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起，博克达汗就已领有黑龙江。”^④有些沙俄御用历史学者如索洛维约夫之流，对于这句话特别津津乐道，到处引用，企图用以“证明”中方论据的荒诞无稽。他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08、510页。

②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11页。

③ 刘选民：《截至尼布楚条约为止的中俄关系》，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40年第23卷，第4期。

④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11页。

们引伸说，似乎中国人自称是希腊亚历山大的后裔！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出自清朝使臣之口，而是戈洛文的凭空捏造。苏联早期历史学家巴托尔德院士指出：清朝使臣根本不可能谈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只有在当时俄国的传说记载中，才谈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活动。”那种断言清朝使臣援引亚历山大的“远征”作为论据的说法，“显然是根据这个传说臆造出来，硬加在中国全权代表身上的。”^①足见，荒诞无稽的不是别人，正是编造谎言的沙俄侵略者自己。

两国使臣围绕俄方所提“以黑龙江为界”的要求进行了一整天的辩论，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最后，双方约定次日再议，首次会谈至此结束。

二十三日，中俄两国使臣举行第二次会议。俄方开始仍坚持原方案，硬要以黑龙江为界，说什么这条河流“久已属沙皇所有”。索额图坚决表示拒绝。双方相持不下，谈判呈现破裂的危机。戈洛文见第一个方案不能实现，于是稍微降低要价，企图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并要求中方赔偿俄国在雅克萨等地所受的“损失”。索额图抱着早日缔约划界的愿望，一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俄方的第二方案，另一方面主动地作出让步，表示可以把尼布楚等地让给俄国。具体地说，即在石勒喀河北岸两国以尼布楚为界，石勒喀河南岸以音果达河为界。^②但

^①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195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17页。

是，俄方对中方这一重大的领土让步仍不满足，甚至不屑一顾，竟“以哈哈一笑作为答复，并且说他们真是应当感谢中国使臣把这样一处无可争辩的地方让给了他们”。^①戈洛文还讥讽说：“我非常感谢你们允许我今晚在这里过夜”，^②并蛮横无理地强要中方再作让步，气焰嚣张到了极点。这种极恶劣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使谈判陷入僵局，索额图等被迫声明：“除尼布楚以外，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他们已无话可说。”^③

更可鄙的是，戈洛文竟在会上采取贿赂手段，密令他的拉丁文翻译贝洛博茨基同耶稣会士徐日升、张诚暗中联络，要求他们为俄方出力，“答应把大君主的恩典和赏赐给与他们”。^④徐日升、张诚是外国在华耶稣会安插在清朝使团中的奸细分子，早在一六八六年，耶稣会的头子南怀仁即曾托沙俄信使魏牛高捎信给尼果赖，“表明他和徐日升神甫对俄国的忠诚。”^⑤这些耶稣会士混进清朝使团，表面上充任译员，实际上是为“给俄国人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以博得他们的感激和信任”，从而换取沙俄的酬劳，特别是指望俄国政府满足他们的夙愿，准许他们经

①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11页。

②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1961年罗马出版，第237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18页。

④ 同上书，第519页。

⑤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01页。

西伯利亚往来于欧洲和中国。^①因此，贝洛博茨基的要求刚一提出来，徐日升和张诚就欣然表示愿为沙皇效劳，并答应随时向俄方“报告必要的消息”。^②从这一天起，他们在尼布楚谈判中一直表面助清，暗中助俄。由于他们的效劳，后来戈洛文曾以“他本人和沙皇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③

应该看到，中俄双方在二十三日会上虽然都做了一些让步，但是这两种让步的性质根本不同。中方同意让给俄国的尼布楚等地，本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俄方同意“让”给中国的精奇里江以东地区，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且在举行尼布楚谈判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沙俄侵略势力已被肃清，他们一度侵占的寥寥几个小据点早经中国收复。俄方企图在这种所谓“让步”的基础上缔结条约，从而把精奇里江以西包括雅克萨在内的广大中国领土全部划入沙俄版图，自然是中方无法接受的。正因如此，结果第二次会议同前次一样，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从二十四日起，中俄会议由于俄方顽固坚持侵略立场，被迫中断。这种情况使清朝使团产生疑虑，担心“莫斯科人并不想要和平，这一切不过是一种阴谋，其目的是拖延时间，别有所图。”^④为了不使谈判破裂，中国使团明确

①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39页。

②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1页。

③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39页。

④ 同上书，第239页。

地通知俄方说,如果他们有事要谈,中方仍然准备听取并给予回答。

同日,戈洛文公开加强战备,在尼布楚周围的哨卡增派了三百名火枪兵,并派贝洛博茨基往见清朝使臣,要求交换“散会证明书”,说明两次会议的经过,以便双方代表分手后各自持证明书向本国政府报告;实际上就是表示准备停止谈判,企图用这种威胁手段迫使中方屈服。清朝使臣告诉贝洛博茨基说,如果俄方将“散会证明书”交来,中方可以照收;但中国使团不会写这种证明书,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写,不卑不亢地回答了戈洛文的讹诈。^①同时,针对俄方的武力威胁和停止谈判的要挟,清朝使团开始加强戒备,以防万一。

在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七日的整整半个月中,两国使臣一直没有会见,但双方通过译员继续进行了商谈。二十五日,中国使团主动作出新让步,建议两国以尼布楚和鄂嫩河为界,戈洛文仍不接受,胡说尼布楚一带“自古以来属于沙皇陛下方面”,^②并再次要求交换“散会证明书”。当天,中方再作让步,提议两国在石勒喀河北岸以绰尔纳河为界,其东属中国,其西属俄国。戈洛文连绰尔纳河的方位也不知道,急忙向中方打听。徐日升和张诚答称,该河位于尼布楚以东约七天路程。戈洛文对中方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20—521页。

^② 同上书,第522页。

的让步仍不满足,声称雅克萨在绰尔纳河的东面,距该河也有七天路程或更远一些,俄国不能“放弃”。^①徐日升、张诚密告俄国人说,中国使臣已奉到谕旨,决不能将雅克萨让给俄国。他们还给俄方出谋划策,建议俄国人“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与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②又说,他们将尽力促使清朝使臣继续作出对俄方有利的让步。贝洛博茨基立即再一次向他们许愿:为了报答他们的“热心效力”,日后必将酬以沙皇的“恩典”。^③

二十六日,索额图决定再作让步,派耶稣会士传话说,中方愿以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但这一建议又遭俄方拒绝,戈洛文仍坚持以精奇里江为界,恬不知耻地说:“沿黑龙江左岸直至海都曾是沙皇陛下的属地。只是大君主陛下以基督教的慈悲为怀,谕令其使臣按照上述方案确定边界。”^④同日,中方还提议同时划分喀尔喀与西伯利亚接壤地区的中俄中段边界,戈洛文又加以拒绝,“理由”是:第一,“喀尔喀人是俄国的死敌”,所以中俄和约中不得涉及喀尔喀的问题;^⑤第二,“喀尔喀汗(指土谢图汗)归顺中华帝国尽管属实”,但他的土地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24—525页。

②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12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23页。

④ 同上书,第527页。

⑤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45页。

“已在一年前被厄鲁特汗夺去”；^①言外之意是，似乎喀尔喀已不再是中国领土，而成了沙俄所谓“准噶尔汗国”的一部分。这些荒谬的借口充分表明，沙俄不但蓄意侵略我国喀尔喀地方，而且明目张胆地把噶尔丹政权视为“独立国家”，妄图将中国厄鲁特蒙古族的准噶尔部分裂出去。清朝使团鉴于俄方坚决反对议分中段边界，只得暂作罢论。

正在这时，尼布楚附近布里亚特和温科特等族居民不堪忍受沙俄压迫，突然纷纷起义，要求重返祖国怀抱。这顿时使俄国使团手忙脚乱，惊慌万状。戈洛文无可奈何地承认：“尽管温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叛变的消息频频传来，但不能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些叛变者大约已有两千人集中在一起，并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从涅尔琴斯克派出许多人，而只留少数人在寨里，那是不行的。”^②武力镇压既行不通，沙俄殖民者便企图实行“招抚”。二十七日，戈洛文派人劝说起义者放下武器，“不要背叛大君主的专制统治”，并答应把沙皇的“特大恩典”给予他们。^③起义群众不屈不挠，断然拒绝接受招安。二十八日，更多的群众加入起义行列，抗俄斗争的力量愈加壮大，“他们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聚集大

①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12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24页。

③ 同上书，第529页。

批人马,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①俄国使团迫于形势,不得不考虑对中方稍稍降低要价,早日结束边界谈判,以便腾出手来绞杀日益蓬勃发展的人民起义。同日,戈洛文从这一动机出发,派贝洛博茨基等来见清朝使臣,提议两国在黑龙江左岸以雅克萨为界,雅克萨地区一部分划归俄国,俄国人得在精奇里江一带渔猎;右岸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同时威胁说,如不能按照这一方案达成协议,则要求双方交换“散会证明书”,说明交涉经过,谈判即到此为止。清朝使臣答称,雅克萨地区历来是中国的地方,“沙皇陛下方面的人在该处定居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他们凌辱、蹂躏中国居民,掳走他们的妻子儿女,横征毛皮税,焚烧商贾,劫走货物,还干了其他种种坏事”;如果俄方真有订约诚意,必须归还雅克萨,但城中全部武装和物资可由俄方自行处理。额尔古纳堡必须迁至对岸。^②

三十日,俄方提议仍以雅克萨为界,但两国均不在该地驻军,企图把雅克萨变成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中立地带”。清朝使臣拒不接受。三十一日,俄方坚持前议,中方决定再作重大让步,提议石勒喀河左岸以流入该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右岸改以额尔古纳河至加齐木尔河为界,并再次声明决不同意将两国边界划在雅克萨附近,也不许俄国人进入这一地区渔猎。^③这个方案反映了中方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31页。

② 同上书,第529—531页。

③ 同上书,第537—538页。

最低限度的要求，自谈判开始以来，中方再三主动地表示让步，至此已无可再让。

九月一日，俄方继续讨价还价，提议在黑龙江北岸以鄂尔多昆河为界，南岸以额尔古纳河直至呼伦池为界。中方对此断然拒绝。^①当时尼布楚一带的布里亚特等族人民愈来愈多地奋起反抗沙俄压迫，戈洛文担心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有使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殖民统治全部崩溃的危险；同时，俄方查明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可供居住的地方很少，也不出产貂皮，而在额尔古纳河西岸却发现了银矿和盐湖，且有很多可供居住的地方和耕地，“由涅尔琴斯克往这些地方移民，比去阿尔巴津要好。”^②鉴于这些原因，他们在九月二日派贝洛博茨基等前往清朝使团驻地，向中方提出一个书面的条约草案，主要内容是：

一、两国以格尔必齐河至第一座石山为界。

二、石勒喀河南岸以额尔古纳河至河源为界，其东属中国，其西属俄国。俄人所建的额尔古纳堡迁至西岸。

三、拆毁雅克萨城。俄军撤出雅克萨，但双方均得在这一地区从事渔猎。

四、双方均不在雅克萨地区直至格尔必齐河建立居民点和堡砦。

五、中方归还第一次围雅克萨时所获之武器，并向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44页。

② 同上。

俄方赔偿损失。

六、发展贸易关系。^①

清朝使团听取这个草案后，当即逐条作出回答。关于两国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的建议，中方没有提出异议。雅克萨拆毁后，中方声明将在该地设立卡伦，并要求俄人此后不得在雅克萨地区渔猎，以免再起纠纷。清朝使臣还严正指出：沙俄侵略者在雅克萨等地残害和掠夺中国居民，罪恶累累；如果说到“赔偿损失”问题，中国方面所蒙受的损失不胜枚举。

九月三日，中方提出对案六条。第一条规定拆毁雅克萨，该地俄人全部撤至尼布楚。第二条规定以格尔必齐河为界，至位于勒拿河与黑龙江之间的最高山，沿此山直至滨海的圣诺斯山，山南一切土地属中国，山北属俄国。第三条规定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在该河东岸所建的额尔古纳堡迁至对岸。第四条规定俄国人不得至额尔古纳河东岸渔猎，中国人不得到该河西岸渔猎。第五条规定两国均不收纳对方的逃亡犯。第六条规定双方对边界肇事者严加惩处。^②

九月五日，双方就划界问题继续磋商。俄方坚决反对在外兴安岭东段以圣诺斯山为界，声称圣诺斯山以南的乌第河地区属于俄国所有，不能划归中国。他们提出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45—546页。

② 同上书，第554—555页。

一个修正草案,建议两国以格尔必齐河为界,从格尔必齐河河源沿山至大海,山北一带土地及河流归俄国,山南土地及流入黑龙江之河流归中国,但乌第河地区应如何划分,以后再定。^①清朝使团希望早日签订条约,一让再让,当天派人通知俄方说,中方对上述的分界主张基本同意。但俄方得寸进尺,出尔反尔,竟又提出以乌尔喀河为界的荒谬要求,当即被中方驳回。戈洛文还秘密地以貂皮、黑狐皮和银鼠皮等贿赂耶稣会士,要他们在交换文本中写明中方不在雅克萨建筑任何房舍,并教唆他们“不必让使臣知晓,因为谁也不会知道在拉丁文写的条约文本中说些什么。”^②徐日升和张诚不敢冒此风险,拒绝照办,沙俄的这一诡计结果没能得逞。

同一天,中方正式提出自己的修正案,建议以格尔必齐河为界,沿该河河源处的山岭到大海,山南流入黑龙江的大小河流归中国,山北流入勒拿河的大小河流及土地属俄国,其间入海的诸河流及土地直至圣诺斯山暂不定界。^③

戈洛文听取中方的修正案以后,反对把暂时存放地区划到圣诺斯山,主张改为:“黑龙江口与乌第河之间的诸川流及土地暂不划界。”^④中方表示,中国在黑龙江口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63—564页。

^② 同上书,第568页。

^③ 同上书,第571页。

^④ 同上书,第572页。

以北设有五处城镇，因此不能同意。九月六日俄方又提出新的修正草案，其中关于乌第河地区问题，建议修改为俄国所属乌第河与中国所属靠近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暂不分界，另行议定。对此，清朝使臣表示可以接受。俄方还重新提出两国均不在雅克萨建造房舍，要求写入条约，经清朝使臣断然拒绝，俄方于是不再坚持。^①自八月二十二日两国全权使臣举行首次会议以来，双方往返交涉达十六天之久，至此终于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全面地达成协议。

九月七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订立。^②

当天上午，中方派员赴尼布楚就签约程序和宣誓仪式等问题同俄方进行最后磋商，双方讨论了很久，最后中方决定一概照俄方的意见办理。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74—576页。

② 关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日期，其说不一。该约俄文本所记的日期是俄历一七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历一六八九年九月六日。拉丁文本所记日期为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公历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戈洛文报告书谓签于俄历八月二十九日，即公历九月八日。按条约俄文本所记日期，实际上是戈洛文起草条约的日期，并非签约日期，详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29页，注138。拉丁文本是《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签约日期当以拉丁文本所载为准；同时，《徐日升日记》和《张诚日记》均说该约签于九月七日，与拉丁文本完全一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戈洛文报告书中逐日记事，但俄历“八月二十七日”的交涉情况竟记在八月二十六日之前，而记完二十六日交涉情况后，接着又出现另一个“八月二十七日”，所记当日交涉情况与前一个“八月二十七日”的情况完全不同。由此可见，这个报告书上的日期自俄历八月二十六日起显有错误。

下午六时，两国使团进入俄方布置的会场。会上先由双方译员朗读拉丁文本条约，并经过仔细核对，证明与双方所协议的条款相符，然后两国全权使臣即开始签字。双方事前商定各准备拉丁文本一份，俄方准备俄文本一份，中方准备满文本一份。俄国使臣在自己准备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上签字用印，中国使臣在自己准备的拉丁文本和满文本上签字用印，接着双方又在对方的拉丁文本上签字用印。条约签署后，随即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中俄两国使臣全体起立，各自手捧和约的文本，以两国君主的名义立誓忠实履行条约义务，“永远信守，不稍逾越。”^①最后双方交换了文本：俄方把自己准备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交给中方，中方把自己准备的拉丁文本和满文本交给俄方。至此，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字、互换手续遂告完成。

第二天，戈洛文特别邀请徐日升和张诚二人到尼布楚城内做客，给予他们“极为亲切的接待”。^②徐日升极力表明自己的亲俄立场，对戈洛文说：“因为我身为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多年，而且因为我是该国皇帝派来的，所以我不得不表现为他的忠实臣民。如果我不那样做，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③戈洛文听了会心一笑，回答说：“这样你就表现得合手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倒

①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15页。

② 同上书，第316页。

③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89页。

是不应该的。”又说：“总而言之，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你们，你们为了共同的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我要你们了解，我是知道你们的帮助的，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不久你们将得到同等价值的报答，获悉你们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①有些沙俄历史学者竭力把徐日升和张诚描绘成俄国的“敌人”，似乎这些耶稣会士在尼布楚谈判中曾经使俄国的利益受到“损害”。戈洛文的谈话，有力地说明了事实真相。

九月九日，中国使团从尼布楚动身返回北京。十日，戈洛文派人通知杯敦说，“全权大使与中国钦差大臣在双方使臣会谈中业经达成协议，并已亲手签订条约，永敦和好”，^②命令他立即拆毁阿尔巴津堡，并将该地俄军全部撤至尼布楚。同一天，戈洛文还下令将额尔古纳堡从额尔古纳河东岸迁至西岸。^③在作了一系列类似的安排以后，俄国使团于十月下旬启程返莫斯科。

①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89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605页。

③ 额尔古纳堡的俄军头目瓦西里·米洛瓦诺夫接到命令后报告说，由于该堡人力不足，同时严冬将至，势难立即拆迁。戈洛文遂派信使隆沙科夫前往北京，将上述情况告知中方，请求谅解，并保证于次年春季将该堡迁至对岸。详见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64页。

第五节 《尼布楚条约》的性质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序言明确指出，两国订立此约是“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条约共分为六款：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牒，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此外，《尼布楚条约》还载明：“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①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正式缔结的第一个条约。这个条约的订立，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一部分领土，制止了沙俄对黑龙江的进一步侵略，使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俄国事实上承认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为非法，同意把侵入这一地区的沙俄军队撤回本国；另一方面，沙俄通过《尼布楚条约》把中国方面让于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方纳入它的版图，把乌第河流域划为待议地区，并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2页。

获得重大的通商利益，初步达到了扩大中国市场的目标。《尼布楚条约》的全部条款及交涉过程都清楚地表明，这个条约是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苏联过去出版的许多书籍，也确认《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例如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说，尼布楚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该约巩固并扩大了两国人民的和睦关系。”^①《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说，“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同中国按照平等原则签订的，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②《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书说：“从国际法的观点看，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是俄中两国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条约。”^③还有许多苏联出版的书籍，确认《尼布楚条约》使俄国得到明显的利益。例如《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对外政策》一书说，《尼布楚条约》“对于俄国是有利的”。^④《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说，戈洛文签订了“一个对俄国有利的条约”，这个条约“是俄国在同满洲人的相互关系中第一次外交上的胜利。”^⑤《苏联大百科全书》也写道：“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⑥

① 葛罗米柯等主编：《外交辞典》，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403—404页。

②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211页。

③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08页。

④ 卡芬豪斯：《彼得一世时期的俄国对外政策》，1942年莫斯科出版，第5页。

⑤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61—162页。

⑥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9卷，第488页。

同时应该看到，虽然沙俄在平等基础上同中国订约划界，同意将俄军撤出黑龙江流域，但是往后的历史进程证明，它并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的打算。从这一野心出发，沙俄方面自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便开始攻击和歪曲《尼布楚条约》，否认这个条约的法律效力，为侵略中国领土制造舆论。特别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沙俄趁机大举入侵，吞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这时起，歪曲《尼布楚条约》以掩饰其强盗行径，更成了沙俄的惯用手段。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有必要对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略加分析。

沙俄侵略者歪曲《尼布楚条约》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竭力把它描绘成对俄国不平等的条约，硬说该约是中国以武力“强加”于沙俄的，中国通过该约“割占”了沙俄的领土。早在一七四〇——一七四一年，帝俄科学院院士米勒尔就叫嚷《尼布楚条约》是“被迫”签订的，“违反国际公法”，“俄国被欺骗了”，受了损失，因此应该坚决要求补偿，占领黑龙江。^①到一八五八年中俄璦琿谈判时，俄方也声称《尼布楚条约》是在清军压力下签订的，并且把这作为俄国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一项“理由”。^②后来，沙俄“汉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更露骨地说：“整个（尼布楚）条约是在丧魂落魄的恐惧感或暴力的影响下签

① 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第250—251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1891年莫斯科出版，第1卷，第511页。

订的”，“一切都让给了中国，而不曾给俄国任何一点好处。”^①如此等等。

所谓中国通过《尼布楚条约》“割占”了俄国的领土，这个说法完全是伪造历史。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用大量历史文献证明，至晚在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即在基辅罗斯国家形成以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就是中国的领土。当沙俄哥萨克侵入黑龙江的时候，这个地区归入中国的版图已经近一千年。《尼布楚条约》只是从法律上再一次肯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属于中国的事实，规定沙俄侵略军必须从这个地区撤走，怎么能说是“违反国际公法”呢？苏联早期历史学者哈恩斯基曾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自古至今的中国》一书中指出：《尼布楚条约》使俄国“放弃了它在黑龙江侵占的土地。”^②安德生在一九三六年发表的《十九世纪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文中也指出，《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失去了它在前半个世纪中靠损害中国”而获得的大部分土地。^③中国收回被沙俄侵占的固有领土，完全符合尊重双方主权和平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沙俄侵略者把这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说成是中国“割占”了俄国的领土，使俄国受了损失，岂不是荒谬绝伦？实际上，中国方面不但没有通

① 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第66—68页。

② 哈恩斯基：《自古至今的中国》，1927年伯力—海参崴出版，第269页。

③ 安德生：《十九世纪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载苏联《阶级斗争》杂志，1936年第9期。

过《尼布楚条约》割占俄国的一寸土地，反而将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以西包括尼布楚在内原属中国的一些地方让给了俄国，并接受俄方的要求，同意将原属中国的乌第河流域作为未定界地区，两国暂不划界，另行议定。如果说这个条约割让了土地，那也是中国割给了沙俄，而不是沙俄割给了中国。

至于说什么中国以武力把《尼布楚条约》强加于沙俄，更是血口喷人。

沙俄早期侵略中国的历史，和清政府为和平解决中俄边界问题所作的一贯努力，充分证明了这一提法的荒谬。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沙俄对中国实行野蛮的武力侵略已足足有几十年，清朝政府曾在一六七〇年、一六七六年、一六八三年和一六八五年多次呼吁沙俄停止武力侵略，和平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均遭拒绝，最后才被迫实行自卫，对沙俄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一六八六年沙俄因武力侵略受挫，表示接受清政府提出的和平倡议。当时中国军队在雅克萨节节胜利，孤城唾手可得，但清政府获悉俄方同意和谈后，立即下令无条件地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这一行动充分表明了中方的和平诚意，为中俄尼布楚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米勒尔等人颠倒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抹煞中国方面的和平努力，把侵略成性的沙俄打扮成受压迫的一方，把被侵略的中国说成是侵略者、压迫者，企图歪曲尼布楚谈判的过程和《尼布楚条约》的根本性质，这是绝不能得

逞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

第一,清政府接受俄方的要求,同意在尼布楚举行谈判,这个事实也足以驳倒所谓中方对俄方施加军事压力的谎言。谁都知道,在沙俄占领下的尼布楚,是当时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头号军事重镇,是一个经营多年、配置重兵的侵略堡垒。尼布楚城上架设的是沙俄的大炮,并不是中国的大炮。在尼布楚城下举行谈判,实际就是在沙俄大炮的射程内谈判。因此,任何人都不难断定:在谈判双方中,俄国是在军事上占据明显的有利形势的一方,中国是处于不利形势的一方。清政府同意在这样的地点举行谈判,充分表现了中国的和平诚意,什么“武力逼签”之类的帽子,对中国是根本不适用的。

第二,尼布楚会议上中俄双方卫队的人数比例,也证明中国以武力“逼签”条约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尼布楚谈判前夕,中俄双方曾就担任会场警卫的两国卫队人数进行过充分协商。当时,俄方提议各带三百名卫士赴会,中方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且主张双方卫队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俄方反对这一主张,认为不应限制携带武器;中方坚持两国卫队至多只准携带不用火药的冷兵器,不得携带任何火器进入会场。最后,中方的合理主张终于为俄方接受,双方圆满地达成协议。这一事实说明:一、中俄双方在会上的卫队人数完全相同,因而根本不存在中国

以优势兵力威胁沙俄的问题；二、关于任何一方不得携带火器赴会的建议，正是中国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这突出地反映了中方要求谈判能在不受武力威胁的情况下举行的愿望。在整个尼布楚谈判期间，中国使团一贯严格遵守上述的协议，从未在会上增加过一兵一卒，更不曾象俄方那样密令卫队暗中揣着禁止携带的火器——手榴弹赴会。可见米勒尔等人所说的中方“以武力逼签”《尼布楚条约》，纯属凭空捏造。

第三，当时中俄双方在尼布楚一带总兵力的对比，也证明中国以武力“威胁”沙俄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真实。如前所述，一六八六年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时，随行军队有五百多人，途经西伯利亚时又增募一千四百多名，共达二千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当年波雅科夫一伙武装入侵黑龙江总人数的十五倍。就连《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的作者沙斯京娜也毫不讳言地说，戈洛文随带的这支部队，“在当时无疑是一支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①此外，先已盘踞在尼布楚、雅克萨、额尔古纳堡以及色楞格斯克、巴尔古津、乌金斯克、叶拉文斯克、伊尔根斯克、车勒姆宾斯克等处的沙俄军队，数目也有二千人，^②总计戈洛

①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9页。

② 据一六八三年俄国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统计，达斡尔地区的沙俄军役人员共约二千人，参看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20页。一六八五年，杯敦又从托博尔斯克带来援兵六百余人。除去第二次雅克萨战役中俄军死伤人数，达斡尔地区的俄军在戈洛文东来以前仍有二千人左右。

文在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地区可以支配的兵力共有四千人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沙俄在尼布楚一带招募的鄂温克族伪军在内。沙俄政府一方面要求清军撤雅克萨之围,表示愿意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却派遣如此庞大的作战部队随同使团东来,这一违反国际惯例的行动当然不能不使中方有所戒备。在俄方先已向中国黑龙江地区派出大批作战部队的情况下,清政府相应地派遣一定数量的护卫兵力,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支兵力,就不足以保障清朝使团安全和免受俄军威胁,就说不上使谈判在平等基础上正常进行。沙俄侵略者竭力夸大随使团前往的清军人数,连船夫、纤夫和清朝使臣的大批家人、夫役等非军事人员^①也都算作战斗部队,企图造成谈判是在中国优势兵力胁迫下进行的假象,借以证实自己的谬论。他们信口开河,越说越神,有些人说尼布楚的清军达一万名,还有人说多达一万五千名,自相矛盾,破绽百出。^②事实上,根据可靠记载,一六八八年清朝使团仅带八百名卫

① 清朝使团长途跋涉,必须带足食物、行李和各种用品,所以后勤队伍相当庞大。据张诚记载:“索三老爷(指索额图)独自一人就有三百头骆驼,一千五百匹马,还有一百个伺候他的家人。国舅(指佟国纲)不会少于三百匹马,一百五十头骆驼和八十名仆人。其他官员各按身份随带不同数量的驼、马和仆役。”(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08页)这就是沙俄侵略者所指的“万人大军”!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97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947年莫斯科出版,第34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彼得堡出版,第114页。

队赴色楞格斯克，中途为噶尔丹叛军所阻，被迫折回。第二年清朝使团改道赴尼布楚，因获悉戈洛文带来重兵，于是酌增护卫兵力，分为水陆两路，由水路前往的黑龙江兵共为一千五百人，《清圣祖实录》等书记载相同。^①由陆路随使团同往者，《清圣祖实录》中没有记载，《平定罗刹方略》仅说“量增于前”，即多于上年派出的八百名卫队，未记确数。但《张诚日记》则明确地记载：从陆路随同使团赴尼布楚的警卫部队共为一千四百名。^②张诚是尼布楚谈判的参加者，本人又是从陆路前往的，所记自属可信。总计中国在尼布楚的兵力，水陆两路共为二千九百人，同当地俄军人数大体相当。至于武器装备，则清军远远不及俄军。雅科夫列娃在《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中坦率承认：“俄国使臣们在尼布楚取得了外交胜利，……这一胜利是由俄国人对于俄国的真正实力所具的信心，和对于中国军事方面比较落后这一事实的了解所决定的。清军大多数是用弓箭装备起来的，而当时俄国早就牢固地掌握了火器。”^③可见，无论从军队人数或武器装备来说，都不存在什么中方以优势兵力压迫俄方的问题。

第四，有些沙俄御用文人还说，当时清朝使团曾“煽动”布里亚特人反俄，借以对俄方施加压力。这就尤其可

① 《清圣祖实录》，第140卷，第30页；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08页。

②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08页。

③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89页。

笑。尼布楚谈判前后，布里亚特等族人民所掀起的大规模抗俄斗争，确乎使戈洛文等心惊胆战，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不过，这种“压力”决不是别人制造出来施加于俄方，而恰恰是沙俄残暴殖民统治本身的产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布里亚特等族人民进行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斗争是势所必然，哪里还用得着清朝使团去“煽动”呢？据《张诚日记》记载：八月二十八日，许多蒙古族部众迫切希望摆脱沙俄压迫，请求清朝使团协助他们迁入中国内地。耶稣会士徐日升竭力阻挠，说什么“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①在他的影响下，索额图等对于当地人民重返祖国怀抱的要求竟没有给以支持，“我们的钦差大臣为了不致妨碍和谈，什么也不肯许诺他们。”^②尼布楚一带那时是中国的领土，当地各族人民是清朝的臣民，中国使团倘若支持他们的要求，这是完全正当、理所当然的，根本扯不上对俄方施加“压力”的问题。这些沙俄文人的荒谬提法，充分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反动立场。更何况由亲贵大臣所组成的这个清朝使团，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本应采取的措施，对布里亚特等族人民给以积极的支援呢？

第五，《尼布楚条约》是不是中国强加于沙俄的不平等条约，从当时沙俄使臣对该约的态度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在条约正式签订的前夕，中俄双方曾就签约程序问

①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63页。

②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13页。

题交换过意见。当时，中方曾提议两国使臣只盖印，不签字，也不必互换条约文本；俄方却坚持必须签字、盖印和互换文本，认为非如此不足以保证该约的法律效力。同时，俄方还强调两国使臣必须表明他们的君主履行条约的责任和决心，“要求双方都作一种誓言，其中规定尽可能严格的义务。最后，中国人采用了俄国人的誓文。”^①这一切都证明，俄方对于签订该约是积极的，主动的。如果《尼布楚条约》是强加于沙俄的“不平等条约”，那末，戈洛文为什么对于签订该约心情如此急切，生怕《尼布楚条约》成为一纸空文，希望该约切实生效呢？

俄国使团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感到极为高兴的。在双方互换条约文本以后，俄国使臣上前同中国使臣热烈拥抱。这时俄方喇叭、铜鼓、风笛、长管齐鸣，乐声大作，戈洛文等用香槟酒和甜酒款待中国使团，频频举杯祝贺条约的订立，并恳留中国使团多住一天再回北京。双方交谈约三小时，最后夜色已深，索额图等起身告辞，俄方全体使臣送中国使臣走了一段路，分手时他们又同索额图等拥抱，并派人提灯笼送中国使团直到河边上船。^②第二天，戈洛文又派员向清朝使臣赠送礼品，“以纪念两国使臣之间在过去一些日子中的真挚友谊。”^③来使

①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19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99页；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81、287页。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600页。

转述戈洛文嘱咐的话说：所赠都是他珍爱之物，为了感谢中国使臣，即使价值万金，也不足为贵。貂皮、猞猁皮表示他热忱之情；自鸣钟系有声之物，象征大臣分别后仍可声息相闻；望远镜能视远方；银壶、银杯可开怀畅饮，以示别后彼此怀念，如同相见。言为心声。如果《尼布楚条约》真是俄国在清军压力下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那末戈洛文等何以会如此兴高彩烈？

还应该看到，当时沙俄政府对于订立《尼布楚条约》也是极为满意的。沙皇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和伊万五世^①曾为此下令表扬使团，赏给金质奖章，连随同使团前往尼布楚的军役人员也都获得了升迁。戈洛文更是飞黄腾达，在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受到沙皇召见，当场由外交事务衙门大臣乌克兰因采夫讲话，称赞戈洛文同中国议定边界有功，并称：“陛下谕令告诉你：你在达斡尔地区色楞格斯克城下为陛下效力期间，同中国使臣举行了会议。赖上帝保佑，并托陛下洪福，经过同中国使臣的多次谈判，缔结了和约，划定了边界，互换了约文。根据哪些条款缔结了和约，划定了边界，同中国使臣和军队长官交换了什么约文，这些陛下都知晓。”在这个讲话的文本上乌克兰因采夫还做了一个批注：“陛下赐恩，对

^① 一六八二年彼得一世与其兄伊万五世同时即沙皇位，由其姊索菲亚摄政。一六八九年索菲亚被推翻后，开始掌握实权。一六九六年伊万五世死后，彼得一世单独执政。

其勤勉效忠予以表彰。”^①从此以后，戈洛文深得彼得一世的信任，曾先后主持过兵器事务衙门、财政事务衙门、交通事务衙门和当时新成立的海军事务衙门，并获得海军上将、陆军元帅、伯爵等一大串显赫的官爵头衔。一六九九——一七〇七年间戈洛文主持外交事务衙门，成为沙俄外交界的第一号人物。试问：如果戈洛文是一个签订了屈辱条约的代表，怎么会成为有功之臣，受到沙皇如此特殊的赏识、信任和重用呢？

沙俄侵略者诋毁《尼布楚条约》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就是随心所欲地曲解约文，制造混乱，把该约规定的界河、界山统统“搬家”，企图证明该约关于边界的条款“含糊不清”，没有法律效力，以适应克里姆林宫的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个米勒尔就故意把流入黑龙江的阿玛杂尔河，说成是大格尔必齐河；他认为依俄国的利益来说，最好以大格尔必齐河为国界。^②另一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涅维尔斯科依的野心更大，竟想把作为中俄两国界山的外兴安岭从黑龙江以北搬到南岸来，胡说外兴安岭在乌第河上游折向南行，穿过黑龙江和松花江，一直延伸到朝鲜边界而达日本海，因此按照《尼布楚条约》，黑龙江下游和滨海地区不能认为是中国领土。^③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795页。“色楞格斯克城下”显为“涅尔琴斯克城下”之误。

② 米勒尔：《关于1689年俄中两国定界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转引自《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40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9、38页。

这些说法真是利令智昏，荒谬绝伦。

《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的规定，内容清晰、明确，根本不容歪曲。一八九一年俄国出版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所附《东西伯利亚地图》，一九一四年帝俄官方出版的《俄国亚洲部分地图集》中《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图》，所标示的一八五八年前的中俄东段边界线都是以《尼布楚条约》的前述规定为依据。苏联早期历史学者巴赫鲁申明确指出，这个条约“规定沿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雅布洛诺夫及斯塔诺夫山脉作为国界。”^①英国历史学者普罗思罗主编的《东西伯利亚》一书也尖锐地指出，所谓《尼布楚条约》“含糊不清”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条约在当时情况下尽可能明确地规定了直到东洋（指太平洋）的边界，只留下紧靠太平洋岸的乌第河地区另行议定。此外还及时地树立了界碑，并且每年进行巡边”。^②沙俄侵略者想要抹煞客观事实，一手掩尽天下耳目，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必须指出：《尼布楚条约》规定为中俄国界定向标记之一的格尔必齐河，所指十分明确，这就是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第一，沙俄官方出版的地图，明确地把这条格尔必齐河作为中俄国界，例如

① 巴赫鲁申：《十六、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纲》，载《巴赫鲁申学术著作集》，第3卷，第1分册，第156页。

② 普罗思罗主编：《东西伯利亚》，1920年伦敦出版，第23—24页。

上引《俄国亚洲部分地图集》所载《西伯利亚地图》(一七〇一年雷米佐夫绘制)中,就在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旁清清楚楚地标明了“边界”字样。第二,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方首次提出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的建议时,所指的就是“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俄方首席代表戈洛文在给沙皇的报告中确认这一事实,他还写道:“格尔必齐河流经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的当中。”^①只要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尼布楚和雅克萨相距五百多公里,戈洛文所记的该河方位,恰与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位置相符。第三,俄方在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前所同意作为国界的格尔必齐河,也明明是指注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而不是指雅克萨附近的阿玛杂尔河。例如,他们在九月四日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写道:“俄中两国以自左方向下流入石勒喀河之格尔必齐河为界。”^②九月五日和六日,俄方提出的两个条约草案中也写道:“将在绰尔纳河附近自左方向下流入石勒喀河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③《尼布楚条约》俄文本的第一款第一句同上面这句话完全相同,没有作过一字改动。第四,《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都明确指出,这条作为中俄国界的格尔必齐河位于绰尔纳河附近。绰尔纳河西距尼布楚二百多公里,与上述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仅隔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527页。

② 同上书,第555页。

③ 同上书,第563、574页。

十二公里左右，因此，根据绰尔纳河的方位，也可以证明条约规定为国界的格尔必齐河必定是流入石勒喀河的这一条。米勒尔等硬说，阿玛杂尔河（即他所谓的大格尔必齐河）东面的乌尔喀河（鄂尔河）是“乌伦穆河”的转音，而《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载明“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所以乌尔喀河也可以认为是绰尔纳河。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如上所述，在尼布楚谈判中，中方始则提议以尼布楚归中国，俄方拒不接受。继而中方向东退让，提议以尼布楚为界，而以尼布楚城归俄国，俄方仍不同意。八月二十五日，中方再向东退让，提议以绰尔纳河为界，又为俄方所拒。八月二十六日，中方继续东退，这才提出了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的建议。由上述谈判过程可知，绰尔纳河必在格尔必齐河之西。乌尔喀河则不仅远在格尔必齐河的东面，而且位于阿玛杂尔河以东，如果这条乌尔喀河就是绰尔纳河，那末，当中方提出以绰尔纳河为界的时候，为什么俄方拒不接受，反倒甘愿把两国边界定在乌尔喀河以西的地方呢？第五，米勒尔等还说，既然《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本中提到绰尔纳河流入黑龙江，因此它就不应是流入石勒喀河的绰尔纳河，而作为国界的格尔必齐河既在绰尔纳河附近，因此不应是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这真是可笑已极。尽人皆知，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向来把石勒喀河看做是黑龙江的一部分。中国的官方文书和地图，从来都是把石勒喀河作为黑龙江上游的正流，所以约文中的黑龙江当然包括石

勒喀河在内。又如《黑龙江外记》说：“黑龙江发源蒙古喀尔喀部之垦(肯)特山，其上游，蒙古谓之鄂伦河，他书亦作敖嫩河，即元史斡难河，元太祖始兴地也。自此东北流，经尼布楚城之南，入省北境，受西南来之额尔古纳河，经雅克萨城折而东南，……东入于海。”^①又如尼布楚谈判的当事人徐日升和张诚在他们的日记中都明确地提到，尼布楚位于黑龙江北岸。^②这些都是黑龙江在当时包括石勒喀河的明证。沙俄侵略者摇唇鼓舌地进行诡辩，难道就能改变客观事实吗？

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主要定向标记——外兴安岭的走向，那就更加清楚了。《尼布楚条约》第一款规定：中俄两国边界自格尔必齐河发源地起，顺外兴安岭“直达于海”，“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这就说明，外兴安岭（俄名斯塔诺夫山脉）是指黑龙江和勒拿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而“直达于海”的意思是指直达于鄂霍次克海。俄国学者达维多夫明确指出，根据《尼布楚条约》，“边界规定为沿额尔古纳河，然后沿石勒喀河的支流格尔必齐河，并继续沿着勒拿河流域与黑龙江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向东延伸”。^③甚至米勒尔也确认：“根据第一和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1卷。

②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01页；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08页。

③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第15页。

第二款,俄罗斯帝国的东南边界是由一条山脉所构成,它位于黑龙江以北,从鄂霍次克海一直延伸到名为格尔必齐的一条小河。”^①前引普罗思罗主编的《东西伯利亚》一书也指出:“在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中,俄国人承认中国的边界沿着黑龙江以北约二百哩远的斯塔诺夫山脉的山脊,在乌第河附近直达于鄂霍次克海。”^②涅维尔斯科依竟声称这条山脉在乌第河上游附近折向南行,穿过黑龙江和松花江,直到朝鲜边界而达于日本海。按照他的说法,黑龙江以南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中国领土似乎也应当划归俄国!这种包藏祸心的谬说,由于太不顾起码的地理常识,连一些稍微尊重事实的旧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是“牵强附会”之论。^③另一个给涅维尔斯科依写传的苏联历史学家卡马宁也说:“涅维尔斯科依的这些设想,如我们现在所知,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存在一条从乌第河上游到朝鲜的统一山脉,因而也不存在他所写的斯塔诺夫山的那种急转弯。”^④

总而言之,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沙俄自始至终是侵略的一方,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清朝政府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坚决抵抗沙俄入侵,促成了中俄尼布楚会议的召开;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谈判庄严缔结并

① 米勒尔、巴拉斯:《西伯利亚的征服与中俄之间的交往、战争和通商史》,1842年伦敦出版,第35页。

② 普罗思罗主编:《东西伯利亚》,第20页。按:1哩=1.6093公里。

③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50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9页。

有利于俄国的，决不是中国用武力逼签或有损俄国主权的；条约所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是明确、具体的，决不是含混不清、可以任意解释的。米勒尔和涅维尔斯科依之流挖空心思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和内容，妄图为沙俄侵略中国领土制造“根据”。然而历史不容任意篡改，谎言到底代替不了事实。他们愈是颠倒黑白，他们的历史伪造者的面目也就暴露得更加清楚。

第四章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第一节 彼得一世时期沙俄 对中国的侵略

沙皇俄国从伊万三世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到彼得一世执政时已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彼得制定争霸世界的侵略计划是：（一）在欧洲方面，北上打败瑞典，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打通由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的海路；西进兼并波兰，巩固沙皇俄国在东欧的地位，以便向西欧扩张；南下侵略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黑海出海口，打通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路。这是俄国对外扩张的重点。（二）在亚洲方面，南下征服高加索，占领中亚细亚，进而争夺西亚和印度，打开通向印度洋的道路；向东占领中国北部大片土地，并开辟经黑龙江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彼得这一狂妄的侵略计划被往后的历代沙皇奉为指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彼得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①。

^①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7页。

彼得一世为了建立世界霸权，扩军备战，把俄国变成了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在他执政的三十六年间，先后征兵五十三次，接连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肆意向邻国“**抢夺领土**”。^①彼得通过战争兼并邻国土地达五十四万平方公里。^②一七二一年，沙俄枢密院尊奉彼得一世为俄罗斯皇帝，沙皇俄国从此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

为了适应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人阶级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扩大市场的需要，彼得一世把夺取出海口作为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他曾公开说过：“水域——这就是俄国所需要的”。^③为此，他发动了针对当时北欧强国瑞典的持续二十一年的“北方战争”（一七〇〇——一七二一年），结果控制了芬兰湾沿岸，吞并了爱沙尼亚、北拉脱维亚和卡累利亚的一部分，攫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在十万农奴的尸骨堆上建立了彼得堡。为了打开通向黑海的“窗户”，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先后几次对土耳其作战，企图夺取顿河的出海口亚速，由此进入黑海。一七二二——一七二三年，彼得一世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占领了黑海的西部和南部沿岸。在中亚，彼得为了打开通向印度的道路，一七一七年派遣贝科维奇远征希瓦。在东北亚，彼得一世也不遗余力地实行殖民扩张，于

①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31页。

② 寇松：《俄国在中亚》，1889年伦敦出版，第259页。

③ 列别杰夫：《彼得一世的对外政策》，1949年莫斯科出版，第3页。

十七世纪末侵占堪察加半岛，企图从那里侵入北美。直到一七二五年一月初病危时，彼得一世还起草了一道训令，决定派一个海上“考察队”，去查明“亚洲和美洲是否连在一起”，^①侵略野心，至死不泯。

从彼得一世开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彼得一世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的侵略目的：一方面顽固拒绝中国提出的划定两国在蒙古北部边境的边界的建议，在外交谈判的掩盖下，逐步蚕食我蒙古边境大片土地；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中国市场，加紧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尼布楚条约》订立后约四十年间，中俄两国围绕边界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直到一七二七——一七二八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时才告一段落。

一、侵占我国蒙古地区大片土地

彼得一世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极大。他把侵华的矛头主要指向蒙古地区，同时还图谋染指黑龙江流域和我国西北地区。^②

包括贝加尔湖一带在内的蒙古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北部的匈奴族，在大漠南北、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广大地区，建立了

① 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第142页。

② 关于彼得一世觊觎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西北地区的史实，分别详见本书第二卷、第三卷。

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匈奴分裂为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两大势力，呼韩邪单于降汉，郅支单于被汉军攻杀，匈奴便成为汉朝的臣属。东汉初年（公元四七年），匈奴又分为南北两部，史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其后，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一部分降汉，一部分西迁。

公元二世纪中叶，东汉所属的鲜卑族崛起辽东塞外，“尽据匈奴故地”。^①三国时，曹魏封鲜卑首领轲比能为附义王。五世纪初，北魏所属的柔然部取代鲜卑，据有贝加尔湖一带和阿尔泰山等地。六世纪中叶，住在阿尔泰山之阳的突厥部推翻柔然政权，建立了突厥汗国。“东起辽海以西，西至西海（即里海）万里；南起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②后来突厥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五九九年，东突厥突利可汗归降隋朝，被封为启民可汗。六三〇年，唐朝灭东突厥，但漠北仍为突厥属部薛延陀所割据。六四六年，唐进兵击灭薛延陀，分布在剑河（叶尼塞河上游）流域的结骨部落（即黠戛斯，元代称吉利吉思，今称柯尔克孜，苏联称吉尔吉斯），贝加尔湖南面和西面的都播部落，贝加尔湖以东以西及该湖以北地区的骨利千部落等都相继向唐称臣纳贡，“请置唐官”。^③六五〇年，唐朝军队击败割据金山（阿尔

① 《后汉书》，第90卷，《鲜卑传》。

② 《周书》，第50卷，《突厥传》。

③ 《新唐书》，第217卷上，《回鹘传》。

泰山)之北的突厥车鼻可汗部,俘获车鼻可汗,从此东突厥的辖境全部纳入唐朝的版图,由唐朝政府设置安北都护府(瀚海都护府)管辖。安北都护府下设许多都督府和州。其中有设在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会合处以南地区的坚昆都督府,设在杭爱山西麓直至金山之北的狼山都督府和新黎州,设在贝加尔湖一带及其以北地区的玄阙州,设在仙萼河(色楞格河)流域的仙萼州等等。^①府设都督,州设刺史,并征收貂皮作为租赋。^②

辽代,住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辖戛斯(黠戛斯),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和以西的唃廝囉(兀良哈),以及斡难河(鄂嫩河)一带的蒙古部,都是辽的属国或属部。辽朝在属国属部中,分别设有大王、于越、左相、右相和节度使等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③金代,大漠以北的鞑靼部落,也“称藩于金国”。^④拉施德《史集》记载:“阿勒坦汗(此处指金朝皇帝——引者)是极强大、极威严的君主,先前大多数突厥、蒙古部落都臣属于他。”^⑤

元朝时,贝加尔湖一带及其以北地区,都属岭北行省管辖。元朝的牧地“北逾火里、秃麻”,^⑥火里即豁里,秃麻即秃马惕,都是岭北行省管辖下的部族。他们与巴儿

① 《新唐书》,第43卷下,《地理志》;第215卷上,《突厥传》。

② 《新唐书》,第217卷上,《回鹘传》。

③ 《辽史》,第46卷,《百官志》二。

④ 《多桑蒙古史》,中译本,上册,第26页。

⑤ 拉施德,《史集》,俄文本,第1卷,第2册,第88页。

⑥ 《元史》,第100卷,《兵志》。

忽部族为邻，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南起色楞格河下游，东至贝加尔湖以东的巴尔古津河一带，西与吉利吉思部的住地接壤。河南人刘好礼，曾被元朝政府派到岭北行省做吉利吉思、昂可刺、乌斯、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管理民政的断事官。吉利吉思部族住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元朝在这里设有九个千户。昂可刺部分布在叶尼塞河中下游地区。乌斯部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乌斯河流域。撼合纳部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源一带。谦州“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山（唐努山）之北”。^①元朝政府在这里设官治民，征收赋税，开展屯田，并从中原地区调来汉族农民，同当地居民一起耕作。^②在这里还有许多从中原地区来的汉族工匠，设有手工业作坊，从事制造农具、修造舟楫和其他手工业。这些汉族农民和工匠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建设祖国的北部边疆。^③

一三六八年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元顺帝逃往蒙古地区。当时贝加尔湖一带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先后归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首领建立的割据政权管辖。一四〇八年，瓦剌首领马哈木向明朝请求封号。一四〇九年，明朝皇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同时还封另外两个瓦剌首领为贤义王和安乐王。马哈木死后，其子脱欢承袭王爵。^④

①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

② 《元史》，第7卷，《世祖本纪》四。

③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

④ 《明太宗实录》，第64卷，永乐七年六月癸丑条；第110卷，永乐十六年四月甲辰条。

一四一三年，鞑靼首领阿鲁台臣附明朝，被封为和宁王，从此年年向明纳贡。后来，瓦剌迁徙到阿尔泰山以西。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和贝加尔湖地区由鞑靼部统治。一五七〇年，明朝封鞑靼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一五八二年俺答汗去世，明朝又封其子彻辰洪台吉为顺义王，封彻辰的儿子为龙虎将军。^①此外，明朝还任命鞑靼大小领主为都督、都指挥等官。明朝末年，南起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地区，是蒙古喀尔喀部的辖境。喀尔喀分为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吉利吉思人属札萨克图汗部硕垒乌巴什台吉及其继承人所辖。从安加拉河到贝加尔湖以东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游牧地带。布里亚特“属蒙古诸汗管辖，并向他们纳贡”。^②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女真族(满族)崛起东北，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六年改称为清)。清朝与喀尔喀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逐步加强，从一六三八年，三汗每年向清“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③一六五五年，清朝任命三汗和其他封建主共八人为札萨克，管理喀尔喀各部事务。^④这样，大漠以北至贝加尔湖一带就归入清朝版图。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这时属我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建立的割据政

① 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第6卷；第7卷。

② 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45页。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3卷。

④ 同上。

权管辖。一六九一年，清朝为了加强对蒙古族地区的统治，把大漠以北的行政区划重新加以调整，取消原来的管理体制，代之以盟旗制度。旗是军事、行政单位，执掌旗政的长官称札萨克，由若干旗组成一个盟。同时保留三汗称号，废除济农、那颜等旧有官号，由清朝授予蒙古族封建领主以王、公、贝勒、贝子、台吉等爵位。^① 上述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包括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和贝加尔湖一带在内的蒙古地区，历史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沙俄觊觎我国蒙古土地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一六〇八年，托木斯克统领渥伦斯基即曾派出一个伪装成商队的“使团”，由贝洛戈洛夫率领，前往“访问”在乌布苏湖游牧的我国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旗珲台吉硕垒乌巴什（俄国人称为“阿勒坦汗”，意为“金汗”），企图进行阴谋活动，但没有得逞。一六一六年，托博尔斯克统领库拉金又派图敏涅茨等人前往科布多，要求硕垒乌巴什连同其所属的全体牧民接受沙皇“最高统治”，遭到严词拒绝。此后，沙俄继续图谋侵占科布多地方，多次派人煽动硕垒乌巴什归附俄国，但都遭到拒绝。硕垒乌巴什在二十年代末死去，一六三八年，沙俄政府派斯塔尔科夫等人到科布多，强要硕垒乌巴什的儿子俄木布额尔德尼向沙皇称臣纳贡。俄木布额尔德尼忍无可忍，立即将这些狂

^① 《清圣祖实录》，第151卷，第6—17页。

妄的侵略分子赶出帐篷，并停止一切粮食供应，以示惩罚。^①

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起，沙俄殖民者不断武装侵入喀尔喀蒙古所属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一六四八年，蒙古车臣汗派遣沙吉克等人赴莫斯科，对这一侵略行径提出抗议。沙皇政府恼羞成怒，竟下令将沙吉克拘捕，押送出境。一六四九年，沙俄政府派贵族士官叶罗菲·札波洛茨基“出使”蒙古，指示他设法诱迫车臣汗加入“俄国国籍”，永为沙皇“奴仆”。札波洛茨基行经贝加尔湖东南岸时，被布里亚特族人民击毙。“使团”的译员潘菲尔·谢苗诺夫等人继续前行，一直到达车臣汗驻地。此时车臣汗已经病故，他的妻子和其他蒙古王公一致拒绝向沙皇称“臣”，并严正警告沙俄哥萨克今后不得再侵犯蒙古土地。^②

十七世纪下半叶，沙俄对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步伐日益加紧。如前所述，一六六六年沙俄强筑色楞格斯克堡，使喀尔喀受到极严重的威胁；为此，土谢图汗等蒙古王公曾多次向俄方提出强烈抗议，但沙俄政府置若罔闻。一六八七年戈洛文带领重兵到达贝加尔湖以东后，我国

① 俄国历史档案中这样写道：“贵族士官瓦西里·斯塔尔科夫为使阿勒坦汗宣誓效忠俄国，前往访问该汗。据托木斯克统领报告及斯塔尔科夫的出使报告书称，阿勒坦汗非但拒绝宣誓，而且非常粗鲁地对待使者，使他受了许多苦楚。”这个不受欢迎的沙俄“使团”被逐出帐篷后，整整饿了四天。参看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19页。

②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74—77页。

北部边疆的形势愈加紧张。一六八八年，戈洛文勾结准噶尔部叛乱头目噶尔丹，两次出兵攻打喀尔喀，使我国蒙古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尼布楚条约》订立后，沙俄继续明目张胆地和噶尔丹进行勾结，图谋吞并喀尔喀蒙古。一六九〇年三月八日，噶尔丹的使者达尔罕到伊尔库次克会见戈洛文，要求他出兵合攻喀尔喀。戈洛文立即答称：“如果他们的博硕克图汗（指噶尔丹）向敌对的蒙古人发动军事进攻，则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形势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从色楞格斯克、乌金斯克、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①三月下旬，戈洛文又派格里戈里·基比列夫随同达尔罕前往噶尔丹处递送函件，内称：“你应率所部前去攻打上述敌对的蒙古人（指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拔除其老巢，在上帝保佑下，将其彻底消灭。”^②同时，他还指示基比列夫面告噶尔丹：“只要博硕克图汗去进攻蒙古人，沙皇陛下就不会停止攻打蒙古乌卢斯。”^③康熙帝获悉沙俄的侵略阴谋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警告正在北京的俄国急使吉里古里·伊法尼齐说：沙俄不得破坏尼布楚和约，勾结噶尔丹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为敌；“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指噶尔丹）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康熙帝要求伊法尼齐立即派人归告尼布楚统领，将中国的态度“遍谕鄂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620页。

② 同上书，第624页。

③ 同上书，第626页。“乌卢斯”意为游牧民族的封建领地。

(俄)罗斯之众”。^① 在中国决心实行武装自卫的坚定立场面前，沙俄最后才不敢轻举妄动。

沙俄虽然未敢对蒙古大举入侵，却仍利用机会进行骚扰。一六九一年七月，彼得·姆诺戈格列什内受伊尔库次克统领基斯梁斯基的派遣，率领俄军从色楞格斯克出发沿色楞格河上行，向莫加河畔一个有四百五十一座帐篷的我国蒙古族人民聚居地进攻。蒙古人民退入树林，从隐蔽处向沙俄入侵者开火，打得他们四散溃逃。蒙古人民随即转入反攻，打死哥萨克十八人，打伤无数，彼得·姆诺戈格列什内本人也被击毙，余众仓惶逃回俄境。^②

应当指出，在勾结噶尔丹吞并蒙古的阴谋失败，特别是在康熙帝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后，沙俄侵占蒙古土地的策略有所改变，即由妄图一举鲸吞变为逐步蚕食。它把在欧洲推行的所谓“骑兵防哨制”搬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来，不断向我国蒙古地区派出骑兵团，强行建立“骑兵防哨线”，美其名曰“积极防御”。一七二六年色楞格斯克《边务公报》公然宣称：“我们只承认俄国派出的哨兵……所确定的边界”。^③ 这就是说，沙俄军队侵略到哪里，哪里就是俄国的领土。所谓“积极防御”，不过是“积极扩张”、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一，《圣训一》；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75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214—215页。

③ 札尔金德：《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外贝加尔西部地区历史片断》，载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论丛》，1949年第1卷，第231页。

“逐步蚕食”的同义语。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沙俄侵略者从通肯堡砦^①、库勒图克^②、色楞格斯克、尼布楚等地出发，逐步向南推进。在彼得一世统治末期，沙俄侵略势力已经渗入到下列地方，

在哲得河流域，建立了泽勒图勒岗哨和博沁岗哨，并在该河流域若干地段，进行屯垦。

在色楞格河的查干乌松河口建立了岗哨。

在恰克图及其东面楚库河支流库达喇河口建立了岗哨。

此外，俄国哥萨克还窜到库珠尔河^③口等处强行开矿铸铁。^④

由于沙俄不断蚕食，上述大片土地都被它逐渐侵占。沙俄历史学者瓦西里耶夫直言不讳地承认：“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成功地夺取了色楞格斯克以南相当远的一块地方。他们首先派出宿营兵进行占领，然后设立哨所，利用这种办法预先规定了今天色楞格斯克的边界线（指一七二七年《布连斯奇条约》所规定的中俄中段边界线——引者），这条边界线不过是将实际占领在法律上巩固起来

① 位于伊尔库特河岸。

② 位于贝加尔湖西端。

③ 楚库河支流。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2卷，第5页；札尔金德：《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外贝加尔西部地区历史片断》，第231页。

而已,这是哥萨克对国家的一项功绩。”^①

在鄂嫩河一带地方,沙俄侵略者从尼布楚出发,以同样的蚕食方法“对音果达河和鄂嫩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建立了事实上的统治”,“预先决定了未来的划界”。^②

在若干地区,沙俄侵略势力甚至企图深入到蒙古境内更远的地方。例如,一七一六年,沙俄当局竟命令伊尔库次克要塞司令派兵前往色楞格河源的库苏泊,强筑堡砦。^③又如,一七二〇年前后,沙俄竟妄图侵入靠近库伦的图拉河,无耻地声称“整个图拉河以西的地方应当属于俄国”,图拉河应作为中俄“两帝国之间的自然疆界”。^④

针对沙俄的侵略行径,清政府多次提出抗议,^⑤俄方一概拒不回答。中国为了保持边境安宁,要求及早划定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中俄国界,但沙俄政府无视中国对蒙古的主权,一再拒绝中国方面的合理要求。一七一七年八月,康熙帝愤怒地指出:“因定议喀尔喀事,曾行文于察罕汗(即沙皇),今十余年,未尝回文”。^⑥在这个无限期拖延划界的政策的掩护下,沙俄继续不断地侵占中国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2卷,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书,第5页。直到一七二七年《布连斯奇条约》签订后,沙俄入侵者才被迫从该地撤走。

④ 约翰·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1763年格拉斯哥出版,第1卷,第316页。

⑤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85、95页。

⑥ 《清圣祖实录》,第273卷,第6页。

蒙古边境的土地,致使中俄关系日趋紧张。

二、义杰斯使华和沙俄对华经济掠夺

《尼布楚条约》第五条对中俄贸易作了原则规定。条约订立后,俄国商人蜂拥来华,沙俄对华贸易进入了迅速扩展的新时期。

长期以来,沙俄一直企图扩大对华贸易。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托博尔斯克通过中亚布哈拉商人的中介,即已和中国进行间接贸易。^①中叶以后,俄商开始经准噶尔和蒙古直接来北京贸易。^②与此同时,沙皇政府多次遣使来华,要求“自由通商”。一六八七——一六八九年戈洛文逗留西伯利亚期间,因发展对华贸易有功,曾受到沙皇“传谕嘉奖”。^③

彼得一世时期,沙俄更加迫切要求扩大中国市场,这是由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决定的。随着十七世纪全俄市场的形成,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富商巨贾为了追逐利润,要求不断扩大国内和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彼得一世穷兵黩武,国库枯竭,也迫切需要大笔战费。一七一一年,彼得一世在给枢密院的信中说:“尽力聚敛金钱,因为金钱是战争的动脉”。^④彼得一世采取的征收关税、出让

① 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物》,载苏联《苏联历史》杂志,1958年第1期,第105—124页。

② 同上书,第120—121页。

③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205页。

④ 《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9卷,第643页。转引自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169页。

专卖权、建立国家专卖企业等措施,都是为了扩充财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收入。同年,彼得一世发布敕令,修订一六四九年俄国“法令”,准许“社会各界人士”,只须交纳关税,都可“自由经商”。^①所以,斯大林把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活动看作是“帮助新兴商人阶级”,指出:“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②为了发展对华贸易,一六九七年十二月彼得一世曾专门发布命令说:西伯利亚各地统领如有阻挠商队去中国贸易者,将处以巨额罚金。次年二月彼得一世再次命令:俄商去北京贸易不必远道来莫斯科领取贸易证书,以免“浪费时间和遭受损失”。^③

彼得一世特别重视对华贸易,因为扩大中国市场对解决西伯利亚毛皮的销路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皮是当时俄国出口的大宗,中国较土耳其、波斯和欧洲各国更加邻近西伯利亚毛皮产地,运输便利,运价低廉,因此被视为俄国毛皮理想的销售市场。十七世纪末,由于北美皮货的竞争,欧洲市场皮货滞销,沙俄更加迫切地要求扩大中国的毛皮市场。正如俄国历史学者柯尔萨克所说:十七世纪下半叶,“从西伯利亚涌向莫斯科的皮货,使政府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政府以实物税的名义从西

①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169页。

②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3—94页。

③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170页。

伯利亚部落征收及以什一税名义从内地各关卡征收的大量珍贵毛皮，简直不知安置何处，因此必须设法寻求有利的销售市场。虽有相当数量的珍贵毛皮从俄国运销波斯、土耳其和供应国内的需要，但仍有大批毛皮在国内找不到任何用途。‘国库自然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数目众多的毛皮需求者，并且邻近西伯利亚，这对通商是极为有利的。俄国这个难题，因《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而消除了”。^①

从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到一六九七年，是俄国早期有组织对华贸易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以私商为主。

一六八九年十一月，《尼布楚条约》甫经签订，沙俄政府已忙着发给俄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证书。十二月，由菲拉季耶夫、鲁辛、乌沙科夫和尼基京四家俄国巨商的代理人组成的商队从尼布楚启程，经额尔古纳堡前来嫩江。直至一七〇三年这条路线是俄商来华的主要商路。^②

一六九一年，以普洛特尼科夫和卡札林诺夫为首的商队从尼布楚出发来华，售出皮货总值七千五百六十二卢布。一六九二年这个商队返回时换取了价值二万三千

①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1857年喀山出版，第18—19页。

② 亚历山德罗夫：《1689年尼布楚条约前俄中经济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历史》杂志，1957年第5期，第207页。

五百九十一卢布的中国货物。^①

同年，莫洛多伊和乌瓦罗夫率领五十三人的商队来华，运来皮货总值五千五百九十二卢布。一六九四年这个商队返回时，向尼布楚税关登记的中国货物，计值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卢布。^②

一六九六年，菲拉季耶夫的代理人和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商人来华贸易，输出毛皮总值四万九千三百三十三卢布。^③

一六九七年，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发放九份贸易证书，准许以克利莫夫为首的巨商代理人以及其他商人团体来华经商，售出皮货总值二万五千五百七十四卢布。^④

同年，菲拉季耶夫和尼基京的代理人以及乌斯丘格商人奥布霍夫等对华输出皮货总值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五卢布。^⑤

这个时期参与对华贸易的，除了上述莫斯科等地的几家大商号外，还有西伯利亚各地的统领、东正教士、中小商人以及许多军役人员。^⑥同一时期，随俄国使者从尼布楚来北京的沙俄商队先后计七次。^⑦例如一六八九年

① 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1961年诺沃西比尔斯克出版，第19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9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205页。

⑦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182页。

末，戈洛文派遣信使隆沙科夫来京，“随行者有八九十名俄国商人，带来六十大车兽皮。一六九一年返回时，运走中国货物（主要是丝织物）总值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四卢布”。^①此外，一六九一年八月从蒙古边境来北京的一名俄国使者，也有大约九十名俄国商人随行。^②

这一时期，俄商以尼布楚为对华贸易重镇，以北京为双方交易中心，向中国主要输出毛皮，从中国主要输入布匹。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一六九七年，俄国对华输出皮货等的总值已超过二十四万卢布，比俄国对整个中亚贸易的总值还大。^③利润率最高的年份达百分之四十八。^④

俄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获取的巨大好处，使沙俄政府十分眼红，它开始盘算把最有利可图的贸易项目，如珍贵毛皮等由政府垄断经营。在《尼布楚条约》刚签订时，伊尔库次克统领基斯梁斯基即曾建议政府，由国家经营珍贵毛皮的贸易。^⑤一六九二年沙俄政府准备实行这个建议。但为此必须进一步查明中国市场对俄货的需求和清政府对中俄贸易的态度。《尼布楚条约》对中俄贸易仅

① 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第192页。

② 荷尔德：《中国概述》，第2卷，第344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36页。

③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186页。

④ 同上书，第188页。

⑤ 亚历山德罗夫：《1689年尼布楚条约前俄中经济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历史》杂志，1957年第5期，第207页。

有原则规定,现在沙俄政府要求进一步商定具体办法,因此决定再派使节来华谈判。

这时正好有一个接近彼得一世的荷兰族大商人伊兹勃兰德·义杰斯,^①申请从俄国财政部预支三千卢布现金和价值相等的貂皮及其它兽皮,到中国经商,彼得一世立即于一六九二年二月批准义杰斯的请求,并命令他持沙皇的国书出使中国。俄国政府给义杰斯的训令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1)探明清政府对《尼布楚条约》和两国未定界的态度。

(2)关于两国在蒙古边境等地区的划界问题,应向中国大臣说明:因“尚未奉训令,不能同可汗(中国皇帝)陛下大臣们作出任何结论”。

(3)要求中国引渡居住在鄂嫩河畔的“俄国叛民”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释放俄国被俘人员。

(4)探明中国各地商品行情,外国商人来华经商情况,以及俄国货物在中国的销售情况。要求允许义杰斯“自由通行各城市并采购所需商品”。

(5)要求清政府拨地供俄国建造一座东正教堂。

(6)“侦察”黑龙江流域的情况。^②

^① 义杰斯生平详见卡札宁编:《义杰斯与勃兰德使华记(1692—1695)》,1967年莫斯科出版,第17、27等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68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68—169页。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训令还规定义杰斯应向中国官员“馈赠礼物”。

这个训令说明：第一，沙皇政府亟盼扩大中国市场，并搜集详细的经济情报。这是义杰斯此行的主要任务。第二，关于清政府在尼布楚谈判期间即已提出的划定蒙古地区北部边境中俄国界的问题，沙皇政府继续采取拖延态度，毫无解决诚意。第三，沙皇政府清楚地看到《尼布楚条约》对俄国的好处，因此，切望清政府一如既往继续履行条约义务。第四，沙皇政府首次提出在中国建造东正教堂的要求，这是沙俄企图伸张宗教势力的最初尝试。

义杰斯一行及其随带的商队共约四百人，于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离莫斯科，途经托博尔斯克、贝加尔湖、尼布楚、额尔古纳河、嫩江、张家口等地，于一六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到达北京。^①清朝礼待俄国使节，十一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亲自接见。由于沙俄对中俄蒙古边境划界问题又一次采取拖延态度，中方感到失望。尽管如此，清政府仍准许俄国商队在北京贸易，并允许义杰斯提出书面的商谈事项。义杰斯于是按照俄国政府的上述训令同清政府进行交涉。

一六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理藩院两次接见义杰斯。在二月二十八日给义杰斯的信件中，理藩院

^① 义杰斯：《从莫斯科到中国三年旅行记》，1706年伦敦出版，第14—60页。

就他提出的要求和其他有关事项通知他：（一）关于划分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中俄国界问题，中国政府曾“多次行文”俄方，俄国政府迄今未作答复，中国方面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要求俄方迅速来函定期择地会商划定该段国界。（二）中国不能接受俄国提出的送回“叛离”俄境的温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无理要求。“该处蒙古人往日原不属于贵方治下，该方国界既未经协议，亦未经划定，所谓属于贵方治下的蒙古人一项，亦不妨容后再议”。^①至于俄国被俘人员愿意返国的，“业经遣送回去，别无可言”。^②（三）中国不同意俄国侨民在中国建立教堂。“西洋各国来我国久居的侨民共有一所教堂，”并无继续“在我国领用地基建造教堂”之例，“此事碍难照准”。^③理藩院还通知义杰斯，今后俄国派遣使臣来华，人员限二百人；如由边境统领派出则限五十人。^④关于中俄贸易问题，理藩院的答复虽未涉及，但清政府在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已宣布一项规定：准“俄罗斯国贸易，人不得过二百名，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⑤不支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7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71页。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71页。

⑤ 据俞正燮《癸巳类稿》，俄罗斯馆在北京东城玉河桥西。见该书1833年刊本第9卷，第16页。

禀给，定限八十日起程”回国。^① 这项规定使《尼布楚条约》有关中俄贸易的条款更加具体化，实际上满足了沙皇政府的要求。

义杰斯在北京期间，向耶稣会士大量行贿，获得了重要情报，如：中国政府不会改变信守《尼布楚条约》的立场；中国已在嫩江架设大炮，加强防卫，并将在额尔古纳河和精奇里江筑城等等。他还从耶稣会士处得到有关对华贸易的重要情报。^②

义杰斯及其随带的商队在北京逗留期间，进行了商业活动。商队货物中，国库的值四千四百卢布，私商的值九千六百余卢布，义杰斯本人的至少值三千卢布。这些商品通过不等价交换在北京换得大批中国货物，用二十七匹骆驼和十四马驮载回国，其中属于国库的值一万二千卢布，私商的值二万五千九百余卢布，还不包括义杰斯本人的货物在内。^③

完成出使中国的任务后，义杰斯一行于一六九四年三月一日离京回俄，一六九五年二月返抵莫斯科。这次使华为进一步扩大俄国对华贸易开辟了道路。经过积极筹备，沙俄政府于一六九八年首次派出以梁古索夫和萨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2卷，《俄罗斯馆考》。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74页。

③ 库尔茨：《十七世纪俄中贸易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8年第23—24期，第335—336页；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第193页。

瓦齐耶夫为总管的国家商队前来北京。从此俄国早期对华贸易进入了新阶段。

从一六九八年起,沙俄对华贸易以国家商队为主,但允许私商加入。清政府虽有商队人数不得超过二百名、三年来京一次的规定,但俄方并不遵守,如一六九八——一七一八年的二十年间,俄国来华商队即达十次,每次人数也往往超过二百人,最多时竟超过八百人。^①除官方商队前来北京贸易外,俄商借递送公文之机,零星前来贸易者更从未间断。他们最初取道尼布楚、嫩江商路来京,一七〇六年改走距离较近的蒙古、张家口商路。^②

对华贸易给俄国国库和商人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六九八年梁古索夫商队运来值三万一千三百卢布的皮货,换回的中国货物值六万五千卢布。一七〇〇年的勃科夫商队运来皮货值三万二千三百卢布,换回的货物值七万六千卢布。^③一七〇六年奥斯科尔科夫商队获利五万五千卢布;一七〇八年胡佳科夫获利更高达二十七万卢布。^④另据楚尔科夫《俄国商业史志》一书估计:“一个商人在莫斯科贷出一千卢布或同价值的皮货,从北京换回的货物在莫斯科可值六千卢布。……如果加上商队在北

① 《故宫俄文史料》,第7号,第279—281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60、173页。

③ 库尔茨:《十七世纪俄中贸易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8年第23—24期,第337—338页。

④ 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第196—197页。

京的食住费用由中国政府津贴，国库不付一文，那么赢利更加可观了”。^① 据不完全统计，沙俄商队运来中国的皮货总值，一七一六年比一六九八年增长七倍多，可见获利总额相当惊人。^②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③ 在华俄商就是通过不等价交换从中攫取暴利的。例如一七〇六年北京和西伯利亚的皮货差价：北京的黑貂皮价格是西伯利亚的三倍，松鼠皮五倍到七倍半；红狐皮三又三分之一倍到六倍。^④ 这样高价的毛皮只能供中国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的享用。“因为在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一切供人享受的财富，也只有那些有商人前来和他们交易的剩余产品的主要所有者，奴隶主，封建主，国家（例如东方的专制者），有资格可以问津”。^⑤ 上述俄商的高额利润主要是通过重新分配中国地主阶级从劳动者掠夺来的剩余产品实现的。

俄商从中国掠夺的暴利，一部分归沙皇国库，余下部分转化为商人资本。商人资本是**“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⑥ 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大多是依赖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奴隶买卖。而在俄国，这个过程的进行除了依赖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外，还依

① 转引自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23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4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69页。

④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199、290—291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0页。

⑥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8页。

赖对中国等亚洲邻国进行掠夺性的贸易，其中主要是毛皮贸易。苏联学者卡希克也承认：“对华贸易是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来源”。^①可见，俄国商人资本是部分依靠吮吸中国劳动者的脂膏而肥胖起来的。马克思指出：“处在优势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夺的制度”。^②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揭露沙俄早期对华贸易的掠夺性质，是完全适用的。

彼得一世贪得无厌，并不满足于北京一地的贸易。一七一一年，他曾下令派商队到青海和西藏等地，但未成功；^③他甚至打算在广州开辟新的市场。^④

应当指出，沙俄还公然在中国进行罪恶的奴隶贸易。一六九四年，俄国使臣义杰斯在归途中贩运一百五十个我国蒙古族人充当奴隶，每个买价二十至三十卢布。^⑤沙皇政府见奴隶贸易有利可图，于一六九七年九月十一日命令托博尔斯克统领将此项交易收归“政府专办”，不许私商插手。^⑥一六九九年六月间，西伯利亚俄国地方当局曾派人与雅美谢夫湖畔的我国准噶尔族人会谈“奴隶买卖事项”。^⑦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俄国人贩子常用四、五匹

① 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第19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0—371页。

③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20—21页。

④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147页。

⑤ 同上书，第198页。

⑥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73页。

⑦ 同上书，第74—75页。

绸缎向我国蒙古族人购买汉人当奴隶，有时买一个汉人“比买一匹马还便宜”。^①沙俄在中国从事贩卖人口的勾当，要比西方殖民者早一百多年。

为了侵略的需要，一七一〇年俄国政府任命来华商队总管胡佳科夫为“商务专员”，并授予他裁判中俄商人纠纷的“权力”。这一蓄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挑衅行动，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一七一二年，中国理藩院曾致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②这一事件证明，早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多年，沙俄就已企图从中国攫取实质上是领事裁判权的侵略特权。

沙俄贪图暴利，不顾清政府关于中俄贸易的规定，频频派遣商队来华，致使北京市场皮货大量过剩。一七一七年八月，理藩院在致加加林的信中曾指出：“查我国京城商贾云集，毛皮堆积如山，作坊充斥，毛皮实属滞销”，“若尔等来货频仍，我国商人既不能将已有之货售出，又如何能购买尔等之货物？”^③清楚地说明了供过于求的情况。但清政府对俄商屡次违约贸易，一直抱克制容忍态度。它希望通过贸易让步，争取沙俄同意划定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中俄国界，建立两国间的正常关系，防止沙俄在我国北部边境从事颠覆和侵略活动。但是，由于沙俄始终坚持经济掠夺和领土侵略双管齐下的对华政策，清政府的

①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198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172页。

这一愿望不能实现。最后,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一七一七年十月,理藩院致函加加林,正式通知俄方“嗣后数年勿再派遣俄商来京”,在此期间可于边界地方贸易。^①实际上这就是宣布暂停中俄贸易。一七一八年,俄国要求清政府准许以伊斯托普尼科夫为总管的商队入境,理藩院于一七一九年六月复信,予以拒绝。

三、伊兹玛依洛夫使华和中俄贸易的中断

清政府提出暂停中俄贸易后,沙俄政府焦急不安。为了保持并继续扩大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彼得一世决定就这一问题同中国重开谈判。

一七一九年四月十日,彼得一世派禁卫军上尉伊兹玛依洛夫^②为特使携带国书前来中国,随行人员包括使团秘书郎克,^③特使秘书格拉什诺甫、苏格兰医生贝尔,^④修士大司祭普拉特科夫斯基,以及卫队、测绘员、译员等共八十余人。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82页。

② 伊兹玛依洛夫曾奉彼得之命在丹麦军队中学军事,回俄国后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禁卫军任上尉军官。一七一〇年又奉命到丹麦担任一项外交使命。参阅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83页。

③ 郎克是在沙俄政府中服务的瑞典籍工程师,一七一六年曾随古谢特尼科夫商队来过中国,他在使团的地位仅次于伊兹玛依洛夫,在这次中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④ 约翰·贝尔于一七一四年从英国来彼得堡。他著有《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一书,叙述了随同伊兹玛依洛夫出使中国的经过。

伊兹玛依洛夫启程前，俄国外交委员会和商务委员会分别颁发了极详尽的训令，^①指示他设法通过谈判为俄国谋取广泛的商业和政治权益，其所负侵略使命的重大，远远超过了义杰斯使团。

就贸易方面说，沙皇政府指示伊兹玛依洛夫应要求增加商队来华贸易次数，达到一年一次；俄商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受限制；俄国人得在中国全境自由经商；准许俄国人进入中国内河和沿海各口岸，人数不限；俄商到中国贸易一律免纳进出口等税。^②沙俄政府授权伊兹玛依洛夫，按照这些条件同中国缔结“自由通商条约”。这就是说，沙俄政府要求中国全部领土向俄国商业资本开放，供其无限制地进行经济掠夺。

与攫取贸易权益同时，训令还指示伊兹玛依洛夫设法获准在北京设立领事馆，并在各省设置副领事。领事除了负责处理俄国在华商务外，还应向俄国政府经常提供情报，“在此等情报中，不仅包括有关商情，并应包括国家各项机要事项”；^③商务委员会的训令还规定所有俄国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86—88、425—433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86页。

③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510页。关于商务委员会给郎克的训令，班蒂什—卡缅斯基所记颁发训令日期是一七二五年，其实这个训令是一七一九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时，商务委员会颁发给使团秘书郎克的；后来一七二五年郎克随俄国使臣萨瓦再度来华时，商务委员会又将这个训令重新颁发给他。参看商务委员会致外交委员会的备忘录（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507—508页）。

臣民到中国后，应将沿途情况写成书面材料，由领事转报商务委员会。^① 沙俄企图大规模、有组织地在中国搞情报活动，这应算是开端。

沙皇政府还公然要求伊兹玛依洛夫设法从中国取得广泛的领事裁判权。训令指出，领事应有权处理在华俄国人彼此间一切纠纷，俄商犯罪，领事有权裁决，并将其押送回国。^②

另外，关于军事方面，训令要求伊兹玛依洛夫应注意刺探有关中国的部队人数、武器和设防情况，^③ 密报沙皇政府。

应当指出，沙俄一方面企图从清政府取得上述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另一方面在训令中对中国迫切要求解决的中俄蒙古边境划界问题和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的问题，完全避而不谈，坚持掠夺中国领土的方针。这种狂妄的侵略野心，决定了这次谈判不可能达成重大协议，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一七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伊兹玛依洛夫一行携带大批皮货和供行贿用的“礼品”离开彼得堡，途经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穿过蒙古，取道张家口，于一七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在离开伊尔库次克之前，伊

① 斑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 510 页。

② 同上书，第 509 页。

③ 同上书，第 87 页。

兹玛依洛夫又接到沙皇训令，指示他再次请求清政府准许伊斯托普尼科夫商队进入中国。

伊兹玛依洛夫在北京逗留三个多月，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礼遇，康熙帝曾召见十余次。一七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二次召见伊兹玛依洛夫时，康熙帝明确表示中国的和平愿望，说：“朕始终欲与贵国皇帝陛下保持巩固之和平。且我两国岂有必争之理乎？……两国皆有许多土地，战争究于两国有何利益？”^①康熙帝同时严正地向伊兹玛依洛夫指出，中俄两国在蒙古方面的边界至今未曾划定，中方曾为此给俄国写过许多信件，但都没有得到答复。伊兹玛依洛夫诡称：“沙皇陛下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推说回国后将向沙皇报告。^②

从一七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一七二一年三月十三日，伊兹玛依洛夫和中国官员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清朝允许郎克在使团返回俄国后，以俄国代理人名义暂留北京，由中国政府供给食住；俄国商队今后须持有中国官员与伊兹玛依洛夫共同盖章的证书，否则不许入境。关于缔结中俄通商条约的问题，中方指出，在划分中俄蒙古边界和交还越境边民问题获得合理解决之

① 佩热姆斯基、克罗波托夫合编：《伊尔库次克编年史》，1911年伊尔库次克出版，第19页；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4—95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5页。

前,中国不能考虑缔结此项条约。^①中方代表还强烈谴责沙俄在库苏泊畔强建堡砦侵占蒙古土地的行径。^②中国对俄国沿额尔齐斯河建筑要塞表示关切,并声明中国也准备在该处建筑要塞。

一七二一年一月十三日,理藩院通知伊兹玛依洛夫有七百余名中国蒙古族边民在俄国煽动下逃入俄境,要求俄方予以遣返。伊兹玛依洛夫答应建议西伯利亚总督遣还中国边民,但以中国允许伊斯托普尼科夫商队入境为交换条件,清政府对此表示同意。^③

伊兹玛依洛夫在谈判结束后于一七二一年三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回国。临行前,康熙帝在致沙皇的信件中再一次指出,必须划定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中俄国界。^④同时,康熙帝在伊兹玛依洛夫辞别觐见时明确宣布,他准许郎克以俄国代理人身分暂留北京,同时期望伊兹玛依洛夫回国后说服沙皇送还上述越境逃犯;“如不能立即办到,他不仅将遣回该代理人,而且将不再接待俄国商队,直至此项要求完全获得满足为止”。^⑤

一七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伊兹玛依洛夫到达色楞格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③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91页。按:根据协议该商队于一七二一年十月到达北京。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8页。

⑤ 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第2卷,第306页。

斯克,在该地见到前来交涉遣返越境逃犯的中国使者,伊兹玛依洛夫自食前言,借口“来奉政府指示”,^①把遣返一事推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清政府连续三次派遣急使前往色楞格斯克交涉遣返事项,均无结果。沙俄这种蛮横态度,激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愤慨。

伊兹玛依洛夫归国后,郎克继续留在北京一年零五个月。他违反清政府规定,明目张胆地进行间谍活动,^②搜集中国和朝鲜、日本等邻国进行贸易的情报,刺探清军讨伐准部叛匪的军情。清政府加以制止,郎克竟狂妄地以战争相威胁,说俄国同瑞典的战争即将结束,那时,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沙皇把军队调到东方来”。^③

在此期间,沙俄还在我国西北地区加紧进行颠覆活动,妄图诱迫准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臣服”俄国。这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政府忍无可忍,于一七二二年四月宣布驱逐库伦俄商,暂停中俄贸易,随后又通知郎克,在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和越境边民问题妥善解决以前,郎克等人不得继续在中国居留。七月,清政府命郎克和伊斯托普尼科夫商队离开北京。十月,拒绝沙俄派遣来华的库尔齐茨基主教入境。一七二三年二月,因清军俘获的准部叛匪四十名逃往俄境,中国派官员到达伊尔库次克,要求引渡,没有获得结果。因此,当一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9页。

②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198页。

③ 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第2卷,第300页。

七二四年以特列季亚科夫为首的俄国商队要求入境时，清朝政府断然加以拒绝。

中俄贸易关系的中断，使沙俄开始看到局势的严重性，迫使它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态度问题。一七二二年八月初，彼得一世发布谕旨，宣称愿意按照《尼布楚条约》的规定，处理中国越境边民问题。一七二四年三月，俄方通知清政府官员，准备遣返八十四名越境的蒙古边民。一七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沙皇政府宣布派遣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为全权大臣来华就两国贸易和划界问题举行谈判。

第二节 萨瓦使华和《布连斯奇条约》、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关于划分中俄在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国界问题，中国方面从一六八九年多次向俄方建议举行谈判，均遭拒绝，前后拖延了近四十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此期间，沙俄利用边界未曾划定的状况，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纠纷，继续蚕食蒙古土地。为了防止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北部领土，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清政府在一七二二——一七二四年中俄贸易关系中断期间，仍积极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因此，一七二四年三月俄方通知准备遣返边民八十四人时，清政府立即于同年七月特派一等公鄂伦岱和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前往边境，会见驻色

楞格斯克负责对华事务的俄国官员郎克，再一次建议两国就划定边界和引渡越境边民问题订立新约。^①当时彼得一世担心中俄边界问题长期拖延不决，将使俄国对华贸易受到更大影响，加上沙俄同瑞典、波斯连年作战，兵力和财力消耗很大，不允许再在中国边境搞军事冒险。同时，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逐步加强了蒙古地区的边防，彼得一世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表示愿意接受清政府的建议，准备派遣使节来华谈判。一七二五年一月彼得一世病死，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一七二五——一七二七年）继位。她根据彼得一世生前的意图，决定借祝贺雍正帝（一七二三——一七三六年）登极和宣布她本人即位的名义，派遣一名高级官员来华进行谈判。同年三月十四日，俄国政府向色楞格斯克的郎克发出指示，命令他把上述决定通知清政府。^②

一七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沙皇政府正式任命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③伯爵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10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08页。

③ 全名是萨瓦·卢基奇·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萨瓦是中国的习惯译名。他是波斯尼亚公爵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后裔，他的父亲从土耳其辖境逃居拉古礼（在今南斯拉夫的杜勃罗夫省内）后，复姓拉古津斯基—务拉的思拉维赤（或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萨瓦曾在君士坦丁堡经商，兼任彼得一世的秘密代理人，受到彼得赏识，被任命为内廷顾问官。

随同使华的有秘书格拉什诺甫,郎克,使团卫队头目布霍列茨中校,主持边界测绘的宫廷内侍阔留赤甫,帝俄科学院的测绘员及东正教士等正式工作人员一百二十人,卫队一千五百名。使团经费共约十万卢布,^①其中三千卢布作为贿赂中国官员的“礼品”费。^②

一七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沙俄外交委员会向萨瓦发出四十五条极详尽的训令,商务委员会也于同时颁发二十条训令,^③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恢复俄中贸易,缔结通商条约。这是使团的中心任务。训令指示:俄国使团在谈判中应要求恢复商队贸易,准许特列季耶科夫商队随同使团进入中国;俄商享受免税待遇;俄国有权在北京设置商务领事(仍由郎克担任);准许俄商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不限人数;等等。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使团应“利用一切手段和一切可利用的人的帮助”,特别是争取西方国家在华耶稣会士的帮助,而以允许他们的人员和信件自由通过西伯利亚为报酬。上述各项要求如此广泛,甚至萨瓦也认为难以实现。他向外交委员会指出,《尼布楚条约》只规定两国商民可以贸易互市,并没有允许俄国商人在中国一切地方通行无阻,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08—109、110、114页。

②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1969年美国出版,第29页。

③ 沙俄外交委员会和商务委员会给萨瓦的训令全文,分别见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34—455、469—483页,并参考第114—118页。

2
2
2
2
2

俄国的要求必将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对。^①他还估计中国不可能接受俄国免税贸易的要求，因为征收商税在任何国家包括俄国都是理所当然的。^②此外，训令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责成使团秘密搜集英、法、荷、葡等国在广州贸易的情况，包括贸易项目、商品价格、以及广州北京间水路运输费用等，表明了沙俄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争夺中国市场的露骨打算。^③第二，指示使团调查中日贸易情况及俄国取道黑龙江与日本通商的可能性。^④这就又一次说明，沙俄在《尼布楚条约》缔结后不久，即已蓄有重新染指我国黑龙江的野心。

（二）关于划界问题，沙俄外交委员会指示：使团在途经西伯利亚和在当地逗留期间，应竭力收集有关俄中边境地区的情报，及早绘制一幅边境地图，“明确指出一切必须归于俄罗斯的地区”，及其“对俄罗斯帝国有何利益”，详尽呈报，以作为与中国交涉的依据；在谈判中，“全

① 往后的事实证明，萨瓦这种估计是不无根据的。清政府在谈判中曾对沙俄无限扩张贸易的要求严予驳斥，指出：“俄国人欲在我大清帝国到处出现，在全国各江河行船，在全国各城市设立领事机构，这怎么能允许呢”？如果那样，“中国实际上成为你们的中国了”。见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31页；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47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71、475页。

③ 同上书，第119、479—481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91页。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19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92页。

权大使应运用一切有效方法，力求延迟划定国界，拖延愈久愈好，尽可能赢得时间”，以便俄国政府可以接到上述地图及说明，作出划界的最后决定；必须占领一切有价值的土地和城市，尤其是金银矿区和战略要地。^①这说明沙俄自始便缺乏合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诚意，阴谋通过划界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此外，训令还指示使团，在谈判中应反对中国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要塞，说什么“因为该河是在俄国领土上”。萨瓦请示说：如果额尔齐斯河全部在俄国土地上，那么反对是可以的，但如该河上源在准噶尔领地上，那怎么能反对？对此，外交委员会承认：“额尔齐斯河上源和斋桑湖是在珲台吉（指策妄阿拉布坦——引者）的领地上”，但又狂妄地宣称，“女皇陛下禁止”中国政府在该地修筑要塞。^②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中国在准噶尔地区的主权，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三）关于传教问题，训令指示：使团应尽力设法携同库尔齐茨基主教及其随行教士等秘密进入中国，并请求清政府允许他们在北京自由居住，主持教务，并“不受限制地”到中国“其他地方探望自己的教徒”。^③如不能做到，可把主教等留在边境，但最低限度使团应设法获得在北京修建一座东正教堂的权利。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36、447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11、187—188页。

② 萨瓦的质疑和外交委员会的答复，见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65—467页，“问题第十一”。

③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54页。

(四)关于交还被沙俄裹胁赴俄的中国边民问题,训令指示,除已商定由郎克在边境交还的八十四人外,一概不予遣返;但若因此影响到有关贸易的谈判,也可另行考虑。

除上述指示外,沙俄外交委员会还给使团布置两项谍报任务:一项是侦察从边境到北京之间的山川形势、物产资源和各城市设防情况,包括部队数量和武器装备;另一项是到达北京后,应注意收集当地的军政情报,并调查中国和邻国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总的说来,萨瓦在扩展商务、宗教势力等方面的任务和伊兹玛依洛夫的任务大同小异,但他奉命必要时可同中国谈判划界问题,这又和伊兹玛依洛夫的使命有极重要的不同。不过,这丝毫也不意味沙皇政府甘心放弃既定的侵华方针。往后的事实证明,它不仅力图继续占有已侵占的蒙古土地,而且还企图通过谈判攫取更多的中国领土。

一七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俄国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经托博尔斯克等地,于次年四月十六日到达伊尔库次克。萨瓦在逗留该地期间着重安排了中俄边境地图的绘制工作。在此以前,西伯利亚总督多尔葛鲁基伊曾遵照沙俄外交委员会指示,绘制了一份,但萨瓦对此并不满意。一七二六年五月十一日,他又派遣测绘员分组进行第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56页。

二次“勘查”：一组“勘查”伊尔库特河、库苏泊、萨彦岭、叶尼塞河上游以及阿巴根山脉；另一组“勘查”格尔必齐河到乌第河以达于海的山区；“勘查”结果应分别绘制详图，并附关于这些地区的自然地理、人种志以及当地各民族与俄国的关系的报告。测绘工作限期两个月左右完成。^①萨瓦精心安排的这项活动，使沙俄得以编造种种“根据”，向中国“提出完全有利于俄国”^②的划界方案。

在萨瓦一行东来的同时，一七二六年三月五日郎克派遣秘书把有关萨瓦任全权大使的通知送来北京。在此以前，清政府已积极准备同俄国进行边界谈判。一七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雍正帝颁发谕旨说：“现今鄂（俄）罗斯国为定边界之故，差使前来。隆科多候伊使到日，即将定边界之处会同议结”。^③四月二十八日，理藩院在复书中宣布派舅舅隆科多和散秩大臣四格前往边境迎接俄国使臣。九月一日，萨瓦离开伊尔库次克，四日到达离恰克图十俄里的布尔河，和隆科多、四格相晤。隆科多告知萨瓦说，本应立即就地进行边界谈判，但因俄使兼有祝贺新皇登极的使命，因此同意他先去北京。萨瓦要求允许商队和库尔齐茨基主教随同使团前往。隆科多以未奉谕旨加以拒绝。九月中旬，萨瓦由四格陪同动身前往北京，隆科多则留在边境等待俄国使团回来商谈划界问题和其他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7页。

③ 《清世宗实录》，第40卷，第25—26页。

事项。^①

萨瓦于一七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至次年五月四日在北京逗留期间,和清政府代表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三人^②会谈三十余次,先后提出的条约草案共达二十个。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③焦点是划界问题。萨瓦遵照沙俄政府力求拖延划界的方针,最初采取回避态度。清政府方面则坚决要求沙俄停止对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共同划定边界,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此,俄国全权使臣一面施展贼喊捉贼的讹诈手段,反诬清政府窝藏俄国“逃民”,^④甚至说什么清政府“侵占”了蒙古阿勒坦汗的土地,而后者“臣属”俄国已达百年之久,等等;另一方面他又虚声恫吓说,如果不满足俄罗斯帝国包括通商在内的一切要求,那么,他将不仅拒绝进行划界谈判,而且将要求“收复”因缔结《尼布楚条约》而“丧失”的黑龙江地区。^⑤察毕那等对这些谬论进行了严厉驳斥,并指出:俄国窝藏的中国越境边民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24—125页。

② 松筠:《绥服纪略》,见《朔方备乘》,第46卷;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29页。

③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29—136页;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第246页。

④ 指一六八八年噶尔丹和喀尔喀蒙古作战时被沙俄诱骗投奔沙俄,战事结束后又逃回的七个蒙古台吉。参看札尔金德:《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外贝加尔西部地区历史片断》。

⑤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30页。

数达六千余人，^①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人从中国蒙古地区夺去大片土地，这些地方理应归还中国。察毕那等主张俄方必须首先归还沙俄窝藏的中国越境边民和划定两国边界，然后再商谈贸易和其他有关事项。萨瓦顽固坚持在其他事项未获协议前，不能考虑划界问题。双方反复争论，相持不下。

清政府为了打开谈判僵局，主动在贸易等问题上作出让步。一七二七年四月一日，双方约定暂不在北京签订条约，但就原则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十条，主要是：一、乌第河地区未定界问题，日后另行议定；二、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中俄国界由两国代表在边境商谈划定；三、中国允许俄国商队每隔三年自费来北京贸易一次，商队人数限二百人；四、在两国边境设立两个贸易点，进行经常的贸易；五、中国允许俄国派遣东正教教士三名来北京，并拨给地基供俄国人建造一所教堂；六、今后两国越境边民应按《尼布楚条约》的规定互相引渡；七、两国应接待对方派来的外交代表，不予阻难，中国理藩院和俄国枢密院（萨那特）为两国互换文书的机关。^②从上述协议可以看出，沙俄在议定边界之前即从中国获得了许多权益，而清政府希望首先解决的划界问题，实际上仍旧悬而未决。

萨瓦在逗留北京期间，遵照沙皇政府的训令，曾经同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15—116页。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原名巴雷宁）神父紧密勾结，进行了一系列卑劣的特务活动。早在离彼得堡之前，他即弄到了法国驻俄大使给巴多明神父的介绍信；途经伊尔库次克时，他用意大利文书写密信，请求巴多明在刺探情报方面给予协助；到北京后，又与巴多明密谈，确定了秘密联系的方式。虽然巴多明这时已失去雍正帝的宠信，但萨瓦通过他买通了深悉内情的清朝大学士马齐。这个民族败类竟把清政府的有关决策和动向“全部告诉了萨瓦”。^①萨瓦后来洋洋得意地报告沙皇政府说：“当我在北京逗留期间，通过耶稣会的神父们，并利用礼物，找到一些善意的人。……在这些人中，现任大学士马齐——即在我以前的报告中所指的那人——给我很大援助，并答应今后继续协助我。我通过商队给他送去一千卢布的皮货作为礼物，并给中间人巴多明神父一百卢布”。^②恩格斯曾经指出：俄国实行的是“**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③萨瓦的卑劣行径就是一例。

一七二七年五月四日，萨瓦离开北京。动身以前，他同巴多明“建立了密码联系”，以便继续获得情报。五月二十一日，萨瓦在前往边境途中颇为高兴地报告沙皇政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15页。按：萨瓦为此在离京前曾“答应从边境上给他（马齐）送去二千卢布的礼物”。见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38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94页。

③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8页。

府说：中国“热望和平”，而且“远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强大”；两国全权大臣即将在中俄边境签订最后确定的条约，“看来事情会是很顺利的”。^①

六月二十五日，萨瓦一行到达布尔河。当时俄方已在该地扎营，并以护卫使团的名义“调集了军队”。^②萨瓦凭借这支兵力，强硬要求谈判必须在布尔河畔举行，国界也必须通过这一带地方。清朝使臣对俄方的蛮横态度深为不满，提议改在苏布赫图举行会议，但萨瓦坚决不同意。最后中方为了不使谈判夭折，在这个问题上表示让步。^③这时，俄方的地理“勘查”和地图绘制工作已经结束，掌握了详细的资料，完成了谈判、划界的准备。

七月三日，中俄双方在边境继续谈判。中方代表有隆科多、策凌、四格、图理琛四人。俄方代表以萨瓦为首，参与谈判的有郎克、阔留赤甫和格拉什诺甫。在谈判过程中，隆科多要求俄国归还所侵占的大片蒙古土地，态度坚决，毫不退让。萨瓦一面收买蒙奸噶尔丹，^④大量窃取中方的机密情报，一面加紧建造要塞和哨所，将托博尔斯克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16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25页。

③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39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25—126页。

④ 此人系蒙古台吉，一六八八年曾叛逃俄国，和准噶尔头目噶尔丹不是同一个人。萨瓦密允给噶尔丹终身年金二十卢布，见萨瓦呈外交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95页。

的卫戍团调到边境，并且公然以战争相威胁，扬言“俄国在欧洲的战争已告结束，现在可以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另一方面的边界了”。^①与此同时，巴多明和马齐也在北京积极活动，力图劝说清政府让步。雍正帝在得悉边境情况后，不愿谈判破裂，决定对俄退让，于一七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颁发谕旨，借故将隆科多撤回，改派克什图前往，与四格、图理琛一起参与谈判。^②隆科多离开后，因克什图未至边境，由策凌暂充中方首席代表。他处处对沙俄表示退让，谈判从此急转直下，迅速按照俄方所提出的划界方案达成了协议。

八月三十一日（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中俄双方签订界约，因订约地点在布尔河畔，所以叫做《布连斯奇条约》。条约有满、蒙、俄、拉丁四种文本。代表俄方签字者为萨瓦和格拉什诺甫，中方为策凌、四格、图理琛。《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第一个鄂博^③为起点，由此向东至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北部归俄国，南部归中国。“所有山、河、鄂博，何者为俄属，何者为中国属，各自写明，绘成图说，由此次两国派往划界各员互换文件，各送全权大臣查阅”。条约签字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39—140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18页。

② 《清世宗实录》，第58卷，第14—15页。

③ 鄂博，蒙古语，是我国蒙古族各部落用以标示牧地界限的石堆，此处作为中俄两国分界的标志。

后，策凌于十月六日向雍正帝奏报订立《布连斯奇条约》的经过。^①萨瓦也将订约经过报告沙俄外交委员会，并得意洋洋地说：这次谈判成功是由于“隆科多的被召回，巴多明和马齐所供给的情报，噶尔丹的服务，而最后则是中国方面因担心事情不得解决而引起的恐惧，以及布霍列茨手下兵士和俄国所修建的第一批堡垒所造成的良好效果”。^②

《布连斯奇条约》签订后，中俄双方即派出界务官，分组前往恰克图迤东和迤西，划定地段，勘分国界，设立界标，订立界约。格拉什诺甫会同瑚毕图、那彦泰前往东部，阔留赤甫会同四格、宝福和额尔布坦前往西部。在勘分过程中，俄方进一步将一些原属中国的土地划入沙俄版图。例如，在东部勘界的格拉什诺甫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日向萨瓦报告说：这次划界，将最好的产貂地区楚库河上游约三百俄里的土地划归俄国，“给俄罗斯帝国带来莫大的好处”。^③阔留赤甫在西部勘界的情况大致相同。“这样，（萨瓦）大使在四十八次会议中未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已由界务官全部得到了，和蒙古建立了四千俄里有利而固定的边界，并增加了二百零五户的貂皮纳贡者，得到了《布连斯奇条约》中没有规定、甚至给大

① 《清世宗实录》，第60卷，第22—23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18页。

③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47页。

使的训令中也没有规定要得到的土地。”^①勘界结果，双方分别订立了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雍正五年九月九日）和中俄《色楞额界约》（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七日，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东面设置了六十三个界标，在西面设置了二十四四个界标。

《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为订立两国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相互关系的总条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雍正五年九月七日），清政府根据双方四月初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和八月底在布尔河畔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拟就了这个总条约的草案，经雍正帝批准后，于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北京把它送达边境，但萨瓦挑剔其中个别条款与原议“不完全相符”，拒绝接受。他一面立即写信指示正在北京的郎克与清政府交涉修改，一面继续在恰克图修筑要塞，加强战备，向中方施加压力。次年六月，中方送来了经清政府签署的新的约本，萨瓦阅后没有异议，两国全权使臣遂于一七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恰克图正式签字互换，这就是《恰克图条约》。^②

《恰克图条约》有满文、拉丁文、俄文三种文本。约文共分十一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边界方面，条约第三条作了与《布连斯奇条约》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48页。

② 同上书，第154页；俄国外交部编：《俄中条约集（1684—1881）》，1889年彼得堡出版，第50—60页，下引约文均据俄文本汉译。

内容相同的规定，换言之，《恰克图条约》包括了《布连斯奇条约》。双方并互换边界地图和关于边界地形的说明。^①此外，条约还重申《尼布楚条约》第一条的规定，“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第七条）。

二、贸易方面，条约规定俄商“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超过二百人，每间三年去北京一次”。贸易“均不取税”；除俄国国营商队来北京通商外，“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者，可在尼布楚和色楞格之恰克图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房屋、墙垣和栅子”，作为贸易市场（第四条）。一七二八年下半年，俄国在恰克图建造市场，同时，清政府在紧靠恰克图的中国边境建买卖城，作为两国贸易的商埠。

三、宗教方面，条约规定北京俄罗斯馆今后“仅由来京之俄人居住”。中国协助在该馆内建造东正教堂。除原住北京的东正教教士（称喇嘛）一人外，准许补遣教士三人，来京后居住俄馆，照向例供以膳食。此外，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满、汉文，居住俄馆，“由俄皇皇室供其膳费”（第五条）。

四、关于越境人犯问题，条约规定，“前越界者容其留于原处，不再归还。嗣后之逃犯，则绝不容隐，两边皆应严行查拿，各自送交边界官员”（第二条）。逃兵、逃犯、越境行窃、杀人者和其他逃民按不同情节依法判罪（第十条）。

^① 加恩：《新档》，第164—165、173—174页。转引自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44页。

以上是《恰克图条约》的基本内容。

通过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俄国得到如下的明显好处：

第一，条约在领土方面“给俄国以相当可观的利益”。^①沙俄除了把已侵占的我国蒙古土地划入俄国版图外，^②还通过划界占领了蒙古地区更多的土地，把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都划入俄国的版图。关于这一点，萨瓦本人和许多沙俄历史学家都直认不讳。一七二七年九月二日，即在《布连斯奇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郎克和使团其他官员向俄国政府递送一份“证词”，证明《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证词中说：“现今俄国人在所有县份向蒙古境内伸展土地达数日行程，某些地方达数星期行程之远，现今界碑的设置令人满意，边界的划分，使俄罗斯帝国的国土扩大了”。^③又说：“在许多地方，大量的蒙古旷地，现已并入俄罗斯帝国”。^④有些白俄学者如巴夫洛夫斯基之流断言《布连斯奇条约》使俄国损失了土地^⑤，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对此，美国福斯特指出：“就划界而论，萨瓦超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23页。

② “根据俄中一六八九和一七二七年和约，俄国征服的外贝加尔地区才正式归它所有”。见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1分册，第168页。

③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344页。

④ 同上书，第345页。

⑤ 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第23—24、29页。

额完成了他的任务；他保存了训令中认为必要保存的那些地区。如果说谁有理由对界线表示不满，那么不是俄国人，而应该中国人”。^① 十八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班蒂什—卡缅斯基写道：“边境居民（指蒙古边境的哥萨克殖民者）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条约（《布连斯奇条约》）不仅没有使他们的各村屯缩小，相反地扩大了很多，给俄国带来不少好处”。^② 十九世纪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也指出：“在布尔河畔缔结的条约，对俄国是非常有利的”。^③ 话说得如此明白，不需要附加任何解释了。

第二，俄国不仅恢复了对华的商队贸易，更重要的是，从一七二八年八月一日开始在恰克图进行的两国边界贸易，后来得到迅速的发展，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十八世纪后半叶，通过恰克图进行的中俄贸易占俄国整个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占俄国对亚洲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一七六〇年对华贸易的关税占俄国总关税的百分之二十点四，一七七五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由于恰克图贸易的发展，西伯利亚城市的人口也迅速增长，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的人口分别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和

①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 56 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 俄 中 外 交 资 料 汇 编》，第 141 页。

③ 索洛维约夫：《俄国通史》，第 10 册，第 19 卷，1963 年莫斯科出版，第 193 页。

百分之三十一·二。^①这在客观上为下一世纪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准备了条件。

第三，《恰克图条约》给予俄国东正教以在北京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利，沙俄的侵略势力从此进一步渗入中国。关于沙俄利用东正教侵略中国的事实，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叙述。

《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正式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边界)。由于当时两国的实力大体相当，沙俄不敢任意违反条约，因而对它对沙俄进一步侵吞蒙古土地的野心起了某种遏制作用。一七二七年以后，在一百多年的长时间中，西起沙宾达巴哈，东起额尔古纳河，漫长的中俄中段边界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动。

① 以上统计数字分见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214、220页。

第 五 章

俄国东正教会的侵华活动

第一节 俄国在华东正教会的 由来和发展

按照《恰克图条约》的规定，沙俄取得在北京设立东正教堂和派遣教士、“学生”来华传教和“学习”的权利。俄国在华东正教会从此有了合法身份，并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东正教一称希腊正教，公元四至五世纪出现于拜占廷帝国。一〇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西部的天主教和东部的东正教，标志着东正教的最终形成。九八八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受洗入东正教，这是罗斯人信奉东正教的开始。后来，东正教就成了沙俄的“国教”。马克思指出，俄国“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

中国领土上的第一批东正教堂，是沙俄侵略我国黑

^①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2页。

龙江地区的产物。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首的沙俄入侵者重据雅克萨后，在该地修建了一座名叫“基督复活”的教堂；一六七一年，又在城郊高地建立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①他们强迫当地居民改奉东正教，妄图使他们放弃反抗斗争，安于受压迫、受宰割的地位。这是沙俄利用宗教对中国实行精神侵略的最初尝试。随着雅克萨的收复，沙俄的这些精神侵略机构被彻底扫除。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沙俄一面加紧推行对我国蒙古地区的蚕食政策，不断扩大对华经济掠夺，同时力图通过东正教会在中国建立新的侵略据点。一六九二年义杰斯出使北京时，曾遵照彼得一世敕令，要求为俄商建造一所教堂，被清政府严词拒绝。这时，北京已有一些俄国东正教徒，他们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招降或主动投奔清朝的。据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在一六八五年以前的三十多年间“总得罗刹近百人”。^②清政府将他们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俄国史籍中称为“俄罗斯百人队”。他们被安置在镶黄旗驻地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③受到和旗人同等的待遇，由清政府供给住房、衣食，发给年俸，允其与中国人通婚，并给

① 塞雷伯列尼科夫：《阿尔巴津与阿尔巴津人》，载《中国福音报》，第90页。

② 俞正燮：《癸巳类稿》，第9卷，第13页。

③ 同上。

予信仰自由。不久，这些定居北京的俄国人把康熙帝赐给他们的一座庙宇，擅自改成东正教教堂。主持这个教堂的神父马·列昂节夫，是一六八五年随同俄俘从雅克萨来到北京的。他利用清政府的优待，在俄国人的中国籍妻子及其亲属中发展教徒。为了活动的方便，他极力模仿中国的生活习惯，甚至剃发留辮，乔装打扮成中国人。

马·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立即受到彼得一世的重视，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此事甚佳”。^①一六九五年，托博尔斯克区主教伊格那提给马·列昂节夫送来教会证书，把他的小教堂正式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这个教堂中国当时俗称“罗刹庙”，后称之为俄罗斯“北馆”。^②这是沙



北京俄国东正教堂(北馆)

① 《中国福音报》，第5页；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1935年哈尔滨出版，第23页。

②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1872年北京出版，第5部分，第42页；《中国福音报》，第48、99等页。

俄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东正教堂，是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伊格那提指示马·列昂节夫继续努力，诱使更多的中国人改奉东正教。

在此以后，沙俄对华宗教侵略的步伐，日益加紧。一七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彼得一世发布一条野心勃勃的“特谕”，要求物色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发展教徒，并选派青年教士数人来华传教，“引导中国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和全体居民赞助此项神圣事业”。^①一七〇二年，沙俄政府借口马·列昂节夫年迈，无力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要求清政府准予俄国另派教士两人来京接替，清政府没有同意。与此同时，每次商队来京，沙俄都配备若干教士随行，用以加强与北京东正教会的联系。^②例如，一七〇三年萨瓦齐耶夫商队中就有东正教士数人。^③

一七一一年，胡佳科夫率领沙俄国家商队来到北京，这时康熙帝正准备派遣太子侍读殷札纳、郎中纳颜和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流域，访问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旨意，趁机又以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士仅马·列昂节夫一人，且已年老为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

① 《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4卷，第1800号。转引自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1905年彼得堡出版，第31—32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38页。

③ 《故宫俄文史料》，第7件，第279—280页。

并以此作为沙俄同意殷札纳等过境的交换条件。^①康熙帝同意了这个要求。一七一四年，殷札纳等完成使命回国，彼得一世根据康熙帝的允诺，派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教士劳伦特、助祭菲里蒙等十人组成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偕行。次年五月一日，依腊离宛等到达北京，住在俄罗斯“北馆”。这就是俄国派遣的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②这个俄国传教士团的来华，使沙俄对华的宗教侵略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七二一年，彼得一世为了进一步控制东正教会，设立了由政府直接操纵的宗教委员会（后改称圣务院），作为东正教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形成了“教会象农奴般的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象农奴般的依赖于国家教会”^③的局面。同年三月，彼得一世借口接替于一七一九年死去的依腊离宛，任命库尔齐茨基主教为在华东正教会的新领导人，带领修士司祭、修士助祭各二人，及其他人员八人前来北京。库尔齐茨基持有俄国枢密院致理藩院的信件，要求中国准许他在北京“自由居住”，执行教务，并“不加禁阻地访问有俄国教徒居住的中国其他地方”。^④但是，沙俄这一如意打算没有得逞。一七二二年

① 图理琛：《异域录》。见何秋涛：《朔方备乘》，第43卷。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80—81页；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38页；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方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101页。

③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99页。

十月五日，库尔齐茨基在色楞格斯克接获理藩院的通知，内称：“在有关中俄两国的私逃者和边界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允许主教进入北京”。^①

一七二八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沙俄最后取得了向北京定期派遣传教士团的权利。条约第五条规定：中国同意沙俄自条约签订之日起，每届可派遣教士四人来北京传教，由清政府供其食宿。此外，中国方面还应允沙俄派“学生”六名随传教士团来华。

此后，沙俄每隔十年改派传教士团来北京，接替前届传教士团。每届传教士团一般包括修士大司祭（中国称之为达喇嘛）一名，修士司祭二名，修士助祭一名，加上学习语文的“学生”等，共计十名。^② 根据《恰克图条约》，一七三二年春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来的东交民巷）俄罗斯南馆（原俄罗斯馆）内建成另一座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③ 此后，俄国传教士团来京后住在“南馆”，^④ 仍由清政府负担部分生活费用。据统计，仅一八二〇年一年，清政府就付出了相当于一千多卢布的款项和九千磅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39页。

②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1905年彼得堡出版，第33—38、47—51页。按照东正教教阶，主持俄国东正教最高机关圣务院的为总主教，其下有区主教，大主教，主教，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修士助祭。修士大司祭是俄国在华传教士团的首领。参看谢格洛夫著、吉村柳里译：《西伯利亚编年史》，1944年东京出版，第15页。

③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9页。

④ 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在俄罗斯南馆设立使馆，原住馆内的东正教士合并到北馆。

大米来养活这些沙俄教士。^①

从一七一五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先后共派遣十二届传教士团前来北京：

第一届（一七一五——一七二九） 首领、修士大司祭
依腊离宛^②

第二届（一七二九——一七三六） 首领、修士大司祭
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

第三届（一七三六——一七四五） 首领、修士大司祭
伊拉尼翁·特鲁索维

第四届（一七四五——一七五四） 首领、修士大司祭
格尔瓦西伊·林切夫斯基

第五届（一七五四——一七七—） 首领、修士大司祭
安福罗西·尤马托夫

第六届（一七七一——一七八一） 首领、修士大司祭
尼古拉·慈维特

第七届（一七八一——一七九四） 首领、修士大司祭
岳阿基穆·石世科夫斯基

第八届（一七九四——一八〇九） 首领、修士大司祭
索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第九届（一八〇九——一八二〇） 首领、修士大司祭
亚金甫（俾邱林）

① 季姆科夫斯基：《护送俄罗斯传教士团来华记》，英译本，1827年伦敦出版，第1卷，第4页。

② 按：此人于一七一九年死去，俄国在华第一届传教士团的首领出缺。往后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第十届(一八二〇——一八三〇) 首领、修士大司祭
彼得·卡缅斯基

第十一届(一八三〇——一八四〇) 首领、修士司祭
魏若明(一八三〇——一八三五)、阿瓦库姆(一八
三五——一八四〇)

第十二届(一八四〇——一八五〇) 首领、修士大司
祭 佟正笏(波里卡尔普)①

上述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开始时一度由沙俄西伯利亚
事务衙门领导,② 十九世纪上半叶直接归沙俄外交部指
挥。③ 俄国学者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一时期东正教会的实
际作用时指出:彼得一世巧妙地利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
团“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以‘打开中国的窗户’”。④ 修士
大司祭英诺森也供称,这个教会在这个时期“起着俄国政
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教会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
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不言而喻,政府的愿望是通过教
会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⑤ 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真正使

① 历届传教士团的任期和首领见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33—38、47—51页;德贞:《中俄政教志略》,附录,第20页。

②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30页。

③ 波兹德聂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1卷,1892年莫斯科出版,第24页。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后,沙俄在华东正教会设圣务院。见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30页。

④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2页。

⑤ 修士大司祭英诺森:《在华的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1916年10月号,第678—679页。

命就是如此。

第二节 披着宗教外衣的奸细

表面上,俄国在华东正教士是道貌岸然的“圣仆”,实际上却是沙皇政府的忠实走卒,是钻入中国心脏的间谍,他们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着大炮和商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刺探情报是沙皇政府赋予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一项经常性任务。俄国第一届传教士团的首领依腊离宛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沙俄奸细。他来到北京后,千方百计结交清政府官吏,刺探清政府的机密。^①往后来华的历届传教士团,也负有同样的侵略使命。例如,一七八一年以岳阿基穆为首的第七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时,沙俄外交委员会曾明确指示他们设法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②同时,圣务院也责成他们及时报告当地的情况和动态。^③

东正教士窃取清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北京的耶稣会士。如前所述,早在一六七六年尼果赖使华时,沙俄就和西方国家在华的耶稣会士进行了紧密勾结;后来,在

①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5页;《中国福音报》,第25—26页。

②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1898年彼得堡出版,第392页。

③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57页。

尼布楚谈判期间,沙俄又一次勾结在华耶稣会士,并得到他们很多帮助。因此,彼得一世在一六九七年获悉北京建成东正教堂的消息后,立即提醒在华东正教士注意笼络“长期以来已在该处安身的耶稣会士”。^①彼得一世的这一指示,成了俄国在华东正教会行动的指针。一七五四年,俄国第五届传教士团首领安福罗西来到北京后,首先就想方设法结识和贿赂耶稣会士。他毫不讳言地说:“住在北京的俄国修士大司祭必须利用耶稣会士”,因为“通过他们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探听到当地的很多事情”。^②

东正教传教士团还责成俄国“学生”利用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方便,盗窃情报。一七三八年,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俄国“学生”罗索兴(布里亚特人)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通过郎克转呈沙俄枢密院,因此获得了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③一七四〇年继罗索兴(原第一届“学生”)任俄文翻译的原第二届俄国“学生”伏拉迪金和贝科夫于一七四六年回国时,也带回“不少对俄罗斯帝国有用的机密情报”。^④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些“学

① 《中国福音报》,第5页;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3页。

②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27—28页。

③ 《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10卷,第7650号,第602页。转引自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135页,注77。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253页,注1。

生”的作用时说：“我们的翻译在理藩院任职，帮助中国官员处理事务。通过这些翻译，我国的传教士团总是对有关中国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了若指掌，借以广泛地向俄国政府提供这些方面的情报”。^① 俄国“学生”频繁的特务活动，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一七三七年，清朝政府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就曾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輿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②

清政府发布的邸报，是东正教士获得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邸报中登载皇帝诏令及奏章等重要文件，发给高级官员，以通消息。东正教士一般是通过耶稣会士或其他途径得到这种资料的。^③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沙皇政府为适应扩大对华侵略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对在华东正教会的领导。一八〇七年以亚金甫为首的第九届传教士团来华时，沙俄外交部第一次派监护官一名同来，就是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此，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④ 一八一四年，伊尔库次克省长特列斯金建议委派一名非神职人员主管北京东正教会；沙俄当局担心此举过于露骨，可能

①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3—24页。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2卷，《俄罗斯馆考》。

③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1页。

④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美国《太平洋历史评论》，1940年第4期，第9卷，第404页。

被清政府发现，未敢实行。一八一八年八月，俄国政府训令在华东正教会，规定“它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①同年，沙俄政府决定派遣原任外交部中文翻译（原第八届传教士团“学生”）、新近改作教士的彼得·卡缅斯基为第十届北京传教士团的首领，以便使教会在“（沙俄）外交部和西伯利亚官员的控制下更加听话”。^②一八二〇年卡缅斯基一行动身来华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破格召见，赏给他以安娜女皇二级勋章、一大批藏书和十字架、法衣等物，对其他成员也分别有所赏赐。^③同时，沙俄政府拨给传教士团的经费也从以往每年六千五百卢布剧增至每年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卢布。^④作为沙皇政府设在中国首都的情报站，这个东正教会在沙俄侵华“事业”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士团的首领先后由魏若明和阿瓦库姆担任。这届传教士团的监护官拉狄仁斯基，原是沙俄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⑤由军事人员来直接担任这项

①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方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101页。

②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40年，第9卷，第4期，第404页。

③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46页；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1968年吉隆坡出版，第25页。

④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8页。

⑤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6页。

职务，这是第一次。他曾利用“宗教人员”的身份非法闯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刺探情报，回国后，起草了一份武装占领黑龙江的详细计划，^① 受到沙俄当局的赏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上述任命的真实意图。

第十二届传教士团首领佟正笏是由前西伯利亚总督、沙皇尼古拉一世办公厅主任斯皮兰斯基推荐的。^② 这届传教士团的成员除教士和“学生”外，还有“画家”、“天文学家”、医生随行。后来（一八六四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取我国西部大片领土的俄方首席代表札哈罗夫（杂哈劳），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猖狂进行特务活动的巴拉第（卡法罗夫），也是这届传教士团的成员。后来充当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柳比莫夫，是这届传教士团的监护官。^③ 他们都是披着羊皮的恶狼，是沙皇政府精心挑选派到中国的头等侦探。

佟正笏等人于鸦片战争前夕（一八四〇年四月）启程来华。行前，沙俄政府一再训令他们进行间谍和行贿活动，^④ 并指示佟正笏要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物的好感”，^⑤ 又做贼心虚地要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只盖私

①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236页。

②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50页。

③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第36页。

④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40年，第9卷，第4期，第404页。

⑤ 同上书，第404—405页。

章，不盖传教士团的公章，“否则中国人将把此项报告看作官方文件，从而对报告的内容表现出过度的好奇心”。^①沙俄政府给予他“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权力”，^②佟正笏也没有辜负沙俄政府的愿望。他在北京到处“搜集情报，观察和注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动向”，^③及时向沙俄政府报告。俄国学者格列勃夫说：“他（指佟正笏）的情报总是非常全面细致……他对中国正在形成的局势，总是了若指掌。所以，他向圣彼得堡外交部提供情报时，俨然以此指导外交部的行动路线”。^④

第三节 俄国商业资本的坐探

沙俄在华东正教士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刺探我国的经济情报，为俄国商业资本夺取中国市场效劳。一位苏联早期历史学者指出，北京俄国东正教会是“俄国商业资本的商务情报机构”，^⑤这是完全正确的。

早在十七世纪末俄国商队初次来到北京时，就和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会紧密勾结在一起。东正教士、教徒积

①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40年，第9卷，第4期，第405页。

②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50页。

③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4页。

④ 同上。

⑤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载苏联《红档》杂志，1932年第53卷，第162页。

极充当俄国商队的译员和向导,^①起了俄商引路人的作用。另一方面,商队又是东正教士的情报传递人,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首领经常通过商队“就外交和情报事项同(沙俄)外交委员会联系”。^②

一七二八年恰克图开市后,俄国对华贸易不断发展,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已在俄国对亚洲贸易中跃居首位。俄国从中国输入茶、丝绸、棉织物、烟叶等,对中国主要输出毛皮;一七九二至一八〇〇年皮货占俄国对华出口货的百分之七十。^③但从十八世纪末叶起,俄国皮货在中国市场上遇到了英、美等国纺织品的竞争,销售量开始下降,以致沙俄不得不力图增加对华商品输出的种类。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的大陆政策使英国纺织品对俄国的输出中断,刺激了俄国棉纺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是“农奴制的俄国强制性地农村维持自然经济制度,无法为猛烈发展的工业提供市场。因此,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国内市场已被认为没有潜力了。”^④上述情况,促使沙俄愈加急切地要求扩大中国市场。当时中俄贸易集中在恰克

① 塞雷伯列尼科夫:《阿尔巴津与阿尔巴津人》,载《中国福音报》,第102—103页;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40年,第9卷,第4期,第409页。

②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2页。

③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195页。

④ 波克罗夫斯基:《外交政策论文集》,1918年君士坦丁堡出版,第21页。转引自《红档》杂志,第53卷,第165页。

图一地，俄商已停止前来北京。^① 为探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对俄国商品需求的类别和潜力，以及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情况，沙俄外交部决定赋予在北京的东正教会以搜集此项情报的任务，并拨出巨款，作为收买清朝官员的活动经费。^②

一八三六年七月三日修士司祭魏若明给沙俄外交部的报告，是东正教士进行商业情报活动的一个例子。这份报告写道：“我国（指俄国）波利斯绒的售价每尺（中国尺）难以达到白银二钱。大小商店充斥此货。我国呢子每俄尺值白银约六钱，现售三钱，尚难寻到买主。”他建议说：“为了维持恰克图市场上我国产品以最有利价格销售，限制抛售的数量将是有益的”。^③ 魏若明还献策说，俄国除对中国输出纺织品外，还应注意其他被忽视的领域。“鉴于广州运来此间（北京）的镜子高价出售，我国如向中国出售同类货物，亦将有厚利可图。半俄尺的镜子最适用于此间的梳妆台。（镜子的）高度和宽度的比例则以长方形为宜。”^④ 魏若明的情报给俄商带来丰硕的利润：恰克图俄商向中国出售镜子的总值，一八四三年计九千五百五十五卢布，一八四七年达三万二千六百四十卢布，四

① 俄国商队最后一次来北京贸易是在 1755 年，“其后遂悉统归于恰克图”。见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燕京学报》1935 年 6 月第 25 期。

②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载《红档》杂志，第 53 卷，第 162 页。

③ 同上书，第 165 页。

④ 同上书，第 164 页。

年间销路增加了好几倍。^①

再看另一个东正教头目、修士大司祭佟正笏的商业情报活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纺织品已成为恰克图市场上俄国出售的主要商品。沙俄外交部为了增加这项产品的对华输出，特将样品送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征求意见。一八四三年七月，佟正笏回答沙俄外交部说：“布样的质量和宽度完全令人满意，后者甚至比英国产品更胜一筹。不过花色低于中国人要求的标准”。^②佟正笏接着说，西方特别是英国巧妙地迎合中国人的爱好，贱价脱售印花布，其布质虽欠坚实，但花样颇为精美。“中国对俄国印花布的需求将始终居于次要地位”。照他的意见，俄国应增加平纹细布的输出，“平纹细布不问印染与否，应居主要地位，因为中国人无疑广泛使用它”。^③

此后，沙俄输华的平纹细布即直线上升，据沙俄外交部统计，一八四五年为五千〇九十一卢布，一八四六年为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卢布，一八四七年达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七卢布。相反，尽管一八四五年沙俄政府宣布给予印花布出口津贴，销路仍踏步不前。^④

俄国绒布在中国销路一向畅旺，给俄商带来巨大的

①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载《红档》杂志，第53卷，第16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64—165页。

利益。但佟正笏早在一八四四年四月即向俄国政府报告说,由于《南京条约》保证了英国在沿海通商的优越地位,俄国绒布的销路可能好景不常,他建议俄国政府在中国西部开辟“新市场”,那里“英国人不易达到,而距俄国则较近”。^①此后,沙俄政府果然提出在我国新疆地区进行贸易的要求,并于一八五一年和清政府签订了对俄国极为有利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和佟正笏的上述建议是不无关系的。

茶叶是沙俄在恰克图贸易中的主要进口商品,在这方面,北京的东正教士也向俄商提供了详备的情报。例如:一八四三年一月,沙俄外交部在致财政大臣坎克林的一份公函中提及,北京东正教会提供了关于从福建省运送茶叶往恰克图的路线的情报,^②给俄商以很大的帮助。

俄国学者格列勃夫谈到佟正笏的情报活动时写道:“他忠告俄国商人,哪些商品能在中国市场畅销;告诉他们市场行情,……在银价上涨时期,他给俄国商人指出毫无差错的行动方针等。总之,他……显示出非比寻常的才能和创造力”。^③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多数俄国在华东正教士。前面提到的那位苏联早期历史学者曾经指出,俄

①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载《红档》杂志,第53卷,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163页。

③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4页。

国“传教士把中国看做俄国商业资本的殖民地”。^①这一论断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从本质上说，沙俄在华东正教士正是一伙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分子，是俄国商业资本打进中国的坐探。

第四节 挂着“汉学家”招牌的文化特务

沙俄在华东正教士的又一项使命就是以“研究”中国为名，进行为沙俄侵华政策服务的所谓科学文化活动。一九三二年，苏联的中国研究所在《中国书目》一书的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汉学是作为俄国专制制度殖民政策的思想武器而发展起来的。沙俄在东方的推进在旧汉学中反映出来并找到辩护的理由，旧汉学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强盗殖民政策各个阶段的反映。……俄国汉学家的骨干由北京俄国传教士团的成员——东正教士组成，他们在传布基督教的幌子下执行着外交职能，他们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殖民政策的积极传导人”。^②

早在十七世纪末，彼得一世就提出了“研究”中国的任务。他在一七〇〇年的“特谕”中特别强调俄国在西伯

①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载《红档》杂志，第53卷，第165页。

② 普·斯卡奇科夫编：《中国书目》，1932年莫斯科出版，序言，第7—8页。按：1960年莫斯科再版的《中国书目》中，已将这篇《序言》全部删去。

利亚和中国的神职人员应“通晓汉蒙语言”，借以深入调查中国的情况。^①在他的倡导下，一七二五年伊尔库次克“耶稣升天”修道院院长普拉特科夫斯基（一七二〇年曾随伊兹玛依洛夫来华），在该城创办了一所蒙文学校，招收二十五名学生学习蒙文。^②不过，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展起来。

《恰克图条约》订立后，沙俄政府定期派遣“学生”随传教士团前来北京。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先后来华的“学生”共二十四人，^③而同一时期，任何西方国家都没有取得派遣学生来华的权利。这些俄国“学生”大都是从俄国语言学院和蒙文学校选拔的青年，他们除了受命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以外，还担负着“研究”中国的特殊使命，正是从他们中间产生了沙俄的第一代“汉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列昂节夫（原第三届“学生”）、罗索兴和伏拉迪金等人。当时是沙俄“汉学”最初建立的阶段，主要从事于汉、满文书籍的编译工作。如阿·列昂节夫翻译了《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等书，并编译了《中国地理手册》。罗索兴翻译了图理琛的《异域录》，编译了《中国丝织厂资料》等。^④上述作品涉及清朝统治家族的源流、清政府的组织机构、法律、经济、对外关

① 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第32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139—140页。

③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38页。

④ 塞雷伯列尼科夫：《亚洲史论丛》，第1卷，1941年天津出版，第431—439页；德贞：《中俄政教志略》，第9部分，第45页。

系和中国地理等各个方面。为了获得中国的机密资料，沙俄“汉学家”们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例如伏拉迪金一七五六年呈送沙俄枢密院的《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就是他伙同在京东正教士偷偷“从宫廷收藏的地图上摹绘的”。^①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沙俄对华侵略的日益加紧，沙皇政府迫切需要从中国得到更多情报和开展对中国的“研究”，作为制定侵华政策的依据。为此，沙皇政府特别瞩目于俄国在华东正教会。这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中“汉学家”“人才辈出”的秘密所在。

在这一时期的沙俄“汉学家”中，俾邱林名列前茅。他利用教士的身份作掩护，在居留北京的十多年间到处钻营，结交清政府的权贵和蒙藏等族的上层人物，大肆搜集我国各方面的情报资料，并编写成书，其中仅仅有关我国边疆地区的“著作”，即有《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东土尔克斯坦和准噶尔志》和《中亚诸民族志》等十一种。另有译作多种，^②如《蒙古律例》，据称他翻译此书“是为治理俄国统治下的诸游牧部落提供有价值的借鉴”。^③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沙俄积极准备侵占我国边疆大片领土的时期，俾邱林写出大量关于我国边疆情况的“著作”，正是为了适应沙俄对华领土侵略的需要。巴托尔德

① 塞雷伯列尼科夫：《亚洲史论丛》，第1卷，第438页。

②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第9部分，第46、49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曾经指出,俾邱林“用自己的知识(即“汉学”)为一八一九年成立的(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效劳”,^①一语道破他“研究汉学”的真实目的。

俾邱林还利用留居北京的方便条件,广为搜求我国汉、蒙、藏文书籍和各类文物,他回国时,为沙俄外交部亚洲司等单位“带回几吨重的中国书籍”,^②其数量多于前八届传教士团带回的图书资料的总和。^③随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华的“蒙古学家”奥·科瓦列夫斯基,于一八四〇年回国时也带去大批珍贵的汉、满、蒙、藏文书籍和文物。^④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有不少就是当年赫庆提议严防外流的“舆图违禁等物”,后来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了重要作用。

沙俄“汉学家”们还不遗余力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内容涉及我国各地的工商业、农业、航运、生产技术、货币、资源等领域。这种所谓“科学研究”,纯粹是为沙俄在中国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原料的侵略目的服务的。正如苏联的中国研究所在一九三二年所说,在关于中国经济、历史、政治等“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沙俄“汉学”“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利益。”^⑤

有些沙俄“汉学家”如阿·列昂节夫和瓦·巴·瓦西

①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271页。

② 派克:《中国与宗教》,1905年纽约出版,第239页。

③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第5部分,第35页。

④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7页。

⑤ 普·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1932年版,序言,第8页。

里耶夫等人,还着重“研究”孔孟之道、佛教和道教等中国封建社会的反动意识形态,积极翻译和传播反动的儒家经典。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阿·列昂节夫即已将《大学》和《中庸》译成俄文。十九世纪初,俾邱林又将《四书》及其全部注释译成俄文,一八二九年他还把《三字经》译成俄文,并捧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一八四〇年随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来京的瓦·巴·瓦西里耶夫致力于研究孔孟之道,把尊孔与侵华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他发表了《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佛教教义及其历史和文献》、《回教在中国的传布》等著作,还将反动的儒家经典《论语》译成俄文。^①《中国书目》序言曾经尖锐地指出,沙俄“汉学家”撰写这一类著作,归根到底是为了“沙俄殖民政策的利益”,“支持亚洲的反动派,并替外国资本奴役中国扫清道路。”^②

上面提到的这些“汉学家”,都是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学术活动”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民族、边疆、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是名符其实的文化特务。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安插在沙俄外交部门担任要职:

阿·列昂节夫,在沙俄外交委员会任职;

罗索兴,是列昂节夫在外交委员会中的同事;

伏拉迪金,任兼有外交职能的沙俄来华商队总管;

俾邱林,在沙俄外交部亚洲司任职;

①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第9部分,第47页。

② 普·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1932年版,序言,第8页。

阿瓦库姆，曾追随沙俄侵华头目穆拉维约夫、普提雅廷干了不少罪恶活动，后担任沙俄外交部亚洲司顾问；

塔塔里诺夫，任沙俄驻塔城领事；

奥·科瓦列夫斯基（“蒙古学家”），任沙俄外交部顾问。

这个远不完备的名单足以证明，沙俄东正教会所“造就”的，并不是什么“献身科学”的学者，而是一帮凶恶的殖民主义分子，他们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着先锋骨干作用。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就是一座侵华骨干的养成所，是一个文化特务训练班。

关于俄国传教士团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在沙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沙俄的一些“学者”也是供认不讳的。

马尔坚斯说：“对俄国政府来说，传教士团是研究中国的工具，利用它能够从可靠的来源获得有关这个国家（中国）的各项情报。显然，彼得堡政府全力支持这个传教士团，其目的和宗教事业毫不相干。”^①

马尔坚斯还承认，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家”是根据“俄国政府提出的目标”“研究中国内部局势的”。他还把这种“汉学研究”喻为沙俄政府组织的“学术远征”，指出俾邱林、科瓦列夫斯基、瓦·巴·瓦西里耶夫等“汉学家”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②

^① 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1881年彼得堡出版，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35—36页。

另一个沙俄学者格列勃夫也供认，俄国北京传教士团的“汉学家”“组成了一些纯属外交和情报类型的十分健全而活跃的机构。俄国政府从这些机构不仅获得各种情报，而且在对华相互关系领域内，一贯采用他们的观点并据以作出这种或那种决定。……在这种场合，传教士团是值得赞扬的”。^①

第五节 盘剥中国人民的吸血鬼

俄国在华东正教士又是一伙盘剥中国人民的吸血鬼，生活糜烂的社会寄生虫。

早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沙俄入侵者在雅克萨修建的“仁慈救世主”修道院，就曾强占大片土地，直接对我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恰克图条约》订立后，沙俄在华东正教会违反清政府禁令，开始从加入旗籍的俄罗斯人手中购买清政府赐给他们的土地。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个教会已在北京郊区占地一万亩以上，每年榨取大量地租。^②此外，在华东正教士还放高利贷。例如，一七九五年修士大司祭索甫罗尼放债二千二百卢

①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3页。

②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410页；德贞：《中俄政教志略》，第7部分，第36页。

布给一个中国人，后曾因债务纠纷上诉清朝官府。^①东正教还在北京经营商业、出租房屋、包揽诉讼等。^②他们身兼大地主、高利贷者、奸商、房产主和讼棍，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这些俄国教士到中国来，不仅是为了完成沙皇政府交付的侵略使命，也是由于“受到金钱利益的引诱”。^③他们在北京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把中国看作供他们寻欢作乐的“伊甸乐园”。

据俄国史书记载，第一届传教士团首领依腊离宛就是一个“私财甚厚”、酗酒无度、生活糜烂的暴发户。他出则高车驷马，入则仆役趋侍；美食锦衣，极其奢华。后来俄国传教士提起他在北京的“排场”时，仍然称羡不已。^④他手下的修士司祭劳伦特，来华时“穷得一文不名，连一件象样的衣衫也没有”，到中国后也阔了起来，过着呼奴唤婢的剥削生活。^⑤

俄国传教士在北京还践踏中国法律，不断制造事端，扰乱社会治安。例如，第二届传教士团修士助祭岳沙夫，有一次竟然“闯入宫苑闹事，并殴打前来制止的宫内官

①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40年，第9卷，第4期，第413页。

②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6页；德贞：《中俄政教志略》，第7部分，第36页。

③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89页。

④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14—16页。

⑤ 同上书，第65、70页。

员。”^①另一个修士助祭菲利蒙诺夫借酒行凶，同传教士团头子普拉特科夫斯基互殴，用刀砍伤对方，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把他驱逐出境，^②随后并要求把普拉特科夫斯基召回俄国。又如，第六届传教士团“学生”科尔金经常殴辱中国居民，胡作非为，引起极大的公愤，成了众所公认的恶魔，以致母亲们竟以科尔金的形象来吓唬啼哭的幼儿。^③第八届传教士团的头子索甫罗尼坦白承认：俄国教士和“学生”的情况“极其糟糕”，他们“不守秩序、酗酒、挥霍无度并和中国人打架。”^④第九届传教士团首领俾邱林，也是一个“干了大量不道德行为”^⑤的人。由于他和其他教士行为不端，“全体团员一度被理藩院尚书召去训斥一场”。^⑥从根本上说，俄国东正教士的种种丑行，正是沙俄殖民主义寄生性、腐朽性的一种表现。

以上是俄国东正教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侵华活动的几个重要方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东正教会的侵略活动达到了最猖狂的地步，关于这方面的史实，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卷中加以揭露。

①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88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189页；特鲁塞维奇：《中俄通使及通商关系》，第220—229页。

③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37页。

④ 同上书，第32页。

⑤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5页注1。

⑥ 同上书，第25页。

附 录 一

俄文参考书名译汉表*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перед Нерчинским миром 1689.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7, № 5. (亚力山德罗夫:《1689年尼布楚条约前俄中经济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历史》杂志,1957年第5期。)

Бабков И. 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службе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859—1875г. СПб., 1912.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彼得堡出版。)

Бадмаев П. 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Пб., 1905. (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1905年彼得堡出版。)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Казань, 1882.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882年喀山出版。)

Барсуков Иван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М., 1891.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

* 包括学术论文在内。

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1891年莫斯科出版。）

Бартольд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 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Казачи на Амуре.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 и XVII вв.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III, ч. 1, М., 1955. (巴赫鲁申:《十六、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纲》, 载《巴赫鲁申学术著作集》, 第3卷, 第1分册, 1955年莫斯科出版。)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заселения Сибири до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巴赫鲁申:《十九世纪中期以前西伯利亚殖民史纲》。)

Больш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XVI, СПб., 1904. (帝俄《大百科全书》, 第16卷, 1904年彼得堡出版。)

Васильев А. П.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т. I—II, Чита, 1916.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 第1、2卷, 1916年赤塔出版。)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 СПб., 1900. (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 1900年彼得堡出版。)

Введенский В. А.

Торговый дом XVI—XVII вв. Л., 1924. (维坚斯基:《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商业家族》, 1924年列宁格勒出版。)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СПб., 1905. (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 1905年彼得堡出版。)

Вилков О. Н.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ы на Тобольском рынке в XVII 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8, № 1. (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物》, 载苏联《苏联历史》杂志, 1958年第1期。)

Г. Л.

Пеки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30—50 гг. XIX в.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1932, т. 53.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 载苏联《红档》杂志, 1932年第53卷。)

Глобов Н. Д.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функции Пек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Сия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 Харбин, 1935. (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 载《东正教之光》, 1935年哈尔滨出版。)

Голубцов Н. З.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города Албазина.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02. (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史》, 1902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

Гонсович Е. В.

Истор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14.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 1914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

Горький М., Сталин И. и другие

Истор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 СССР. т. I, М., 1936. (高尔基、斯大林等主编:《苏联国内战争史》, 第1卷, 1936年莫斯科出版。)

Греков Б. Д.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т. I, М., 1948. (葛列科夫等编:《苏联通史》,第1卷,1948年莫斯科出版。)

Груздев Ф.

Амур. СПб., 1900. (格鲁兹捷夫:《阿穆尔》,1900年彼得堡出版。)

Груздовский В. Е.

Приморско-Амур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4. (格鲁兹多夫斯基:《滨海—阿穆尔边区》,191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

Гудошников М.

Сибирь,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Москва-Иркутск, 1932. (古多什尼科夫:《西伯利亚历史文选》,1932年莫斯科—伊尔库次克出版。)

Давидов Д. А.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1.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1911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

Залкинд Е. М.

Из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 в конце XVII—начале XVIII вв.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ГУ, сер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ческих наук», 1949, вып. I. (札尔金德:《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外贝加尔西部地区历史片断》,载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论丛》,1949年第1卷。)

Златкин И. Я.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М., 1957. (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1957年莫斯科出版。)

Златкин И. Я.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1635—1758). М., 1964.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1964年莫斯科出

版。)

Казанин

Избрант Идес и Адам Бранд. «Записки о Русском Посольстве в Китай (1692—1695)». М., 1967. (卡札宁编:《义杰斯与勃兰德使华记(1692—1695)》, 1967年莫斯科出版。)

Каманин Л. Г.

Пер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46.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 1946年莫斯科出版。)

Каманин Л. Г.

Пер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51.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 1951年莫斯科出版。)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 IX, СПб., 1821. (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 第9卷, 1821年彼得堡出版。)

Кашик О. И.

Торговл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в XVII—начале XVIII в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61. (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 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 1961年诺沃西比尔斯克出版。)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 I, М., 1911.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历史教程》, 第1分册, 1911年莫斯科出版。)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Китайцы и 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Пб., 1898. (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 1898年彼得堡出版。)

Корсак А. Ф.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

史统计概览》，1857 年喀山出版。）

Кури Б. Т.

Из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в XVII ст.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8, № 23—24. (库尔茨：《十七世纪俄
中贸易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8 年第 23—
24 期。)

Лебедев В.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тра I. М., 1949. (列别杰夫：《彼得
一世的对外政策》，1949 年莫斯科出版。)

Летопись Сибирская. СПб., 1821. (《西伯利亚编年史》，1821 年
彼得堡出版。)

Лопатин И. А.

Этнография Приморья. «Приморье, его природа и хозяй-
ст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3. (洛巴金：《滨海地区民族志》，载
《滨海地区的自然和经济》，1923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出版。)

Лященко П. И.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т. I и II, М., 1947—
1948.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 1、2 卷，1947—1948
年莫斯科出版。)

Маак Р.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муре в 1855 г. СПб., 1859. (马克：《黑龙
江旅行记》，1859 年彼得堡出版。)

Мартенс Ф. Ф.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Пб., 1881. (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
1881 年彼得堡出版。)

Миллер Г. Ф.

Описание Сибир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Книга 1, СПб., 1787. (米
勒尔：《西伯利亚王国记述》，第 1 册，1787 年彼得堡出版。)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I, М.-Л., 1941.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2卷,194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1689—1881 гг., СПб., 1889. (俄国外交部编:《俄中条约集(1689—1881)》,1889年彼得堡出版。)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Материалы к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арте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 т. III,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5. (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3册,1955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Приамурье в древности, «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 т. II,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3. (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古代黑龙江沿岸》,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册,1953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 начала XIX столетия. т. 1, Иркутск, 1920. (奥哥罗德尼科夫:《自远古至十九世纪初期的西伯利亚史纲》,第1册,1920年伊尔库次克出版。)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Далекое прошлое Приморь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59. (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195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

Панкратова А. М. и другие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 1949. (潘克拉托娃等编:《苏联通史》, 1949年莫斯科出版。)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т. I, СПб., 1914. (俄国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编:《俄国亚洲部分》,第1卷,1914年彼得堡出版。)

Пежемский и Кропотов

Иркут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Иркутск, 1911. (佩热姆斯基、克罗波托夫合编:《伊尔库次克编年史》,1911年伊尔库次克出版。)

Писарев М. И.

Сибирь,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1914. (皮萨列夫:《西伯利亚历史地理概述》,1914年出版。)

Позднессев А.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т. I—II, СПб., 1892—1893. (波兹德聂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1、2卷,1892—1893年彼得堡出版。)

Потемкин В. П. и друг.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т. I, М., 1941. (鲍爵姆金等编:《外交史》,第1卷,1941年莫斯科出版。)

Саввин В. П.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619—1927. М.-Л., 1930. (萨文:《沙俄及苏联与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Садовников Д.

Наши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 рассказы о заселении Сибири (1581—1712). М., 1905. (萨多夫尼科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西伯利亚殖民史话,1581—1712)》,1905年莫斯科出版。)

Сахаров А. 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истории в школе», 1961, № 4. (沙哈罗夫: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载苏联《历史教学》杂志, 1961
年第 4 期。)

Семенов П. П.

Живописная Россия, т. XII, ч. 1; ч. 2, СПб.-М., 1895.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第 12 卷, 第 1、2 分册, 1895
年彼得堡—莫斯科出版。)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И. И.

Албазинцы. Пекин, 1922. (塞雷伯列尼科夫:《阿尔巴津人》,
1922 年北京出版。)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И. И.

Албазин и Албазинцы.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Пекин,
1935. (塞雷伯列尼科夫:《阿尔巴津与阿尔巴津人》, 载《中国
福音报》(纪念文集), 1935 年北京出版。)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И. И.

К истории Азии, сборник, т. I, Тяньцзинь, 1941. (塞雷伯
列尼科夫:《亚洲史论丛》, 第 1 卷, 1941 年天津出版。)

Скачков П. 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1932. (普·斯卡奇科夫编:《中国
书目》, 1932 年莫斯科出版。)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
1957.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 1957 年莫斯
科出版。)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1917 г.). М., 1974.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

经济贸易关系史》，1974年莫斯科出版。）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М., книга II, 1960; книга VI, 1961; книга VII, 1962; книга X, 1963. (索洛维约夫:《俄国通史》，第2册,1960年;第6册,1961年;第7册,1962年;第10册,1963年,莫斯科出版。)

Сотрудники Общезем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иамурье. М., 1909.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1909年莫斯科出版。)

Татищев В. 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т. V; т. VI, М.-Л., 1965, 1966. (塔吉谢夫:《俄国史》，第5、6卷,1965、196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т. I, 1969; т. II, 1972.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1969年;第2卷,1972年,莫斯科出版。)

Трусо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ека). М., 1882.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1882年莫斯科出版。)

Фирсов Н. Н.

Чте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М., 1920. (费尔索夫:《西伯利亚历史教程》，1920年莫斯科出版。)

Фирсов Н. Н.

Чте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го и ниж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Казань, 1921. (费尔索夫:《伏尔加中下游地区历史教程》，1921年喀山出版。)

Фишер И. Е.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сам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ибири до завоевания сей земли российским оружием. СПб., 1774. (费歇尔:《西伯利亚史》, 1774 年彼得堡出版。)

Фукс К.

История г. Казани. Казань, 1914. (符克斯:《喀山史》, 1914 年喀山出版。)

Ходоров А. Е.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и изуч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 25, 1929.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与远东研究》, 载苏联《新东方》杂志, 1929 年第 25 期。)

Шастина И. П.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ека. М., 1958. (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 1958 年莫斯科出版。)

Шебенков В.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 1960.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 1960 年莫斯科出版。)

Яковлева П. Т.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ода. М., 1958.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958 年莫斯科出版。)

附 录 二

英文参考书名译汉表*

Allen, C. W.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Shanghai. (艾伦:《京廷之耶稣会士》,上海,无出版年月。)

Baddeley, J. F.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1919.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1919年伦敦出版。)

Bell, John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2 vols. Glasgow, 1763. (约翰·贝尔:《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旅行记》,1763年格拉斯哥出版。)

Cahen, G.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Sheldon Ridge, Shanghai, 1914.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英译本,1914年上海出版。)

Chen, Agnes Fang-Chih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V, No. 1, Aug. 1948. (陈芳芝:《中国北方边疆的历史背景》,载《燕京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1期,1948年8月。)

Chen, Agnes Fang-Chih

* 包括学术论文在内。

Chinese Frontier Diplomacy: The Coming of the Russians and the Treaty of Nertchinsk,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V, No. 2, Feb. 1949. (陈芳芝:《中国边疆外交——俄国人的东来和尼布楚条约》,载《燕京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2期,1949年2月。)

Chen, Agnes Fang-Chih

Chinese Frontier Diplomacy: Kiakhta Boundar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IV, No. 2, Feb. 1949. (陈芳芝:《中国边疆外交——恰克图界约》,载《燕京社会科学学报》,第4卷第2期,1949年2月。)

Chen, Vincent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gue, 1966. (文森特·陈:《十七世纪中俄关系》,1966年海牙出版。)

Curzon, G. N. C.

Russia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London, 1889. (寇松:《俄国在中亚》,1889年伦敦出版。)

Dudgeon, Joh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Peking, 1872. (德贞:《中俄政教志略》,1872年北京出版。)

Foust, Clifford M.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U. S. A., 1969.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1969年美国出版。)

Golder, F. A.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1914.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1914年美国克利夫兰出版。)

Halde, J. B. du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 London, 1738—1741, 2 vols. (荷尔德:《中国概述》,英译两卷本,1738—1741年伦敦出版。)

Howorth, H. 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1876, 4 vols. (霍沃思:《蒙古史》,第1—4卷,1876年伦敦出版。)

Ides, E. Isbrants

Three Years Travels from Moscow Overland to China through Great Ustiga, Sirania, Permia, Siberia, Daour, Great Tartary, & C. to Peking, London, 1706. (义杰斯:《从莫斯科到中国三年旅行记》,1706年伦敦出版。)

Archimandrite Innocent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Oct. 1916, № 10. (修士大司祭英诺森:《在华的俄国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1916年10月号。)

Lantzeff, G.

Siber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Printed in U. S. A., 197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3). (兰采夫:《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殖民制度的研究》,1943年第1版,1972年美国再版。)

Liu Hsüan-min

Russo-Chinese Relations up to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40, vol. XXIII. № 4. (刘选民:《截至尼布楚条约为止的中俄关系》,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40年第23卷第4期。)

Mancall, Mark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Harvard, 1971.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1971年哈佛出版。)

Meng Ssu Ming

The E-lo-ssu Kuan (Russian Hotel) in Pek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3, (1960—1961). (孟思明:《俄罗斯馆考》,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第23卷,(1960—1961年)。)

Parker, E. H.

China and Religion, N. Y., 1905. (派克(贝日高):《中国与宗教》,1905年纽约出版。)

Parry, A.

Russian (Greek Orthodox) Missionaries in China, 1689—1917, 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40, vol. 9. (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40年第9卷。)

Pavlovsky, M. N.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 Y., 1949. (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1949年纽约出版。)

Quested, R. K. I.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Kuala Lumpur, 1968.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1968年吉隆坡出版。)

Ravenstein, E. G.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London, 1861.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1861年伦敦出版。)

Sebe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Rome, 1961.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1961年罗马出版。)

Semyonov, Yuri

Siberia, Its Conques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63.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1963年伦敦出版。)

Vernadsky, George

A Source Book of Russian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1917,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2, 3 vols. (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汇编(从早期到1917年)》,第1—3卷,1972年纽黑文、伦敦出版。)

Vernadsky, George

Political & Diplomatic History of Russia, Boston, 1936.
(弗纳德斯基:《俄国政治和外交史》,1936年波士顿出版。)

Vladimir (Volpicelli, Zenone)

Russia on the Pacific and the Siberian Railway, London, 1899. (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与西伯利亚铁路》,1899年伦敦出版。)

附录三

俄汉人名对照表

А

Аблин С. 阿布林
 Аввакум 阿瓦库姆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亚力山德罗夫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
 Андерсен В. 安德生
 Анна 安娜
 Арсеньев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
 Аршинский Д. 阿尔兴斯基
 Афонасьев Ф. 阿芬纳西耶夫

Б

Бабков И. О. 巴布科夫
 Бадмаев П. А. 巴德玛耶夫
 Байков Ф. И. 费·伊·巴依

科夫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班蒂什-卡缅斯基
 Барсуков И. 巴尔苏科夫
 Бартольд В. 巴托尔德
 Бахтеяров 巴赫捷亚罗夫
 Бахрушин С. В. 巴赫鲁申
 Бейтон А. 杯敦
 Бекетов П. 别克托夫
 Бекович 贝科维奇
 Белобоцкий А. 贝洛博茨基
 Белоголов И. 贝洛戈洛夫
 Бичурин Н. Я. (Иакинф) 俾邱林(亚金甫)
 Боков Г. Т. 勃科夫
 Бунаков Е. В. 布纳科夫
 Бухолец И. Д. (Бухгольц) 布霍列茨
 Быков И. 贝科夫

В

Василий III 瓦西里三世

Васильев А. П. 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ьев В. П. 瓦·巴·瓦
西里耶夫
Введенский В. А. 维坚斯基
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 魏若明
Венюков Н. 魏牛高
Вс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维谢洛夫
斯基
Вилков О. Н. 维尔科夫
Владимир Святославич 弗拉
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
Владыкин 伏拉迪金
Власов И. А. 乌拉索夫
Воейков Ф. 伏耶科夫
Волга Иван 伊万·伏尔加
Волынский В. В. 渥伦斯基

Г

Гагарин С. И. 加加林
Галкин И. 加尔金
Гервасий Линцевский 格尔瓦
西·林切夫斯基
Глазунов И. 格拉什诺甫
Глебов Н. Д. 格列勃夫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波里斯·戈都
诺夫
Головин Петр 彼得·戈洛文
Головин Ф. А. 费·阿·戈洛
文

Голубин П. 戈鲁宾
Голубцов Н. З. 戈鲁勃佐夫
Гонсович Е. В. 冈索维奇
Греков Б. Д. 葛列科夫
Груздев Ф. 格鲁兹捷夫
Груздовский В. Е. 格鲁兹多
夫斯基
Гудошников М. 古多什尼科夫
Гусятников М. 古谢特尼科夫

Д

Давидов Д. А. 达维多夫
Даниил 丹尼尔
Дербыш Хан 捷尔必失汗
Долгорукий М. В. 多尔葛鲁
基伊

Е

Екатерина I 叶卡捷琳娜一
世
Ермак 叶尔马克
Ермоген 叶尔莫根
Ермолин 叶尔莫林
Есипов С. 耶西波夫

З

Заболоцкий Ерофей 札波洛茨
基
Залкинд Е. М. 札尔金德

Захаров И. 札哈罗夫(杂哈劳)
Зиновьев 季诺维也夫
Златкин И. Я. 兹拉特金

И

Иван Калита 伊万·卡里达
Иван III 伊万三世
Иван IV 伊万四世
Иван V 伊万五世
Игнатий М. 伊格那提
Избрант Идес 义杰斯
Измайлов Л. 伊兹玛依洛夫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英诺肯
提乙)
Иосаф 岳沙夫
Ипатьев 伊巴节夫
Источников 伊斯托普尼科
夫

К

Казаринов А. 卡札林诺夫
Каманин Л. Г. 卡马宁
Каменский Петр 彼得·卡缅
斯基
Канкрин 坎克林
Карамзин И. М. 卡拉姆津
Кафенхауз Б. 卡芬豪斯
Кашенцев 卡申采夫
Кашик О. И. 卡希克

Квашнин 克瓦什宁
Кибирев Григорий 基比列夫
Киприан 启朴里安
Кислянский Л. 基斯梁斯基
Климов Н. 克利莫夫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克留切夫
斯基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 科瓦列夫斯
基
Колесников В. 柯列斯尼科
夫
Колычев С. А. 阔留赤甫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廓索维慈
Коркин Я. 科尔金
Корницкий С. 柯尔尼茨基
Коровин С. 柯罗文
Корсак А. Ф. 柯尔萨克
Кропотов 克罗波托夫
Кульчицкий И. 库尔齐茨基
Куракин И. С. 库拉金
Куриц Б. Т. 库尔茨
Кучум 库程

Л

Ладыженский 拉狄仁斯基
Лаврентий 劳伦特
Ланг Лоренц 郎克
Ларынов 拉雷诺夫
Лебедев В. И. 列别杰夫

Лежайский Илларион 依腊离
宛

Леонтьев А. 阿·列昂节夫

Леонтьев М. 马·列昂节夫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 洛巴诺
夫—罗斯托夫斯基

Логинев И. 罗吉诺夫

Лоншаков Г. 隆沙科夫

Лопатин И. А. 洛巴金

Лузин С. 鲁辛

Любимов Н. И. 柳比莫夫

Лянгузов С. Я. 梁古索夫

Лященко П. И. 梁士琴科

М

Маак Р. 马克

Мартенс Ф. Ф. 马尔坚斯

Миддендорф А. Ф. 米登多尔
夫

Милеску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尼果赖·加甫里洛维奇·米
列斯库

Миллер Г. Ф. 米勒尔

Милованов В. 瓦·米洛瓦诺
夫

Милованов И. 伊·米洛瓦诺
夫

Минин 米宁

Михайл Федорович 米哈依尔·

费奥多罗维奇

Многогрешный Петр 彼得·
姆诺戈格列什内

Мокрошубов Д. 莫克罗舒博夫

Молодой С. 莫洛多伊

Москвикин И. 伊万·莫斯科
维金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Н. Н. 穆
拉维约夫

Мыльник Г. 梅勒尼克

Н

Нагиба 纳吉巴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涅维尔斯
科依

Никитин Г. 尼基京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诺维
科夫—达翰尔斯基

О

Обухов Л. А. 奥布霍夫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奥哥罗德
尼科夫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奥克拉德
尼科夫

Осколков Г. А. 奥斯科尔科夫

П

Па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巴拉第

(卡法罗夫)

Панкратова А. М. 潘克拉托娃

Пашков А. 帕什科夫

Пежемский 佩热姆斯基

Перфильев И. 伊·佩尔菲利耶夫

Перфильев М. 马·佩尔菲利耶夫

Петлин Иван 裴特林

Петр I 彼得一世

Петров Иван 伊万·彼特罗夫

Петров Ю. 尤里·彼特罗夫

Писарев М. И. 皮萨列夫

Платковский А. 普拉特科夫斯基

Плотников А. 普洛特尼科夫

Позднеев А. 波兹德聂耶夫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

Поликарп 佟正笏(波里卡尔普)

Потапов 波塔波夫

Потемкин В. П. 鲍爵姆金

Похабов И. 帕哈波夫

Поярков Василий 波雅科夫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Пушкин 普什金

Р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авва Лукич-Владиславич (Владиславич-Рагузинский) 萨瓦·卢基奇·拉古津斯基—务拉的思拉维赤

Разин Степан 斯杰潘·拉辛

Рассохин 罗索兴

Ремезов С. У. 雷米佐夫

С

Саватьев И. П. 萨瓦齐耶夫

Саввин В. П. 萨文

Садовников Д. 萨多夫尼科夫

Самойлов 萨莫依洛夫

Сахаров А. М. 沙哈罗夫

Семенов П. П. 谢苗诺夫

Семенов Панфили 潘菲尔·谢苗诺夫

Сенотрусов Н. 西诺特鲁索夫

Серебrenников И. И. 塞雷伯列尼科夫

Скачков П. Е. 普·斯卡奇科夫

Скрыпичин Ф. 斯克列皮金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

Соловьев С. М. 索洛维约夫

Сорокин 索罗金
Софонов Я. 索福诺夫
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 索甫
罗尼
Софья 索菲亚
Спиранский 斯皮兰斯基
Старков В. 斯塔尔科夫
Степанов О. 奥·斯捷潘诺夫
Строганов 斯特罗干诺夫

Т

Татаринов 塔塔里诺夫
Татищев В. Н. 塔吉谢夫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齐赫文斯基
Толбузин А. 阿列克塞·托尔
布津(额里克谢)
Толбузин И. 伊拉雷昂·托尔
布津
Торгашев 托尔加谢夫
Трескин Н. И. 特列斯金
Третьяков С. 特列季亚科夫
Трусевич Х. 特鲁塞维奇
Трусовый Иларион 伊拉尼翁·
特鲁索维
Туменец В. 图敏涅茨
Тургенев П. 普·屠格涅夫

У

Уваров Л. 乌瓦罗夫

Украинцев Е. 乌克兰因采夫
Ушаков И. 乌沙科夫

Ф

Фаворов И. 法俄罗瓦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费奥多尔·
阿列克塞维奇
Филатьев О. 菲拉季耶夫
Филимон 菲里蒙
Филимонов 菲利蒙诺夫
Филофей 菲洛费
Фирсов Н. Н. 费尔索夫
Фишер И. Е. 费歇尔
фон Шмаленберг 冯·施马伦
堡
Францбеков Д. 弗兰茨别科夫
Фролов Г. 弗罗洛夫
Фукс К. 符克斯

Х

Хабаров Ерофей 哈巴罗夫
Харнский К. 哈恩斯基
Ходоров А. Е. 霍多罗夫
Худяков П. Р. 胡佳科夫

Ц

Цвет Николай 尼古拉·慈维
特

Ч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 Р. 切尔尼
果夫斯基

Чечигин Т. 契奇金

Чулков 楚尔科夫

Ш

Шастина Н. П. 沙斯京娜

Шебенков В. Г. 谢宾科夫

Шишковский Иоаким 岳阿基

穆·石世科夫斯基

Шульгин П. 舒利金

Шульман Н. К. 舒尔曼

Щ

Щеглов И. В. 谢格洛夫

Ю

Юдин И. 尤金

Юматов Амвросий 安福罗西·

尤马托夫

Юрьев В. 瓦·尤里耶夫

Я

Яковлева П. Т. 雅科夫列娃

Ялычев Б. 雅勒切夫

附 录 四

俄 汉 地 名 对 照 表

А	Барабинская степь 巴拉宾 草原
Абакан, X. 阿巴根山脉	Баргузин 巴尔古津
Азербайджан 阿塞拜疆	Белое море 白海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雅克萨)	Березов 别廖佐夫
Алдан, р. 阿尔丹河	Бикин, Р. 毕金河(毕歆河)
Амазар, р. 阿玛杂尔河	Бира, Р. 比腊河
Амгунь, р. 阿姆贡河(亨滚河)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 克(海兰泡)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Боцин 博沁
Ангара, р. 安加拉河	Братск 勃腊茨克
Андрюшкина 安德鲁希金纳	Брянск 布良斯克
Ануй, Р. 阿纽依河	Брянта, р. 勃良塔河
Аргу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额尔古纳 堡	Бура, р. 布尔河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Буря, р. 布列亚河(牛满河)
Астраха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阿斯 特拉罕汗国	Буталск 布塔尔斯克
Ачанск 阿枪斯克(乌札拉村)	В
Б	Верхнез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上结 雅斯克堡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柏海儿 湖)	Верхняя Ангара, р. 上安加 拉河

Верхоленск 上勒拿斯克
Верхотурье 维尔霍图里叶
Всселой 维肖洛耶
Витим, р. 维季姆河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
克(海参崴)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Вятка 维亚特卡

Г

Газимур, р. 加齐木尔河
Гилуей, р. 基柳依河
Гоном, р. 戈诺姆河
Горбица, р. 格尔必齐河

Д

Даубихе, р. 刀毕河
“Даурия” “达斡里亚” (达斡
尔地方)
Джида, р. 哲得河
Джугджур, хр. 朱格朱尔山
Джунгария 准噶尔
Днепр, р. 德聂伯河
Доло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德隆斯克
堡
Дон, р. 顿河
Дубровник 杜勃罗夫尼克
Дукичинское зимовье 杜契
钦斯克冬营

Е

Елатомск 叶拉托姆斯克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河
Енисейск 叶尼塞斯克
Ерав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叶拉文
斯克堡
Еравна, оз. 叶拉夫纳湖

Ж

Желтура 热勒图喇
Желегинск 热烈金斯克

З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
Зея, р. 结雅河 (精奇里江)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钦察(金帐)汗
国

И

Игнашино 伊格那申诺
Илимск 伊利姆斯克
Им, р. 依木河
Иман, р. 伊瞒河 (伊曼河)
Ингода, р. 音果达河
Ирген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尔根斯
克堡
Иркут, р. 伊尔库特河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Иртыш, р. 额尔齐斯河

Искер 伊斯坦城

К

Казань 喀山

Каза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喀山汗国

Кама, р. 卡马河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里海

Кеть, р. 凯特河

Киренга, р. 基廉加河

Козельск 科节里斯克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君士坦丁堡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

Крым 克里米亚

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克里米
亚汗国

Кулара р. 库达喇河

Кудюрь, р. 库珠尔河

Кузнецк 库兹涅茨克

Култук 库勒图克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呼玛尔斯
克堡

Кур, р. 库尔河

Кяхта 恰克图

Л

Лена, р. 勒拿河

М

Мая, р. 马亚河

Мангазея 曼加泽亚

Мейрелке, р. 墨里勒克河

Мога, р. 莫加河

Монастырщина 莫纳斯蒂
尔欣纳

Н

Нарым 纳雷姆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尼布
楚)

Ниж • Новгород 尼什 • 诺夫
哥罗德

Нимелен, р. 尼密连河

Новгород 诺夫哥罗德

Новоз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新结雅斯
克堡

Новосибирск 诺沃西比尔斯
克

Нуямка (Ньюемка), р. 努亚姆
卡河(纽约姆卡河)

О

Обь, р. 鄂毕河

Озерная 奥捷尔那雅

Ока, р. 奥卡河

Олдокон, р. 鄂尔多昆河

Олекма, р. 奥廖克马河
Ом, р. 鄂木河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нон, р. 鄂嫩河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П

Паново 潘诺沃
Перм 彼尔姆
Погдаева 波格达耶瓦
Покровская 波克罗夫斯卡雅
Псков 普斯科夫

Р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в 雷布涅依堡
Рязань 梁赞

С

Свияжск 斯维雅日斯克
Святой Нос, г. 圣诺斯山
Селемджа, р. 西林木迪河
Селенга, р. 色楞格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
Селим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в 昔林
 宾斯克堡
Семнозорк 谢米奥杰尔克
Серпухов 谢尔普霍夫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би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西伯利

亚(失必儿)汗国

Сихотэ-Алинь, хр. 锡霍特—
 阿林山脉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Становой хр. 斯塔诺夫山脉
 (外兴安岭)

Стрелка 斯特列尔卡
Сургут 苏尔古特

Т

Тагил, р. 塔格尔河
Тагчен 塔格切
Тара 塔拉
Тверь 特维尔
Телем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в 车勒
 姆宾斯克堡
Тобол, р. 托博尔河
Тобольск 托博尔斯克
Толгин 托尔金
Томь, р. 托木河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Тугир, р. 通吉尔河
Тула 图拉
Тунгуска, р. 通古斯河
Тункинский остров 通肯堡
 砦
Тура, р. 图勒河
Туруханск 土鲁汉斯克
Тыр 蒂尔(特林)

Тюмень 秋明

У

Уда(Удь), р. 乌第河(乌达河)

Удинск 乌金斯克

Улья, р. 乌利亚河

Умлекан, р. 乌姆列坎河

Урал, хр. 乌拉尔山

Урка, р. 乌尔喀河(鄂尔河)

Урум, р. 乌伦穆河

Уссурийск 乌苏里斯克(双城子)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 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

Усть-Кут 乌斯季-库特

Устюг Великий 大乌斯丘格

Учур, р. 乌丘尔河

Х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Хилок, р. 昔洛克河

Хунгари, р. 宏加力河

Ц

Цаган-Усун, р. 查干乌松河

Цурухайту 祖鲁海图

Цыпа, р. 崔巴河

Ч

Черная, р. 绰尔纳河

Чернигов 车尔尼戈夫

Чикой, р. 楚库河

Чита 赤塔

Чусовая, р. 楚索夫河

Ш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уфа, р. 舒藩河(舒法河)

Ю

Югорский Камень 乌格拉石崖

Югра 乌格拉

Я

Яблонный, хр. 雅布洛诺夫山脉

Якутск 雅库茨克

Ямышев, оз. 雅美谢夫湖